# 从陶渊明到苏轼

## 文人的理想品格



文化中国

永恒的话题

张亚新／著

济南出版社

/整体策划：丁少伦
/责任编辑：王　菁
赵志坚
/封面设计：张玉泰
/版式设计：戴梅海
/插图设计：侯文英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

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

盛世情怀：天汉雄风与盛唐气象

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

清官崇拜谈：从包拯到海瑞

大众文化的经典：四大奇书纵横谈




ISBN 7-80629-993-9
定价：20.00 元

# 从陶渊明到苏轼

文人的理想品格

文化中国

永恒的话题

张亚新/著

济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张亚新著.—济南:
济南出版社,2004.5

(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

ISBN 7-80629-993-9

Ⅰ.文... Ⅱ.张... Ⅲ.作家—人物研究—中国—古代
Ⅳ.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24769 号

**整体策划** 丁少伦
**责任编辑** 王 菁 赵志坚
**封面设计** 张玉泰
**版式设计** 戴梅海
**插图设计** 侯文英

**出版发行** 济南出版社
**地　　址** 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251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jnpub.com
**印　　刷** 日照报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 彩页 4
**字　　数** 225 千
**印　　数** 1—4000 册
**定　　价** 20.00 元



明·张鹏·渊明醉归图轴



李白像



李白诗意图




饮中八仙图（自左至右：焦遂、苏晋、崔宗之、李适、李琎、李白、贺知章、张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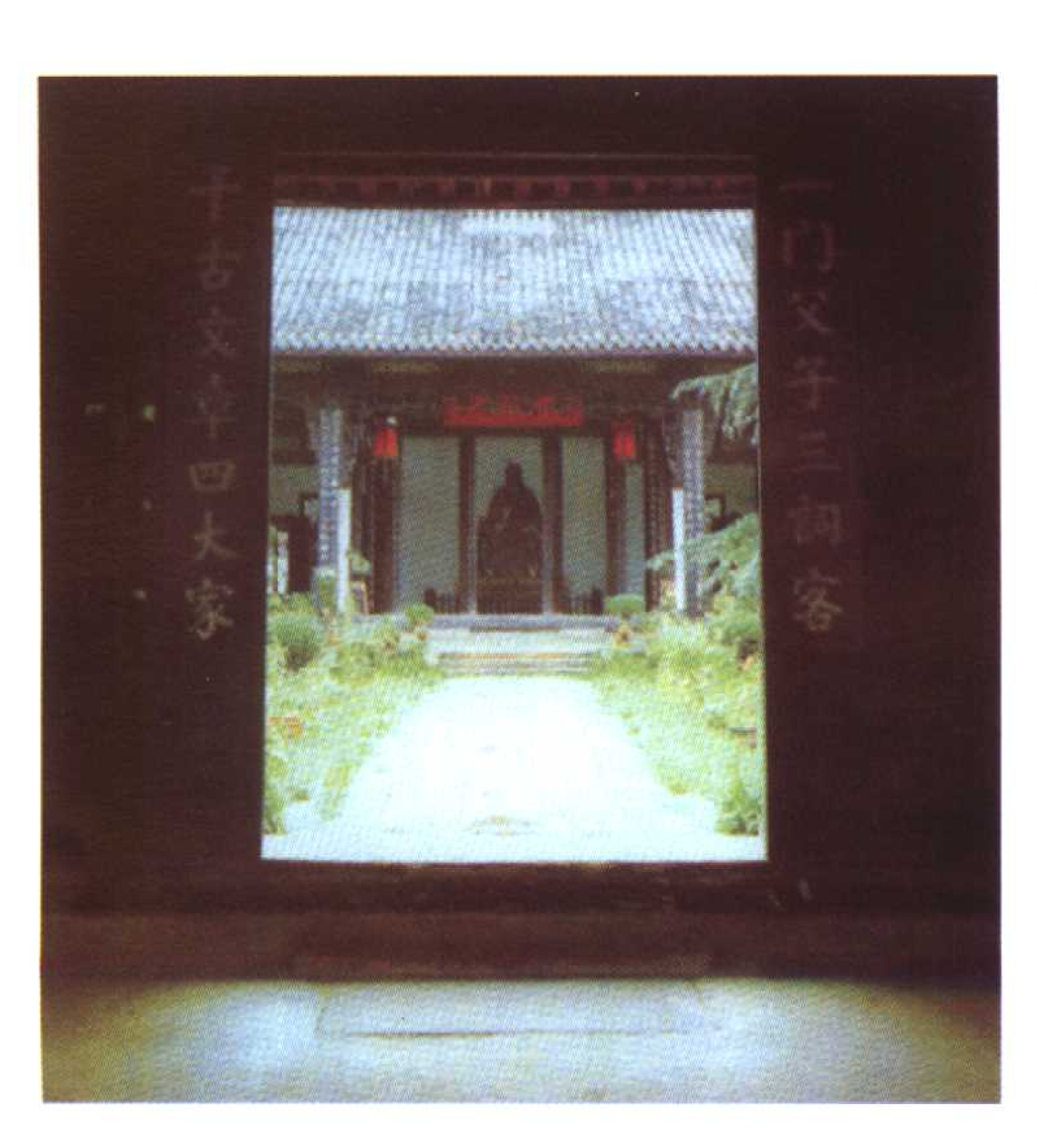
苏轼像



明·东坡题扇图


苏洵像


苏辙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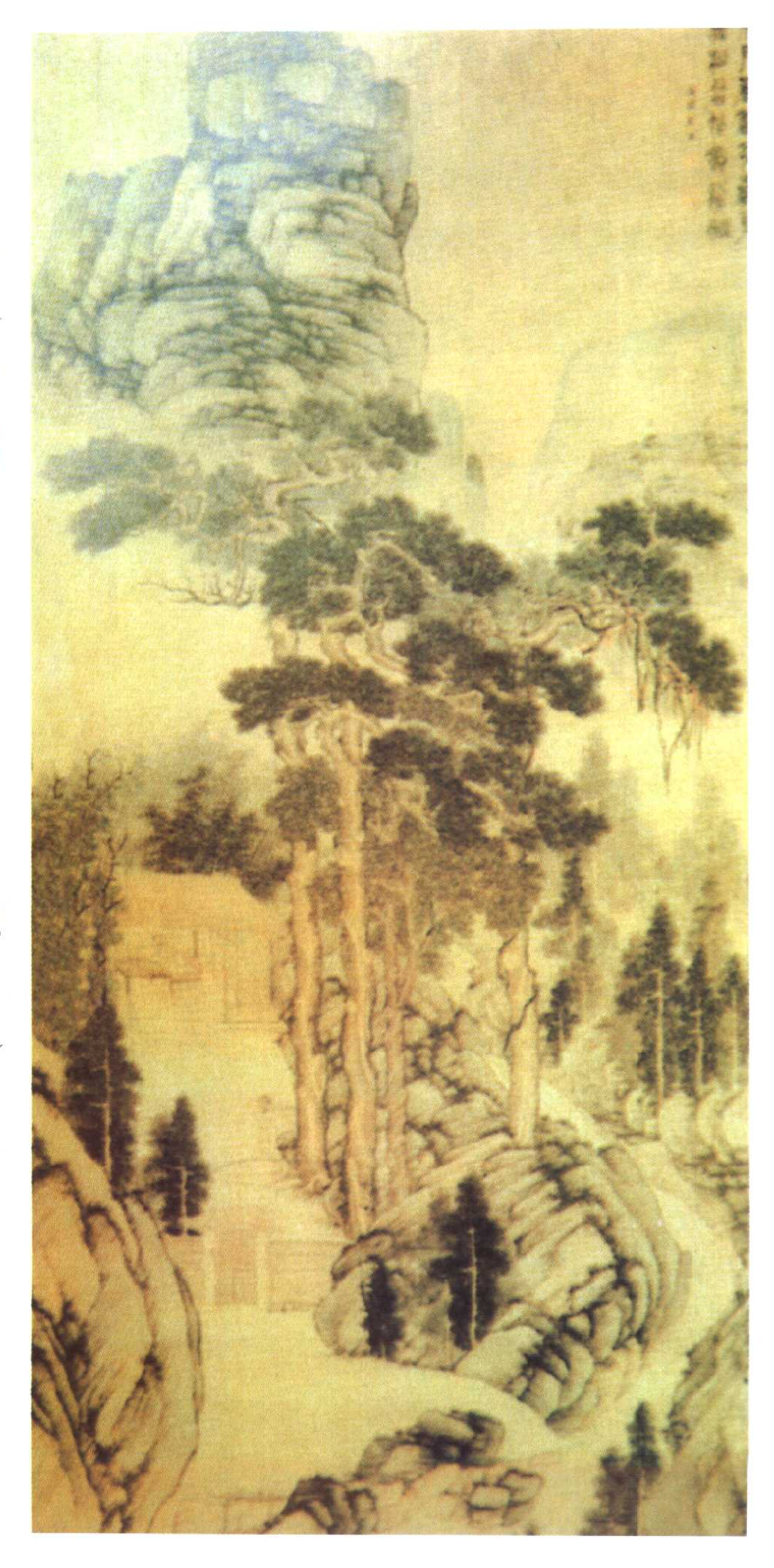
三苏祠




唐 · 韩滉· 文苑图




南宋·马远·踏歌图轴（表达了『丰年人乐业，垅上踏歌行』的诗意）



画王维诗意图轴（表现了『闭户著书多岁月，种松皆作老龙鳞』的意境）

# 总 序

乔 力

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中国历史上对各族人民的生存和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对世界文明作出了杰出贡献。尤其是它的内在精神已渗透到炎黄子孙的血脉中，其影响是弥久深远的；当代中国人——无论是谁，无不深深地打上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

历史的车轮行驶到今天，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宝贵资源。对于传统文化，我们的态度是，立足于当代中国，从我们的问题或我们的精神需要出发，以新的视野或现代意识，对中国文化中某些被反复咏叹的东西给以重新观照或解读。

现代派诗人、著名文学史家闻一多先生宣称："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说'诗唐'——懂得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如果善于理解这种逆向思维的丰厚内涵，并由此引申开去的话，那么，我们则想说：中国文化虽早已成为国人耳熟能详的话题，但假如只满足于平面式的浅尝辄止，就很容易指木为林或见林失木，最终反倒是空泛无得并且莫知归依了。所以，我们现在才尝试着变换习惯性的认知方式，移果就因、因反作正，从文化的特定视角来重新解读而非直接面对某些重大的历史或文化主

题,特意选择那些人们普遍感兴趣即茶余饭后可供谈资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作为题材——这是一些世世代代都在反复谈论的话题。问题在于,今天应用一种什么样的眼光和口吻重新谈论它。我们力求以扎实确凿的史料为根基,采取富有文采、生动流畅的散文笔法,对其进行多元观照与文化透视,反映重大历史、文化主题,并给予历史阐释和文化反思,折射出某些文化精神。缘此而往,就有可能寻找到另一扇尚未被开启过的门扉,那里面当有着不尽胜境、无限风光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辨理……所以,本丛书强调知识性,但不是一般性的知识读本;强调学术根基,但不是纯粹的学术专著;强调可读性,但不是违背史实的任意杜撰;强调个人新见,但不是只顾新异的凿空立论和华而不实的游戏笔墨。浓郁的文化观照和多出新见卓识(观点新或视角新),是本丛书的特色和宗旨。

本丛书中的每一种,都精心选择国内在各自领域有造诣的专家学者撰写,注重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的叙述方式,采用图文并茂的表现形式,选择相关的、经典的图片,采用彩色插页和黑白附图(编者按:本丛书采用了少数今人作品,因无法与原作者取得联系,恳请当事人见书后尽快与我们联系,以便寄奉样书、稿酬。)的方式,从而更具鉴赏价值和收藏价值。本丛书面向中等文化以上的广大读者群,使其在轻松、趣味盎然的阅读中,得到启迪和收获,以提高综合文化素质和鉴赏品位。

本丛书强调"可操作性和持续发展的张力",即灵活性和巨大的包容性,作为一个长期的品牌选题,视具体情况,分为若干辑陆续推出,逐步完成对文化中国重大历史、文化主题的另样解读。

本丛书第二辑推出五种,如依类相从取近者归纳的话,大略

可以划分成三种范型：

首先是在宏大开阔的社会历史发展背景上，选择最能够标志中国及中华民族形象、文化精神的朝代中的某一特定段落，给予全方位的描述与评析，揭示其内涵实质及盛衰成败的因果、规律。如西汉和盛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值得自豪的两个时期，《盛世情怀：天汉雄风与盛唐气象》就精辟地指出其雄风与气象是当时各种先进力量、因素的综合产物，是当时朝野上下一心、顺时应变，注重人文关怀、提升人的价值、务实求新、积极进取的结果。它们大获成功的经验乃至终归衰落的教训，也与其创造的辉煌文明成果一样，同属于留给后世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今天再细细品味。

其次是选择在一定历史时段内先后或联袂产生、出现的，承载深厚文化一人文意义的若干部文学经典著作，进行综合评述和观照。如从明朝末年起便被称作"四大奇书"的长篇通俗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不仅形象地描绘出某个历史时期内各阶层中国人的生存样式与生活方式，还反映了他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及理想社会的憧憬追求，也体现着广大民众的丰富创造活力和审美需求。《大众文化的经典：四大奇书纵横谈》以大众文化为视点，从作品主要人物和事件的关键问题的角度切入，探讨了它们的基本文化精神与主要价值取向。《三国演义》"拥刘反曹"的倾向传达了"天下惟有德者居之"的政治要求；《水浒传》"逼上梁山"、"异姓一家"图景表现出了对贪官污吏的憎恨及小生产者乌托邦式的向往；《西游记》受到宋以来心性之学的浸染，演绎着以"修心炼魔"为核心的童话故事，曲折透露出对真、善、美的求索；《金瓶梅》则使用极贴近世俗民众的语言，去再现明代中后期社会转型过程中各色人物的生活状态。要

之，“四大奇书”不仅深刻影响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文化性格，而且也成为世界各国人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文化载体。

再者是关注处于中国历史不同社会阶层、具有不同身份属性的人物群体类型，分别述写他们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肩负的责任使命以及其实施的曲折过程、文化一人文品格与艺术精神特征等。如《流民皇帝：从刘邦到朱元璋》采取文史结合的方式，比较全面、完整、系统地论述了从秦汉到朱明的一批流民皇帝，从在社会最底层的卑贱小人物到奋争崛起而建立一代莫大之功业的专制帝王的历程，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演化规律予以分析，特别强调适者生存，于磨难困窘中增长才干智慧。又如《清官崇拜谈：从包拯到海瑞》，从中国封建社会状况、皇权政治体制的本质、文人士子的理念与人格、下层民众百姓的渴求愿望以及时代的思想文化观念等不同层面，多视角、多元化地观察、探讨了历史上形成清官崇拜情结的动因，清官的道德思想根源，重点叙述了历代清官形象标志人物的事迹，他们的是非观、善恶观、行为特征等。再如《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则首言文人的这种理想品格是中华民族理想品格的重要组成部分；再联系具体人物的言行志趣、生平行迹，论述其丰厚意蕴与各种不同类型范式，兼纳文化品格、文学品格、艺术品格、哲学品格种种，是为中华民族精魂的瑰宝。

本丛书的目的是面向社会广大读书界，自然希望得到更多读者朋友的关注。倘蒙您慨然指出不足谬误之处，相互切磋商酌，那便是传递出一份浓浓的友情，而我们的欢迎与感谢之情自是不言而明的。

二〇〇四仲春之月于济南玉函山房

# 目　录

# 引 言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极看重人的品格的锻炼和修养的。一个人的品格是高尚还是卑下,关系到他个人的形象,关系到社会对他的评价,自然也关系到他在社会上、历史上的地位。一个人品格的锻炼和修养,与他所处的生活环境、社会风气及所受教育的状况等情形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还是他个人的追求、修养及所从事的社会实践活动。他必须从自己的道德品质、思想行为、人生境界、

人格理想等多方面入手,甚至必须注意到自己的一言一行。如果一个人能从总体上、特别是在大是大非问题上表现出崇高的品格,便能够获得人们很高的评价,甚至成为万众倾仰的对象,从而对社会、对历史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古代的思想家、教育家几乎无一例外都是极为看重人的品格的锻炼和修养的,其中儒家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一部《论语》,其内容十之八九都或多或少与这个问题有关。孔子构建的理想品格的基本规定,就是能遵循"仁"和"礼"。所谓"仁",就是"爱人"(《颜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雍也》);就是"能行五者(指恭、宽、信、敏、惠)于天下"(《阳货》);而其最高境界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雍也》),能"修己以安百姓"(《宪问》)。而实行"仁"必须以"礼"为规范,即所谓"克己复礼为仁"(《颜渊》)。孔子主张把品格的锻炼和修养贯注于日常的生活和言行之中,所谓"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就是要求养成少说多做的习惯。孔子还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卫灵公》鼓励人们在人格理想与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发生冲突时,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的利益乃至生命,去追求和实现美好的人格理想。类似的言论,在其他儒家经典及阐释、运用、发挥儒家学说的典籍、文章中也随处可以见到,具体内容不断有所丰富和发展。比如孟子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将"义"、"智"与"仁"、"礼"并列,均看成是构建理想品格的要素。又比如司马迁在《报任少卿书》中说:"仆闻之:'修身者,智之符也;爱施者,仁之端也;取予者,义之表也;耻辱者,勇之决也;立名者,行之极也。'士有此五

者,然后可以托于世,而列于君子之林矣。”则将“智”、“仁”、“义”、“勇”、“行”看作是构成理想品格的要素,并对构成各要素的最重要的品质谈了自己的理解。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儒家之外,其他各家对这个问题同样是很重视的,只不过各家构建理想品格的要素或多或少有所不同,悬出的目标、强调的重点或多或少有所不同。比如道家强调顺应自然、清静无为、高蹈绝尘、洁身自好、少私寡欲、功成身退,墨家强调简朴节俭、勤劳刻苦,法家强调维护君权、勇于任事、敢于法治、雷厉风行,佛家强调清心寡欲、内心宁静、悲天悯人、乐善好施等等。各家的主张和追求既有彼此对立之处,但同时也有不少是可以相通、相似甚至大体相同的。各家主张互相影响、吸纳,彼此交融,从而形成了一些几乎可以被认为是公认的理想品格的构成要素。由于儒家思想是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因此儒家的理念、主张、追求在传统理想品格的构成要素中占据着主导地位。

封建社会的知识分子,至少多数人是把理想品格当作自己的倾仰对象、当作值得自己为之追求的人生境界和人生目标的。只不过由于人们的出身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所处时代、所受教育、人生经历、人生境遇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因此他们对理想品格的理解也不尽相同甚至很不相同。他们对理想品格的追求,也就既有彼此相同或相似的目标,也有彼此相异的目标,从而使得人们所追求的侧重点总有所不同,每一个人的品格表现总是在某个方面或某些方面更为突出。即使是同一个人,在他人生的不同阶段,在他遭遇不同的生活境遇时,他的品格表现也有所不同。因此,就一个社会的品格形态而言,它在总体上呈现出的是一个既有突出共性、又有着丰富个性的精彩纷呈的局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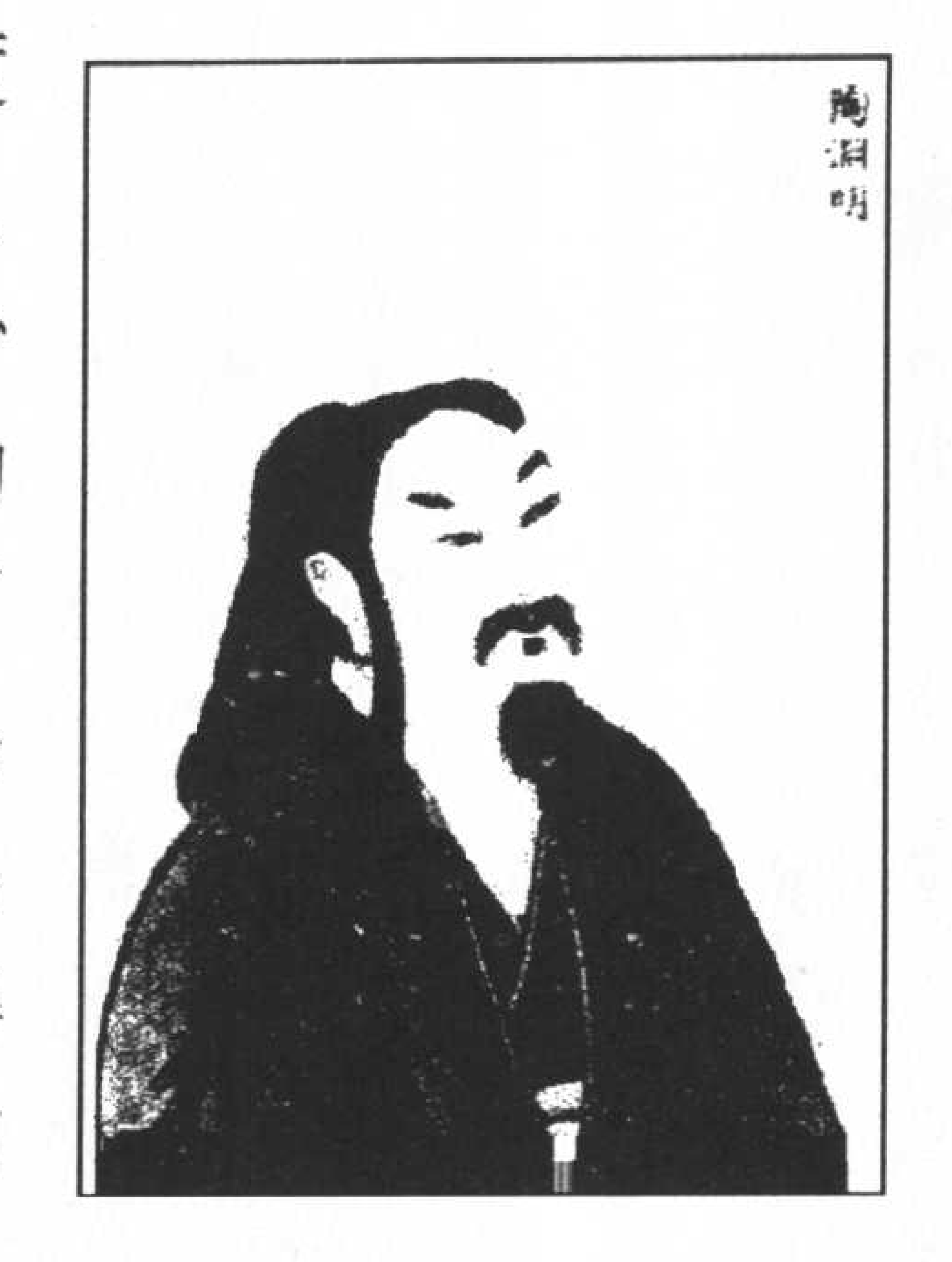
但不论在理解、追求和表现上有何差异,只要是得到众人认同的理想品格,就总会有不少的人们去追求。在漫长的古代社会中,在理想品格的某些方面表现得非常突出的人就如天上繁星,数不胜数。其中的一些佼佼者,不仅在当时影响巨大,直到今天还闪耀着夺目的光彩。陶渊明、李白、苏轼就是其中突出的代表。他们都是杰出的文学家,其人生经历、理想抱负、品格表现又都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同样都得到千百年来无数人们的喜爱,因此大体上算得上是一个类型的人物。文人理想品格的许多方面在他们身上都有表现,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把他们看作是古代社会具有文人理想品格的代表,至少是文人理想品格在许多重要方面的代表。现即以这三个人为例,说明具有理想品格的人是如何受到人们的欢迎、倾仰并进而在历史上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的。在此基础上,对以陶、李、苏三人为代表的古代社会文人理想品格的构成、表现作一些具体分析,并说明理想品格在构成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精神传统方面所具有的作用。



陶渊明(365? —427),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自号五柳先生。晋、宋之际的大诗人,也是一位著名的辞赋家和散文家。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人。东晋大司马陶侃之孙,但到陶渊明时,家道已经衰落。少年时期在家闲居。29岁时,因亲老家贫,入仕为江州祭酒,但因不堪吏职,不久自解归。此后又曾先后做过镇军将军参军、建威将军参军等,但时间都不长。41岁时,为彭泽令,但仅在官80余日,即辞归,从此隐居躬耕20余年,不再出仕。为开创田园诗派的诗人。有《陶渊明集》传世。

陶渊明隐居不仕、洁身自好的举动在当时就引起了人们特别的关注。陶渊明去世后,他的生前好友颜延之写了一篇《陶征

士诔》，对他的品格操守作了高度评价和由衷赞美。沈约撰《宋书》，将陶渊明收入《隐逸传》，说他“少有高趣”，并通过对其生平事迹的罗列介绍，在客观上展示、肯定了陶渊明“躬耕自资”、不慕荣利的品格之美。钟嵘在《诗品》中则说：“每观其文，想其人德。”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昭明太子萧统。他在《陶渊明传》中说陶“颖脱不群，任真自得”，在《陶渊明集序》中说陶“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自非大贤笃志，与道污隆，孰能如此乎？余素爱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不仅对陶渊明的思想品格表示了高度的认同，而且作出了在那个时代无人能够企及的高度评价。




陶渊明像

陶渊明的诗文质朴自然，在崇尚绮丽文风的南朝不被世俗看重，但也并非不为人知。南朝宋鲍照有《学陶彭泽体》，稍后江淹《杂体诗》有《陶征君潜田居》，可见陶诗已开始成为学习的对象。钟嵘《诗品》则将陶诗列入中品，并对其人其文作了比较全面的评论。在这方面萧统同样特别值得一提。他特地为陶渊明编集作序，在序中说陶“文章不群，词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抑扬爽朗，莫之与京。横素波而傍流，干青云而直上。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不仅慧眼独具，非常准确地指出了陶渊明诗文的特色，而且对此作出了同样是前所未有的非常高的评价。

到唐代，陶渊明受到更多人们的重视，杜甫屡称“陶谢”，李

白、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韩愈、白居易、柳宗元等人于陶渊明其人、其诗、其事均多有称引和赞美,王维、孟浩然等人更以陶渊明的田园诗为学习的榜样,从而形成了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上影响很大的田园山水诗派。

至两宋,陶渊明的影响达到高峰。谈论陶渊明成为一时风气,评论陶渊明的人上至宰相、朝臣,下至隐士、僧侣,几乎遍布社会各个阶层,而评论到陶渊明的诗话、笔记多达70余种。历代"拟陶"、"和陶"之作不下千首,宋代占了很大比例,其中苏轼的"和陶"之作最多。辛弃疾对陶渊明也情有独钟,据袁行霈《陶渊明与辛弃疾》一文的统计,辛词中吟咏陶渊明、提及陶渊明、明引陶诗陶文、暗用陶诗陶文者共60首,将近全部辛词的1/10。在宋代还出现了一个编刻陶集的热潮,可考知的抄本、刻本就有16种。最早的陶渊明年谱和陶渊明写真(画像)也出现在宋代。

宋以后,陶渊明一直是人们关注、评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仅民国以来所出版的陶渊明研究专著就不下数十种,其中有10余种为日本学者撰写。陶渊明的作品,在公元8世纪就由当时来华的日本留学生和僧人带到日本,在日本广为流传,陶渊明的生活和创作成为不少日本人吟咏的题材、研究的对象。在海外的其他国家和地区,陶渊明也具有不小的影响。

李白(701—762),字太白,号青莲居士。唐代大诗人。祖籍陇西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其先人于隋末流徙西域,李白即出生于中亚碎叶。5岁时随父移居绵州昌隆(今四川江油)青莲乡。少年时在蜀中就学,25岁时"仗剑去国,辞亲远游"。天宝初应诏赴长安,供奉翰林,但不久即遭谗去职。安史乱中,曾为永王李璘幕僚,永王兵败后受牵累,被长流夜郎,途中遇赦。晚年飘泊东南一带,依当涂令李阳冰,病卒。有《李太白集》传世。



李白像

李白在他生活的当时就曾引起很大的轰动，当时人们对李白的学问、文章、谈吐、风神、品格都很赞赏。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说："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礼部尚书、散文名家苏颋出任益州刺史，李白时年二十，带着自己的作品在半路上拜谒。苏颋读过李白作品，大为赞赏，对其同僚说："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指司马相如）比肩也。"李白初到长安，太子宾客贺知章遇之，读其《蜀道难》未竟，竟称道者数四，称李白为"谪仙人"，因解金龟（一种饰物）换酒痛饮。经贺知章推荐，李白得入翰林，从此诗名大振，作品远播。大诗人杜甫对李白极为钦佩，在赴长安途中遇到李白，竟改变路线，随之东下。分别之后，念念不忘，对李白敏捷的才思及其作品非凡的艺术魅力赞赏有加。青年诗人魏万（后改名魏颢）因仰慕李白，追寻李白的游踪达数千里，最后才得以在广陵相见。

李白身后，盛誉如潮。韩愈《调张籍》写道："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从此李白与杜甫并称，被推为唐诗的最高典范。此后千百年来，李白其人其诗一直广受关注，一直是古典文学和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热点。在海外，亚洲有很多国家和地区对李白早有研究，日本研究李白的历史尤为悠久。李白在西方也受到众多学者的喜爱，不少西方学者认为：李白不仅是属于中国的诗人，同时也是属于世界的诗人，他的诗歌是世界文学的一

部分。近年来,世界各国研究李白的学者越来越多,李白的影响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减弱,相反越来越大。

还值得一提的是,如果我们翻检一下《方舆胜览》之类的书中有关地方名胜的记载,就会发现谪仙楼、太白酒楼、李白读书台、李白书院、李白岩、太白捉月亭、李翰林宅、李翰林祠、桃花岩、峨眉亭等与李白有关的古迹遗址特别多。以李白为题材的绘画也不少,如《李白酒船图》、《李白舟中醉卧图》、《太白醉归图》、《太白独酌图》、《李白醉饮图》、《李白扶醉图》、《太白裘马换酒图》、《李白玩月图》、《李白对月图》、《李白泛月图》、《太白捉月图》、《李白扪月图》、《李白待月图》、《李白月下泛舟图》、《李白问月图》、《李白邀月图》、《李白对月饮图》、《李白应召图》、《李白还山图》、《脱靴返棹图》、《谪仙泛舟图》、《太白扁舟图》、《李白观瀑图》、《太白骑驴图》、《太白骑鲸图》、《李太白登泰山观日出图》等等,难以一一列举。列代文人墨客的题咏也特别多,据《李白研究资料汇编》,单是明清两代的咏李诗就多达809首。还有许多关于李白的传说,如李白为天上太白星托生、唐玄宗曾亲手为李白调羹、李白曾让玄宗最宠信的宦官高力士为他脱靴之类。连李白的死,也被蒙上了神话的色彩,如有人说他是醉酒后入水中捉月而死,有人说他是奉上帝之召,还归星位,坐于鲸背,音乐前导,腾空而去的。这当然不可能是事实,但同样也是可以说明李白在人们心中的地位和影响的。



苏轼(1036—1101),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北宋著名词人、诗人,也是卓有成就的散文家、词赋家和书画家。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宋仁宗嘉祐二年(1057)进士。神宗时,因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外放通判杭州,历知密、徐、湖诸州。被劾作诗讪谤朝廷,贬谪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元祐年间,旧党执政,累迁

翰林学士。复因与司马光政见不合，为旧党所恶，出知杭、颍、扬、定诸州。哲宗亲政，斥逐旧党，贬惠州，再贬儋州。徽宗即位，被赦北归，病卒于常州。有《苏东坡集》、《东坡乐府》等传世。



苏轼像

苏轼同李白一样，年青时就曾产生很大影响。苏轼22岁时随父苏洵及弟苏辙赴京师应礼部进士试。当时的主考官是文坛宗主欧阳修，他一看到苏轼的试卷《刑赏忠厚论》，便惊叹异常，本欲置为第一，但因疑此文为其门客曾巩所写，便置为第二名。但在复试《春秋》对义时，还是赢得了第一名。欧阳修在《与梅圣俞书》中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可喜可喜。"嘉祐五年(1060)，欧阳修又在《举苏轼制科状》中称苏轼"学问通博，资识明敏，文采烂然，论议蜂出"。经欧阳修及其他元老重臣如韩琦、富弼等人的推挹，苏轼一举成功，名满京师。连皇帝也十分欣赏苏轼的文章和才能，据《宋史·苏轼传》载，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后来"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欧阳修去世后，苏轼便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坛盟主。当时的文士对他都非常倾仰，著名词人秦观刚见苏轼时即说："生不愿封万户侯，但愿一识苏徐州。"苏轼在任地方官期间，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因此他在普通民众中也享有很高的声望。他在徐州治水有功，调离徐州时，民众纷纷前来送行。因他在杭州"有德于民"，因此"家有画像，饮食必祝。

又作生祠(为活着的人所立的祠堂)以报”(《宋史》本传)。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苏轼病逝。据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载,当时“吴越之民相与哭于市,其君子相吊于家,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太学之士数百人,相率到佛寺祭奠。其后不久,党祸复起,苏轼的著作和墨迹被令禁毁,然而“禁愈严而传愈多”,苏轼的名气反而越来越大。不久,皇家开始搜集苏轼的手稿,悬价每一篇赏制钱5万文。还有人出5万制钱买一个学者书斋上苏轼题匾的3个字。后来金人攻下京师,也特别索求苏轼的手稿和书画。

苏轼的创作,历来享有极高的评价。其诗在有宋一代,就有各种刊本约20种,被认为是奠定了宋诗体制与风格的基础。苏轼“以诗为词”,扩大了词境,提高了词格,从而打破了艳词一统天下的局面,被誉为豪放词派的创始人。其文纵横恣肆,雄豪博辩,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在“三苏”中被认为是成就最高的一个。其赋、其书、其画,也都能独辟蹊径,自成大家。总之,苏轼历来被认为是宋代最伟大的文人,其创作成就堪称北宋文学的最高峰。直到今天,苏轼的思想和创作仍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和重点,研究成果可谓汗牛充栋。苏轼在海外也广有影响,不仅在亚洲的一些国家和地区苏轼研究有十分深厚的基础,在欧美学界也不断有足资借鉴的成果问世,研究呈现出方兴未艾之势。



值得一提的是,苏轼也同李白一样,由于一生到过很多地方,因此各地留下来的与他有关的遗址、胜迹、传说、纪念物也特别多。仅以海南儋县为例。那里现在不仅有东坡书院,还有东坡村、东坡田、东坡井、东坡路、东坡桥、东坡小学、东坡公园,还有所谓东坡话、东坡笠、东坡豆等。东坡似乎无所不在,当年他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在人们心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记。

陶渊明、李白、苏轼对后代产生了如此之大的影响，而他们彼此之间，后者对前者在总体上也是欣赏、肯定、倾仰的。在李白诗中，直接吟咏陶渊明，直接引用、化用陶诗语句的不下30首，情调、意境、风格有类陶诗的则更多。“河阳富奇藻，彭泽纵名杯。所恨不见之，犹如仰昭回。”(《赠从孙义兴宰铭》)“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表达了对陶渊明无比景仰、亲近、只恨不得一见的感情。清人马位在《秋窗随笔》中说：“二公风流孤迈，一种旷世独立之致，异代同情。”正因为两人在品性、人格、精神等方面有相通和一致之处，所以才能“异代同情”，产生如此共鸣。

苏轼对于陶渊明，则更是喜爱、推崇之至。苏轼在其《书渊明〈羲农去我久〉诗》中说：他曾得到一本江州东林本《陶渊明集》，“字大纸厚，甚可喜也。每体中不佳，辄取读，不过一篇，惟恐读尽，后无以自遣耳”。苏轼先后和过陶诗109首，并将这些和诗亲自编纂成集，交付其弟苏辙为之作序，“以遗后之君子”，对这些和陶之作极为珍视。此后，苏轼又和作了15首，加起来一共和作了124首，差不多占到苏诗总数(2700多首)的1/20。不仅诗有和作，词也有深受影响者，如《哨遍》(为米折腰)就是取陶渊明的《归去来兮辞》加以改造而成的。此外，引用、化用陶诗陶文，思想感情、意境风格逼近陶诗陶文的还有不少。苏轼对陶诗还发表了一些独到精辟的见解。苏轼晚年流宕迁徙，亲历田园，因而其思想性格、处世态度大幅向陶渊明靠拢，对陶渊明有了高度的认同感，甚至说出了“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这样的话。苏轼对陶渊明的喜爱和推崇，对扩大、提升陶渊明在宋代及其后的影响，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苏轼对李白其人其诗也颇多赞誉之辞。其《李太白碑阴记》在引夏侯湛赞东方生语“开济明豁，包含宏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跆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者也”之后，紧接着说：“吾于太白亦云。”对李白的品格气节作出了极高的评价。《沿流馆中得二绝句》其二写道：“李白当年流夜郎，中原无复汉文章。纳官赎罪人何在？壮士悲歌泪万行。”则对李白长流夜郎的遭遇表达了深深的同情。苏轼自己曾一再遭贬，所贬之地多偏远荒凉，因此有人认为此诗实乃自况之作。清人潘高《古意》云：“骑鲸何处来？飘然下八极。后有苏子瞻，前有李太白。一流夜郎西，一居儋耳侧。”则因此而将苏、李相提并论。苏轼豪气横溢，笔力奇横，也与李白极为相似，因此前人屡有认为“东坡诗似太白”者。苏轼对李白诗从总体上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其《书黄子思诗集后》有语云：“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

陶渊明、李白、苏轼彼此既有许多相类之处，相互间又是如此欣赏、推重，因此古代已有不少人将他们相提并论。“太白渊明总一身，休将出处较比邻。”（胡祗遹《题刘仲修悠然亭》）这是将陶、李并举。“眉山学士百代豪，夜郎谪仙两争高。”（杨慎《苏祠怀古》）这是将李、苏并举。“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黄庭坚《跋子瞻和陶诗》）这是将陶、苏并举。还有将陶、李、苏三人在很小范围内同时并举者，如“更无双子美，止有一渊明。响接东坡和，肩随太白名。”（方回《诗思十首》）即是。事实说明，虽然陶、李、苏三人所处时代、出身经历很不相同，处世态度、性格志趣、创作实践也有不少差别，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共同性、相似性、类型性仍是相当突出的，因此人们才会“求同存异”，如此将他们

相提并论，并给予褒肯和赞美。

上面不惮词费，列述了陶、李、苏三人曾经和仍在发生着的影响。他们之所以得到人们如此广泛的喜爱和如此崇高的评价，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比如他们的经历比较独特，他们的个性十分鲜明，他们的才能异常杰出，他们在许多方面卓有建树等等。但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具有卓异的品格。前人对他们的褒肯之辞，有不少就是从这个角度着眼的，比如《宋史》本传说苏轼“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就在相当程度上涉及了这一问题。而其卓异的品格，具体表现则是多方面的。综观陶、李、苏三人一生的表现和千百年来人们的评价，其具体表现主要有以下的一些方面：

他们具有忧时伤国、济世爱民之心，把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难放在心上，总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好事。而对黑暗的政治和那些祸国殃民的当道人物，则是怒目以对，刚正敢言，决不因个人的利益和安危而有所退避、动摇，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难能可贵的忘我精神。

他们具有高远的理想和抱负，或以天下为己任，欲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或以保持品格高洁为追求，不与世俗同浮沉。志存高远，虽历经磨难而不稍移。

他们敢于坚持自己的主张、原则和既定的人生道路，不因政敌的反对、打击和个人遭受太多的磨难、艰辛而放弃，与尔虞我诈、蝇营狗苟格格不入，超拔于流俗之上，清浊异路，是非分明，守正不阿，特立不群。

他们胸襟博大，乐观旷达，随缘自适，享受人生，即使迭遭政

治迫害，即使面对饥寒死亡，也能泰然处之、一笑置之，达到了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

他们从不知矫情虚饰为何物，处事接物，能不拘俗套，所说所写，纯是内心思想和感情的自然流露，顺乎天性，出之自然，诚挚坦率，跌宕不羁，始终保有一颗天真烂漫的赤子之心。

他们怡性田园，纵情山水，发现了田园、山水的真美，实现了与田园山水的和谐相处，在田园山水中感悟到了人生的真谛，寻求到了人生的理想。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还亲自在田园劳作，发现了劳动的价值，和劳动人民建立了真挚的感情。

他们对人温和友善，慷慨厚道，诚恳热情，不仅是负责的父兄，深情的丈夫，而且是真诚的朋友。甚至对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他们也并不记挂心中，能对事不对人，展示出民胞物与的宽阔胸怀。

他们都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极深厚的感情，都有广博深厚的文化修养，有杰出的文学才能，并且极富创新精神，在诗、词、文、赋等领域各自都有重大突破和很高建树，在书法、绘画等领域也都取得了很高成就，光大了祖国的文化遗产，丰富了祖国的文化宝藏，多才多艺，充满智慧，才华卓异，是几百年难得一遇的人才。



他们具有哲人的眼光和修养，常常发表对社会、人生、自然和艺术的哲学思考，感受敏锐，见解深刻，思想透彻，显示出一种既深邃又灵动的哲人之美，有着启人情思、发人深省的永久魅力。

他们在儒道玄佛中漫游，但能主儒术而不迂，杂佛老而不溺，对各家都既有所取，也有所舍，从而融汇众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精神世界、深厚的品格修养和高远的人生

追求,从而达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

当然,上面仅就陶、李、苏三人的总体表现而言,并不是说他们三人在所有各个方面所表现的程度都是一样的,而是各有特色,各有侧重。这些表现无可辩驳地说明,他们都具有卓异的品格,既有卓异的政治品格,也有卓异的文化品格、文学品格、艺术品格和哲学品格。他们拥有很大的名气,千百年来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些卓异的品格,就构成了他们名气的骨干,成了他们影响的精髓,成了他们身上最可宝贵、最闪光的东西。这些卓异的品格在别的一些人身上也能看到,但像他们这样将众多卓异的品格荟萃于一身,表现得如此集中、突出、鲜明,却是很少见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将这些卓异的品格都固化到了他们杰出的作品中,人品藉由文品得到了充分、生动的表现,千千万万的人们喜欢他们的作品,得以具体感知他们的品格,他们因此得以精神不死、光辉永存,这是别的许多同样也具有卓异品格的人们所难以比拟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以陶、李、苏三人为具有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代表,着重加以介绍、分析、评论的一个重要原因。



诚然,任何理想的品格都必然要深刻地打上时代的烙印,都要受一定社会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不可能是超时空的,因此随着时间的流逝,有些理想品格的光彩就会逐渐黯淡下去。何况,陶、李、苏三人也都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品格表现即使按古代的标准也并不都是理想的,古代的人们也并不对他们事事都表认同。但是,就总体而言,至少就品格表现的许多重要方面而言,他们的表现在许多古代文人看来是理想的,是可以被视作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代表的。这种理想品格既得到人们的公认,成为众多人们心仪的对象和自觉不自觉地

学习的榜样，它就必然地要融入我们民族的人文精神、我们民族的理想品格而成为其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成为我们民族的精神传统、思想传统和文化传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甚至成为我们民族之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到这时，它就不再仅仅代表陶、李、苏三人，而会逐渐地成为我们民族的一笔共有的财富，成为我们民族不断前进和发展的一个精神支柱、一个思想基础。因此，后代的人们在设计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格理想时，在构建自己时代的理想品格时，就不可能绕开它们前进，相反必然地会把眼光投向它们，从中吸取营养和借鉴。这就是陶、李、苏三人的光辉为什么会历经千百年而不衰的根本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对以陶、李、苏三人为代表的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进行分析、研究的一个根本原因。

本书共分为十个部分，第一至第九部分谈以陶、李、苏三人为代表的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各种表现，第十部分谈以陶、李、苏为代表的古代文人理想品格形成的思想根源。另附有古、今人所绘画像、插图等多幅。还有一点须加说明，即古代具有理想品格的文人是很多的，其具体表现也多种多样，因此如把陶、李、苏三人放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来加以考察，总体说来他们只能被视作一个特定类型的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的代表。希望读者在阅读本书时，能举一反三，放开视野，以期能对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有更多的了解。

# 一、伤时忧国　济世爱民



《礼记·大学》有言云:"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意思是,心思端正了才能修养品性,品性修养以后家族才能整治好,家族整治好了邦国才能治理成功,邦国治理成功以后天下才能太平。这就是儒家著名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可见,修身的目的,最终是要治国平天下,这同儒家反复强调的国君要有"德"的主张

是一致的。因此,凡注重自身修养的人,凡有“德”的人,往往具有伤时忧国、济世爱民之心,往往能把国家的命运、人民的苦难放在心上,总想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为国家、为人民多做一些好事。而对黑暗的政治和那些祸国殃民的当道人物,则往往敢于怒目以对,直言抗争。其中的不少人,抱有先国后家、先国后己甚至舍家为国、舍身殉国的理念,成为品格最为崇高、人们最为敬仰的人。

#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在抱有先国后家、先国后己甚至舍家为国、舍身殉国理念的古人中，范仲淹是颇具代表性的一位。他在《岳阳楼记》中所写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成为古代不少仁人志士立身处世的信条。特别是当政局出现动荡、国家出现危难、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仁人志士们更是热血沸腾，挺身而出，表现出了高昂的爱国热情。南宋是一个




范仲淹像

民族危机深重的时代，据陆游《跋傅给事帖》记载，他年轻时“亲见当时士大夫，相与言及国事，或裂眦嚼齿，或流涕痛哭，人人自期以杀身翊戴王室，虽匈裔方张，视之蔑如”。又据其《跋周侍郎奏稿》记载，当时与陆游父亲来往的，都是一些爱国志士，他们每论到当前局势，“未尝不相与流涕哀恸，虽设食，率不下咽引去”。这种情形，可说是国家多难、国势危殆时志士仁人们表现的一个缩影。

陶渊明被称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①，但他与许多隐士一样，也并未彻底自外于政局清浊、国家安危之外。他生当晋、宋易代之际，也时时表现出对政局变幻的关心和忧虑，对官场黑暗、世风日下的厌恶与不满。其《饮酒》二十首、《述酒》等诗的写作不少人认为与时势有关，如从南宋汤汉到当代学者王瑶、袁行霈都认为《饮酒》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正处于晋宋易代之际，诗作即表现了作者处于易代之际的复杂心情。被鲁迅称为“金刚怒目”式作品的《咏荆轲》，通过对荆轲刺秦王事件的吟咏，热情赞颂了荆轲不畏强暴、慷慨赴死的英勇精神，而对其大功不成则表示了深深的惋惜，实表现了作者对那些强暴的当权者的强烈反抗意识和激愤感情。作者生当南北分裂的时代，他

① 钟嵘：《诗品》中。

对国家的统一也是非常关心的，义熙十二年(416)八月，刘裕率大军讨伐后秦姚泓，十月打下洛阳。次年八月，其部将王镇恶打下长安，姚泓降，后秦灭亡。这是自淝水之战以来东晋对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又一次重大胜利，陶渊明对此是心怀激动的。《赠羊长史》写道："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九州行将统一，他也准备整理车船到北方一游了。但是，刘裕当时志在篡夺，无意经营中原，陶渊明对此也心知肚明，因此"拥怀累代下，言尽意不舒"，对这次北伐胜利表现出了复杂的心情。但无论是激动还是失望，都表现了陶渊明对国家统一的企盼和关切，是一个把国家命运放在心坎上的人。

安史之乱是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将近8年的安史之乱，使黄河流域的社会经济遭受了极大的破坏，人民惨遭劫难。爱祖国、爱人民的精神，也在许许多多志士仁人那里得到了弘扬，李白便是其中之一。在安禄山叛乱前3年，即唐玄宗天宝十一年(752)十月和十一月，李白曾去过安禄山势力范围的中心地带幽州，凭藉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和敏锐的政治嗅觉，他当时已感觉到安禄山的叛变已迫在眉睫。他在后来写作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中说安禄山当时占有了幽州以北的广大地区，拥有了众多的军队，庞然坐大，气焰嚣张，一呼一吸竟至可以使百川奔腾，连燕然山都会被吹成飞灰。诗人看到这种情况非常忧心，但在这个不重视人才、即使是乐毅再生也会遭到疑忌而被迫奔亡的时代，自己却得不到进言的机会，只能避世做隐士。沉忧、失望与痛苦，交织流溢于字里行间。

果然不出李白所料，3年之后，即天宝十四年(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了。李白当时正在梁园探亲，面对战火，他不得不

带着夫人仓促南奔。在逃难途中，李白写了许多诗篇来表达他对安史叛军的痛恨，对国家和人民命运的担忧，对大片国土沦于敌手的痛心。这种对国家命运的担忧，在他经历了流放夜郎的沉重打击之后也并不曾稍减。《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写道：

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
旌旆夹两山，黄河当中流。
连鸡不得进，饮马空夷犹。
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头？

当时，安禄山虽已死去，但他的部下史思明等还在继续作乱，诗人因此而夜不成眠，长吁短叹。诗人感到自己已经衰老，“落旄头”即消灭叛军的愿望已难在自己的亲自参与下实现。但他希望能有像“善射”的“羿”这样的英雄人物站出来，帮助他实现自己的宏愿。这种将国家危难常系于心、对天下太平殷殷企盼的精神，实属难能可贵。



苏轼《范文正公文集叙》说：“呜呼，公之功德，盖不待文而显，其文亦不待叙而传。然不敢词者，自以八岁知敬爱公，今四十七年矣。”又说：“公在天圣中，居太夫人忧，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天下传诵。”可知苏轼还是一个孩童时就对范仲淹非常景仰，此后数十年，对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的高贵品质一直非常敬佩，并将范仲淹引为楷模。苏轼所在的北宋，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已处于无可挽回的走下坡路的阶段。而北宋朝廷本身，由于存在如苏轼在《思治论》中所说的“财之不丰”、“兵之不强”、“吏之不择”的“三患”，导致严重的“积贫积弱”局面。由于宋王朝在辽和西夏的关系上一直不思进取，软弱无能，妥协退让，民族矛盾和持续不断的边患成为尤为严重

的问题。宋太祖夺取政权后,即先向南方用兵,而在北边只采取守势,还特地设置了一个"封椿库",贮积金帛,以期作为向辽赎取燕云等州的代价,实在不行了,才以此作为攻取燕云等州的军费。后来,宋军虽曾一度对辽发动攻势,但在连遭败绩后,便彻底放弃了以武力收取燕云等州的打算。真宗景德元年(1004),辽兵大举南下,朝臣纷纷主张迁都逃命,只有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主抵抗。但是,由于投降派的破坏,在已取得初步胜利的情况下,仍与辽订立了屈辱的澶渊之盟,应允每年向辽输纳银 10 万两,绢 20 万匹。仁宗庆历二年(1042),辽再次大兵压境,遣使至宋,索晋阳(今山西太原)及瓦桥(在今河北雄县南易水上)以南十县地,结果定盟,宋每年增赂辽银 10 万两,绢 10 万匹。对西夏也是如此。在长期战争不胜后,宋于真宗景德三年(1006)应允西夏王德明的要求,承认其在西北诸州郡的统治,并每年给予银 1 万两、绢 1 万匹、钱 2 万贯。仁宗庆历四年(1044),又应允册封西夏主元昊为夏国王,并在各种名义下每年给予西夏银 7 万两,绢 15 万匹,茶 3 万斤。辽与西夏所加于北宋的民族压迫和经济勒索,北宋统治者的阶级压迫和剥削,加之不时而至的自然灾害的侵逼,使北宋人民生活在沉重负担和巨大痛苦之中。在内忧外患的夹逼下,国家面临着生死存亡、兴废成毁的严峻考验,引起了众多有识之士的忧虑,因此自北宋初年以来,就陆续有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李觏的"富国"、"强兵"、"安民"的主张,韩琦、富弼、欧阳修、司马光的"富国强民"主张以及轰动一时的王安石变法,改革浪潮可以说是一浪高过一浪。苏轼也是站在这个改革潮流的前列的。早在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就向朝廷进呈策论 25 篇,全面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此后,特别是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苏轼更是不断提出自己的改革主张,

虽然不是每项主张都那么正确，每个想法都那么切合实际，但其出发点和归宿是为了富国强兵、拯时济危，则是可以无疑的。这种愿望、胸襟和抱负，常常不由自主地在其作品中表现出来。如：

忠臣体国，知无不为。

——《答李琮书》

为国者终不顾家。

——《陈公弼传》

报国之心，死而后已。

——《杭州召还乞郡状》

圣人视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

——《学士院试孔子从先进论》

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
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

——《赐新除中大夫守尚书右丞王存辞免恩命不允诏》





屈原像

这些展现了作者崇高思想境界和光辉精神品格的金石之言，是足可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相媲美的。

像这样的人和事，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屈原一生追求美好的政治理想，希望通过改革使楚国强盛起来，但却遭到无情的排挤打击。虽然万

分悲愤、失望和痛苦，但屈原却仍然不愿离开自己的祖国。《离骚》的结尾写道：

陟升皇之赫戏兮，忽临睨乎旧乡。

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

诗人在想像中漫游，上升到了光明的天国，他完全可以继续漫游下去，但却在这时看到了自己的祖国，于是就再也迈不开步了，表现了诗人即使在幻想中也不愿离开自己祖国的深情。杜甫一生忧国忧民，当国家危难之时，在愁肠满腹的杜甫眼里，那带着露珠的春花仿佛也因“感时”而流出了眼泪，那鸣声清脆的鸟儿仿佛也因“恨别”而发出了惊心的鸣叫，如《春望》所写：“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而当大乱初定，消息传来，他又兴奋得手舞足蹈，热泪横流，如《闻官兵收河南河北》所写：“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陆游《示儿》写道：

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作为一篇在临终前给所钟爱的儿女留下的遗嘱，陆游没有言及一点私事，却以“北定中原”来表达其生命中的最后意愿，以“无忘告乃翁”作为对儿女的最后嘱咐，这是何等伟大的胸怀！是多么崇高的品格！陆游实际上是把国事当作家事，把国家命运同家庭命运、个人命运紧密地结合了起来。屈原、杜甫、陆游等人的言行，证明他们不愧是千千万万爱国者的杰出代表，每一个炎黄子孙，都不能不被他们对国家民族的一往深情和九死不悔的爱国精神所深深感染。

# “涤荡振刷”，力图“卓然有所立”



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使历代的仁人志士总是不甘于寂寞，要就治国安邦的大是大非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在原有的基础上得到了飞速的发展，社会变革的潮流风起云涌，诸子百家于是应运而生。各家站在不同的阶级立场，从不同的阶级利益出发，各逞其说，放言争辩，并积极游说，希望统治者采纳自己的主张，对现实的变革

和社会的安定、发展、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的法家，有不少代表人物是各国实际掌握政权的政治家，他们更是利用手中的权力和影响，实际推行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春秋时期齐国的管仲，郑国的子产，是推行法家政策的先驱；战国时期魏国的李悝，楚国的吴起，秦国的商鞅，赵国的武灵王，韩国的申不害，也先后在各国实行变法，虽屡遭挫折、甚至付出了血的代价也在所不惜。百家争鸣不仅对先秦学术文化的繁荣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关心时政、以天下为己任、敢于放言高论的精神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屈原面对楚国“群臣相妒以功，谄谀用事。良臣斥疏，百姓心离，城池不修。既无良臣，又无守备”（《战国策·楚策》）的现实状况，敢于提出举贤授能、联齐抗秦等主张，将改革的矛头直指腐朽的贵族阶级，“虽九死其犹未悔”，其精神和品格更是得到了后人的交口称赞。

一般说来，关注时政、提出主张特别是将有关主张付诸实施是在位者、当权者的事情，因为他们负有这个责任，也有这么去做的条件。但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古代许多并不在位的人，或虽在位而位不高、权不重的人却并没有因此置身事外，他们常常披肝沥胆，指陈利害，献策进言，表现出可贵的政治勇气和一种“以国家之务为己任”（韩愈《送许郢州序》）、“位卑未敢忘忧国”（陆游《病起书怀》）的精神。陶渊明一生大半时间为一介平民，虽也曾出仕过几次，但做的不过是参军、县令之类的小官；加之具有强烈的隐居避世思想，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似乎是并不突出，甚至可以说态度是比较消极的。但即使如此，我们从他的作品中，还是不难看出他期盼天下统一，朝政清明，天下太平，国家富强，人民安居乐业，人人各得其所的心愿、主张和理想。李白一生只在一个短时间内得到过翰林供奉的名分，但也曾利用“置

于金銮殿，出入翰林中，问以国政，潜草诏诰”（李阳冰《草堂集序》）、较多接近皇帝的机会，向皇帝阐述过自己对一些国家大事的看法和主张，针对某些现象对唐玄宗进行过谏劝。《书情赠蔡舍人雄》：“遭逢圣明主，敢进兴亡言。”说的就是这种情况。其《大明赋》、《大猎赋》希望皇帝不要贪图逸乐，不要铺张奢靡，要招贤进能，要重农抑商，让百姓安居乐业，过上和平安乐的生活。虽不免带有较多理想成分，但联系当时现实看，还是针对时弊而发，表现了诗人关注现实、力图有所作为的精神。

比起陶渊明、李白来，苏轼有大半生是沉浮宦海、并曾一度官居高位的。他始终没有淡忘自己的责任，特别是在他应该说话而且有权说话的时候。他对政治、社会的不少重大、“热点”问题发表了见解，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和建议。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向朝廷进呈策论 25 篇时，刚刚步入官场，年纪也不过 26 岁。策论分成“略”（5 篇）、“别”（17 篇）和“断”（3 篇）三部分，是关于国计民生、国家大政方针的政治论文，后来苏轼概括





摹东坡自画像

其主旨说："昔于仁宗朝举制科，所进策论及所答圣问，大抵皆劝仁宗励精庶政，督察百官，果断而力行。"(《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苏轼认为北宋王朝的形势，已到了危机四伏的关键时刻。于是，苏轼坚定地提出：

方今之世，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

意思是，如果不能彻底消除积弊，振作刷新，而有独特的建树，对时局是极为不利的。苏轼于是提出了自己的改革主张：人主必须下定改革的决心，要奋发有为；行政机构应作重新分工；人主要信任执政大臣；要深结天下之心，等等。还提出了一些具体的改革意见，如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敦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较赋役、教战守、去奸民、厚货财、省费用、定军制、训军旅、蓄材用、练军实、倡勇敢等。策论还特别注意到西夏和辽的问题，认为"二虏之大忧未去，而天下不治，终不可为也"，"二虏为中国患，至深远也"。提出对西夏和辽不能抱苟且求和的态度，求和乃"国之大忧"，必须采取"必至于战"的方针，与之进行坚决的斗争。一定要作好必胜的种种准备，将战争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掌握了主动权，"我欲则战，不欲则守。战则天下莫能支，守则天下莫能窥"，就可以化被动为主动了。苏轼还根据辽和西夏军事上的特点，从战术层面提出了一些建议，以发挥"中国之长"，彻底打败对手。

嘉祐八年(1063)，苏轼在其《思治论》中，又提出了"今世有三患"的形势估计，即"财之不可丰，兵之不可强，吏之不可择"，认为"此三者，存亡之所从出，而天下之大事也"，"决不可不治"。作者认为，"其始不立，其卒不成"，"不知其所以不成者，罪在于不立也。苟立而成矣"，再次强调了"卓然有所立"的主张，表达

了“思治”的强烈愿望。

神宗熙宁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被拜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在神宗的支持下开始实行变法,设置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改革的领导机构,“而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诸役相继并兴,号为新法,遣提举官四十余辈,颁行天下”(《宋史·王安石传》)。次年,王安石被拜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进一步推行新法。变法从一开始就受到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势力的极力破坏和顽强抵抗,他们在曹太后(仁宗皇后)和高太后(英宗皇后)的支持下,不停地在神宗面前诋毁王安石及其新法。熙宁七年(1074)四月,因天下久旱,保守派诋毁说这是因为实行新法的缘故,神宗信心动摇,于是罢了王安石的宰相职务,以观文殿大学士的身份知江宁府。王安石临行,让同属改革派的韩绛代替自己做宰相,新法大体上得到了维持,但已失去原有的势头。

10个月后,即熙宁八年(1075)二月,神宗复拜王安石为相,继续变法。但是,由于改革派陷入了严重的分裂,神宗皇帝也失去了改革的锐气,并开始怀疑变法,讨厌王安石,改革实际上很难继续下去了。熙宁九年(1076)十月,王安石再度被罢相,改革最后归于失败。王安石下台后,原来退居洛阳的司马光重新回到朝廷。元丰八年(1085),神宗去世,年方10岁的哲宗继位,宣仁皇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旋即对新法大兴挞伐,“凡新法之为民害者,次第取而更张之,不数月,划革略尽”(《宋史·司马光传》)。元祐八年(1093)九月,高太后病故,哲宗亲政,任命改革派章惇为宰相,改革派再度登台,恢复了被废除的新法,但总的来说已失去了王安石变法时的锋芒。

苏轼一生,与王安石变法运动相终始,不可避免地被卷进这

一历史洪流之中,还曾一度被掀到了风口浪尖之上。苏轼历来被视作保守派人物,但实际上,他与王安石之间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处,比如他们对北宋"积贫积弱"的形势就有着相近的认识,在改革措施和变法内容方面也有一些相似点。但苏轼是一个具有独立见解的人,他也针对王安石变法提出过不少不同的甚至反对的意见。比如,王安石主张激进的改革,苏轼则主张渐进式的改革,主张"徐"变"徐"立,认为"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王安石认为"祖宗不足法",对祖宗陈法要尽量进行变革,苏轼则认为一些仍然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法规应予保留,"譬如医者之用药,药虽进于医手,方多传于古人,若已经效于世间,不必皆从于己出"(《乞校正陆贽奏议上进札子》)。王安石虽然也认识到"择人"的重要,但他更主张"法度"的更易,而苏轼早在策论中就已表达了这样的看法:"臣窃以为当今之患,虽法令有所未安,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认为"任人"问题解决得不好,新法的实施就会出现弊端。王安石还曾打算废科举,兴学校,罢诗赋明经诸科,专以经义论策取士,苏轼则上《议学校贡举状》加以反对,认为"贡举之法,行之百年,治乱盛衰,初不由此","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何负于天下,而必欲废之"!认为"专取策论而罢诗赋",不过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苏轼与司马光有着很深的友谊,但政见也与之并不相同。司马光上台后,从其保守派的立场出发,不管王安石推行的新法在实践中是否行之有效,而欲尽行废除,遭到了苏轼的坚决反对。比如关于役法,苏轼就曾与之展开激烈争论。苏轼《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天下皆以为便,而台谏犹累疏力争,由此观之,是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也。臣为中书舍

人，刑部大理寺列上熙宁已来不该赦降去官法凡数十条，尽欲删去。臣与执政屡争之，以谓先帝于此盖有深意，不可尽改，因此得存留者甚多。"可见苏轼为保留王安石变法的成果作出了重要贡献。元祐年间，苏轼又曾主张尽力制止西夏的入侵，反对司马光等保守派急于与之求和的意向，认为"为国不可以生事，亦不可以畏事，畏事之弊，与生事均。譬如无病而服药，与有病而不服药，皆可以杀人"，认为议和"以求无事，然事之起，乃至于此，不几于有病而不服药乎"(《因擒鬼章论西羌夏人事宜札子》)。可见，无论在对内还是对外政策上，苏轼都与司马光存在有严重的分歧。

由于政见与王安石和司马光均有不合，因此苏轼在改革派当权时受到排挤、打击，在司马光当权时也不免于被诬陷攻击，难以在朝中立足。但苏轼不论是在得势时还是失意时，都没有忘记自己的责任，仍不断针对时弊向朝廷提出意见。他在"补外"期间，由于更多地了解了实际情况，向朝廷提出的一些建议应当说是更有分量、更有针对性的。



总的看来，苏轼的改革方案确有某些消极因素和保守倾向，这使他有意无意地与以司马光为首的保守派发生了较多的联系。但就改革的政治大方向而言，他反而是与司马光离得较远，而与王安石靠得较近的，因为他与王安石都是要限制豪门权贵的利益，以此实现富贵强兵、巩固北宋封建王朝统治的目的。王安石被列宁称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他的变法确是功不可没，但他所提出的主张并不是当时惟一进步的改革主张，从范仲淹"庆历新政"以来的改革潮流对王安石变法起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包括苏轼在内的改革派人物所提出的众多改革主张也与王安石的新法有"互补"的作用。而且，王安石变法也不可能

十全十美,新法在执行过程中也会出现某些流弊,连王安石本人也说,新法"得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则为大害"(《上五事札子》),对新法的流弊提出批评,自然也就无可非议了。在这个过程中,苏轼所表现出来的勇于"涤荡振刷"而力图"卓然有所立"的精神,同样是应当给予肯定的。

# 力行“惠民之政”



孔子的学生子贡问孔子:“假如有一个人,能给予老百姓多方面的好处,又能帮助大家过上好日子,可以算是仁德吗?”孔子的回答是:“这哪里仅是仁德,那简直是个圣人了!尧舜大概都难以做到哩!”孔子进一步发挥说:“有仁德的人,自己要站得住,同时也要别人站得住;自己要想通达,同时也要让别人通达。凡事都要以自身为例而想到

别人，可以说是实行仁道的方法了。"可见，孔子对于"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作出了多么崇高的评价，认为"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对于仁德来说非常重要，是仁德之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并指出了施行仁德的途径和方法：从自己一步步地做起。



孔子像

孔子的话，被古代不少仁人志士奉为人生准则和为之奋斗的人生目标。像陶渊明、李白这样的不在其位，或虽曾在位而位不高、权不重的人，只能在诗文中表现一下对老百姓苦难生活的同情，或提一些无法实际推行的如"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桃花源诗》）之类的主张，只能"思垂空文以自见"（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心有余而力不足，所起的作用不免有限。但不少在官场中握有一定实权的人，却在这方面实实在在地做了不少工作。如王叔文、柳宗元等人在唐顺宗永贞元年(805)上台执政后，便积极改革，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老百姓的主张。其中之一是禁止宫市和五坊小儿。所谓"宫市"，就是皇宫里所需要的物品，到市场上去购买，只随便给点钱，实际上是进行公开的掠夺。德宗时，这种情形更为严重，用宦官专管其事，在长安东市、西市设置"白望"数百人，看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就口称"宫市"，随意付给很少的代价，往往"用百钱物，买人值数千钱物"，甚至根本不付钱，拿了就走。市民看见这些人，只得赶紧逃避，或关门闭户。所谓"五坊小儿"，是在京城雕坊、鹘坊、鹞坊、鹰坊、狗坊

中专为皇帝饲养宠物的人，这些人也常常依权仗势滋事扰民。王叔文、柳宗元下令取缔宫市和五坊小儿，对作威作福的宦官是一个迎头痛击，而老百姓则人心大快。

王叔文、柳宗元还大力整顿税收，降低盐价，减轻人民负担。他们规定在两税正税外，不得再擅自巧立名目征税。盐税当时是国家财政的一项重要来源，此前长期被藩镇和宦官所控制，他们往往随意抬高盐价，从中牟取私利。德宗时，规定盐价每斗370钱，而实际盐价有时竟至翻番，弄得贫苦百姓无力购买，只能淡食。王叔文、柳宗元针对这种情况，下令立即削减盐价，“江淮盐价，每斗为钱二百五十；河中两池盐，斗钱三百”（《新唐书·食货志》）。与此同时，他们还宣布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因为这些人往往借口给皇帝进奉，搜刮民脂民膏，中饱私囊。这些措施，打击了宦官势力和不法官吏，对减轻人民负担起了积极作用。



柳宗元像

王叔文、柳宗元的革新由于遭到宦官集团和豪族大官僚的反对，很快就失败了，革新派人物都被贬职。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杀。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十年后改贬为柳州刺史。柳宗元在柳州刺史任上，不改初志，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继续进行改革，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如采取措施使许多沦为奴婢的人恢复了人身自由，使得回家与亲人团聚。又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风俗习惯，严令禁止江湖巫医和算

卦先生到处骗人,并自采、自晒、自制、研究中草药,宣传中草药的效用。针对当地百姓用水困难的状况,用历年积累下来的公款组织人力挖掘水井。又组织闲散劳力开垦荒地,发展柳州与外地的经济文化交流。这些兴利除弊的措施,都直接使当地老百姓获益,因而受到了当地百姓的欢迎。

像柳宗元这样的例子,在古代仁人志士中不胜枚举。苏轼"早岁便怀齐物意,微官敢有济时心"(《次韵柳子玉过陈绝粮》其二),在这方面表现得也非常突出。苏轼无论是在朝中还是在外放期间,只要有可能,都会力行"惠民之政",从而为人民做了许多有益的事情。

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始步入官场,被朝廷除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上任伊始,苏轼便着手改善当地"民贫役重"(《宋史》本传)的状况,对有关条令作了适当修改,给服役的人一定的灵活性,从而减轻了对百姓的危害。

神宗熙宁十年(1077),苏轼调任徐州。刚到任三个月,黄河突然在澶渊的曹村决口,徐州地处下游,洪水奔临城下,高二丈八尺,情势非常危急。在这个紧要关头,苏轼挺身而出,指挥抗洪抢险。据苏辙《黄楼赋》记载,当时苏轼看到被卷入激流中的百姓蔽川而下,便"使习水者浮舟楫 ,载糗饵以济之,得脱者无数"。眼看城墙就要坍塌,城中富户争相出城逃避,苏轼赶忙制止,说:"富民出,民皆动摇,吾谁与守? 吾在是,水决不能败城。"(《宋史》本传)将那些已逃出城外的富户又赶回了城内。苏轼又赶到武卫营,对带兵的军官说:"河将败城,事急矣,虽禁军且为我尽力。"带兵的军官立即表态:"太守尤不避涂潦,吾侪小人,当效命。"(同前)于是率领部众拿着畚箕和铁锸奔出,修筑了东南长堤。暴雨还是日夜下个不停,城墙只差三板就将被淹没,苏轼

"庐于其上,过家不入",指挥吏民"分堵以守"。经过70多天的奋战,终于战胜洪水,保全了全城百姓的生命财产。为此,全城百姓摆宴欢庆,载歌载舞。第三年春天,苏轼调离徐州,徐州的百姓流着热泪,前来送别,父老"洗盏拜马前,请寿使君公。前年无使君,鱼鳖化儿童。"苏轼谦逊而深情地表示:"吏民莫扳援,歌管莫凄咽。""而我本无恩,此涕谁为设。""水来非吾过,去亦非吾功。"(《罢徐州,往南京,马上走笔寄子由五首》)百姓与长官这种真情碰撞、难舍难分的场面,在古代应当说是并不多见的。

哲宗元祐五年(1090),苏轼在杭州太守任上。适逢天旱,饥荒瘟疫同时发生,苏轼即请求朝廷减免本路上供米1/3。第二年春天,于青苗不接之时,苏轼"又减价粜常平米,多作馇粥药剂,遣使挟医,分坊治病,活者甚众"(《宋史》本传)。当时西湖杂草丛生,淤泥沉积,几近干涸,眼看就要成为所谓的"葑田"(水已干涸、杂草丛生的湖沼),苏轼又请求朝廷准予进行疏浚治理。疏浚治理的原因,苏轼《杭州乞度牒开西湖状》一共罗列了五条,其中有三条是与百姓的生计利益直接相关的。在得到朝廷批准后,苏轼招募民工对西湖进行了疏浚,挖出的淤泥,筑成了一道长堤,将湖分成了两部分,西为里湖,东为外湖。在长堤上夹植花柳,造桥六座,后来堤桥成为西湖的佳胜之地,被称为苏堤。苏轼为杭州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杭州百姓十分感激,以至"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宋史》本传)。

元祐七年(1092),苏轼调任扬州刺史。刚一到任,他就提出了解决本州"积欠"的问题,并向朝廷上《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苏轼能亲自深入村落,访问贫苦,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实际情况,这种工作态度和作风,不是真把百姓疾苦装在胸中的人是绝对做不到的。而对百姓疾苦感同身

受的情怀,对苛政和如狼似虎的催欠吏卒的切齿痛恨,尤属难能可贵。但朝中当权者却"屡言而屡不听",苏轼于是再呈《再论积欠六事四事札子》,指出:"臣访闻浙西饥疫大作,苏、湖、秀三州,人死过半,虽积水消退,露出泥田,然皆无土可作田塍,有田无人,有人无粮,有粮无种,有种无牛,殍死之余,人如鬼腊。"其时哲宗册立皇后,"天下大庆",苏轼甚至因此质问道:"今陛下膺此大庆,犹不念积欠之民,流离道路,室家不保,鬻田质子,以输官者乎?"苏轼为民请命,情辞急切,率皆此类。由于紧追不舍,一再请求,终于获准诏免"积欠",苏轼又为走投无路的老百姓做了一件大好事。

苏轼不仅在既有职又有一定权力的情况下敢于力行"惠民之政",即使在遭贬无权的情况下,也总要想法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老百姓做一些好事。如在黄州期间曾劝阻穷苦百姓溺杀婴儿,并亲自募集基金救助贫苦的孕妇,他们应允若养育婴儿,就赠给钱物。在海南岛期间,又鼓励农民开垦荒地、多种稻谷,移植中原优良品种,推广先进耕作方法,宣传破除迷信、改变陋习等等。可以说,苏轼一生都在实践自己强国富民的改革主张,是一个真能把老百姓的疾苦放在心上的人,他在很多地方能得到老百姓的衷心拥戴,决不是偶然的。

# “惟有悯农心尚在”



《尚书·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意思是,先懂得种田的艰难,就会知道种田人的疾苦了。《无逸》旧传为周公所作。周武王姬发死后,其子成王年纪尚幼小,于是先由武王之弟姬旦即周公代为治理天下之事。等到东方平定,洛邑建成,周王朝的天下已经巩固,成王也已长大,周公于是将政权归还成王,《无逸》便是周公归政时对

成王的一番告诫之辞。所谓"无逸",就是不要贪图安逸,是全文反复论证的一个中心。"先知"二句,为全文开头的话,可知周公将这看作是"无逸"的基础和前提,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真正做到"无逸",真正成为一个自律很严、勤政清廉、诚信敬业、虚怀若谷、品德高尚的君王。"先知"二句,成为儒家民本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后代无数仁人志士"悯农"思想的基础。

陶渊明半生躬耕陇亩,与农民亲密往来,对农民稼穑的艰难是有深刻体会的,所谓"旧谷既没,新谷未登,颇为老农,而值年灾。日月尚悠,为患未已"(《有会而作序》)数句就表明了这一点。"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则直接抒发了对农民艰难生活的同情。陶诗中有不少作品是表现诗人自己躬耕生活的艰难的,诗人自己尚且如此艰难,一般农民的境况就更可想而知,因此这些作品对我们了解当时农民生活的困苦状况也有重要作用。



李白直接反映农民生活的作品很少,《宿五松山下荀媪家》算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首:

我宿五松下,寂寥无所欢。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跪进雕胡饭,月光明素盘。
令人惭漂母,三谢不能餐。

写诗人游历途中借宿在一个荀姓老妇家中的所经所感。一个"苦"字,一个"寒"字,写出了农民的辛勤劳苦,也写出了他们内心的凄凉痛苦。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仍然尽其所能十分诚挚地款待客人,显示出农民特有的纯朴笃诚品格。诗人对此感激万分,谦恭有加,与笑傲王侯的时候相比,判若两人,表现

了诗人对于劳动人民的特殊感情。

苏轼出身在一个较寒微的中小地主家庭，曾经历过“少年辛苦事犁锄”(《野人庐》)的生活，对农民生活的艰辛本来就有相当的了解。步入官场后，出于一个正直官员的责任感，也出于执行强国富民改革主张的需要，有意识地对于农民问题给予了较多的关注，能把农民的疾苦放在心上，并尽量想法给予解决。在官场遭受排挤贬谪之后，他与广大贫苦农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在思想上、感情上同他们有了更多的联系。《立秋日祷雨，宿灵隐寺，同周、徐二令》写道：

崎岖世味皆尝遍，寂寞山栖老渐便。

惟有悯农心尚在，起占云汉更茫然。

由于经历了官场的风风雨雨、起起落落，诗人遍尝了人间百味，心境渐归于平和，行动渐趋于随便，但“惟有悯农心尚在”，对农民的疾苦始终放不下心，因此“悯农”便成了他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寄刘孝叔》写道：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描写了在旱灾蝗灾接踵而至、庄稼颗粒无收的情况下，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为食的悲惨情景。《除夜大雪，留潍州，元日早晴，遂行，中途雪复作》写道：

三年东方旱，逃户连敧栋。

老农释耒叹，泪入饥肠痛。

描写了大批灾民流亡、只能在临时搭起的歪歪倒倒的棚户中藏身、内心无比凄怆的情景。《山村五绝》其三云：

老翁七十自腰镰，惭愧春山笋蕨甜。

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

描写了一个年已七十的老翁，腰插镰刀，到山里割笋蕨充饥并自诉"迩来三月食无盐"的辛酸情景。"韶"相传为舜时乐曲名。《论语·述而》："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这里说老农不是圣人，不可能"闻韶"而知"忘味"，语气中有幽默，更有讥刺、辛酸和同情。

不难看出，苏轼对百姓的疾苦，主要是从天灾和人祸两个方面来加以反映的。在许多情况下，天灾往往是难以避免，而人祸是并非不能避免的。老天无意，人却有情，因此因人为因素而造成的人间苦难，往往也更能引起人们的切齿痛恨。苏轼"悯农"的诗歌，实际上更多地是从"人祸"的角度着眼，谈的是社会问题而不是自然问题，因此更具针对性、深刻性和震撼性，更能发人深省，其社会意义和人文价值也就更大。

# “至今欲食林甫肉”



《论语·为政》载孔子语云:“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意思是,应依靠道德来治理国家,若能做到这一点,自己就会像北极星一样,待在固定的地方,群星都环绕在他的周围,意即得到大家的敬仰和拥戴。这是孔子对国君的要求,也是对一切统治者特别是对那些执政大臣的要求。实际就是要求统治者实行仁政,而对暴政则持坚决反对的态度。《礼记·檀弓》记载了一

个故事:孔子过泰山时,听一老妇说,其舅、其夫、其子都被老虎吃掉了,之所以不肯迁居,是因此地无苛政。孔子听了这句话,大为感慨,得出“苛政猛于虎”的结论,并要他的学生记住这句话。主张推行仁政,肯定、赞美那些能够实行仁政的循吏,而对暴政进行抨击,对官场的腐败和黑暗进行揭露,对那些鱼肉人民的贪官污吏进行鞭挞,此后便形成了一股汹涌的潮流,形成了一个优良的传统,成为仁人志士正义感和崇高品质的重要表现,也成为古代优秀诗文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屈原在《离骚》中,就对楚国贵族的贪婪、变节、苟且、偷安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说他们都争着贪污受贿,永远没有满足的时候;说他们热衷争名夺利,并以小人之心来揣度别人,从而产生嫉妒心理,对别人进行造谣中伤;说他们只求自己进用,投机取巧,没有一点固定的主张。表示要坚持自己高洁、卓异的品格,越是受到挫折,这种品质就越发扬:“芳菲菲其难亏兮,芬至今犹未沬。”表示绝不与黑暗势力妥协,“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这种敢于斗争的精神,这种追求正义坚贞不渝的品格,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苏轼一生勇于批判时政,对豪门权贵、贪官污吏非常憎恨。《许州西湖》写道:“使君欲春游,浚沼役千掌。……但恐城市欢,不知田野怆。颍川七不登,野气长苍莽。”这是诗人的早年作品,对郡守为了个人的春游之乐,竟置百姓的灾荒痛苦于不顾,大量役使人力疏浚湖沼的行径进行了揭露。这种对执政者丑恶行径的揭露和批判,此后便成为苏轼作品常见的主题,在屡遭贬谪、特别是因文字之祸身陷囹圄之后,仍然不改初衷,不改其敢怒敢骂的性情。晚年所写的《荔枝叹》,便是在这方面极具代表性的作品:




杨贵妃晓日荔枝香

十里一置飞尘灰，五里一堠兵火催。
颠坑仆谷相枕藉，知是荔枝龙眼来。
飞车跨山鹘横海，风枝露叶如新采。
宫中美人一破颜，惊尘溅血流千载。
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之涪。
至今欲食林甫肉，无人举觞酹伯游。
我愿天公怜赤子，莫生尤物为疮痏。
雨顺风调百谷登，民不饥寒为上瑞。
君不见：武夷溪边粟粒芽，前丁后蔡相笼加。
争新买宠各出意，今年斗品充官茶。
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
洛阳相君忠孝家，可怜亦进姚黄花！

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苏轼贬谪惠州(今属广东)，此地盛产荔枝。面对这种果中珍品，诗人想起汉唐以来多少帝王为了满足口腹之欲，不惜劳民伤财、万里征敛的故事，不禁感慨万分，写出了这篇作品。前面八句写汉唐时代由南方向京城长安传送荔枝的情景。为了让荔枝送到长安时仍能保持新鲜，途中纵马疾驰，不惜让差官十里、五里就换一次马。由于拼命奔跑，导致很多人死伤，有的跌进深坑，有的倒进山谷，尸骨枕藉，其状惨不忍睹。而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不过是为了博得宫中美人的欢心，统治者视人命如草芥的行径令人发指。诗人以“惊尘溅血”与“宫中美人”对举，以“流千载”与“一破颜”对举，对比强烈，寄慨遥深。

中间八句，对汉唐两代进贡荔枝的弊政进行总结，并发抒感慨，表达愿望。汉和帝永元年间进贡的荔枝来自两广南部的交州，唐玄宗天宝年间进贡的荔枝来自今重庆市的涪陵，产地都极遥远。而李林甫这样的权奸，却阿谀取宠，仍下令年年进贡。

"至今欲食林甫肉",表达了人们对于李林甫的切齿痛恨。"伯游",即唐羌,汉和帝时为武陵长,见到传送荔枝,死亡惨重,曾上书和帝,建议罢除进贡,和帝采纳了他的建议。这样的人本来值得纪念,但现在却没有人再祭奠他了,实际上是说现在再没有像伯游这样的人了。诗人接着表白了自己的虔诚愿望,希望上天能够怜悯百姓,表现了作者感念民瘼的一腔深情。

最后八句,由史事说到当前。汉唐时有进贡荔枝的弊政,而当世又有贡茶、贡花之事。福建向朝廷进贡名茶,始于宋真宗时的宰相丁谓,后来仁宗时学士蔡襄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他们竞相收罗,彼此攀比。当时把茶叶制成饼形,上面印上龙凤花纹,有"龙团"、"凤饼"等名目。丁谓制的"大龙团茶一斤八饼",蔡襄制的"小龙团茶一斤二十饼",故曰"相笼加"。又作者自注:"今年闽中监司乞进斗茶,许之。"斗茶亦即"斗品",宋代有赛茶之风,比赛胜出的名品,称斗品。闽中监司请求进贡斗品,又得到了朝廷的允许。洛阳盛产牡丹,钱惟演晚年曾为使相,留守西京洛阳,曾把牡丹中的名品姚黄花进贡给宋仁宗,从此洛阳就年年贡花。贡茶也好,贡花也好,都是官僚们取媚皇上的无耻行径。苏轼对此深为鄙薄,质问道:大宋皇帝难道就缺这个东西吗?这个东西只能满足皇帝生活上的一点需要,这样做岂不太鄙陋了吗?言外之意是,为官者应当在治国安民这件大事上多花心思,多下力气。作品从历史的批判转入对现实的批判,点名揭露当今权臣进贡茶叶和牡丹两事,以此与汉唐时期进贡荔枝的事并列,实认为两者性质相同,可以相提并论,而丁、蔡、钱等人也与唐代权奸李林甫别无二致。"至今欲食林甫肉"的呐喊,表明作者对谄媚邀功、残民以逞的权奸深恶痛绝,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诗人一再以文字罹祸,此时正远谪在外,前途未卜,但在事

关治乱兴衰的大是大非面前，浩然正气，却不稍衰，其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崇高的政治品质不能不令人肃然起敬。

陶渊明对于乱世暴政，也是极为憎恶的。其《桃花源记》说桃花源中人"自云先世避秦时乱"而至此处，就显示了他反暴政的用心，而诗中所写更明确："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余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童孺纵行歌，斑白欢游诣。"把桃花源描绘得如此美好、富足、和谐、安乐，实是为了反衬现实世界的污浊、黑暗和混乱，发泄自己对暴政的不满，《咏荆轲》以充沛的热情、刚劲的语言、高亢的音调赞美了反抗暴秦的壮士荆轲的英雄气概，实亦寄托了诗人对现实和暴政忿忿不平的心情。而他的归隐田园，则是对"贤者避其世"的步趋，是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表示了对于暴政的不满和抗议。

唐玄宗天宝元年(742)正月，李白应玄宗的征召来到长安，至天宝三年(744)春离开，连头带尾在长安待了3年。由于遭谗被谤，这3年李白在政治上并无建树，但他对朝廷的黑暗和腐败却有了深刻的认识和体会。《古风》59首中有一部分作品是在长安时期写下的，从中不难看出李白对黑暗腐朽的政治现实的不满。如《古风》其二十四写道：

大车扬飞尘，亭午暗阡陌。
中贵多黄金，连云开甲宅。
路逢斗鸡者，冠盖何辉赫。
鼻息干虹霓，行人皆怵惕。
世无洗耳翁，谁知尧与跖

当时玄宗宠信宦官，宦官得以凭藉权势，大肆勒索，"于是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为中人所名者，半京畿矣"(《新唐书·宦官传》)。

玄宗还喜欢斗鸡之戏，在长安设有“鸡坊”，选六军小儿500人，饲养和训练成千的雄鸡。诸王、公主、外戚，都争相用高价买鸡，一时成为风气。对于擅长斗鸡的人，玄宗特别爱幸。据陈鸿《东城老父传》载，当时有一个人叫贾昌，特别会斗鸡，被称为“神鸡童”，深得皇帝爱幸，于是“金帛之赐，日至其家”。有民谣说：“贾家小儿年十三，富贵荣华代不如。”还有不少擅长斗鸡的人被赏做大官。这些宦官和斗鸡者恃宠骄恣，不可一世，像高力士这样的人自然更加气焰嚣张，气势凌人。这首诗即描写了宦官、斗鸡者的荣华生活和飞扬跋扈的气焰，其批判的矛头实际上是直指最高封建统治者的。此外，李白还有不少乐府诗、七言歌行和五言古诗是揭露皇帝的昏庸腐朽、奸臣的弄权误国和宦官外戚的胡作非为的，也具有强烈的针对性和批判精神。



白居易像
（明成化二十三年绍兴郡斋圣贤图石刻）

下层官吏及其爪牙直接面对黎民百姓，往往依权仗势，狐假虎威，敲诈勒索，胡作非为，百姓深受其害。但如果不是上级包庇纵容，如果不是上梁不正，如果不是政治黑暗、官场腐败，这种情况是绝不可能发生的。对这种情形进行揭露和鞭挞，也就是对当时政治黑暗、官场腐败的揭露和鞭挞，也是表现了可贵的政治勇气和批判精神的。

古代仁人志士对权臣奸相、贪官污吏、有时甚至是对皇帝的

倒行逆施不仅是敢于口诛笔伐，也敢于面折廷争，即使是受排挤、遭贬谪、甚至坐牢杀身也在所不惜。苏轼就是一个不怕触犯权贵的人，敢于同他们争论，敢于对其政治上的胡作非为进行揭露和斗争，而能置个人的利益和安危于不顾。白居易被任命为“左拾遗”(谏官)后，恪尽职守，累次所上谏章，情辞激烈，说的往往是别人不敢说的话。一次，他当面说唐宪宗犯了严重错误，宪宗大怒，幸亏宰相李绛回护，才没有受到处分。白居易认为谏官应有刚直之气，曾以古剑比喻说：“可使寸寸折，不能绕指柔。愿快直士心，将断佞臣头。”(《李都尉古剑》)又以“直折剑”自比：“我有鄙介性，好刚不好柔。勿轻直折剑，犹胜曲全钩。”(《折剑头》)这种刚直的政治品格和宁折不弯的精神，确实是对付“佞臣”和权奸的利剑，其光辉是永远不会磨灭的。

# 二、志存高远　坚定不移



古代的仁人志士，没有一个是没有远大的抱负和理想的。所谓“志士”，就是有远大志向的人，而且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百折不挠地为之奋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人，如《孟子·滕文公下》所说：“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意即有志之士为了坚守崇高的节操和远大的理想，甚至不怕弃尸沟壑，不怕死无葬身之地。

正因为有了远大的理想，他们才远离了浑浑噩噩、无所作为和得过且过；才会奋发有为，为国家、为社会、为人民努力做出自己的贡献；才会对光明和正义有所追求和护卫，对黑暗和邪恶有所拒斥和抗争；才能始终保持高洁品格和坚贞操守，不与世俗同浮沉，更不与黑暗邪恶势力同流合污。有远大理想且能始终如一地坚守，特别是能百折不挠地为之奋斗的人，其人生必然是壮丽的，其品格必然是崇高的，特别是那些能常将国家、民族的命运放在心上的人更是如此。

#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古代仁人志士的人生理想，主要是希望能在政治上一展抱负，有所作为。陶渊明半生隐居，恬静淡泊，其实政治理想也是他一生始终不渝追求的一个目标。且看其自述：

忆我少壮时，无乐自欣豫。
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

——《杂诗》其五

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

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

——《拟古》其八

抒写了诗人亟欲展翅高飞的激越情怀，展示了诗人朝气蓬勃、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那么，诗人政治理想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其《读史述九章》云："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也就是要立德立功，像稷契一样辅弼明君，实现国家富强、天下太平的目标。也就是要"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这种报负和情怀，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是别无二致的。陶渊明从29岁到41岁这13年里，曾数度出仕，虽然他自己一再声称是因为亲老家贫才不得不出仕谋生，但这应当不是惟一的原因，有时恐怕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因为他当时还没有穷到非出仕不可的地步。他的出仕，在相当程度上应当是为了实现少时的"猛志"心愿。陶渊明曾先后入桓玄、刘裕和刘敬宣幕中，当时桓玄都督八州军事，兼荆州、江州刺史，刘裕为镇军将军，不久为侍中、车骑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刘敬宣为名震一时的镇北将军刘牢之之子，时任建威将军、江州刺史，都是当时最足以影响东晋政局的军府；而所任参军之职，位虽不显，却是一个能参机要、颇多升迁机会的职务；而陶渊明出仕的时机，又是东晋政局最为动荡的时候：因此不能不认为，陶渊明的出仕，在很大程度上是希望能够在政治上有所作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

由于理想和黑暗的现实政治的矛盾，陶渊明终于还是归隐了。在归隐期间，对早年的"猛志"并未完全淡忘，有时甚至对"猛志"不能实现感到非常痛苦。如《杂诗》其二所写：

白日沦西阿，素月出东岭。

遥遥万里晖，荡荡空中景。

风来入房户，夜中枕席冷。
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
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
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
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

在初秋寂静的夜里，诗人心潮起伏，彻夜难眠。而不能成眠的原因，不是因为节候变化，也不是因为孤独寂寞，而是因为时光流逝，事业无成。这使得诗人满怀悲凄，心潮彻夜难平。一个“掷”字，写出日月无情之状，也写出诗人的无奈之情。这种感慨，诗人在《杂诗》中反复作了抒写，如其一云：“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相勉励，岁月不待人。”其四云：“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其五云：“古人惜寸阴，念此使人惧。”《杂诗》作于诗人晚年，从“昔闻长老言，掩耳每不喜。奈何五十年，忽已亲此事”(其六)数句可知。因此《杂诗》中虽有不少叹老之辞(如其五所说“气力渐衰损，转觉日不如”等)，但从“丈夫志四海，我愿不知老”两句看，诗人并未因年老体衰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还颇有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即使拚上老命也要大干一场的劲头。这种执著的精神，与屈原“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

这种对于壮志未酬的不甘心，在《读山海经》中有着更为强烈的表现：

夸父诞宏志，乃与日竞走。
俱至虞渊下，似若无胜负。
神力既殊妙，倾河焉足有？
余迹寄邓林，功竟在身后。

——其九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
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其十

诗篇颂扬了夸父的“宏志”和“神力”，尤盛赞其功在身后的壮举。颂扬了精卫、刑天死而不休、继续战斗、绝不低头屈服的顽强意志和斗争精神。“同物”以下四句，谓生死可以置之度外，不必悔恨，然而昔日猛志不能实现，时机不再重来，则不无抱恨之意。这既是为精卫、刑天抱恨，也是诗人为自己抱恨。不难看出，从少年时代的“猛志逸四海”，到中年的“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再到老年的“猛志固常在”，对其政治理想的追求可以说贯穿了诗人的一生；而政治理想未能实现，可以说也成了诗人终身的遗憾。

李白对于理想的向往、追求和歌唱，也在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李白26岁时，其政治抱负和生活理想就已经确立。“骐骥筋力成，意在万里外”，“大鹏羽翼张，势欲摩穹昊”（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大丈夫必有四方之志”（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李白由此产生了要到祖国广阔的天地中去施展抱负、贡献才智



李白像

的强烈渴望，于是走出蜀中，开始了长期的漫游，实际上是开始了对理想的追求。李白“不求小官，以当世之务自负”（刘全白《李君碣记》），其想法是依靠自己的才能学识，通过多方面的社会活动，树立起巨大的声望，以获得帝王的特别赏识，然后一跃而至卿相的高位，为国家做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这就是他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所说的：

> 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

可见李白抱负是宏大的，气概是非凡的。为此，他曾一再以大鹏自比，如《上李邕》写道：

> 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
> 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
> 时人见我恒殊调，见余大言皆冷笑。
> 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

李白还常常以管仲、鲁仲连、范蠡、乐毅、信陵君、张良、韩信、诸葛亮等古代的政治家、军事家自比，希望自己也能像他们那样，凭藉个人的才能和勇气济世安民，做一番显赫的事业。这些历史人物在成功之前大都有过一段隐遁或不得志的时期，李白一方面认为这仿佛是“尺蠖之屈”、“龙蛇之蛰”，是不可避免的；另一方面，他有时又忍不住对隐遁的行为提出批评，如批评诸葛亮说：“耻学琅琊人，龙蟠事躬耕”。（《邺中王大劝入高凤石门山隐居》）批评谢安说：“莫学东山卧，参差老谢安。”（《送梁四归东平》）可见李白当时热衷用世的心情是何等的强烈。

但是，李白如同陶渊明一样，在追求政治理想的道路上遭遇了太多的艰难和挫折。长安三年一无所为，后来本想在平乱中为国立功，谁知却被捕下狱，长流夜郎。平时所遭受的困厄、讪

笑和打击，更是难以计数。但是，李白也同陶渊明一样，人生道路的艰难虽也使他感到苦闷和彷徨，却并没有从根本上挫伤他的政治热情，磨灭他为实现宏大抱负而奋斗的积极性。离开长安后，李白四处漂泊，常以被放逐江南的屈原自比，又常以未出仕前的谢安自比，希望有朝一日能再度被朝廷任用，“东山高卧时起来，欲济苍生未应晚”（《梁园吟》）。直到他临终的前一年，他仍在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奋斗，直到在悲愤、无奈中离世。

与陶渊明、李白相比，苏轼应当是幸运得多，因为他毕竟走进了官场，手中一度握有实权，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去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部分地让自己的政治理想变为现实。但是，苏轼的理想与现实之间，差距也是不小的。苏轼年轻时便“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在他春风得意之时，曾唱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和子由苦寒见寄》）的豪迈歌声，并自信“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沁园春》）。但是，险恶的现实粉碎了苏轼的天真想法，他一再受到排挤，遭到贬谪，甚至身陷囹圄，面临性命之虞。但同陶渊明、李白一样，挫折并没有真正浇灭苏轼的政治热情，他“虽废弃，未忘为国虑也”（《与滕达道书》），“尊主泽民”、“经世济时”的理想仍时时在他的心头闪光，并且，即使是在最艰难的情况下，他也坚持按自己的政治理想，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国家、为百姓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情。他那些揭露时弊、抨击时政的作品，也是展示了他敢于为民请命的政治报负和干预政治的勇气的。

《孟子·公孙丑下》载孟子语云：“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当今之世，舍我其谁”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使命感、昂扬的气概和高度的自信，千百年来却激励了无数仁人志士，使他们总能以天下为己任，树立远大的政

治抱负，终生追求，坚持不懈。即使到了老年，仍不放弃，为后人留下了无数豪言壮语。如：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曹操《步出夏门行·龟虽寿》

老当益壮，宁移白首之心？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

——王勃《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

白头虽老赤心存。

——杜甫《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

老骥思千里，饥鹰待一呼。

——杜甫《赠韦左丞丈济》

年益壮，志益大。

——刘禹锡《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记》

怜君头早白，其志竟不衰。

——白居易《寄唐生》

心如老骥常千里。

——陆游《赴成都》

壮心未与年俱老，死去犹能作鬼雄。

——陆游《书愤》

有的虽仅为激励之言，但终生以此为信条奉行者也大有人在。苏轼《赐太师文彦博乞致仕不允断来章批答》："宜守不移之志，以成可大之功。"只有坚持自己的人生理想并坚持不懈地为之奋斗的人，才有可能建立大的功业，取得大的成就。由于各种原因，不少人功业无成，但只要"猛志固常在"，不甘沉沦，其人生也是壮丽的，其品格也是崇高的。陶渊明、李白、苏轼的人生经历，都不同程度地说明了这一点。

# “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几千年来，在中国这块大地上，曾经数度发生分裂，形成若干个互相攻伐的小国。在大部分基本统一的年代里，也曾多次发生边患和内乱，在汉民族和其他少数民族间爆发战争。在谋求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战争中，在反对投降、抵御外侮的岁月里，涌现出了无数民族英雄。维护和巩固国家统一，反对割据分裂，反对民族压迫，抵御外敌入侵，也成为无数仁人志士终身追求的人生理想。每当

国家发生危难之时，他们总要勇敢地站出来呼吁抗战，维护统一，不少人还亲自投身到了抵御侵掠、恢复统一的斗争中去。如


辛弃疾像

辛弃疾出生在金人统治下的济南，沦陷区人民“号泣动于邻里，嗟怨盈于道路”（《金史·兵志》）的苦难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记，培育了他对民族压迫的强烈仇恨。在人民反抗运动的推动下，他毅然拿起武器，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他亲自组织起一支2000多人的游击队，后又率部参加了以耿京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在义军中担任“掌书记”的重要职务。南归后，他一直为抗战奔走呐喊。陆游20岁时便立下了“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的宏愿。在32岁时，又抒发过“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的豪情壮志。他曾亲戍边防要地大散关，亲历“铁衣卧枕戈，睡觉身满霜”（《鹅湖夜坐书怀》）、“铁衣上马蹴坚冰，有时三日不火食”（《江北庄取米到作饭香甚有感》）的战斗生活。抒发爱国的理想和激情，成为陆游诗歌的突出主题，一生所创作的诗，“言恢复者十之五六”，大都表现了“铁马横戈”、“气吞残虏”的英雄气概和“一生报国有万死”的牺牲精神。直到82岁时，陆游还唱出了“一闻战鼓意气生，犹能为国平燕赵”（《老马行》）的时代强音。



追求爱国的政治理想，也会碰到困难，遭遇挫折，甚至会面临生死考验。历史上，当受到外敌侵掠、国家安全受到极大威胁

时，统治阶级内部往往会产生分化，出现主战、主和两派。主战派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对抗战表现出强烈的渴望和热情。而主和派则反之，他们往往庸懦自私，眼光短浅，主张和议，反对抗战。在很多情况下，主和派往往就是投降派，在强敌咄咄逼人的凶焰面前，他们不可能签订平等的条约，和议的结果，不是割地赔款，就是北面称臣。他们为了达到投降敌人的目的，往往千方百计压制主战派的抗战活动，甚至不惜大打出手、杀头落地。在这种情况下，主战派人士要坚持自己的抗战理想，就必然要承受巨大的压力，必然要与投降派展开坚决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不少人英勇不屈，表现了忠于祖国、忠于理想的坚贞操守和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在与敌人兵刃相见的战场上，在敌人的监狱、刑场上，他们敢于面对种种危险而不退缩。文天祥在《指南录后序》中就说：“呜呼！予之及于死者不知其几矣！诋大酋，当死；骂逆贼，当死；与贵酋处二十日，争曲直，屡当死；去京口，挟匕首以备不测，几自颈死。”但是，虽屡历险境，诗人时刻想着的仍是“但令身未死，随力报乾坤”（《即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过零丁洋》），更是肝胆照人、豪气四溢，成为中华民族最为高亢激越的乐章，教育、激励、鼓舞了无数后来人。



文天祥像

陶渊明身处南北分裂时代，李白亲历安史之乱，苏轼一生始

终感受着辽和西夏的威胁，因此，统一中国，削平战乱，抵御外侮，也成为他们一生关切、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成为他们终生追求的人生理想，并为实现这一人生理想作出了不同程度的努力。

陶渊明是东晋开国将领陶侃的曾孙。陶侃是一个出身“孤寒”的士人，后凭藉武功，官至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受曾祖“枭雄斩勒”（陶侃《上表让大将军》）功业的鼓舞，陶渊明也是有荡平中原的愿望的。《拟古》其八写道：“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饥食首阳薇，渴饮易水流。”所说诸地当时都在北方少数民族贵族的统治之下，就多多少少表露出了这种意向。联系其“猛志逸四海”的抱负，特别是联系其“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赠羊长史》）的表态，这一点就可以看得更为明显。

李白在安史之乱爆发后，即亟欲投身到报国杀敌的行列中去，为削平叛乱贡献自己的力量。他高唱：

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
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赠张相镐》其二



“鲸鲵”即鲸鱼，雄的叫鲸，雌的叫鲵。喻凶险之人。这里代指安史叛军。当时长安已克复，洛阳尚陷于敌手，所以诗人表示要斩杀鲸鲵，消灭叛军，光复洛阳。然而令李白痛心的是，他空怀报国之心，并无用武之地。《猛虎行》写道：“有策不敢犯龙鳞，窜身南国避胡尘。宝书玉剑挂高阁，金鞍骏马散故人。”就抒发了这种失望的心情。他无可奈何地辗转江南，最后来到庐山隐居。

李白隐居庐山期间，长安失陷，玄宗奔蜀，把太子李亨留在北方讨贼。李亨旋即称帝，就是肃宗，改年号为至德。玄宗并不知情，逃到汉中后，仍以皇帝名义颁发“制置”诏，命太子李亨为

天下兵马大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都使，负责收复黄河流域一带地区。命永王李璘为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都使及江陵大都督，负责保卫长江流域一带地区。永王璘是玄宗的第十六子，李亨的异母弟。他接到命令后，就到江陵招募将士数万人，并领舟师顺江东下，直奔金陵。至德二年(757)正月，永王经过浔阳，知道李白在庐山隐居，就派人持重礼请他去做僚佐。李白当时是曾犹豫的。但由于永王再三邀请，时间又较紧迫，更重要的是由于永王当时是以准备平乱为号召，而李白本有参与平叛之志，于是最终应邀来到永王幕中。当时有许多人同李白一样，是为了平叛来到永王军中的，因此军中有较浓厚的救国杀敌气氛，李白深受鼓舞，对永王开始寄予厚望，并进行了赞颂。李白在相当短的时间里，写了《永王东巡歌》十一首，其中两首写道：

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
但用东山谢安石，为君谈笑静胡沙。

——其二

试借君王玉马鞭，指挥戎虏坐琼筵。
南风一扫胡尘静，西入长安到日边。

——其十一

“永嘉”为西晋怀帝年号。永嘉五年(311)，前汉刘聪的相国刘曜率军攻陷洛阳，中原人相率南奔避乱，史称永嘉之乱。“谢安石”，即东晋谢安，字安石，曾隐居会稽东山。前秦苻坚率大军南侵，时为宰臣的谢安被任为征讨大都督。他派谢玄等破苻坚百万众于淝水，创造了历史上以少胜多的著名战例。这里李白以谢安自比，希望从永王那里取得部分兵权(“玉马鞭”)，自己将一边饮酒谈笑，一边指挥战争，取得平叛的胜利，去向皇帝报捷。

表达了参与平叛的强烈愿望和必胜信心。《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愿与四座公,静谈《金匮篇》(兵书名)。齐心戴朝恩,不惜微躯捐。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也表达了同样的心情。诗人不惜牺牲,不为爵赏,一心只想彻底平定叛乱,表现了公而忘私的崇高品格和难能可贵的牺牲精神。

李白始料不及的是,他竟因此而被卷进了一场统治阶级的内斗。永王在江陵的举动,引起了肃宗的猜忌,被看作是对他帝位的威胁,于是调动军队对付永王。不久,永王兵败,被执受戮,其军队分崩离析。李白从丹阳前线逃离战场,一路心情极为悲愤,“过江誓流水,志在清中原。拔剑击前柱,悲歌难重论!”(《南奔书怀》)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心情。李白逃到彭泽,遭到逮捕,被关进了浔阳监狱。传说朝廷本来要以“从璘附逆”的罪名判处李白死刑,因郭子仪力救,才减死罪为流放。李白从江夏到宿松,在这里给时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兼河南节度使持节都统淮南等道诸军事的张镐写了两首诗,表示自己仍“雄心日千里”,要“誓欲斩鲸鲵”,可见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其报国之志仍未消歇。



不久,李白再次被捕,定罪流放夜郎。李白于至德二年(757)十二月从浔阳动身踏上了流放的长途,经历了千辛万苦,于乾元二年(759)抵达巫山时遇赦,旋从奉节(今属重庆市)雇船东归。李白这时的心情是欢快的,我们从他这时所写的《早发白帝城》诗不难体会到这种心情。李白报国的热情又被点燃,回途中在江夏所写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诗,又抒写了自己“中夜四五叹,常为大国忧”的心情,表达了“安得弈善射,一箭落旄头”的强烈愿望。在《江夏送倩公

归汉东序》中，诗人又说："今圣朝已舍季布，当征贾生。开颜洗目，一见白日。"表达了希望能够得到朝廷再次征召的心情。上元二年(761)，史思明被其子史朝义杀死，史朝义率兵向南进袭，朝廷以李光弼为河南副元帅、太尉兼侍中，率大军出镇临淮抵御。李白这时已经是61岁的老人，但他仍动身赶往临淮，准备加入李光弼的队伍，可惜因病，只得中途返回。《闻李太尉大举秦兵百万，出征东南，懦夫请缨，冀申一割之用，半道病还，留别金陵崔侍御十九韵》诗写道："愿雪会稽耻，将期报恩荣。半道谢病还，无因东南征。亚夫未见顾，剧孟阻先行。天夺壮士心，长吁别吴京。"表达了极为遗憾的心情。次年，李白便因病与世长辞。不难看出，李白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胸中还燃烧着平定叛乱、报国立功的热情。

苏轼一生，也怀抱着驰骋疆场、抵御外御、报国立功的宏愿，这在其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词中有突出的表现：

>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词作于神宗熙宁八年(1075)任密州太守时。上片极写其打猎时意气风发的"狂"态：太守出猎而需"报"城中百姓跟随去看，此其一"狂"；出看而需"倾城"，此其二"狂"；出猎而要"亲射虎"，此其三"狂"；自比孙郎，此其四"狂"。孙郎，指三国吴孙权。《三国志·吴书》记载，建安二十三年(218)，"权将如吴，亲乘马射虎于庱亭(今江苏丹阳东)，马为虎所伤，权投以双戟，虎却废"。这里以孙权自比，足见其英姿勃发的豪兴和豪情。

下片由实而虚，抒写由打猎而激发起来的报国壮志。"持

节"句用冯唐赦魏尚事。汉文帝时,云中郡太守魏尚抗击匈奴有功,后因上报战果数字略有差误而被削职。郎中署长冯唐谏文帝不应如此处理,于是文帝"令唐持节赦魏尚,复以为云中守"(《汉书·冯唐传》)。作者在这里以魏尚自比,希望朝廷能够起用他,委他以边任,让他到边疆杀敌。最后三句,作者更为自己勾勒了一个弯弓劲射的英雄形象,英武豪迈之概,跃然纸上。

这种激昂的报国壮志,在苏轼的其他作品也多有表现。如《和子由苦寒见寄》写道:"山西良家子,锦缘貂裘鲜。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谢陈季常惠一揞巾》写道:"臂弓腰箭何时去,直上阴山取可汗。"

苏轼具有报国壮志,不仅是说说而已,还表现在他在这方面做过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他多次就边患问题提出过自己的主张,对"以岁出金缯数十百万,以资强虏"(《策略》二)的妥协投降政策表示过反对,对当时所实行的对辽和西夏的政策及抗战形势发生过一定影响。哲宗绍圣元年(1094),苏轼出任定州太守。定州当时为北方的边防重地。自澶渊之盟以来,经历了一段较长的和平时期,河朔号称无事,以致边备松弛,法令不行,将骄卒惰。军队长期不予训练。军中频出贪污盗窃案件,军民赌博成风,不法将士进行敛掠,放债取息。营房毁坏,不庇风雨。士兵日有逃亡,聚为"盗贼"。苏轼到任后,大力进行整顿,整饬军纪,惩办贪污,修葺营房,训练部队,使军队面貌在短期内发生了很大变化。在强本固边这个问题上,苏轼未能大展宏图,但他能抓住有利时机,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推行自己主张,让自己的理想部分地变为现实。这是苏轼使命感和实干精神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和陶渊明、李白比起来,相对较为幸运的地方。

# “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



不同阶级、不同集团、不同学派、不同个人会有不同的人生理想,甚至同一个人其人生理想也可能会是多元的。儒家主张积极入世,道家却主张消极避世;儒家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道家却主张淡泊自守、清静无为。道家的主张,在儒家那里有时也能得到共鸣。

《论语·先进》载,一次孔子与他的学生子路(名由)、曾皙(名点)、冉有(名求)、公西华(名赤)

聊天,要他们谈谈自己的理想。子路抢先说:“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孔子听了,微微笑了一下。孔子又问:“求,尔如何?”冉有回答说:“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孔子再问:“赤,尔何如?”公西华回答说:“宗庙之事,如会同,端章甫,愿为小相焉。”最后孔子问:“点,尔何如?”当时曾皙正在弹瑟,心不在焉地听着子路等人的发言,听到老师发问,便慢慢停止弹奏,把瑟放下,回答说:“异乎三子者之撰。”孔子鼓励他:“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曾皙于是回答:“莫(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感慨地说:“吾与点也。”子路、冉有、公西华的理想均是要在政治上有所作为,而曾皙的理想却是要到大自然中去逍遥,颇有些不过问政治的味道,与孔子的一贯主张相悖,孔子为什么却偏偏对他表示赞同呢?初看似乎不可理解,但稍加思考便会得到答案,即孔子在经过多方努力其政治主张仍无法实现的情况下,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发生了某些微妙



子路像



曾皙像

的变化，避世无为的思想有所抬头。这一点在《论语》中也能找到佐证。《论语·公冶长》载孔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泰伯》载孔子曰："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卫灵公》载孔子曰："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可见孔子已经在开始实行孟子所说的"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的主张了。孔子周游列国返回鲁国后，即专心从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化的工作，不妨认为这是他在退出政治潮流后的一种选择。因此，似乎可以说，从孔子开始，人们就有了"用世"和"避世"两种选择，两种选择可以被同一个人采用，只不过往往是其中的一种占据着人生的主导地位，或者在人生的某一个时期或阶段占据着主导的地位。陶渊明、李白、苏轼也是这样的人。他们执著地追求政治理想，同时，他们也曾经执著地把避世隐居、投身自然、洁身自好、淡泊无为当作自己追求的人生目标，其中尤以陶渊明最为突出。



冉有像



公西华像

陶渊明"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从小就爱好大自然，对世俗的事情不甚留心，不感兴趣。后来，陶渊明出仕了，但刚刚出仕，他就开始留恋山泽乡居生活。且看《始

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眇眇孤舟逝，绵绵归思纡。
我行岂不遥，登降千里余。
目倦川途异，心念山泽居。
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
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

在赴任途中，船在向前行，但归思却在把诗人往后拉。异乡的景物没有使诗人感到新鲜，却使他感到厌倦；自由自在高飞的鸟儿，在水中轻快地游来游去的鱼儿，都使他这个有了俗务缠身、不得自由的人感到惭愧。最后一句诗人表示，他最终要回到仁者的住所隐居。可以说刚一出仕，诗人就已确定了他最终的人生归宿。

此后，陶渊明对官场生活越来越表现出明显的抵触情绪，而退隐之心则与日俱增。《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云："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写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写道："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对自己抛弃田园生活而走仕宦之路一再提出怀疑甚至表示自责，表示"素襟不可易"，即自己归隐田园的素志不可改变，并表示自己的德行要像霜中挺拔的松树那样坚定、高洁。不难看出，诗人归隐的决心越来越大。最后，诗人终于在他41岁的这一年，从彭泽县令任抽身归隐了。且看他在《归去来兮辞》中所写：

归去来兮！田园将芜胡不归？既自以心为形役，奚惆怅而独悲？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舟摇摇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

开头两句，如大声疾呼，如大声棒喝，这是诗人对自己发出的召唤和命令。诗人把自己13年中的仕途生活，看作失路人走过的一段“迷途”，可见痛悔之深，而对即将到来的田园生活则向往之至。情怀急切，语调轻快，不难想象当时心情。

诗人归隐田园后，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此后思想上虽曾产生过功业无成的苦闷，也并未彻底遗忘世事，但他始终不改初衷，经受住了艰苦生活的考验，战胜了再度出仕的诱惑。与陶渊明同称为“浔阳三隐”之一的周续之为江州刺史所请，与学士祖企、谢景夷一起在城里讲礼、校书，其办公的地方同马厩差不多，陶渊明还写了诗去嘲讽他们，最后说：“老夫有所爱，思与尔为邻。愿言诲诸子，从我颍水滨。”劝他们和自己一起隐居，可见陶渊明不仅自己不应征命，还希望别的隐士也同自己一样站稳立场。入宋后，陶渊明贫病转剧，江州刺史檀道济前去看望，并说：“贤者处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劝陶渊明放弃隐居之志出仕，但渊明仍不为所动，也不接受檀道济的馈赠（见萧统《陶渊明传》）。陶渊明坚持己志以终老，在封建社会无数的隐士中，可以说是非常突出的。

李白《留别王司马嵩》云：“鸟爱碧山远，鱼游沧海深。”对隐居生活也是非常向往的。李白不仅是向往隐居生活，一生中还曾多次到山林隐居。20岁以前他还在蜀中时，就曾和隐士东严子一起隐在岷山，即现在成都附近的青城山。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养奇禽千计，呼皆就掌取食，了

无惊猜。广汉太守闻而异之,诣庐亲睹。因举二人以有道,并不起。"出蜀后,李白在安陆(今属湖北)与在唐高宗时做过宰相的许圉师的孙女结婚,婚后便在安陆寓居下来,开始了"酒饮安陆,蹉跎十年"(《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的生活。在"酒饮安陆"的十多年时间里,李白曾先后隐居在安陆境内的寿山和白兆山桃花岩。在漫游期间,他又曾和道士元丹丘一起隐居嵩山。在山东,还曾与孔巢父、韩准、裴政、张叔明、陶沔五人一起隐居在徂徕山(在今山东泰安)西北巉石峰下的竹溪,时人称为"竹溪六逸"。

之后,李白还曾与道士吴筠同隐剡中(在今浙江曹娥江上游)。安史之乱期间,又曾隐居庐山。李白一再归隐,不难看出他对隐居生活是情有独钟的。李白认为最理想的人生,就是先用自己的智慧和才能去为国家建立一番功业,然后"功成身退",去隐居和求仙学道。诗人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说:"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在《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其二中说:"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中说:"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在《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诗中说:"所冀旄头灭,功成追鲁连。"在《留别王司马嵩》诗中说:"愿一佐明主,功成还旧林。"说的都是这个意思。可惜的是,诗人一生始终功业未成,因此"功成身退"也就无从谈起,这是诗人终生的遗憾,也是诗人的一个人生悲剧。



遁迹山林、亲近自然、恬澹无为也曾是苏轼向往的人生目标。苏轼在其早期的诗作中,就曾明确地表达过这样的愿望:"尽解林泉好,多为富贵酣。试看飞鸟乐,高遁此心甘。"(《入

峡》)“永怀江阳叟,种藕春满湖。”(《浰阳早发》)“何时归耕江上田,一夜心逐南飞鸿。”(《二十七日,自阳平至斜谷,宿于南山中蟠龙寺》)到他对官场的污浊与险恶有了深入的了解,特别是在他遭受排挤、打击和困厄之后,他对这种理想的向往与追求就更为强烈。苏轼被贬谪到黄州时,就曾慨叹:“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念奴娇·赤壁怀古》)就曾幻想:“小舟从此逝,江海度余生。”(《临江仙》)此后,这种想法就更时时在诗人心头涌现。苏轼还曾不止一次筹划买田,实实在在地为归隐做过准备。不过,苏轼虽曾在贬谪和外放期间过过不少形似归隐的生活,但他一生却从未真正地归隐过,这是与陶渊明和李白不同的地方。但有一点是与陶渊明和李白一样的,即他对山林田园生活的向往与追求也是真诚的、执著的。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对隐逸生活如此向往和追求,大致有以下几点原因:

其一,政局的风云变幻,社会的污浊黑暗,官场的险风恶浪,使他们产生避世绝尘之想。

其二,个人政治理想受挫,不得不回归山林田园。

其三,本性自然,不耐官场拘束,愿到山野田园过自由自在的生活。

其四,利用隐居建立社会声誉,为出仕打基础。李白与那些仅仅把隐居看作是敲开仕宦之门工具的禄利之徒不同,但他也曾以此为手段,目的是要像周朝的吕尚和商朝的傅说那样,开始隐居,后来得到周文王和武丁(殷高宗)的信用,为国家苍生作了一番事业。之后,他再“功成身退”,归隐山林。李白在玄宗征召前的隐居活动,在相当程度上基于这一目的。

其五,真心喜欢山水自然、山林田园,真心希望置身其中,欣

赏美景，享受乐趣，寻求慰藉。陶渊明、李白、苏轼无不如此。

热衷向往和追求隐逸生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人走上隐逸之路，往往并非一种原因在起作用，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也不例外。既执著地追求政治理想，希望能够建功立业、有所作为，又希望能够隐逸山林、终老田园，这使得他们的人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使得他们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多了一种自我调适的手段。也使得他们更加具有独立人格，具有批判精神，具有潇洒气度和悠然情调，具有了令人叹为观止的高风亮节。陶渊明、李白和苏轼能够得到后人的景仰，这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 三、守正不阿　特立不群



正与邪，尖锐对立，水火不容，如苏轼在《学士院试春秋定天下之邪正论》一文中所说："邪正之不同也不啻若黑白。""正"对一个人立身处世很重要，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长治久安、兴旺发达也很重要，如苏洵《用间》所说："用心于正，一振而群纲举；用心于诈，百补而千穴败。"因此，正而不邪守正不移，成为无数仁人志士所共同崇奉的理念、所共同遵守的原则。

真正做到守正不阿并不容易,须面对、经受和战胜各种各样的考验,甚至是非常严峻的考验。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是能守正不阿的人,他们从不因遭受了太多的艰辛、挫折、磨难、打击而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做人原则、人生追求和既定的人生道路,能超拔于流俗之上,清浊异路,是非分明,铁骨铮铮,特立不群,显示出可贵的品格和精神。

# "赋性刚拙,议论不随"



《论语·学而》载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讨人喜欢的面孔的人,是很少有仁德的。孔子又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论语·公冶长》)意思是,花言巧语,装出一副谄媚的容貌,对人过分恭敬,这种人,左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内心对人隐藏着怨恨,外表却装出对人很友好,这种人,左

丘明认为可耻,我也认为可耻。可见,孔子对巧言令色、心口不一、善于谄媚逢迎的人是深恶痛绝的,认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多少仁德的,或者即认为这样的表现是与仁德背道而驰的。反之,孔子对于刚直的人则十分赞赏,曾赞美刚直不屈的卫国大夫子鱼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论语·卫灵公》)认为史鱼(史鳅,字子鱼,亦称史鱼)在国家政治清明时能像箭一样直,在国家政治黑暗时也能像箭一样直。孔子认为:"当仁,不让于师。"(《卫灵公》)在面对着仁德时,要敢于坚持,就是自己的老师,也不同他谦让。不难看出,孔子把正直敢言看得非常重要,认为这是构成仁德的必备条件,是仁德的突出表现。古代的仁人志士,不少人正是以此要求、砥砺自己,从而表现出了可贵的品格。

陶渊明在《与子俨等疏》中说自己"性刚才拙,与物多忤",李白疾恶如仇、桀傲不群,都是具有刚直的品性的。而在这方面表现得最为突出的是苏轼。苏轼对那些逢迎"希合"、"以求世用"(《乞郡札子》)的人极为厌恶,表明自己在政治斗争中的态度是"赋性刚拙,议论不随"(《乞罢学士除闲慢差遣札子》),是"专务规谏","遇事有可尊主泽民者,便忘躯为之,祸福得丧,付与造物"(《与李公择书》)。苏轼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去做的。



王安石变法时,大权在握,苏轼在《杭州召还乞郡状》中说:"是时王安石新得政,变易法度,臣若少加附会,进用可必。"当时因"附会"王安石而得"进用"的人确也不少。但苏轼对某些在他看来仍行之有效的传统法制采取了维护的态度,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律加以废除、更改,而且认为"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也"(《策略三》),因此他加入了反对派的行列,对新法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王安石变法是得到宋

神宗支持的，因此苏轼曾先后三次给神宗上书，每次都是洋洋洒洒，雄辩滔滔，秉笔直书，无所隐避。苏轼表示："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又说："立条例司，遣青苗使，敛助役钱，行均输法，四海骚动，行路怨咨。自宰相以下，皆知其非而不敢争。"而苏轼却自称"愚蠢不识忌讳"，"上疏论之详"。在神宗正雷厉风行地推行新法的当时，苏轼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勇气，是十分难得的。而且，不管苏轼对制置三司条例司、青苗法、均输法等新法举措的看法是否正确，态度是否偏激，其出发点绝对是为国为民，而无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苏轼提醒皇帝改革一定要考虑到老百姓的利益，不可失掉人心，这种看法无疑是正确而深刻的。苏轼列举新法之弊："青苗、助役之法行，则农不安，均输之令出，则商贾不行，而民始忧矣。"对那些对新法之弊视而不见的人提出了严厉批评："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这些，都是从"爱民"的角度提出问题、发表看法的。由于苏轼是逆潮流而动，态度又异常激烈，批评的矛头甚至直指神宗皇帝，他是做好了被罢官的思想准备的，也就是说，他是甘冒着被罢官的风险挺身而出、坦陈己见的。果然，他最终被遭罢黜，再后来又遭诬下狱，被贬黄州。

元丰八年(1085)三月，神宗去世，年仅10岁的哲宗即位，宣仁皇后高氏垂帘听政，改用旧党司马光为相，苏轼也得"骤迁"，先复朝奉郎知登州，到任才五天，又以礼部郎中召还京师，再迁起居舍人。次年，即元祐元年(1086)，又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知制诰。元祐二年，兼侍读。元祐三年，权知礼部贡举。一二年间，青云直上，堪称苏轼一生仕宦最为顺畅、得意的时期。但苏轼并没有就此安于现状。司马光上台后，欲尽废新法，许多人望

风响应。苏轼与司马光私交甚厚,当初他也曾激烈地反对新法,按理他应是无条件地与司马光站在一起的。但情形恰恰相反。新法实行十余年来,对挽救赵宋王朝的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都起到了一定作用,苏轼这些年来在对新法的某些流弊进行批判的同时,也发现了新法的某些好处,如他认为唐中叶以来,“民不知兵,兵不知农,农出谷帛以养兵,兵出性命以卫农,天下便之。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今免役之法,实大类此”(《宋史·苏轼传》),对免役法采取了肯定、维护的态度。因此,当他发现司马光“其意专欲变熙宁之法,不复较量利害,参用所长”时,便挺身而出“屡争之”,“因此得存留者甚多”(《辩试馆职策问札子》)。双方的争吵异常激烈,司马光十分固执,苏轼为与他争辩免役法的问题,气得回家痛骂:“司马牛! 司马牛!”苏轼也因此而葬送了自己进身的机会,有的人甚至称苏轼为“王安石第二”,他们一再上疏诬陷攻击,苏轼难以在朝立足,最后再度被迫“补外”而去。



苏轼与司马光的这一场斗争,也完全是从国家利益出发的。实际上,苏轼对自己早年所持的对新法的态度也作了自我批评。苏轼对于新法的弃取是并无个人成见的。他在政治变革中完全走着自己的路,既不投靠旧党,也不依附新党。他赞同新法的某些内容,不是在附和新党;他反对新法的某些内容,也不是在附和旧党。无论是在王安石当权时还是在司马光当权时,他都没有采取随波逐流的态度。他在《与杨元素书》说:“昔之君子,惟荆(指王安石)是师;今之君子,惟温(指司马光)是随。所随不同,其为随一也。老弟与温,相知至深,始终无间,然多不随耳。”明确展示了自己即使是“相知至深”也“不随”的独立不阿的品格。

苏轼所表现出来的独立品格，与孔子所提倡的理想品格是一脉相承的。苏轼晚年从海南岛贬所北归后，曾写有《刚说》一文，认为“刚者必仁”，而“佞者必不仁”，并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加以证明：凡将自己从灾难中解脱出来的，都是那些平常不讲情面、不易亲近、看起来让人感到害怕的刚直之人；凡是把自己推挤到危险境地的，都是那些平常讨人喜欢的善于谄媚逢迎的人。接下来苏轼回忆了孙立节刚直不阿的两件事，赞扬了孙立节的刚直品格，以此“明刚者之必仁，以信（同“伸”，伸张、阐明之意）孔子说”。可见，苏轼是将刚直与否当作是否仁德来看待的。也可看出，苏轼在经历了长期颠沛流离、九死一生的贬谪生活之后，他仍保持着刚直的品格，仍把刚直看作是人生的一种理想品格。

苏轼认为，要保持刚直的品格，自身必须无所畏惧。他在《书〈孟德传〉后》一文中，用生动的故事说明了这个问题。苏轼不畏强者，遇事敢言，正体现了他的无所畏惧的精神。

苏轼“拙于谋身，锐于报国”（《乞郡札子》）的品格，在当时就得到不少人的敬佩，身后更得到崇高的评价。南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朝廷赐苏轼谥号文忠公，又赐太师官阶。在封太师之位的圣旨中，说苏轼“养其气以刚大，尊所闻而高明”，“不可夺者峣然之节，莫之致者自然之名”。



苏轼身后名气很大，而其人品道德实构成了他名气的骨干。《宋史》本传载，当时曾有人说：“轼稍自韬戢，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意思是，苏轼如果能稍微韬晦收敛一点，即使不得大用，也不会招致祸患。但本传作者随即反驳说：“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这话是说得很对的。

#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



《庄子·秋水》记载有一个故事，说惠子在梁国做宰相，庄子前去看望他。有人对惠子说：“庄子来梁国，是想取代你做宰相。”惠子于是恐慌起来，在都城内搜寻庄子，一直搜寻了三天三夜。庄子得知这一情况，便去见惠子，说：“南方有一种鸟，名字叫鹓鶵，你知道吗？鹓鶵从南海动身往北海飞，途中不碰到梧桐树它不会停下来休息，不是竹子的果实它不会进食，不是甘美的泉水它不会饮

用。鹞鹰找到一只已腐烂的老鼠,鹓鸰刚好从它头顶飞过,它以为鹓鸰要来抢他的腐鼠,于是既惊恐又愤怒地叫了一声‘赫’!如今你也想用梁国的相位来‘赫’我吗?”在这里,庄子把自己比成一只高贵的鹓鸰(鹓鸰是鸾凤一类的鸟),而把梁国的相位比成一只腐鼠,表现了自己对禄位权欲的鄙夷之情。

道家轻官忽禄,蔑视权贵,儒家崇尚气节,视干进逢迎为可耻,这对后世仁人志士产生了深刻影响。当权臣专擅朝政、颐指气使、胡作非为时,总有一些节概之士敬而远之,不与合作,甚至站出来与之展开坚决的斗争。据《宋史·杨万里传》载,权奸韩侂胄当宰相后,想网罗天下名士做他的羽翼。他曾建造了一座南园,园建成后,特请杨万里写一篇记,许诺给他中枢高官做。杨万里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官可以放弃,记是不能写的!”韩侂胄十分生气,只好让别人写。杨万里在家闲居15年,这期间一直是韩侂胄当权。杨万里在家看到韩侂胄一天比一天专权,忧愤成疾。家人知道他的病是因忧国而起,因此京中来的邸报中凡有关政局的消息都不告诉他。一天,杨万里突然从一个侄子口中得知韩侂胄要轻率地北伐,料知国事将会不可收拾,于是痛哭失声,急命家人拿来纸笔,写道:“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在书十四言诀别妻子后,笔落而逝。杨万里因此以耿介刚毅知名,成为节概之士的突出代表。

陶渊明半生不仕,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不愿与权贵合作。《宋书》本传载陶渊明为彭泽令,“郡遣督邮至县,吏白应束带见之。潜叹曰:‘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印绶去职,赋《归去来》”。陶渊明将郡里来的督邮称为“乡里小儿”,

不愿向他弯腰鞠躬，表现了他的傲骨。又萧统《陶渊明传》载，入宋后，陶渊明“躬耕自资，遂抱羸疾”。江州刺史檀道济前来看望，劝他出仕，并“馈以粱肉”，但陶渊明却“麾而去之”，毫不领情。江州刺史的权位比起郡督邮来可就大多了，而且他不是来巡视检查工作的，但陶渊明照样“麾而去之”，一个“麾”字，写出陶渊明对刺史的不屑一顾之态。陶渊明还曾做过刘裕的镇军参军，后来的离职，很可能也因刘裕在彻底消灭桓玄及其余党的势力后，地位日益提高，权势也日益强大，陶渊明不愿再向他“折腰”有关。下面的一首诗，是很形象地表现了陶渊明自己挺拔卓异的品格的：

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
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
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
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
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

——《饮酒》其八



当严冬到来之前，青松与“众草”并没有什么不同，它甚至长得没有“众草”繁茂，其身姿都被“众草”掩盖了。但是，当严冬来到之后，“众草”纷纷凋零，惟独青松仍傲然屹立，“卓然见高枝”。特别当它是一棵“独树”的时候，它更显得卓异不俗，会吸引来更多惊奇钦敬的目光。诗人提着酒壶，“抚孤松而盘桓”（《归去来兮辞》），哪还用得着向远处眺望呢？钟爱青松之情，溢于言表。钟爱青松，实际上就是钟爱青松傲霜斗雪、不惧严寒、不同流俗、卓异高标的品格。诗人实以青松自比，有了这种青松品格，自然不会向严寒、流俗即权贵们“折腰”了。

李白睥睨富贵，粪土王侯，其气概更是上薄青云。他常以大

鹏、良骥自况。如《上李邕》写道："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赠崔谘议》写道："骎骥本天马，素非伏枥驹。长嘶向清风，倏忽凌九区。"这一方面表现了李白对自己才能的高度自负，表现了他的远大抱负和豪迈气概，也表现了他对权贵利禄的蔑弃和不愿为封建秩序所束缚的思想性格。李白也曾以诗文干谒州郡长官和朝中卿相，在干谒时对对方也不免要说一些恭维的话，如在《与韩荆州书》中，一开头就借用"天下谈士"的话说："生不用万户侯，但愿一识韩荆州。"接下来又说："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动天地。笔参造化，学究天下。""为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权衡。"又称颂韩朝宗为"国士"，有"周公之风"，"推赤心于诸贤腹中"，这些话都不免褒奖失实。但是，李白在谈到自己时，也说："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王公大人，许与气义。""日试万言，倚马可待。"高度自负，气概昂扬，充分表现了他"出则平交王侯"(《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的性格。可以说，李白抬高了韩朝宗，却并没有贬低自己。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李白更表示自己是"天为容，道为貌，不屈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总之，李白即使在"干人"的时候，也是以"不屈己"为前提的，同那些在"干人"时气夺神敛、卑躬屈膝的人判然有别。



李白蔑视权贵的性格，在下列传说中得到了最充分的表现：

李白名播海内，玄宗于便殿召见。神气高朗，轩轩然若霞举。上不觉忘万乘之尊，因命纳履。白遂展足与高力士曰："去靴！"力士失势，遽为脱之。

——段成式《酉阳杂俎》

高力士何许人也？他当时是最受唐玄宗宠信的一个宦官。据

《旧唐书·高力士传》,高力士"资产殷厚,非王侯所拟",四方进奏的文表,都先由他审阅,然后再呈进,一般事务则可自行处理。当时的将相宇文融、李林甫、盖嘉运、韦坚、杨慎矜、王鉷、杨国忠、安禄山、安思顺、高仙芝等人都是经高力士的推荐而至高位的。他在宫中的地位,可以说仅次于唐玄宗。唐肃宗李亨在未登位前,叫他"二兄",诸王及公主都叫他"阿翁",驸马辈叫他"爷"。对这样一个权倾内外、炙手可热的宦官,李白却敢于将他当作奴仆看待,当着唐玄宗的面把脚伸过去,叫他"去靴",其气概确实不同凡响。此外,还有李白让杨贵妃为他捧砚的故事,因此方孝孺在《吊李白》诗中说:"脱靴力士只羞颜,捧砚杨妃劳玉指。"这些传说所说不一定就是事实,但却与李白的精神、气概、品格是相符合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事情在李白身上是并非绝不可能发生的。

李白无所顾忌的傲岸态度,招来了权贵的忌恨,从而对他的政治前途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据韦睿《松窗杂录》记载,一次唐玄宗和杨贵妃在兴庆宫沉香亭观赏牡丹,把李白叫到宫中即席赋《清平调辞》三首,由当时的名歌手李龟年当场配乐演唱,杨贵妃听了非常高兴,"笑领歌意甚厚"。唐玄宗从此也"顾李翰林尤异于他学士"。但高力士对"脱靴"之耻一直怀恨在心,一次当杨贵妃再次吟唱《清平调辞三首》时,高力士便乘机进谗。他摘取辞中"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妆"两句对贵妃说:"比以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反拳拳如是?"赵飞燕是西汉成帝的皇后,原为歌女,在当时被视为出身低贱。杨贵妃的父亲不过是蜀州的一个司户,出身也不高贵,听说李白以飞燕比她,觉得是在捅她的痛处,不禁恨恨地说:"何翰林学士能辱人如斯?"高力士进一步火上浇油:"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杨贵妃"深然

之”，于是开始在玄宗面前说李白的坏话。据说，唐玄宗曾三次打算任命李白以官职，都因杨贵妃的坚决反对而作罢。高力士和杨贵妃，一个是玄宗最宠信的宦官，一个是玄宗最宠爱的妃子，他们联合起来诋毁李白，当然会产生很大的作用。何况，当时参与诋毁李白的并不只他们两人，还有前宰相张说的儿子、玄宗的女婿、与李白同供奉翰林的张垍及其他一些人。“浮云蔽紫闼，白日难回光。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李白《古风》其三十七）在这样的情况下，李白必然要遭到玄宗的疏远。李白为此感到十分苦闷。他在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徘徊、犹豫和观察之后，感到玄宗已经不是一个可以寄予希望的君主，于是毅然自动上疏请求离开。玄宗顺水推舟，并不挽留，遂“优诏罢遣”。李白的好友任华在《杂言寄李白》诗中写道：“权臣妒盛名，群犬多吠声。有敕放君却归隐沦处，高歌大笑出关去。”权臣排挤李白达到了目的，但李白并没有低下他高傲的头颅，“高歌大笑出关去”。

李白离开长安后，一路漫游，先到了河南，然后又到了山东。天宝四年(745)，李白准备南游越中，在行前写下了《梦游天姥吟留别》一诗。关于本诗主旨，或以为是记梦，或以为是游仙，或以为是酬赠，或以为是抒怀，或以为是描山绘水，实则兼而有之，难以以偏概全。诗篇驰骋想像，通过梦游，描绘了想像中的天姥山既雄奇瑰丽、又阴森恐怖的景象，创造了一个缤纷奇异、眩目惊心的神仙世界。最后从梦境中返回现实，发出了“世间行乐亦如此，古来万事东流水”的深沉慨叹。最后两句：“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如惊雷一声自天外飞来，振聋发聩，一吐长安三年的郁闷之气，高度概括了李白一生对权贵极度蔑视的态度和对自由人生的热切向往之情。“折腰”一词直接陶渊

明，表明了两人气概、精神一脉相承的联系。

李白直到他的晚年，其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的精神及慷慨高歌的壮怀仍未消减，任华因此说他“平生傲岸其志不可测，数十年为客未尝一日低颜色”(《杂言寄李白》)。据王琦注《李太白全集》附录引，当时还曾出现李白“不能屈身，以腰间有傲骨”的传说。表现了李白“傲骨”的诗句，如“松柏本孤直，难为桃李颜。”(《古风》其十二)“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设辟邪伎鼓吹雉子斑曲辞》)“绿萝笑簪绂，丹壑贱岩廊。”(《闻丹丘子于城北营石门幽居，中有高风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将进酒》)“功名富贵若长在，汉水亦应西北流。”(《江上吟》)等等，至今读来仍觉豪气逼人，掷地有声。

苏轼一生，虽身在官场，并曾亲掌机要，但他刚直敢言，不看当路者脸色行事，虽一再遭受排挤打击而品性不改，说明其精神气概与陶渊明、李白是并无二致的。其《次韵孔毅父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一写道：“我虽穷苦不如人，要亦自是民之一。形容虽是丧家狗，未肯弭耳争投骨。”夫子自道，就突出地说明了这一点。

陶渊明、李白、苏轼的铮铮铁骨，显示出了最可宝贵的独立人格和高尚节操。特别是李白，能以布衣的骄傲与王侯相抗衡，展示出凌然不可侵犯的人的尊严，尤为难能可贵，这是其人其诗千百年来得到人们喜爱的一个重要原因。

# “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



在处于穷困时，仍然坚守个人的品行、操守和气节，是儒家所标榜的最高人生理想和人生追求之一。孔子周游列国时，在陈国断了粮，跟随的人一个个都饿病了，躺在床上爬不起来。孔子的学生子路满脸不高兴地来见老师，问：“君子也有穷困的时候吗？”孔子回答说：“君子能够安守穷困，小人穷困时就会胡作非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能否安于穷困，成了孔子判断君子和小人的一个

标准。这里的“穷”，是指无路可走，不是贫的意思，在古汉语中，“穷”和“贫”是有区别的。当然，一个人“穷”了往往也就“贫”了，因此在很多情况下两者又是相通的。



颜回像

孔子自己在“固穷”这方面是以身作则的。《论语·述而》载孔子语云：“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吃粗粮，喝冷水，把胳膊弯过来当枕头，物质生活可以说是非常窘困，但只要能坚守自己的理想，为自己的理想去奋斗，乐亦在其中，而不会以不道德的手段去求得富贵。对于能安贫乐道的学生，孔子特别欣赏。《论语·雍也》载，颜回吃的是一个竹篮子装的饭，喝的是一葫芦瓢水，住在小巷子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苦的忧愁，而颜回却认为过清贫生活自有其快乐并加以坚持，孔子因此非常欣赏，一再赞叹说：“颜回是多么有贤德呀！”孔子将学生所学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颜回因此被列为“德行”之首。颜回死后，孔子非常伤心，不住地痛哭，说：“噫！天丧予！天丧予！”（《先进》）意思是：是天老爷要我的命啊！是天老爷要我的命啊！别人劝他说：“您太伤心了。”孔子回答说：“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同上）意思是：我不为这样的人伤心，还为什么人伤心呢？可见，孔子对于能安贫乐道的人，是何等的挚爱和推崇。

坚守“固穷”的准则，其中有一个“道”支撑着，这个“道”指自己为之奋斗的理想、学说，更多的情况是指个人的品德和节操。

“道”比起“穷”来，要重要得多，因此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能够守道不移，才能受穷不移，才能虽穷而能乐在其中，虽穷而不觉穷。君子有道，小人无道，这是君子能够“固穷”而小人却会“斯滥”的根本原因。因此，儒家提倡“固穷”，实际是提倡守道不移，要追求、坚守崇高的品格节操永不动摇。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都是能够“固穷”的人物。他们的一生，都曾经历过政局的动荡、政治的黑暗、社会的混乱，都曾遭遇过生活的坎坷、困苦，但他们都并没有因此而改其志、失其节，相反在经历磨难之后，其志更坚、节更显，从而得到了无数后人的景仰。下面谈谈陶渊明在这方面的情况。

陶渊明对于孔子提出的“固穷”准则，是高度认同并认真服膺的。他在其作品中多次提到要坚守“固穷”。

《癸卯岁十二月中作与从弟敬远》写道：“劲气侵襟袖，箪瓢谢屡设。萧索空宇中，了无一可悦。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高操非所攀，谬得固穷节。”强劲的寒风侵袭着襟袖，像颜回那样的箪食瓢饮都不能常有，可以说是饥寒交迫。但是遍览古书，却从古代的贤人、烈士那里学得了固守穷困的节操。“高操”两句的意思是：古代贤人、烈士高尚的操行不是我所能高攀的，只是错误地学到了他们“固穷”的气节。这里有自谦，有调侃，实际是说从古代贤人、烈士那里学到了“固穷”的操守气节，并以此自骄，身处穷困而流露出乐观精神。

《饮酒》其二写道：“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九十行带索，饥寒况当年。不赖固穷节，百世当谁传！”“夷叔”指伯夷、叔齐，商代孤竹君之二子，父死后因互让君位而出逃。周灭商后，二人耻食周粟，隐于首阳山(即西山)，采

薇而食，后饿死。孔子称他们为“古之贤人”，并说他们是“求仁而得仁”(见《论语·述而》)。这首诗前四句有抱不平、发牢骚之意：做了善事说是有善报，伯夷、叔齐却饿死在首阳山。善恶如果没有报应，为什么还要这样说空话呢？后四句却来了一个转折。《列子·天瑞》载，孔子游于泰山，碰到了隐士荣启期，年将九十，穿着粗陋的裘衣，以绳索为衣带，边走边“鼓琴而歌”。陶渊明说：荣启期九十岁了还以绳索为衣带，还以贫为乐，何况处于饥寒中的壮年人呢？伯夷、叔齐和荣启期如果不是依赖“固穷”的节操，百世之后还有谁会传播他们的事迹呢？丘嘉穗《东山草堂陶诗笺》评云：“此诗前四句作势反起，后四句收转本意，一翻一覆如时文之故作波澜，而后乃正解也。”也就是说，后四句才是陶渊明真正想要说的话。“当年”即壮年，应指诗人自己，“饥寒况当年”为处于饥寒中的诗人的自励自勉之辞。如果是为了“欲传而后固穷”，岂不太虚伪了吗？而且，为了“欲传”而“固穷”的人也不可能真正地“固穷”，因为他忍受不了“穷”，不可能坚持得太久。所以，陶渊明又写了《饮酒》其三，表达其“身后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之意，以彰显其强调“固穷”的本意。

《饮酒》其十六写道：“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行行向不惑，淹留遂无成。竟抱固穷节，饥寒饱所更。敝庐交悲风，荒草没前庭。披褐守长夜，晨鸡不肯鸣。孟公不在兹，终以翳吾情。”说少年时专心读经书，希望能够有所作为，但快到 40 岁了还无所成就，只得抱着“固穷”的节操归隐田园，饱受饥寒，但却无人能够理解。要坚持“固穷”并不容易，而诗人战胜种种不易坚持下来了，所以显得特别可贵。

《有会而作》写道：“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 。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惄如亚九饭，当暑厌寒衣。岁月将欲暮，如何

辛苦悲。常善粥者心，深念蒙袂非。嗟来何足吝，徒没空自遗。斯滥岂攸志？固穷夙所归。馁也已矣夫，在昔余多师。”前面回顾了一生饥寒情景，对《礼记·檀弓》所载黔敖不吃“嗟来之食”一事进行了评论，认为遗赠者如果是出于善心，穷乏者予以接受也并无不妥。最后表明自己操守：“斯滥”哪里是我的志向，“固穷”才是我的归宿。挨饿就挨饿吧，从前有很多人是值得我学习的老师。诗人取舍，泾渭分明，态度斩截，不难想见其豪壮之气、刚劲之节。

《咏贫士》其七写道：“昔在黄子廉，弹冠佐名州。一朝辞吏归，清贫略难俦。年饥感仁妻，泣涕向我流。丈夫虽有志，固为儿女忧。惠孙一晤叹，腆赠竟莫酬。谁云固穷难，邈哉此前修。”说东汉人黄子廉辞官归隐后，穷的程度很少有人能与之相比。一年闹灾荒，他看到妻子吃不饱饭，难过得流下了眼泪。但是，他并不因此而改变自己的节操，连别人的馈赠他也拒不接受。陶渊明因此感慨地说：谁说“固穷”很难做到呢？这些离我们很久远的前代贤人就做到了。实际上就是要以前代贤人自励，坚守“固穷”节操毫不动摇。

《感士不遇赋》写道：“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缊袍之为耻。”意思是：宁愿“固穷”以有益于身心，不能低声下气而劳累自己。既然不把官位爵禄看作是荣耀，岂会把穿破旧衣服当作是耻辱？表面上是感士，实际上是夫子自道，从中能见作者一生志节。

陶渊明一再提到“固穷”，不难看出“固穷”在陶渊明心目中的地位。他将“固穷”看作自己必须遵守的人生信条和人生哲学，当作自己坚守“固穷”的精神支柱，不断以此自励，来帮助他抵御利禄的诱惑，抵御穷困的袭扰，来获取心理的平静、精神的

高洁和品格气节的完美。他能最终做到这一点，以下因素起了较大的作用：

一是他能牢记“先师遗训”。《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忧道不忧贫”是孔子所说的话，因此所说“先师”指孔子无疑。又《荣木》云：“先师遗训，余岂云坠。”表示自己对孔子的教诲不敢忘记。因此可以认为，陶渊明能坚守“固穷”节操，是他遵循孔子教诲，不折不扣地身体力行的结果。

二是他能以颜回、黔娄、袁安、荣启期、张仲蔚、黄子廉等安贫乐道的古代贫士为榜样，以他们的高言洁行来激励自己。《咏贫士》七首，分别吟咏了多位古代的安贫乐道之士，他们的人生道路、生活境遇、对待安贫乐道的态度多与陶渊明相同或相似，诗篇既是咏古，亦是咏己。“何以慰吾怀，赖古多此贤。”(其二)，说明诗人从古代贤士的身上找到了精神的慰藉、学习的榜样和力量的源泉，使他能够“固穷”守志，永不动摇。



三是陶渊明“质性自然”的本性起了很大作用。《归去来兮辞并序》写道：“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也就是说，他更希望到田园中去过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合于他本性的生活，如果违反自己的本性勉强去做自己不爱做的事情，将使身心都感到痛苦。“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说的也是这个意思。因此，在陶渊明的哲学中还有比富贵和贫穷更高的原则，这就是自然。他用自然的原则战胜了富贵的诱惑和贫穷的煎熬，在“固穷”守节的道路上走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陶渊明将个人的品德、节操看得非常重，将这看作是自己必须严格遵循的人生准则。他所说的“道”，多偏重于个人的品德节操方面，他说：“匪道曷依，匪善奚敦。”

(《荣木》)"好爵吾不荣,厚馈吾不酬。……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对声名其实也很看重,在《饮酒》其十中说:"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意思是说,为解决生计问题而去出仕,恐怕不是保住名声的良策,而其声名,实指"固穷"之声名。因此,陶渊明虽并不一般地鄙薄出仕,但他绝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决不去苟求富贵,如《咏贫士》其三说:"岂忘袭轻裘,苟得非所钦。"这与孔子所说的"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是如出一辙的。《咏贫士》其五写道:"岂不实辛苦,所惧非饥寒。贫富常交战,道胜无戚颜。至德冠邦闾,清节映西关。"可见,富贵对陶渊明并非没有诱惑,陶渊明并非能把富贵忘得一干二净了,他比别人做得好的是,他不愿去"苟得"富贵,不愿以牺牲"道"为代价去换取富贵。他能做到这一点非常不容易,思想上是经常有矛盾斗争的,但"道"最终取得了胜利,他最终成就了自己的"至德"和"清节"。

# 四、笑对人生　乐观旷达



古代的仁人志士,其人生经历往往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其中不少人的经历甚至非常坎坷,甚至要面临生与死的考验。但是,他们在面临坎坷、困厄甚至死亡的考验时,却往往能够泰然处之,一笑置之。他们能够随缘自适,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中寻求和发现生活的乐趣,能够苦中作乐,甚至能够以苦为乐。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们有独特的处世哲学,有清超旷迈、乐观

旷达的处世态度，有的人还有诙谐幽默的个性，有履险若夷、自我调适的非凡本领。而从根本上说来，还是因为他们具有高远的追求和独立不移的品格志节，不然，他们是不可能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安于困厄、笑对人生、乐观旷达而达于常人难以企及的境界的。

# “谈笑于死生之际”



孔子历来被推为圣人，一生颇多政治、哲学、教育、道德修养方面的言论，是一位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道德家。于是，孔子给不少人留下了端整严肃、不苟言笑、甚至望之令人生畏的印象。其实，孔子既是一个有着坚定原则、崇高理想、深邃思想的人，也是一个有着丰富情感、鲜明个性、身上不乏幽默细胞的人。《史记·孔子世家》载，周游历国时，孔子在郑国同他的学生走散了，他独自

一个人在城的东门口站着,他的学生们急得四处找他。有一个郑国人碰到子贡,告诉子贡说:东门口有一个人,他的额头像唐尧,脖子像皋陶,肩膀像子产,但是从腰以下比夏禹要差三寸,疲惫的样子好像是丧家之犬。子贡找到孔子后,把这番话如实告诉了孔子。孔子听后,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意思是,所描画的形状那倒未必,但说我像丧家之犬,那是啊!那是啊!读了孔子的话,"大成至圣先师"的幽默感、亲和力不能不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幽默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自信,在困窘状态中仍能幽默的人,他的幽默就是对困窘的蔑视,就是对付困窘的一支投枪、一把匕首,是其不屈人格、翘楚精神、开阔胸怀、昂扬气概的一种展示。古代不少仁人志士,具有这种幽默精神。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一生历经坎坷,但都具有自信开朗、乐观旷达的精神。苏轼尤以诙谐幽默著称于世,在日常生活、日常交往中他经常开玩笑,甚至在身遭大难、生死未卜的情况下也不例外。现即重点对苏轼在这方面的表现作一评介。

苏轼经常跟自己的朋友开玩笑。文与可为著名画家,与苏轼为同乡,又是苏轼的中表兄弟,两人交情很深,所以苏轼经常同他开玩笑。文与可为洋州太守,当地有山谷名筼筜,盛产竹。苏轼《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写道:"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筼筜谷》其一也。予诗云:'汉川修竹贱如蓬,斤斧何曾赦箨龙。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箨龙",形容竹笋。诗说文与可嘴馋,把渭水滨千亩竹林的竹笋都用斧子砍来煮熟吃下肚了,而文与可打开信看到这首诗时,又刚好在"烧笋晚

食”,所以忍不住失笑,把嘴里的饭喷了满案。在调侃的背后其实还含有深意,因为文与可说过“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的话,所以“渭滨千亩在胸中”实双关“成竹在胸”,是对文与可绘画理论的认同,这种调侃,自不同凡俗,能见苏轼这个大文豪的功力和见识。

苏轼有一个僧人朋友叫参寥。《东坡志林》载,当时有一个名医叫庞安常,志趣高雅,给人看病,病人若付不起医药费,用书画代替也可以,如能得到书画精品,他会高兴异常。九江的胡道士善医,继承了庞安常的风范,苏轼找他看病,付不出酬资时,就来几页行草送给他。一次参寥病了,想找胡道士看病,口袋中没钱,自己又不擅长书画,于是请苏轼画几幅,而且催得很急。苏轼就跟他开玩笑说:“子粲、可、皎、彻之徒,何不转语作两首诗乎?”“粲、可、皎、彻”指僧粲、无可、皎然和灵彻,四人都是唐宋之际的著名诗人。苏轼对参寥说,你是粲、可、皎、彻的弟子,何不转告他们帮你做两首诗呢?本来求人是一件难为情的事,被苏轼这么一开玩笑,气氛顿时就轻松了。



苏轼有时还跟自己的老师开玩笑。据《东坡志林》,有一次欧阳修说起一件事:有一个人得了病,医生问他是怎么得的,他说是“乘船遇风,惊而得之”。医生于是找到船舵长年被舵工操作留有汗渍的地方,刮下一些粉末,配上丹砂等药熬汤让病人喝下,病人喝下后,病果然马上好了。欧阳修于是发议论说:“医生以意用药多此比,初似儿戏,然或有验,殆未易致诘也。”苏轼听了,反驳道:如依此类推,喝下伯夷洗手洗脸的水就可以治好贪心,把比干吃剩的饭吃下就可以把阿腴奉承的毛病治好,舔一舔樊哙所用的盾牌就可以把胆怯的毛病治好,嗅一嗅西施所戴的耳环就可以治好恶疾,显然都是荒诞不经的。欧阳修听后,也不

觉"大笑"。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盟主,苏轼当年应进士试,主考官就是欧阳修,因此苏轼与欧阳修的关系是"门生"和"老师"的关系。苏轼敢于跟老师抬杠、开玩笑,既能见出他横溢的才气和幽默的个性,也能见出他们师生间亲密无间的关系。

苏轼有时还跟同僚中居上位者开玩笑。据张世南《游宦纪闻》载,有一次苏轼去拜访宰相吕大防,"值其昼寝,久之方出"。苏轼便临机一动,指着客厅中一个大盆中养着的一只绿毛龟说:这种龟容易得到。唐庄宗时,有人进献了一只六目龟,十分稀罕,其特点是"六只眼耳睡一觉,抵别人一觉"。这里明显地是将吕大防比作六目龟,说他睡午觉的时间比别人长很多。巧妙地嘲讽了吕大防的傲慢与怠惰,令人忍俊不禁。

苏轼还曾当众在庄重场合开大臣的玩笑。《孙公谈圃》载,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九月,宰相司马光去世。正好神宗灵位被送进太庙,大家都要遵礼去斋戒,没有时间去宰相府吊祭。朝廷同时举行了大赦。大赦完毕,苏轼率领同僚去吊祭司马光。当时司马光的丧礼由理学家程颐主持,程颐认为,大家曾在太庙唱过歌,至少听过奏乐,而吊祭时吊丧者应当哭几声,按照《论语》所记载的"子于是日哭,则不歌"的规矩,这天是不能再去吊祭的。程颐还认为,司马光的儿子也不应该站在灵柩一旁接待吊祭的客人,因为如果孝子真孝,他是悲痛得不可能再站在这里接待客人的。大家不赞成他的意见,而程颐"固争",苏轼忍不住,当着众官员的面讽刺他说:"你真可谓是燠糟鄙俚的叔孙通。"大家都笑了。"燠糟鄙俚"为汴京城外地名,比喻乡野、鄙陋。叔孙通为西汉初人,他采择古礼,结合秦制,为汉王朝制定了朝廷礼仪。程颐当众出丑,大失颜面,从此与苏轼结下了仇怨。而苏轼对程颐食古不化的讥讽,确也一针见血,入木三分。

苏轼还常就眼前情景谐谑。释惠洪《冷斋夜话》载:"东坡夜宿曹溪,读《传灯录》,灯花堕卷上烧一'僧'字,即以笔记于窗间曰:'山堂岑寂寂,灯下读《传灯》。不觉灯花落,荼毗一个僧。'""荼毗"为梵文,意为火葬。其诗颇具妙趣,而苏轼夜间挑灯夜读,当为独自一人,独自一人而不乏谐谑兴致,其能自娱自乐的品性可知。

苏轼还常常自嘲。因闹红眼病,暂时不能吃肉,但嘴巴不同意了,苏轼认为这样做是对眼"厚",而对己"薄",并对眼睛表示大度说:"哪天我嗓子哑了,你可以照样看东西,我不管。"接下来,"余"(苏轼自称)郑重其事地引了管子和《礼记》中所说的大道理来说服自己的嘴巴。这应当是苏轼自己患了眼病后不能吃肉但又非常想吃肉的内心矛盾的反映,妙在写来意趣盎然,活灵活现。为眼病所困扰,本当心烦,而苏轼竟有心思拿自己眼疾开玩笑,可见其善于自我调适,心胸豁达。

更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在大难临头时仍不失幽默的品性。神宗元丰二年(1079),突发"乌台诗案",苏轼与家人告别时,家人大哭。据《东坡志林》载,苏轼是这样与家人告别的:



> 昔年过洛,见李公简言:"真宗既东封,访天下隐者,得杞人杨朴,能诗。及召对,自言不能。上问:'临行有人作诗送卿否?'朴曰:'惟臣妾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上大笑,放还山。"余在湖州,坐作诗追赴诏狱,妻子送余出门,皆哭。无以语之,顾语妻曰:"独不能如杨子云处士妻,作诗送我乎?"妻子不觉失笑,余乃出。

家人惊怖异常,痛苦万分,苏轼临别"无以语之",千言万语无从说起,内心其实也是痛苦的。妙在他能自持,并以足可令人解颐

的杨朴妻作诗故事调侃夫人，夫人不由得破涕为笑，临别的凄楚气氛得以化解，典型地反映了苏轼旷达诙谐的性格。

苏轼晚年被贬到“南荒”海南岛儋州，是他遭到的最后一次沉重打击。前途渺茫，老弱多病，使他感到生还已无希望。但苏轼也并未完全绝望。据朱弁《曲洧旧闻》载，苏轼在海南岛“环视天水无际，然伤之曰：‘何时得出此岛耶？’”但他在“环视”的同时也领悟到：“天地在积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想到蚁附于芥浮于水而终得脱身的故事。苏轼在“念此可以一笑”的自嘲中，顿时豁然开朗，绝望情绪得到了排解。而“俯仰之间有方轨八达之路”也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充溢着高度的自信，对处于困境中的人们是一个深刻的启迪和巨大的鼓舞。

苏轼敢于“谈笑于死生之际”，不仅仅是由于他生性豁达、诙谐，在骨子里起作用的，是“道理贯心肝，忠义填骨髓”，是他对国家、对百姓的一颗赤子之心，这使他在逆境中能“谈笑”，敢“谈笑”，始终保有乐观情绪和无畏精神。这种品性和精神，对苏轼的创作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苏轼还创作了大量笑话式的寓言，得到后世不少文人的喜爱，有力地推动了明清时期调谐、笑话寓言的发展。

#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孟子·滕文公下》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所谓“贫贱不能移”，是说身处贫贱而不改其志节，仍能坚守自身的原则。做到“贫贱不能移”固然很不容易，但古代许多仁人志士不但能做到这一点，还能做到在贫贱中自得其乐，能做到苦中有乐、以苦为乐、化苦为乐。陶渊明、李白、苏轼就是这样的人。

陶渊明出身于一个家道已经衰落的官僚地主

家庭，很早就尝到了贫困的滋味。颜延之说他“少而贫困”（《陶征士诔》），他自己也说：“自余为人，逢运之贫，箪瓢屡罄，絺绤冬陈。”（《自祭文》）贫困几乎伴随了陶渊明一生，特别是在他归隐以后，又特别是在他躬耕自食的过程中遭遇火灾、虫灾、风灾、水灾等种种灾难侵袭的时候。他有时甚至不得不外出讨饭，“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乞食》）。陶渊明确实是贫困的，其人从来不说假话，这种贫困的情况确实是“信而有征”的。



孟子石像

李白一生，也曾经常遭遇贫穷。《送侯十一》写道：“余亦不火食，游梁同在陈。”揭不开锅的日子就同孔子在陈绝粮时的情形一样。在得不到别人帮助时，李白有时连御寒的衣服都成问题。有一次，李白在路上遇见他的一个从甥，想要一块去喝酒，但没有钱，只得把挂在腰间多年的宝剑拿去换酒吃了。



苏轼一生为官，还做过高官，他的情况应当是比陶渊明和李白要好得多。但实际情形并不完全是这样，他也曾经多次遭受穷困：

《后杞菊赋并序》写道：“余仕宦十有九年，家日益贫，衣食之奉，殆不如昔者。及移守胶西，意且一饱，而斋厨索然，不堪其忧。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扪腹而笑。”这是在做密州太守时的情况。

《答秦太虚书》写道：“初到黄，廪入既绝，人口不少，私甚忧之；但痛自节俭，日用不得过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钱，

断为三十块,挂屋梁上。平旦,用画叉挑取一块,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别贮用不尽者,以待宾客。此贾耘老法也。"这是被贬黄州做团练副使时的情况。

《乞常州居住表》写道:"但以禄廪久空,衣食不继。累重道远,不免舟行。自离黄州,风涛惊恐,举家重病,一子丧亡。今虽已至泗州,而资用罄竭,去汝尚远,难于陆行。无屋可居,无田可食,二十余口,不知所归,饥寒之忧,近在旦夕。"这是离开黄州赴汝州途经泗州时的情况。

《答程天侔》写道:"此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然亦未易悉数,大率皆无耳。惟有一幸,无甚瘴也。近与儿子结茅屋数椽居之,仅庇风雨,然劳费亦不赀矣。"《与侄孙元老书》:"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及泉、广海舶绝不至,药物酱酢等皆无。"这是贬居海南时的情况。



以上所述,自不免于疏漏,但仅就所述及的而言,已经够触目惊心的了。面对如许贫穷,陶渊明、李白、苏轼自也不免发愁、吁叹、消沉,但总体而言,他们是能坦然面对的。他们的态度,可以陶渊明的表态作为代表:

> 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
>
>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
>
> 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晏如也。
>
> ——《五柳先生传》

他们面对贫困,为什么还能欣然自得、自在安乐呢?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生活低标准,能知足常乐。陶渊明说:"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移居》其一)"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营己良有极,过足非所钦。"(《和郭主簿》其一)"岂期过满

腹，但愿饱粳粮。御冬足大布，粗絺以应阳。”(《杂诗》其八)说的就都是这个意思。苏轼也说：“吾无求于世矣，所须二顷田以足饘粥耳。”(《人生有定分》)生活要求不高，自容易满足，苏轼就曾对他的朋友表示，他对他在贬谪期间只有米饭、萝卜和一个清淡的汤的简朴生活感到十分快乐满足。

二是善于发现生活中自认为美的东西去品味，去享受，去从中寻求乐趣，获取快乐。苏轼《浣溪沙》词写道：

细雨斜风作晓寒，淡烟疏柳媚晴滩。入淮清洛渐漫漫。雪沫乳花浮午盏，蓼茸蒿笋试春盘。人间有味是清欢。

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十二月，与前面提到的《乞常州居住表》大体作于同时，可知就处境而言，实在是说不上有什么好。但在词人眼里，一杯浮着如雪似乳的沫花的午茶，一盘装着野菜嫩芽和蒿笋的春蔬，都是那样的清香有味，都使人感到了生活的美好，从而说出了“人间有味是清欢”这样的透着满足、包含哲理的话。在词人看来，真正的生活乐趣并不在穷奢极欲的物质享受，而在这些日常生活所带来的独特而清新的感受之中。因此，苏轼在黄州时很快就发现了当地的好处：“有潘生者，作酒店樊口，棹小舟径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酽。柑橘椑柿极多，大芋长尺余，不减蜀中。外县米斗二十，有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獐、鹿如土，鱼、蟹不论钱。岐亭监酒胡定之，载书万卷随行，喜借人看。黄州曹官数人，皆家善庖馔，喜作会。”(《答秦太虚书》)诗人还情不自禁地唱道：“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逐客不妨员外置，诗人例作水曹郎。”(《初到黄州》)意思是，在有如此美味的地方，被“员外置”、做“水曹郎”又有什么关系呢？被贬惠州期间，苏轼照样感到生活的满足：

罗浮山下四时春，卢橘杨梅次第新。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食荔枝》其二

能尽情地享受美味，就是“长作岭南人”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抱持着这种态度，自然就不会再一味沉缅于痛苦之中，而会通过对生活中快乐的发现和品味，改善生存状态，享受到生活的乐趣。

三是在逆境中能够随缘自适、任天而动。陶渊明能够“委心任去留”、“乐夫天命”（《归去来兮辞》），能“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自祭文》），人所共知，苏轼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是非常突出的。《答毕仲举书》写他在黄州的生活和感受：“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偶读《战国策》，见处士颜蠋之语：‘晚食以当肉’，欣然而笑。若蠋者，可谓巧于居贫者也。菜羹菽黍，差饥而食，其味与八珍等；而既饱之余，刍豢满前，惟恐其不持去也。美恶在我，何与于物。”颜蠋为战国时齐人，《战国策·齐策》载，他曾对齐宣王说：“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无罪以当贵。”所谓“晚食以当肉”，是说等到饥饿的时候再进食，即使是粗劣的食物也会觉得是在吃肉似的。苏轼表示认同，并就此发表了“美恶在我，何与于物”的看法，即外物的好与坏全在于自己主观上的感受，与外物有什么关系呢？这实际上也是苏轼“巧于居贫”之一法，即不仅认同了苦日子，甘心情愿过这苦日子，还善于去过这苦日子，欣豫自适之情溢于言表。《定风波》一词将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词前有小序云：“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已雨遂晴，故作此。”“莫听穿林打叶声”，“莫听”

二字，便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何妨吟啸且徐行”，照常在雨中从容不迫地行进，与小序“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呼应，表现出一种随遇而安、与任何一种环境同在的情致。“竹杖芒鞋轻胜马”，与“晚食以当肉”意思相类，不但是能适应环境，还能从这种环境中感觉出“好”来。“一蓑烟雨任平生”，则将词人要与物俱化、任天而



苏东坡像

动的意思点明。这里的风雨，自然双关着人生道路上的风雨，双关政治灾难和人生坎坷，词人表示要坦然面对、履险如夷。有了这种态度，人生道路上的一切荣辱得失都将在所不计，在作者的感觉中，迎来的就将是一个“也无风雨也无晴”的人生境界。词作即事寓理，巧妙地抒写了词人不避风雨、忧乐两忘、达观自适的人生态度。



《记游松风亭》写道：“余尝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风亭下，足力疲乏，思欲就林止息。望亭宇尚在木末，意谓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此间有甚么歇不得处”、“当甚么时也不妨熟歇”，表达的也是一种随遇而安、任情自适的人生态度。人生不但应看重结果，也应看重达到这个结果的过程，享受这个过程的乐趣，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将人生旅途中的苦与累、重负与压力、艰辛与挫折忘掉。同《定风波》词一

样，也是通过旅途中的一件小事情，悟出人生的大道理，表达了作者参透人生的旷达情怀。

《儋耳夜书》写道："己卯上元，余在儋耳，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佳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酤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寝，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钓者，未必得大鱼也。"苏轼则认为，钓鱼的人未必就是为了钓到大鱼才来垂钓的，垂钓本身就是一种乐趣，因此对韩愈"无得更欲远去"的想法付之一笑，表现的也是一种忘怀得失、随遇而安的人生态度。同作于海南的《与程天侔》说："尚有此身，付与造物，听其运转，流行坎止，无不可者。"表示要将此身托付老天，随其运转，乘流则行，遇坎则止，无所不可，将这种人生态度表达得更为明确。《与侄孙元老书》写道："厄穷至此，委命而已。老人与过（苏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所说也是这种人生态度的体现。



四是在读书写作中找到快乐。陶渊明《五柳先生传》写道："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苏轼在贬谪期间，也将不少时间花在了读书和写作上，并从中享受到了巨大的快乐。他曾对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乌台诗案"之后，苏轼曾一度想废弃笔墨，但实际上做不到。晚年在海南，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就说，在海外孤寂无聊，其幼子苏过"时出一篇见娱，则为数日喜，寝食有味。以此知文章如金玉珠贝，未易鄙弃也"。苏轼自己所作，也并不少。此外，苏轼还花了不少时间整理文稿和进行

学术研究。他和弟弟苏辙分别为“五经”作注,他自己在黄州时注完了《易经》和《论语》,在海南时注完了《尚书》。这些,都丰富了生活,增添了乐趣,也为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遗产。

此外,大自然的美景,与朋友的交往,一定的劳动生活等,都给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带来了快乐,都成了他们排解忧愁、忘怀贫穷的有力武器。程颐《偶成》诗有句云:“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陶渊明、李白和苏轼能做到这一点,确乎算得是“豪雄”了。他们能做到这一点,在于他们有独特的处世哲学,有清超旷迈的处世态度,有履险若夷的非凡本领。而从根本上说来,还是因为他们具有独立不移的品格志节,不然他们是不可能几年、几十年如一日地安于贫困、笑对人生、乐观旷达的。

# “纵浪大化中，不喜也不惧”



生与死是古代许多思想家热心探讨的一个哲学命题，也是每一个人都关心的问题。《庄子·德充符》引孔子语云：“死生亦大矣。”说明孔子是把生死当作大事来看待的。不过《论语·先进》又载孔子语云：“未知生，焉知死。”说明孔子并不愿多谈生死问题。从总体倾向看，儒家强调现实的努力和奋进，认为这样才算活得有意义、有价值；强调要为理想、为国家利益而死，认为这样才算死得

有意义、有价值。因此,“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乾》)“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这些话就得到了无数仁人志士的首肯,鼓舞了无数的后来人。道家则持不同看法。《庄子·至乐》说:“人之生也,与忧俱生。”认为人的生死乃是气的聚合与流散,犹如四季的更替,“死生为昼夜”,人只能顺应这一变化,无论死生都不足以忧愁或欢乐。因此庄子妻死,开始他也感到悲伤,后来觉得这是不通晓天命的表现,就一边敲打瓦缶一边高声唱歌了。儒家、道家的生死观,对后世都有深刻影响。

陶渊明、李白、苏轼对生死的看法,接受了前人的影响而有自己的特色。总的来看,他们既能积极地追求人生理想,对人生的坎坷与忧患抱达观的态度,也能以达观的态度看待死亡。下面重点对他们的死亡观作一介绍。

陶渊明有《形影神》诗三首,假设形、影、神三者的问答,阐明了自己对天地、生死、祸福、人生态度等一系列根本问题的见解。“形”指人的物质生命及其感情欲望。“形”羡慕天地与山川永不毁灭和改变,草木也得到了长存的道理,今年被霜冻得凋零了,但明年经过雨露的滋润又会重新萌发。独有人不能这样,刚才还看见他活在世上,但突然间就死掉了,再也看不到他回来。“形”深知自己并无成仙的法术,必然也会像别人那样死去,于是主张以饮酒来愉悦短暂的人生。这代表了一种颓废主义或享乐主义的想法。

“影”指人的生命行为所发生的社会影响。“影”的苦恼不但是生命永存不可能,神仙之道不可通,还有人死后名声也不能久传。为此“影”提出:“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酒云能消忧,方

此讵不劣!”《左传·襄公二十四年》有“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三不朽”说,这里所说的“立善”,即指立德、立功、立言。“立善”可以把好处留给后代,为什么不在这方面努力呢?饮酒虽说能够消忧,但与“立善”相比岂不是太低劣了吗?这代表了儒家的看法。

“神”为陶渊明所追求的最高生命境界。“神”对“形”、“影”的看法均持反对态度。“神”对“形”、“影”说:我和你们虽然不同,但我们生来就互相依附在一起,活着我们共同存在,死后我们同归于尽,我哪能不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呢。无论老少、贤愚,都是要死的。伏羲、神农、燧人这三皇是大圣人,如今他们在哪里呢?彭祖活了800岁想要长留人间,最终还是没有留住。天天喝酒或能让人忘掉死,但这样做反而会让人短寿。立善固然是可喜之事,但在一个善恶不辨、是非不分的社会里,又有谁来称誉你呢?考虑太多会损伤生命,因此正确的做法应当是:任其自然,放浪宇宙之中,无拘无束,无忧无虑,不喜不惧,生命应当结束时就让它结束,不要再为此多考虑。也就是说,人应当不以死得早为苦,也不应以活得长为乐,应一切听其自然,这样才算达到了人生的最高境界。



陶渊明以极恬淡、自然的态度,以“纵浪大化中”的智慧,化解了人生短促所带来的烦恼和忧愁。同样的意思,陶渊明多次表示过:

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

——《归园田居》其四

运生会归尽,终古谓之然。

——《连雨独饮》

穷通靡忧虑，憔悴由化迁。

——《岁暮和张常诗》

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

——《读山海经》其十

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

——《自祭文》

这些用例多处讲到“化”，所谓“化”，即变化、改变之意。“化”作为一个哲学范畴，很早就有了，儒、道两家都讲“化”的问题，“纵浪大化中”的“大化”一词，即出自《荀子·天论》：“四时代御，阴阳大化。”世间万事万物莫不在变化之中，人当然也不例外，有生就会有死。陶渊明的“顺化”思想，表明了他对死亡的达观态度。从《自祭文》看，他不仅认识到了这一点，而且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能识运知命，所以我就没有什么顾念。现在我死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真是看得透彻，死得坦然。这种想法和心态，在《挽歌诗》三首中表现得也很突出。其一云：



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
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
魂气散何之，枯形寄空木。
娇儿索父啼，良友抚我哭。
得失不复知，是非安能觉？
千秋万岁后，谁知荣与辱？
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

其二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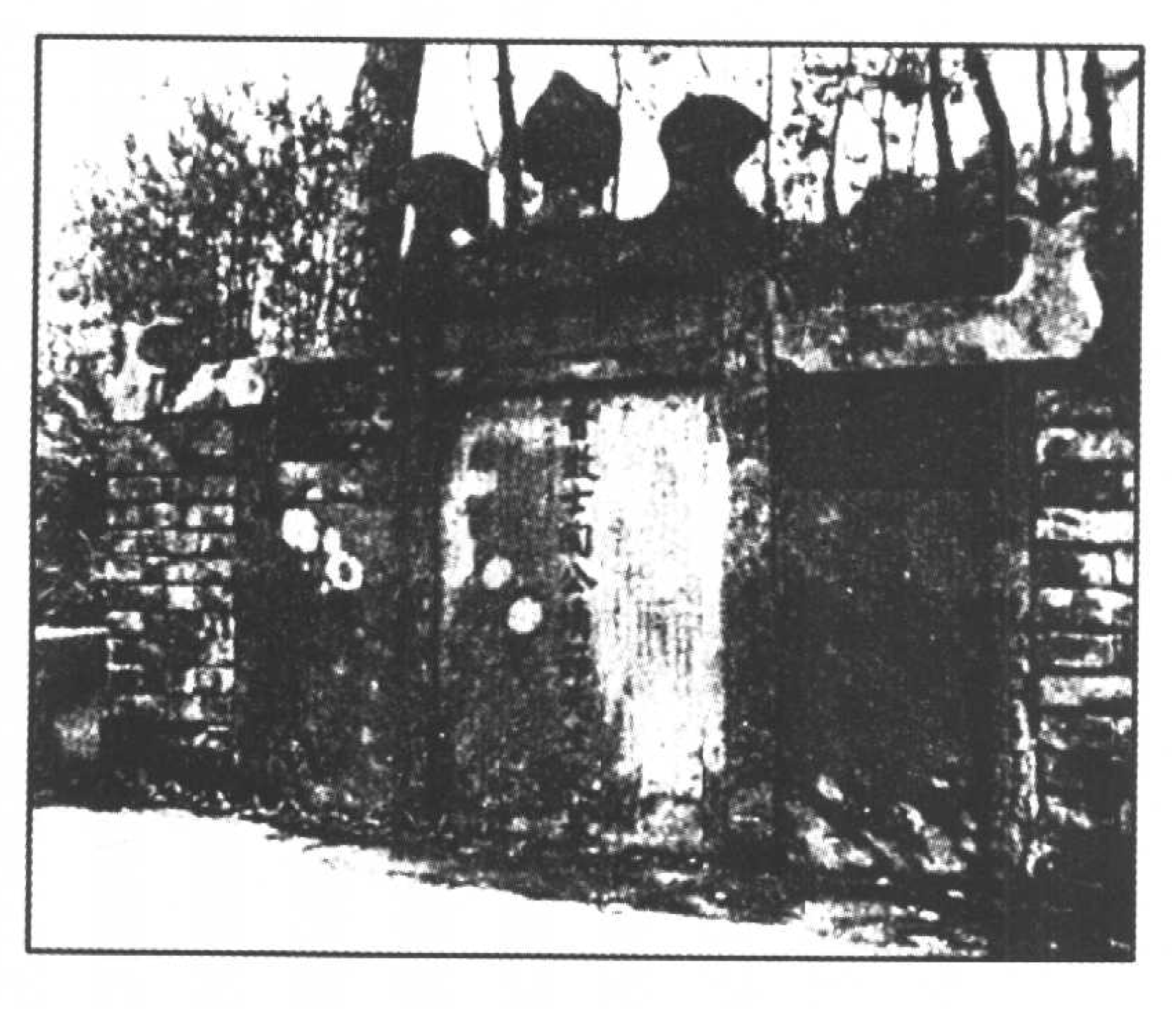
在昔无酒饮，今但湛空觞。
春醪生浮蚁，何时更能尝。
肴案盈我前，亲旧哭我傍。

欲语口无音，欲视眼无光。
昔在高堂寝，今宿荒草乡。
荒草无人眠，极视正茫茫。
一朝出门去，归来夜未央。

其三云：

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
严霜九月中，送我出远郊。
四面无人居，高坟正嶕峣
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
幽室一已闭，千年不复朝。
千年不复朝，贤达无奈何。
向来相送人，各自还其家。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
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陶渊明之墓（在江西九江县面阳山）

挽歌就是葬歌，最初为挽灵车的人所唱，用意在表示对死者的哀悼。《挽歌诗》三首作于诗人临终前不久，写的是自己死后的情景，全为设想之辞。第一首写刚死之

际，乍离人世的恍惚之感。娇儿、良友都深感痛苦，但自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得失、是非、荣辱统统被抛到一边去了，彻底得到了解脱，惟一的遗憾是在世时酒还没有喝够。第二首写祭奠之后出殡的情景。《自祭文》写道："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将人间视同旅馆，将人活在世上视作旅客暂住旅馆中，而把死视作归于"本宅"，即回到老家去。据说"本宅"是长夜不明的，因此这首诗末二句说一朝离开本宅来到人间，现在回到本宅去，还是漫漫长夜。第三首写送殡和埋葬的情景及被埋葬之后的感觉。诗人对自己死后的情形看得很清楚：亲戚或许还有一些悲痛，别的人却已经在唱歌了，谁能为自己长久地悲痛呢！死亡不过是将肉体寄托于山阿，彻底回归到自然的状态，有什么值得悲哀的呢？诗人能以如此朴素的态度看待生死，能以如此平静的心情来迎接死亡，真是达观之至。而将自身这一主体客观化，超越自我以第三者的身份冷眼看着自己死后的情景，这一构思也巧妙之至。

《饮酒》其十一写道："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汉书·杨王孙传》记载：杨王孙临终前，要求儿子将他裸葬，"以身亲土"，"以反吾真"，即返回自己的本质。认为所谓死，就是生命终了时的变化，事物的归宿，裸葬可以使"归者得至，化者得变，是物各反其真也"。陶渊明在这里说：何必对杨王孙的裸葬要求加以指责呢？应当理解他要求裸葬的真正用意。可见，从返回自然的意义上说，陶渊明是完全理解、支持杨王孙的裸葬要求的，因为这实际上也就是"托体同山阿"，有什么可以怀疑和指责的呢？

李白的生死观，与陶渊明不完全相同，但也有相通之处。《拟古》其七写道："旷野多白骨，幽魂共销铄。荣贵当及时，春华

宜照灼。人非昆山玉,安得长璀错。身没期不朽,荣名在麟阁。”其九写道:“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月兔空捣药,扶桑已成薪。白骨寂无言,青松岂知春。前后更叹息,浮荣何足珍。”单就这几句诗而言,就可见李白的思想是复杂的。人生短促,他认为“荣贵当及时”,里面既包含了应及时求取“荣贵”的意思,也包含了应及时享乐的意思;既认为应当求取身后之名,又认为“浮荣何足珍”。但他认为“人非昆山玉”,不可能长生久视、长放光彩,认为“天地”乃一“逆旅”,“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这与陶渊明的看法是一致的,也是表现了对于生死问题的达观态度的。苏轼《三老语》写道:

> 尝有三老人相遇,或问之年。一人曰:“吾年不可记,但忆少年时与盘古有旧。”一人曰:“海水变桑田时,吾辄下一筹,尔来吾筹已满十间屋。”一人曰:“吾所食蟠桃,弃其核于昆仑山下,今已与昆仑齐矣。”余观之,三子者与蜉蝣朝菌何以异哉?



三个老人自夸长寿,但在苏轼看来,他们的寿命与无限的宇宙相比,与只能活一两天、几个月的朝菌蜉蝣有什么区别呢?这明显地接受了庄子相对论思想的影响,但说人的寿命的长短都是相对而言的,这是不错的,应当也是一种通达的看法,包含有寿长不足喜、寿短不足悲之意。

人生短暂的感叹和对死亡的恐惧,是自汉末以来诗文中经常出现的主题。面对这一问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应对方案:有的学神仙之术,追求长生;有的则认为“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古诗十九首》),即及时行乐;有的则力图在有限的人生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应当说,这三种应对方案在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作品中都有所反映,但各人

侧重有所不同，同一人在不同时地、不同的人生阶段其侧重也有所不同。就对死亡的看法而言，他们都较通达，陶渊明在这方面的表现最为突出。能委运顺化，坦然面对死亡的到来，这比对死亡一味抱着恐惧的态度要好得多，更比痴迷神仙长生之说和佛教轮回之说要好得多。这种态度，显然是旷达、超迈而不是消极、颓废的。当然，抱委运顺化的态度，不等于消极地等死。他们一方面总不忘怀建功立业，另一方面也希望能延年益寿。陶渊明说“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九日闲居》)，有人据此认为陶渊明喝一种能防止衰老的用菊花泡制的药酒。而苏轼一生对养生之术尤感兴趣。这与曹操在《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一方面说“神龟虽寿，犹有竟时。腾蛇乘雾，终为土灰”，一方面又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同时还说“盈缩之期，不但在天；养怡之福，可得永年”，其用意、态度、精神可以说是一脉相承的。

# 五、任情适性　跌宕不羁



儒家主张加强自身道德品质的修养，这本来是件好事，但一旦走向极端，陷于僵化，成为人们思想的束缚，就会产生副作用，就会使人丧失自我，丧失独立的人格，规行矩步，变成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所描绘的如许人物："服有常色，貌有常则，言有常度，行有常式。立则磬折，拱若抱鼓。动静有节，趋步商羽。进退周旋，咸有规矩。心若怀冰，战战栗栗。束身修行，日慎

一日。"更有甚者,由于品德修养往往与社会评价直接相关,甚至与利禄之途直接挂钩(如汉代选拔人才的地方推举就以"经明行修"即熟悉儒家经典、道德行为和生活作风没有毛病作为考察的重点),因此不少信仰不坚定的士人就变得虚伪矫情,使名实变得不符甚至爆出桩桩欺世惑众的丑闻。但是,不少正直耿介之士却与之相反,他们往往不知矫情虚饰为何物,处事待人,能顺乎天性,出于自然,诚挚坦率,跌宕不羁。这是对虚伪礼法的一种抵制和反拨,是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用一种独特的手段,表现了不与虚伪狡诈同流合污的品格和精神。

# “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



据《后汉书·陈蕃传》，东汉时有一个名叫赵宣的人，埋葬双亲后不封闭墓道，“因居其中行服二十余年，乡邑称孝，州郡数礼请之”。谁知后来发现他的五个儿子都是在服丧期间生的，结果弄得声名狼藉。当时有民谣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又云：“直如弦，死道边。曲如钩，反封侯。”都反映了当时社会名实相舛、诈伪不公的现象。

其实,任何时代都会有名实相舛的现象发生,都会有虚伪矫情的人在,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所处的时代自然也不例外。陶渊明《饮酒》其二十写道:“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感士不遇赋序》写道:“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在陶渊明看来,上古伏羲氏和神农氏的时代社会风气是淳朴、真诚的,而自那以后,虚伪之风就越来越盛行,人们都热衷在利禄场上奔走,不再把清廉谦退的节操当回事。怎么办呢?陶渊明提出要以“真”来与之抗衡,要以“含真”、“养真”、“任真”的办法来保持自己心灵的纯洁。且看他的表态:

《劝农》写道:“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老子》第十九章曰:“见素抱朴。”河上公注:“见素者当抱朴守真,不尚文饰。”陶渊明认为,上古时代的人们能“含真”即保有人类的朴素与真淳,是最理想的人,这就成了他的憧憬与向往,他以上古生民寄托了自己的理想。

《连雨独饮》写道:“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天岂去此哉,任真无所先。”《庄子·天地》曰:“忘乎物,忘乎天,其名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谓人于天。”郭象注:“天物皆忘,非独忘己,复何所有哉?”陶渊明“试酌”之后,各种杂念都离他远去,人世间的是是非非、得失荣辱全都淡忘了,是为“忘物”;连饮几杯之后,连“天”也忘却了,亦即宇宙自然都被忘却了。难道“天”真的离我远去、真的被忘却了吗?其实不是,只不过“天”与我浑然合一了,“天”就是我,我就是“天”,达到了“天”、物、我皆忘,眼前什么都不再存在的境界。这种境界就是一种“任真”的境界,是一种最理想的境界,因此“任真”是最重要的,没有什么能放在“任真”的前面、比“任真”更重要的了。

《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写道:“真想初在襟,谁谓形迹拘。

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真想"也就是追求"真"的想法。"真想"本来是装在胸中的,谁知出来做官,"形迹"也即外在的行为被拘束住了,理想与现实产生了矛盾。不能立即离开官场,于是作者表示:姑且委运顺化吧,但我最终是要回家隐居的。

《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写道:"投冠旋旧墟,不为好爵萦。养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弃官回到自己的旧居,不被高官厚禄所牵缠。到茅屋中"养真",这是保持自己名声的好方法。可见,作者认为在官场中是不能"养真"的,只有远离尘世回到山水田园中去,住茅屋,过简朴的生活,才能达到"养真"以保持名节的目的。

不难看出,陶渊明对于"真"是有自己的一套系统的想法的。首先是要"含真",即内心要将"真"当作自己的理想,当作自己追求的目标;其次是要"养真",慢慢地培育"真"的品格、"真"的理想;最后是要"任真",即真正把"真"当作人生的最高理想去加以实行,并努力达到"任真"的最高境界,在这最高境界中获得人生的最大满足和快乐。那么,陶渊明所说的"真"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真"是道家哲学中与世俗礼法相对立的重要概念,是一种至淳至朴的精神境界,它是受之于天、与生俱来的,是人的天性、本性,是不假雕琢、自然而然的,是与名教礼法、诈伪浮薄背道而驰的。而这种状态,就一个人来说,只有婴儿时期才能如此;就一个社会来说,只有尚未开化的上古时期才能如此。作为一个远离了婴儿时期和上古社会的人,要想"真",只能"含"之"养"之和有意"任"之,这样才能抵御世俗的诱惑和侵蚀,在一个虚伪、丑恶、污浊、道德沦丧的社会中保持自己的品格和名节。这就是陶渊明提倡"含真"、"养真"、"任真"所要达到的最终目的。



在这方面,陶渊明做得怎么样呢?离陶渊明的时代不算久

远的萧统在其《陶渊明传》中对陶渊明作了一个很好的评价："颖脱不群，任真自得。"所谓"颖脱不群"，即《晋书·陶潜传》所说的"颖脱不羁"，谓能超脱世俗，无拘无束。"任真自得"，即能保持本性，顺乎自然，率性而为，适性自得。这可以说是对陶渊明一生行迹和人格特征的最好概括。陶渊明一生，无论是对出仕归隐、读书种地、写诗作文、交友择邻，还是对四季轮回、生老病死、贫富贵贱、悲喜忧乐，都能坦然面对，听其自然，安之若素。

萧统《陶渊明传》说："尝著《五柳先生传》以自况，时人谓之实录。"可知五柳先生实为陶渊明的自画像，其任真自得的品性跃然于纸。不以贫为羞，实事求是地加以陈述，因"不慕荣利"，故贫穷反能适己之性，故能安之若素，处之泰然。"不慕荣利"，是因荣利为身外之物，为身心之累赘，故"不慕"。"嗜酒"乃性之所好，不愿多加克制。酒喝足了，也不在意于去留，想待就再待会儿，不想待了抬脚马上就走。"好读书"也是出于消遣，"不求甚解"，不愿像汉儒那样去钻求章句。一切任情而动，何等自在。

在《归去来兮辞序》中，陶渊明亦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对做官之事，他是"不吝情去留"。想做官了，就去找官做，但并不以做官为荣；不想做官了，就辞官归田，但也不以退隐为高。直言不讳地供认出仕是因为"家贫"，想解决吃饭问题；又坦言辞职是因为自己的本性实在受不了官场的拘束，不愿违反自己的本性去加以适应，但也曾想收获一次再辞职，也都真率得可以。



归隐之后，贫穷当然仍会成为问题，陶渊明就亲自参加一些劳动以补不足，而不以亲自参加劳动为耻。参加劳动了当然不等于就完全可以解决衣食问题了，仍不时陷于困穷，他就把自己的穷困之状写出来，而不觉得有什么难为情。有一次，他竟穷得揭不开锅了，于是去乞食，而不以乞食为耻。他还要将自己的乞

食之状写出来:“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行行至斯里,叩门拙言辞。”将外出乞食而不知该往何处去的无奈惶惑、漫无所适之态及敲开主人门后进退失据、羞于启齿的难堪尴尬之态表现得惟妙惟肖。这一方面表现了诗人不怕难为情、亲自去向普通人扣门求食的真率,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宁可困穷、也不愿再涉足官场的品格气节。

在人事交往方面,陶渊明的率真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州刺史王弘求见,陶渊明开始称疾不见,后来又欣然应允,并非反复无常、行无准的,而是其“任真”性格的自然表露。“称疾不见”不是要以此自高,欣然应允不是要“有羡于华轩”。一任自然,绝不造作。在礼法社会能有如此表现,实属难能可贵。

李白一生,也是尚真、“任真”的。他的豪迈,他的奔放,他的傲岸,他的自负,他的追求理想,他的蔑视权贵,他的尚义任侠,他的爱山爱水,都是其至性至情的真实流露。他拥有属于自己的真实的喜怒哀乐,能爱己之所爱,恨己之所恨,悲己之所悲,当笑则笑,当悲则悲,任情而行,绝不矫揉造作。《山中与幽人对酌》写道:“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真实地表现了李白的“任真”性格,也反映出李白的“任真”与陶渊明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

苏轼对于陶渊明的“真”赞赏有加,他自己的“任真”表现比起陶渊明来也并不逊色。苏轼尚幼时,就任天而动,不自掩饰,其父苏洵因此曾担心说:“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名二子说》)及长,此性情毫无改变,他曾自称:“我本麋鹿性,谅非伏辕姿。“(《次韵孔文仲推官见赠》)在风浪险恶的官场上,他仍是襟怀坦荡,任性而行,如他自己所说:“我坐华堂上,不改麋鹿姿。”(《和陶饮酒二十首》其八)这因此而给他招来了无穷的麻烦。但

即使如此,他还是没有学会伪善和圆滑。如此无遮无碍的率直个性,在当时的官场是极为罕见的。

陶渊明、李白、苏轼的“任真”,在当时是对虚伪、欺诈、污浊的社会风气的一种反拨,是不愿违背本性与伪善和智巧同流合污的崇高品格的表现;是对礼法束缚的一种抵制和反抗。对陶渊明而言,还是为了实现他“抱朴含真”的社会理想,他是企图以“自然”为依归,达到净化人类道德和社会风气的目的。虽然其力甚微,但也显示了他的卓异不凡,是未可轻视,而应给予足够的尊崇、肯定和赞美的。

# “野性犹同纵壑鱼”



历史上，每当儒学相对衰微、老庄玄学思想盛行之时，或当士人对礼法名教思想不满、受老庄玄学思想影响较多之时，便会有放诞之风、放诞之人出现。比如曹操，“为人佻易无威重，好音乐，倡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细物。时或冠帢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娱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帻，其轻易如此”（《三国志·

魏书·武帝记》裴松之注引《傅子》)。曹操之子曹丕,在去祭奠王粲时,因王粲生前喜欢听驴叫,于是便“顾谓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世说新语·伤逝》)。其子曹植,也是“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三国志·魏书》本传)。可以说,曹氏父子的放诞为自汉以来所不曾有,从而为魏晋放诞之风的盛行打开了大门。

曹魏正始时期,放诞之风迅猛发展。时有所谓“竹林七贤”,因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因而得名。阮籍“旷达不羁,不拘礼俗”,“纵酒昏酣,遗落世事”(《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阮籍传》裴注引《魏氏春秋》),曾做出许多放诞之事。



竹林七贤

由西晋而东晋,放诞之风一直盛行不衰。陶渊明委心任真,纵放不羁,自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以后提倡、服膺放诞者仍代不乏人。下面即重点介绍一下李白和苏轼在这方面的表现。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道:“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此二句用典。“楚狂”名接舆,春秋时楚人。据《论语·微子》载,孔子去楚国游说楚王,接舆在其车旁唱道:“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嘲笑孔子迷于做官。因首句云“凤兮凤兮”,故称凤歌。两句虽系用典,但李白自述其狂放之品性,自抒其对富贵利禄的鄙

薄嘲讽之情，却是实事求是、并无虚饰的。李白诗中有不少自述其狂放不羁之态的诗句，如：

《王壶吟》写道："凤凰初下紫泥诏，谒帝称觞登御筵。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写他出席皇帝举办的盛宴，一方面对皇帝说些称美的话，另一方面又与臣僚们谈笑戏谑，毫无拘谨之态。

《流夜郎赠辛判官》写道："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写他在长安时"平交王侯"、气夺豪士、在花柳间醉饮的情景。

《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写道："一生傲岸苦不谐，恩疏媒劳志多乖。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严陵"即严光，字子陵，东汉初隐士。少与汉光武帝刘秀同游学，刘秀即位，乃变名姓，隐身不见。后被召至洛阳，授谏议大夫，不就，归隐于富春山，耕钓以终。诗人表示要学习严光，不能摧眉折腰在朝廷侍奉。



《游泰山》其一写道："登高望蓬瀛，想象金银台。天门一长啸，万里清风来。""蓬瀛"指蓬莱和瀛州，传为海中三神山中的两座；"金银台"，指神仙所居的宫阙。"啸"，即吹口哨，撮口吹气以发长声，或辅以手指。魏晋间人多喜撮口长啸，或以渲泄情志，或以逞超迈洒脱之襟怀。诗人独立远眺，翘首长啸，不难想见其激越狂放之态。

《友人会宿》写道："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良宵宜清谈，皓月未能寝。醉来卧空山，天地即衾枕。"《夏日山中》写道："懒摇白羽扇，裸体青林中。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或醉卧空山，或裸体青林，以天为被，以地为枕，其放诞不羁，更是上与"竹林七贤"相接。

李白对自己的才能极为自负，认为自己“怀经济之才，抗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认为自己“虽长不满七尺，而心雄万夫”（《与韩荆州书》），可以“出则以平交王侯，遁则以俯视巢、许”（《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李白还一再以大鹏、巨鱼自比，认为自己可以像大鹏那样“抟摇直上九万里。假令风歇时下来，犹能簸却沧溟水”（《上李邕》），可以像巨鱼那样“仰喷三山雪，横吞百川水”（《古风》其三十三）。横扫六合，气吞万里，目空一切，这种气概，自然也是充分显示了李白的不羁精神和狂傲个性的。

苏轼《李太白碑阴记》说：“李太白，狂士也。”又《李白谪仙诗》云：“对面一笑语，共蹑金鳌头。绛宫楼阙百千仞，霞衣谁与云烟浮。”苏轼对李白之“狂”有深刻的理解，也是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李白放旷不羁的精神的。就其秉性而言，本也有任性而动、不堪羁束的一面。苏轼在《游卢山，次韵章传道》一诗中即说：

尘容已似服辕驹，野性犹同纵壑鱼。

苏轼在这里说，处于尘世，其状已如套在辕中的马驹般显得局促，而现在来到山水之间，其野性却如同放纵大壑的巨鱼，任性逍遥，无拘无束。诗人不只一次称自己具有“野性”，也爱称自己为“野人”，如《再和》说：“野人疏狂逐钓舟。”《东坡》说：“市人行尽野人行。”连自己穿的衣服也称之为“野服”，如《赠写真何充秀才》说：“黄冠野服山家客。”他还喜欢运用具有“野”趣的意象，如“野鸭”、“野鹘”、“野凫”、“野菊”、“野橘”、“野芙蓉”等。他自己平时的表现，也常常是充满了“野”味。文与可初次拜访苏轼，苏轼就给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虽然对坐两寂寞，亦有大笑时相轰。顾子心力苦未老，犹弄故态如狂生。书窗画壁恣掀倒，脱帽

褫带随纵横。”(《往年寄子平》)恣意欢笑,其声轰然,脱帽解带,随其纵横,手舞足蹈,窗掀壁倒,“荡突不管邻人惊”,“狂生”之狂态,确实出人意表,难与伦比。



苏轼画像(相传宋李公麟原画,清朱野云临摹,翁方纲题款)

贬谪期间,苏轼没有了官场的羁束,其“野性”得到了更充分的展示。他在黄州期间,或“寻溪傍谷钓鱼采药以自娱”,或“扁舟草履,放棹江上”,“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喜渐不为人识”(王文诰《苏诗总案》)。其《黄泥坂词》描写了这种生活情景:出门漫游,乘着酒兴,边走边唱,最后醉卧路边,直到明月东升。还是老农把他叫醒了,怕归家的牛羊把他踩了。如此表现,焉得不“野”,哪还有士大夫的影子呢?宜乎“渐不为人识”。



苏轼还喜欢夜游,著名的《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就是这种夜游生活的真实记录。《前赤壁赋》写道:“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真是浪漫得可以。有一次,苏轼夜游还闹出了一场误会。据叶梦得《避暑录话》载,苏轼“与数客饮江上,夜归,江面际天,风露浩然,有当其意,乃作歌辞”。不料次日,“喧传子瞻夜作此辞,挂冠服江边,拏舟长啸去矣。郡守徐君猷闻之,惊且惧,以为州失罪人,急命驾往谒,则子瞻鼻鼾如雷,犹未兴也”。谣言还很快传到了京师,甚至传到了神宗皇帝的耳中,动静实在是不小。

苏轼晚年被贬惠州、儋州后,其"野性"有了进一步发展。他时而到高山深谷间遨游,"曳杖不知岩谷深,穿云但觉衣裘重"(《同正辅表兄游白水山》);时而沐浴于山泉野塘,"归路霏霏汤谷暗,野堂活活神泉涌。解衣浴此无垢人,身轻可试云间凤"(同上);时而在田野中漫步,"饱食不嫌溪笋瘦,穿林闲觅野芎苗"(《自昌化双溪馆下步寻溪源,至治平寺》其一);时而贪杯纵酒,甚至与当地父老一起"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西新桥》)。有时外出喝酒喝得半醉,回家竟找不到路了:"半醒半醉问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被酒独行,遍至子云、威、徽、先觉四黎之舍三首》其一)有一次,他"过访黎子云,遇雨,从农家借竹笠戴之,着屐而行。妇人儿童相随争笑,篱犬群吠"(见《儋县志·言行》),此一情景,被后人画作有名的"东坡笠屐图"。苏轼还曾将圆而且坚的椰子壳制成椰子冠戴在头顶,引起黎族百姓的极大兴趣:"自漉疏巾邀醉客,更将空壳付冠饰。规模简古人争看,簪导轻安发不知。更著短檐高屋帽,东坡何事不违时。"(《椰子冠》)又:"父老争看乌角巾,应缘曾现宰官身。溪边古路三叉口,独立斜阳数过人。"(《纵笔》三首其二)这一幅幅自画像,无不充满了放浪诙谐情调,无不充分展示了苏轼的"野性"。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纵放与狂野,与嵇康、阮籍等人有一脉相承的联系,但又与之不完全相同,在很多情况下,他们不过是想从"名教"中解脱出来,从官场的羁束和政治的迫害中解脱出来,过一种更加合于自己本性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因此狂野中也有中和的一面,往往任而不诞,放而不狂。但即使如此,他们也不能为现实所容,李白因"狂"而不被统治集团所接纳,苏轼因"野"而一再被逐出权力中心,如他本人所说:"嗟我本狂直,早为

世所捐。"(《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好在他们并没有因此而丧失自我,始终坚持了自己特立独行的品格。这种品格,孔子是曾经表示首肯的。《论语·子路》载孔子语云:"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意思是:得不到言行不过激、也不保守的人与之相交,那就一定要和狂者、狷者相交了。狂者有进取精神,狷者洁身自好,不肯做不仁义的事。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就是这样的"狂者"、"狷者",他们不仅跟那些无所不"为"的人相比判然有别,同那些是非不明、缺乏斗争性和原则性的"中行"的人比起来,也是要高明得多的。

# “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酒在中国古代文化生活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不仅可以满足人们的口腹之欲，而且与礼仪、人际交往、社会风俗、文艺创作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酒很早就渗透到了我国社会文化生活的许多方面，在文艺作品中也多有反映，据刘扬忠在《诗与酒》一书中的统计，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中，专门写饮酒、写到酒和以酒态喻心态的作品就有48首，约占全书305篇的16%，这个比

例不低了。会喝酒、喝过酒、经常喝酒的人在社会总人口中也占有不小的比例，因此古代也有不少“酒仙”、“酒徒”们的故事。在众多的好饮者中，陶渊明、李白和苏轼非常引人注目。

陶渊明一生，与酒有着不解之缘，并留下许多与酒有关的记载。比如：亲旧招饮，到饮辄尽，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江州刺史王弘于半道邀饮，欣然便共饮酌。尝九月九日无酒，出宅边菊丛中坐久，值王弘送酒至，即便就酌，醉而后归。颜延之经过浔阳，日造陶渊明饮焉，往必酣饮致醉。延之临去，留二万钱与渊明，渊明悉送酒家，稍就取酒。贵贱造之者，有酒辄设，渊明若先醉，便语客：“我醉欲眠，卿可去。”陶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渊明为彭泽令，公田悉令吏种秫，曰：“吾常得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请种粳，乃使二顷五十亩种秫，五十亩种粳。陶渊明还自己酿酒，酒熟，取头上葛巾漉酒，漉毕，还复著之。偶有名酒，无夕不饮。直到临死，还抱恨“饮酒不得足”。陶渊明的诗文也常常提到酒，前人说他“篇篇有酒”（见萧统《陶渊明集序》），虽未必然，但据逯钦立《关于陶渊明》① 一文的统计，其作品说到饮酒的共 56 篇，约占其现存诗文总数 142 篇的 4/10，这样高的比例，不但此前未曾有过，此后也难找到匹敌。在陶渊明这里，饮酒开始形成一种文学的主题，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



李白《对酒醉题屈突明府厅》说：“陶令八十日，长歌《归去来》。”又《戏赠郑溧阳》云：“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李白不仅十分佩服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气节和精神，对其嗜酒也深表赞赏，而李白自己嗜酒的程度，也决不让于陶渊明。李白《赠

① 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中华书局 1979 年版，第 201 页。

内》说:“三百六十日,日日醉如泥。”又《答湖州迦叶司马问白是何人》云:“青莲居士谪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李白曾自称“酒中仙”,在长安期间,常与贺知章、崔宗之等一起饮酒游览,又被人称作“酒中八仙”。李白常常豪饮,其诗屡见“会须一饮三百杯”、“一日须倾三百杯”、“中宵出饮三百杯”之句,在《赠刘都使》诗中,还有“高谈满四座,一日倾千觞”之语。喝酒多必醉,




李白像

甚至有时因此而不能应天子召。为了喝酒,没钱时,李白甚至解金龟、脱紫绮裘、解下腰间宝剑换酒。因为好酒,还与酒店老板结成了莫逆之交,其《哭宣城善酿纪叟》诗云:“纪叟黄泉下,还应酿老春。夜台无李白,沽酒与谁人。”其死据说也与酒有关,一方面有李白因醉而入水中捉月而死的传说,另一方面,由于同为唐人的皮日休在其《七爱诗》中有李白“竟遭腐胁疾,醉魄归八极”之句,因此又有了李白因酒精中毒而死于慢性脓胸穿孔的有根有据的推论。① 诗文中写到饮酒的作品也很多,据郭沫若统计,在李白现存1050篇诗文中,说到饮酒的有170篇,占到16%强。由于李白诗文在安史乱中遗失颇多,实际所占比例应会更高。

苏轼对酒的嗜好与陶渊明、李白相同,但就酒量而言,他比陶、李要小得多。据苏轼自称:“吾少时望酒杯而醉,今亦能饮三

---

① 郭沫若:《李白与杜甫》,人民文学出版社1971年版,第81页。

蕉叶矣。"(《东坡题跋》)可见苏轼本是一个不会喝酒的人,后经长期锻炼,酒量大为长进,但比起善饮者来,还是小巫见大巫。但苏轼却乐此不疲,而且酒量虽小却能得其真趣,在这方面私毫不让于人。在其作品中,也曾经常写到饮酒,单写到酒的赋就有好几篇,在本来不多的赋作中,显得十分醒目。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如此热衷饮酒,其目的或欲达到的效果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欲以显其孤高不平之性。陶渊明《饮酒》其十三云:"有客常同止,取舍邈异境。一士长独醉,一夫终年醒。醒醉还相笑,发言各不领。规规一何愚,兀傲差若颖。"写醉者和醒者的取舍迥然不同,两人说的话对方都不能领会,而醒者浅陋拘泥,实在愚蠢,醉者不随流俗,较为聪颖。醒者实指那些趋炎附势、热中名利的人,醉者实陶渊明自指,"兀傲"之态,形象地显示了他孤高不平的品性,他之热衷饮酒,饮酒以致沉醉,就是为了追求这种孤高不平的品性。李白《忆旧游寄谯郡元参军》说:"黄金白璧买歌笑,一醉累月轻王侯。"《流夜郎赠辛判官》说:"昔在长安醉花柳,五侯七贵同杯酒。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酒中可以高谈阔论,用傲慢的态度来睨视一切,醉后更可以不管不顾,甚至不理睬皇帝的召唤,"天子呼来不上船",李白的热衷饮酒,自与陶渊明有相似之处。

二是借饮酒以针砭现实、韬晦免祸。前面已提到过,从南宋汤汉到当代学者王瑶、袁行霈等均认为陶渊明的《饮酒》二十首作于晋安帝义熙十三年(417),正处于晋、宋易代之际,诗作表现了诗人处于易代之际的复杂心情。其最后一首有句云:"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似乎诗人确实有意在诗中说了一些犯忌的话,然后托言醉人以自掩。《述酒》的写作则与晋恭帝被药酒毒

死的事件有关，通篇语意隐晦，用意与《饮酒》相类。李白、苏轼写到饮酒的作品，也有一些是与政治相关的，只不过有的较隐晦、有的并不那么隐晦罢了。

三是欲以饮酒驱除愁闷，适意快情。曹操早在《短歌行》中，就说过“何以解忧，惟有杜康”这样的话。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生活中也有许多忧愁、烦恼、痛苦、不平乃至激愤，需要排解和消释，于是饮酒便成了他们经常采用的一种方式。陶渊明《游斜川》云：“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己酉岁九月九日》云：“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饮酒》其七云：“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杂诗》其八云：“正尔不能得，哀哉亦可伤。人皆尽获宜，拙生失其方。理也可奈何，且为陶一觞。”《责子》诗云：“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李白《月下独酌》其四云：“穷愁千万端，美酒三百杯。愁多酒虽少，酒倾愁不来。”《友人会宿》云：“涤荡千古愁，留连百壶饮。”《江夏赠韦南陵冰》云：“愁来饮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阳春。”说的都是借酒浇愁之事。借酒浇愁和饮酒取乐，在很多情况下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因此愁闷时饮酒，高兴时也饮酒，愁闷时饮酒可以使人高兴起来，高兴时饮酒可以使人更加高兴。留连光景时可以饮酒，朋友聚会时更要饮酒，喝酒可以活跃气氛，兴奋神经，愉悦情绪，还可以触发灵感，活跃思维，形成诗酒唱和的场面，促进创作的大丰收。饮酒能取乐，因此有时不免要借此表现一些及时行乐的情绪，但归根结底还是与借酒浇愁的目的联系在一起的，李白《梁园吟》说：“人生达命岂暇愁，且饮美酒登高楼。”《将进酒》说：“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就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饮酒获取的最高享受，是经过酒精的刺激和麻醉，经过愉悦

的饮酒气氛的熏染和影响，达到一种物我两忘、悠然酣适的境界。陶渊明《连雨独饮》云："试酌百情远，重觞忽忘天。"《饮酒》其十四云："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李白《月下独酌》其二云："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其三云："一樽齐死生，万事因难审。醉后失天地，兀然就孤枕。不知有吾身，此乐最为甚。"苏轼《湖上夜归》云："我饮不尽器，半酣味尤长。"《和陶〈饮酒〉二十首》云："偶得酒中趣，空杯亦常持。"《送千乘千能两侄还乡》云："譬如饮不醉，陶然有余欢。"说的就都是这种境界。这种境界的核心或曰极致就是要能品尝到"酒中味"、"酒中趣"，具体说来就是苏轼在《书东皋子传后》所说的"酣适之味"。品尝到这种"酣适之味"的时候，"就能实现个人主体与现实世界之间的亲和性，获得愉悦身心的无穷乐趣和美感"，就能达到一种"高度审美化的雅饮之境"，体会到"摆落拘限、忘怀物我的妙趣"。在这种情况下，"酒，已经差不多超越了原始物质属性，而变成了精神用品和审美媒介"(见刘扬忠《诗与酒》)。显然，要达到这种境界并非易事，这不是狂饮和烂醉所能达到的境界，跟酒量的大小也没有必然的联系，它需要酒精适度的刺激，但更需要的是喝酒所形成的这个特定的"场"，需要深细的感受功夫和灵敏的内心体验，需要高雅的审美情趣和高度的品格修养。所以，真正能达到这种境界的人，并不是很多的。



四是欲借饮酒以展示自己"任真自得"的品性。陶渊明《饮酒》其三说："道丧向千载，人人惜其情。有酒不肯饮，但顾世间名。""道丧"语出《庄子·缮性》："世丧道矣，道丧世矣，世与道交相丧也。"这里的"道"指道家所主张的自然之道。陶渊明认为，自然之道丧失了快一千年，人人都吝惜情欲，顾惜声名，不肯放

纵任情，不肯饮酒。陶渊明则要反其道而行之，纵情饮酒，认为这样才合于自然之道，才合于人之常性。确实，陶渊明饮酒时的种种表现，绝无矫揉造作之弊，无不充分展示了他任真自得的本性。李白也是这样，平生嗜酒任天真，充分展示了他的真性情、真精神。仅以其名篇《将进酒》为例：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
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
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
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侧耳听。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
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
五花马，千金裘，
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明代无名氏评云："一往豪情，使人不能句字赏摘。盖他人作诗用笔想，太白但用胸口一喷即是，此其所长。"① 因是"用胸口"喷出，因此其蔑视功名富贵的狂放傲岸，其壮志难酬的深沉愤懑，其河奔海涌、宽阔深邃的精神世界，其豪放纵恣、开朗自信的个性，无不一一跃然于纸。诗以参差错落的词句、疾徐瞬变的节奏和大胆夸张的语言（特别是用了一系列夸张的数字，如"千

① 托名严羽评点：《李太白诗集》卷二。

金”、“三百杯”、“斗酒十千”、“千金裘”、“万古愁”)抒写豪放不羁的诗情,如火山喷发,似江流出峡,表现出一种撼山震岳般巨大的气势和力量,这种艺术个性,也非李白莫属。李白的咏酒之作,大率如此。

总的来看,饮酒也是关联着社会,关联着政治,关联着人的品格和修养的。饮酒也是饮者在险恶忧患的环境中坚持乐观性格、坚持生活信心、坚持斗争精神、坚持品格操守、坚持人生理想、坚持独立个性的一种重要手段。此外,靠着酒兴的激发,作品也频频从酒中流淌而出,李白“一斗诗百篇”(杜甫《饮中八仙歌》),“兴酣落笔摇五岳,诗成笑傲凌沧洲”(《江上吟》),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既能识酒中之深味,又能将酒方方面面的功能发挥到极致,在古代能与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比肩的,实在是不多的。

# “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



古代许多游侠人物，能够抗暴扶弱，救助人于困厄之中，甚至勇赴国家、民族之难，不惜仗义舍身，而且说话算数，已经答应人的事一定兑现，办事一定办成，事情办成之后不接受官禄，不接受赏赐，也不要声名，赢得了不少人的赞赏，特别是一些豪放不羁之士的赞赏，甚至一些爱国志士的赞赏。陆游为了完成抗金大业，就曾希望到剑侠中寻觅同调。他还结交了不少剑侠作朋友，鼓励他

们去为国报仇：

我友剑侠非常人，袖中青蛇生细鳞。
腾空顷刻已千里，手抉风云惊鬼神。
荆轲专诸何足数，正昼入燕诛逆虏。
一身独报万国仇，归告昌陵泪如雨。

——《剑客行》

“袖中青蛇”(指宝剑)顷刻间就凌空飞越千里，白昼入燕将逆虏诛杀，然后归来到宋太祖赵光胤的陵墓永昌陵告祭，这种超现实的描写，寄托了诗人的理想和抱负，表现了诗人强烈的爱国之情。因此，虽然韩非站在法家立场，曾有“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的批评，历代统治者对“犯禁”的侠客也多不能容忍，但站在另一立场上，人们对侠客的侠义之举又是多有正面的评价和期许的。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由其人生理想和疏狂不羁的个性所决定，对侠客的侠义精神均有所肯定。陶渊明和李白对此尤为向往，而李白本人就是一个豪侠之士。陶渊明《拟古》其八写道：“少年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就颇有一些任侠的精神。尤为突出地表现了陶渊明这种精神的，是其《咏荆轲》一诗：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
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
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
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
雄发指危冠，猛气冲长缨。
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
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

萧萧哀风逝，淡淡寒波生。
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
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
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
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
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
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
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诗咏荆轲刺秦王事，着重刻画了荆轲大义凛然、慷慨赴死的英雄形象，赞颂了荆轲敢于反抗强暴的英勇精神，而对其大功不成则表示了深深的惋惜。以前有不少诗评家认为陶渊明写这首诗有为晋复仇的用意，虽未必然，但诗反映了诗人对强暴者的强烈反抗意识和激愤感情，却是没有疑义的，而个人没有反抗强暴者的实际能力，因而将希望寄之于荆轲、豫让等刺客。诗篇表现了对豪侠的认同钦敬，也展示了诗人自己的豪侠品性。朱熹说得很对："陶渊明诗，人皆说是平淡，据某看他自豪放，但豪放得来不觉耳。其露出本相者，是《咏荆轲》一篇，平淡底人如何说得这样言语出来。"（《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任侠的风气在唐代很流行，在李白的家乡尤为流行，因此李白自幼尚任侠，并一生"以气侠自任"（《为宋中丞自荐表》），他的狂放不羁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尚任侠有关系。李白自称"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大概他在15岁之前就曾较系统地学过剑术，此后仍继续学习。《五月东鲁行，答汶上翁》云："顾余不及仕，学剑来山东。"可知李白曾到东鲁学过剑。据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的推测，当时有一位击剑名人名叫裴旻的可能隐居在山东，而裴旻的侄孙裴敬在其《翰林学士李公墓碑》中有这

样几句话："(李白)又常心许剑舞。裴将军，予曾叔祖也，尝投书曰：'如白，愿出将军门下。'"因此李白到山东很可能是向裴旻学剑。裴旻事略见《新唐书·李白传》后附，他曾随幽州都督孙佺北伐奚人，为奚人所困，乃舞刀立马上，飞矢四集，迎刃而断。又曾在北平射虎，一日射虎达31头之多。李白向这样一位名手学剑，说明他对剑术确实情有独钟，而且要求很高，拜师就得拜名师。经过向名师学习，他的剑术一定也会有很大的提高。李白曾经到过幽州，在那里打过猎，他在《赠宣城宇文太守兼呈崔侍御》诗中描写："怀恩欲报主，投佩向北燕。弯弓绿弦开，满月不惮坚。闲骑骏马猎，一射两虎穿。回旋若流光，转背落双鸢。"可见他的武艺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这当然可能不免夸张，但也总得有一定的事实作依据。以此类推，李白所钟爱的剑术，一定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既对剑术如此钟爱，因此宝剑是经常挂在腰间的，《忆襄阳旧游赠马少府巨》云："高冠佩雄剑，长揖韩荆州。"《留别广陵诸公》云："金羁络骏马，锦带横龙泉。"《冬夜醉宿龙门觉起言志》云："醉来脱宝剑，旅憩高堂眠。"都说到了这一点。李白其人器宇轩昂，双目炯炯，当他腰横宝剑、身跨骏马时，那气概肯定是非凡的。每遇酒酣或感情郁勃时，李白常常抚剑起舞或长啸，崔宗之说他"起舞拂长剑，四座皆扬眉"(《赠李十二》)。他自己也说"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赠张相镐》其二)。李白对豪侠之士自是十分倾慕，常常在诗中满腔热情地歌颂他们的任侠精神：《行行游且猎篇》赞美生来不识一字却颇具猛气英风的边城游侠儿；《结客少年场行》赞美剑术高超、意气高昂的都市游侠儿；《侠客行》赞美英姿飒爽、重诺言、建奇功、轻声名的赵国侠客侯嬴、朱亥；《古风》其十赞美曾助赵国却秦军、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

《梁甫吟》赞美曾助刘邦立下大功的郦食其;《经下邳圯桥怀张子房》赞美用全部家财求刺客为韩报仇的张良;《拟恨赋》赞美刺秦的壮士荆轲,并为其功不成表示惋惜;《结袜子》赞美利用演奏机会、猛力以筑扑击秦始皇的壮士高渐离。此外,对豫让、郭隗、剧孟等侠士均有所称道。

李白不仅称道侠士,自己还经常同侠士交往。李白青少年时期所结交的朋友多为豪侠一类的人。据魏颢《李翰林集序》载,李白还曾亲自"手刃数人",原因应当是为了打抱不平,其《叙旧赠江阳宰陆调》云:"我昔斗鸡徒,连延五陵豪。邀遮相组织,呵赫来煎熬。君开万丛人,鞍马皆辟易。告急清宪台,脱余北门厄。"有人认为描写的就是当时杀人的情景。李白诗中一再描写白昼闹市杀人情景,并将此作为壮举加以赞颂,可见对此心向往之,是有坚实的思想基础的。

李白在结交朋友时,重义气,重诺言,轻财好施,也表现出了浓郁的豪侠之风。据《上安州裴长史书》载,李白南游洞庭时,与他一同出蜀的友人吴指南死了,李白非常伤心,"禫服恸哭,若丧天伦。炎月伏尸,泣尽继之以血。行路闻者,悉皆伤心。猛虎前临,坚守不动"。他暂时将吴指南葬于湖滨,然后就到金陵去了。几年后,他又专程来到洞庭湖边,起出友人的尸骸,见"筋肉尚在",于是亲自持刀将筋肉剔除,将骨殖洗净,然后"裹骨徒步,负之而趋,寝兴携持,无辍身手,遂丐贷营葬于鄂城之东"。这件事,很能表现李白"存交重义"的品质。在东游扬州等地时,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李白又曾"散金三十余万,有落魄公子,悉皆济之"。其《赠友人》诗云:"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醉后赠从甥高镇》诗云:"黄金逐手快意尽,昨日破产今朝贫。"这又突出表现了李白轻财重义的侠义品格。

更值得注意的是,李白的尚侠义在很多情况下是与他为国效力的人生理想结合在一起的。横在他腰间的宝剑,也往往成了他壮志的象征、激情的寄托。试看以下诗句:

《临江王节士歌》:"壮士愤,雄风生。安得倚天剑,跨海斩长鲸。"

《塞下曲》其一:"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

《独漉篇》:"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赠何七判官昌浩》:"羞作济南生,九十诵古文。不然拂剑起,沙漠收奇勋。老死阡陌间,何因扬清芬。"

《在水军宴赠幕府诸侍御》:"宁知草间人,腰下有龙泉。浮云在一决,誓欲清幽燕。"

《赠崔郎中宗之》:"长啸倚孤剑,目极心悠悠。"

《赠张相镐》其二:"抚剑夜吟啸,雄心日千里。誓欲斩鲸鲵,澄清洛阳水。"



在这些诗句中,诗人的自我形象与剑的意象互相映衬,充分表现出诗人激越豪迈、积极奋发的情怀。但是,现实给予李白的回答却是严酷的,他的热切的希冀一次次地变成了痛苦的失望。《玉壶吟》云:"烈士击玉壶,壮心惜暮年。三杯拂剑舞秋月,忽然高咏涕泗涟。"《赠从兄襄阳少府皓》云:"一朝乌裘敝,百镒黄金空。弹剑徒激昂,出门悲路穷。"壮志不能实现,宝剑成了徒然的摆设,连生活都成了问题,诗人不能不为此伤心落泪,甚至不得不以剑换酒,借酒浇愁。诗人尚任侠,不愿走青灯苦读、皓首穷经之路,这本是性情使然,也有借此在上层社会中树立声名以达帝听、最终得到任用之意,但事实表明这条路是走不通的,这不能不是李白的悲剧,也是时代的一个悲剧。

李白一生宝剑是常常挂在身边的。这把孤悬的宝剑,成了李白的一个符号、一个标志。我们从这里,可以更清楚地感受到李白任侠尚气、纵放不羁、慷慨激昂的品性,也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李白远大的人生理想、政治抱负及其理想终不能实现、抱负终得不到施展的人生命运。

# 六、怡性田园　纵情山水



人类从诞生的那一刻起，就与自然结下了不解之缘。道家崇尚自然，所说的“自然”虽与我们通常所说的自然并不是一回事，但两者之间又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道家认为自然界的万物是道家所崇奉的作为精神本体的“自然之道”的外在的显现，因此他们十分热衷到自然山水中去“体道”、“悟道”。儒家说“智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载孔子语），虽然这里的“水”和“山”是用来比

附品德的,但这在客观上也有利于引导人们去关注山水自然。因此,“天人关系”亦即天地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关系问题,成为自古以来人们经常探讨的一个哲学命题。

古代的仁人志士,不少人是喜欢山水田园的。他们怡性田园,纵情山水,发现了田园山水的真美,在田园山水中感悟了人生,实现了与田园山水的和谐相处,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深刻地阐释了天人之间应具备的一种关系。他们中有的人还亲自参加了农耕,发现、肯定了农耕劳动的价值,甚至与农民建立了真挚的友情,这是颇为难得的。

#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严格说来,自然是可以将田园和山水均包括在其中的。山水完全处于自然的状态或更接近于自然的状态,田园则是农民生活的领域,随处可见人类活动的痕迹,已不是一种纯粹自然的状态。但田园往往就分布在山水之间,与山水水乳交融地结合在一起,很难将两者截然加以分割。而且田园生活大体说来是淳朴的、宁静的,与闹市、官场的生活比起来非常接近于自然的状态,因此田

园与山水往往就被人们视为一体,被并称为田园山水或山水田园。喜爱自然的人,往往也就是喜爱田园山水的人。

陶渊明是一个非常喜欢田园山水的人,而且是天性使然,我们从他所写的"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两句便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但不可忽视的是,陶渊明本也有用世之志,也曾经做过官,要用世、要做官,就不可能同时安安心心地去过田园生活,这两者是不可能兼得的。同样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陶渊明"爱丘山"的天性最终战胜了他出仕的想法,而且在亲历了一段官场生活之后,经过对比,他更加清楚地认识到了田园生活的美好,更加坚定了他回归田园的想法。这种想法在《庚子岁五月中从都还阻风于规林》其二中有颇清楚的展示:

久游恋所生,如何淹在兹。
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

"所生"指其父母和故乡,实亦指下句所说的"园林"。"兹"在很大程度上与"人间良可辞"句中所说的"人间"即仕途、官场同义。"静念"是默念,诗人静静地想:还是"园林"好,应当辞官回到"园林"中去。这种想法在《辛丑岁七月赴假还江陵夜行涂口》一诗也有表现:"诗书敦宿好,林园无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南荆。""林园"中没有虚伪矫饰、尔虞我诈等世俗之情,我为什么




陶渊明像

要离开它呢？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最后终于出现了弃官彭泽令而“归去来”的一幕。

陶渊明回归田园后，所过的生活不外欣赏田园山水景色，饮酒，读书，写作，与邻里交往，农耕劳作等，显得简单而充实。虽有时不免因饥馁、衰老而忧思焦虑，但就总体而言，其心境是平静、快乐的，其诗文对田园生活的反映，也大抵以“园林好”为主旨。且看《归去来兮辞》中的描写：

> 乃瞻衡宇，载欣载奔。僮仆欢迎，稚子候门。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携幼入室，有酒盈樽。引壶觞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颜。倚南窗以寄傲，审容膝之易安。园日涉以成趣，门虽设而常关。策扶老以流憩，时矫首而遐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
>
> 归去来兮，请息交以绝游。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悦亲戚之情话，乐琴书以销忧。农人告余以春及，将有事于西畴。或命巾车，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寻壑，亦崎岖而经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



此文作于作者辞官之初，描写了归田后的生活、心情和乐趣。作者回家时，刚一看到自家简陋的住房，他就欣喜若狂，拼命地往前赶。僮仆和孩子们都站在门口迎接，使他感到了家庭的温暖。回到家中后，喝喝酒，弹弹琴，看看书，到园中走走，扶着手杖散散步，抬起头来向远处眺望，抚着孤松盘桓，看着云彩在山间无忧无虑地飘浮，和家人聊聊家常，和农民谈谈农事，到山间转转，这些看似寻常的小事、琐事，在作者笔下却无不充满了情趣；这些寻常情景、寻常生活，却无不让作者感到开心、惬意、满足、快乐。不是真正认为“园林好”的人，不是真正安于简朴平淡生活

的人，是绝对写不出来的。清人吴乔在《围炉诗话》中说：“夫诗以情为主，景为宾，景物无自生，唯情所化。情哀则景哀，情乐则景乐。”诗如此，文何尝不是如此，本文字里行间所洋溢着的喜悦色彩，正是作者以喜悦之情“化”景的结果。景与物的描写皆传达出了作者特定的心情，其中有的景物还包含寓意，比如无心出岫的云、倦飞知还的鸟，以及菊花、孤松等，都是作者品性、情操的寄托与化身，读来令人寻味不尽。

再看《归园田居》其一：“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篇突出地表现了诗人厌恶官场、热爱田园生活的思想感情。官场被喻作“尘网”、“樊笼”，在官场中的自己被喻作“羁鸟”、“池鱼”；而与之相反，田亩、草屋、榆柳、桃李、远人村、墟里烟、狗吠、鸡鸣这些在农村极为寻常的景物却经诗人点化，无不充满了诗情画意。诗人甚至对被一般人视为简陋、寒酸的“草屋八九间”津津乐道，使之具有了很高的审美价值，如果不是真正觉得“园林好”，也是绝对写不出来的。人生理想不同，品格志趣有别，价值取向和审美情趣必然也就会有所不同。

类似的例子还可举出不少。写出了田园景色与风光之美，写出了闲弄琴书、自斟春酒的悠闲生活之美，写出了弱子戏侧呀呀学语的温馨亲切之美，写出了农耕生活之美，写出了简朴生活之美，甚至居住于深巷、摘蔬于园中、盥濯于檐下、采菊于东篱，所见所为无不是美的，诗人不由得要自内心发出感喟“此事真复乐”、“不乐复何如”。对“园林好”的赞美和惬意的感受，无疑成

为陶渊明田园生活的基调,虽然一些田园诗也写到自己所遭受的困厄和农村的凋敝,写到自己内心的矛盾、忧愁、痛苦和焦虑,但这个基调始终没有改变。

相对而言,李白写到田园生活的作品很少,他曾经归隐过山林,但没有真正归隐过田园。不过他涉笔田园的诗歌,也是不无美感的,如《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写道:"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相携及田家,童稚开荆扉。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写月夜访问一个复姓斛斯的终南隐士并和他一同饮酒的情景,对山村风光及人情琐事的描绘,平淡自然,颇具陶渊明田园诗的风韵。

苏轼一生,是颇关注农村和农民的,因此他对于田园风物并不陌生,曾在作品中一再予以反映。如《浣溪沙》词写道:

麻叶层层苘叶光,谁家煮茧一村香?隔篱娇语络丝娘。垂白杖藜抬醉眼,捋青捣麨软饥肠,问言豆叶几时黄?

簌簌衣巾落枣花,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谩思茶,敲门试问野人家。

软草平莎过雨新,轻沙走马路无尘,何时收拾耦耕身?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薰,使君元是此中人。

词作于作者任徐州太守时,以淋漓酣畅、充满感情的笔触,描绘出一幅幅洋溢着浓郁乡村生活气息的风景画和风俗画,闪光的麻叶,煮茧的香味,簌簌下落的枣花,缫丝车的声响,缫丝女郎的娇语,白发拄杖老人的醉态,仿佛就在眼前,响在耳畔,正可谓情景历历,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能将农村情景写得如此生趣盎然,当然不仅得力于作者艺术功力的深厚、表现手法的高超,更得力于他对田园生活的喜爱,不然,煮茧的气味本来很大,他嗅

来就不会觉得是股股清香，对因青黄不接而将新麦捋下炒干捣碎以果腹的老人，他就不会去询问豆类几时才能成熟接上，他就更不会说“使君元是此中人”，“何时收拾耦耕身”。对“园林好”的钟情，与陶渊明是一脉相承的。

苏轼在官期间，确曾买田置地，做过归隐的打算。他自己的居所，特别是贬官期间的居所，也总想安排得有些农家风味。他在黄州的居所，周围有树，有水，有稻田、麦田，有桑林菜圃，还有一片果园。他在惠州的居所，旁边种有橘子、柚子、荔枝、杨梅、枇杷等果树，还种了几株桧树和栀子树，“门外橘花犹的皪，墙头荔子已斓斑。树暗草深人静处，卷帘欹支枕卧看山”（《三月二十九日》其二），有着浓郁的田园风味。他在儋州的居所也复如此，其《新居》诗云：“朝阳入北林，竹树散疏影。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旧居无一席，逐客犹遭屏。结茅得兹地，翳翳村巷永。数朝风雨凉，畦菊发新颖。俯仰可卒岁，何必谋二顷。”苏轼初到海南时，开始被安排住在一所官舍里，官舍虽然破旧，但其政敌仍将他赶了出来，于是他在当地居民的帮助下，自盖了三间住房，虽然不免简陋，但因颇具农家风味，他因此感到十分满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即使身处京师，也追求这种农家风味。他曾在一封给杨济甫的信中说：“都下春色已盛，但块然独处，无与为乐。所居厅前有小花园，课童种菜，亦有少佳趣。傍宜秋门，皆高槐古柳，一似山居，颇便野性也。”他不仅是“课童种菜”，被贬黄州期间，还亲自当起了老农，参与了农耕。这种情趣、追求和经历，使他越来越把陶渊明当作知己，对陶渊明“园林好”的情愫，也越来越予以认同了。

陶渊明、苏轼能觉得“园林好”，是与他们在人生哲学、品德修养方面崇尚自然、奉行“抱朴含真”的原则分不开的。在他们

看来，名教礼法和官场利禄就像罗网和樊笼般束缚人的天性，官场的污浊和争斗也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陷阱，只有来到农村，投身田园，回到淳朴的生活状态，与大自然融在一起，人的天性才会得到复活，人才能依自己的本性去过无拘无束的生活。陶渊明《饮酒》其五云："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此中的"真意"，实际上蕴藏于"采菊"等句之中，这是人与自然的一种和谐契合，是一种悠然自得、物我两忘的境界，是物必归于自然的人生真谛，而这种契合、境界、真谛是只有通过"心远"世俗与人事才能得到或领悟到的。因此，他们也就有了一双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发现美的眼睛，"园林好"也就成了他们不断地获得快乐与满足的源泉，成了他们不知疲倦地加以歌咏的主题。他们也就成了最会欣赏田园山水之美的人，这对无数的后来人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 “一生好入名山游”



普列汉诺夫《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说:“从历史上说,以有意识的功利观点来看待事物,往往是先于以审美的观点来看待事物的。”人类对山水自然的看法也是这样。人类与山水自然的关系虽然密切,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仅仅是将山水自然当作自己的托身之所和获取衣食之资的地方来看待的,而不是把它当作审美的对象来看待的。自古以来就有隐士,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中,隐士也

只把山水自然当作一个栖身之地看待，当作一个没有市井喧嚣、官场污浊的宁静、淳朴的所在看待，当作一个可以体悟道家自然之道的所在看待，而并没有以之作为审美观照的对象。到东晋时期，对山水自然的审美才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自然美意识最后觉醒，山水自然开始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进入人们的视野。在这一进程中，陶渊明也受到熏染，在他的田园诗中，也有了少量关于山水之美的描写。不过，陶渊明更属意于田园，更属意于对田园之美的表现，山水景物不过是连带而及，在他的集子中几乎没有纯粹的山水之作，因此在这方面的表现不算突出。真正让山水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登上历史舞台的人物，是与陶渊明同时而稍晚的谢灵运。谢灵运能够作出这一贡献，与他的特殊经历和思想有关。

谢灵运一生政治上不得意，遂钟意山水，精心营构，肆意遨游，日渐明确的山水审美意识及有关山水描写的长期艺术积累终于在他身上发生裂变作用，使他成为中国诗史上大力写作山水诗的第一人。在其笔下，奇山异水，纷至沓来，令人有目不暇接之感。仅略举数例：



《过始宁墅》："岩峭岭稠叠，洲萦渚连绵。白云抱幽石，绿筱媚清涟。"

《晚出西射堂》："连嶂叠巘崿，青翠杳深沉。晓霜枫叶丹，夕曛岚气阴。"

《登江中孤屿》："乱流趋正绝，孤屿媚中川。云日相辉映，空水共澄鲜。"

《石壁精舍还湖中作》："林壑敛暝色，云霞收夕霏。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

《从斤竹涧越岭溪行》："猿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

云方合,花上露犹泫。……蘋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

或工笔细绘,或白描勾勒,或两者双管齐下,构造出一个个引人入胜的画境。值得注意的是,谢灵运钟情山水,肆意遨游,一方面是由于他政治上失意,想在精神上寻求寄托,另一方面是由于山水审美意识的觉醒使他充分地认识到了山水自然之美。这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促成了他的山水之游,铸就了他的山水之作,也使得后世许多与他有类似经历、遭遇和思想的人,步了他的后尘,李白和苏轼便是其中的两位。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写道:

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
庐山秀出南斗旁,屏风九叠云锦张,
影落明湖青黛光。
金阙前开二峰长,银河倒挂三石梁。
香炉瀑布遥相望,回崖沓嶂凌苍苍。
翠影红霞映朝日,鸟飞不到吴天长。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
黄云万里动风色,白波九道流雪山。

诗以如椽巨笔,描绘庐山瑰奇壮丽的景色和长江雄伟奔放的气势,想像丰富,境界高远,意气超迈,气象万千,读来给人以雄奇的美感。而"一生好入名山游",则对李白一生行止和品性作了很好的概括。李白早在蜀中时,就遍游了峨眉山、戴天山、巫山等蜀中名胜。蜀中雄伟壮丽的山川,对他壮阔胸襟、豪迈性格的培育起了很大作用,燃起了他走出蜀中,到祖国各地去登临山水、游览名胜的强烈渴望,于是在他 26 岁的那一年开始了长期的漫游。在向三峡进发的途中,他就写出了《峨眉山月歌》这篇名作:

峨眉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

夜发清溪向山峡，

思君不见下渝州。



峨眉山月歌

由峨眉而平羌江，而清溪，而渝州，而三峡，诗境渐次展开，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千里蜀江行旅图。半轮秋月，影入江流，意境清空灵妙，为极善写月之一例。全诗四句，连用五个地名，由于笔力雄放，音韵流畅，组织精巧，读来丝毫不觉堆砌。出蜀后，李白数十年间足迹遍及今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的广大地区，南望九嶷，北达幽燕，东至于海，纵横数千里。所游山有庐山、泰山、衡山、嵩山、华山、终南山、太白峰、黄山、钟山、会稽山、天台山等，所历水有长江、黄河、汉水、洞庭湖、鄱阳湖、太湖等。有的地方到过不只一两次，有的地方则是长期留连，范传正在《李公新墓碑》中就说他是“偶乘扁舟，一日千里，或遇胜境，终年不移”。遍历名山大川极大地开阔了李白的视野和胸襟，使他获得了极大的审美快感，于是他以“五岳为辞锋，四海作胸臆”（皮日休《七爱诗》），创作了一篇篇雄视千古的杰作。如：



《望庐山瀑布》：“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望天门山》：“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李白之凌空落笔、大气包举，其诗想像之奇特，境界之雄阔，



李白游踪图

气势之骏迈，气象之峥嵘，古今罕有其匹。李白因名山胜水而得一展其个性，一纵其诗魂，名山胜水也因李白之诗笔而增光添彩、声名远播。即以《蜀道难》为例。孟棨《本事诗》载："李白初自蜀至京师，舍于逆旅。贺监知章闻其名，首访之。既奇其姿，复请所为文，出《蜀道难》以示之。读未竟，称叹者数四，号谪仙。"所谓"谪仙"，即原为天上仙人，不过被贬谪到了人间而已。诗以参差腾挪、神奇莫测之笔，熔神话传说、想像夸张于一炉，绘声绘色地写出了蜀道的奇险和高峻，写出了蜀道景象的奇谲变幻，也写出了诗人跌宕起伏的思想感情，"奇之又奇"①，宜乎为"谪仙"所写。对"谪仙"之喻，苏轼曾颇表赞同，他在《戏徐凝瀑布诗》中谈到李白《望庐山瀑布》的"银河"之喻时说："帝遣银河一派垂，古来惟有谪仙词。"《望庐山瀑布》先以紫烟缭绕的香炉峰陪衬，然后从静、动两个侧面刻画凌空直落、势不可挡的瀑布形象，最后想落天外，以"银河落九天"为喻，完成了对雄奇瑰丽的瀑布形象的完美塑造，确实妙绝，后人难以为继，苏轼之评，自有见地。

苏轼曾自称："予瞻性好山水。"(《再跋醉道士图》)，行如其言，他一生确实非常喜欢到山水自然中徜徉游乐。苏轼一生身陷

① 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上。

官场，不可能像李白那样长年遨游在外，但他公务有余暇，加之一生任职多处，一再迁徙，旅途所经，必有濡染，而半生遭贬，很多情况下形同流人，无职无权，更可专务山水，如其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诗中所写："嗟我本狂直，早为世所捐。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苏轼游览了很多山水名胜，为此他曾自豪地宣称："人间绝胜略已遍，匡庐南岭并西湖。"苏轼钟爱名山胜水，名山胜水于是源源不断地涌入他的笔底，铸成了一篇篇传世佳作。早年苏轼与父苏洵、弟苏辙离开故乡沿水路进京应试时，在饱览大江两岸雄奇壮丽景色之余，便写出了大部分为山水诗的《南行集》，其中已不乏出色之作。如《江上看山》：

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
前山槎牙忽变态，后岭杂遝如惊奔。
仰看微径斜缭绕，上有行人高缥缈。
舟中举手欲与言，孤帆南去如飞鸟。



抓住景物相对运动的特点，把本来静止不动的山写得千变万化、形神飞动。《游径山》写道："众峰来自天目山，势如骏马奔平川。"又以奔马写山，形成特色，竟引来后人纷纷仿效，辛弃疾"青山欲共高人语，联翩万马来无数"（《菩萨蛮·金陵赏心亭为叶丞相赋》）便是其中著名的一例。苏轼才华横溢、众体兼擅，此后诗、词、文、赋中均不乏山水记游名作。仅略举诗词两例：

《饮湖上，初晴后雨》其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崩云，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或大笔如椽，或工巧细腻，或虚实相生，或动静相济的特点已不难窥见。苏轼是提倡水墨写意的湖州派文人画家，作品中所描写的烟雨苍茫、云雾迷蒙的景致，更颇具水墨写意画神韵，耐人咀味。

苏轼记游的文、赋主要有《石钟山记》、《游沙湖》、《前赤壁赋》、《后赤壁赋》等。写景一般均较为简略，但能抓住特点着力描绘，如《石钟山记》以"如猛兽奇鬼，森然欲搏人"写侧立千尺的大石，以"闻人声亦惊起，磔磔云霄间"写山中栖鹘，以"若老人咳且笑于山谷中"写鹳鹤声，以"噌吰如钟鼓不绝"、"与风水相吞吐，有窾坎镗鞳之声"写水，皆极生动形象，而且将夜游时所感受到的森冷恐怖气氛渲染到极致，读来有身临其境的悚然之感。叙事、描写、议论往往熔为一炉，《石钟山记》通过乘舟夜游经历得出的富有哲理性的结论："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前赤壁赋》通过主人对客人的劝慰所阐述的"变"与"不变"的相对主义理论和"物各有主"的观点，都能在给人以艺术享受的同时，从中获得关于宇宙人生的哲理感悟。



李白和苏轼投身于山水，就像陶渊明投身于田园，从中找到了快乐，从而暂时忘怀了人生的坎坷、世俗的丑陋和官场的险恶。李白《独坐敬亭山》云："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寂寞的诗人与静穆的山峰交冥互会，诗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给予的无私的情谊和温暖。"只有"二字，反衬人世之相弃、之无情，具有强烈的感情色彩。苏轼《梅花》其二云："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诗人实以孤独的梅花自喻，"清溪"则是大自然的代表，惟有"清溪"对诗人不弃不离，也写出了诗人与"清溪"之间"两不厌"的关系。诗人不仅从山水自然中找到了快乐，也找到了美感，他们

尽情地捕捉、表现了山水自然之美，给后人留下了一笔丰厚的遗产。他们自己也在山水审美中陶冶了性灵，锤炼了品格，升腾了精神。陶渊明、李白、苏轼能与田园山水契合得如此自然、紧密，可以说真正达到了“智者乐水，仁者乐山”的佳境。

# “我是识字耕田夫”



儒家历来被认为是轻视农业劳动的。《论语·子路》载,有一次孔子的学生樊迟向孔子提出要学种庄稼,结果孔子回答说:“我不如老农。”樊迟又提出要学种菜,孔子又回答说:“我不如老菜农。”樊迟退出后,孔子说:“小人哉,樊须也!”孔子的理由是:“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意思是:在上位的人讲究礼



樊迟像

节，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敬；在上位的人做事以义为重，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服从；在上位的人诚恳信实，老百姓就没有人敢不说真话。要是这样，四方的百姓都会背负着小孩前来投奔，哪里用得着自己去种庄稼呢？孔子大概觉得在上位的人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他的学生也应当在礼、义、信这些大事上下功夫，不应当捡了芝麻丢了西瓜，所以对樊迟提出的要求不高兴，要说他是“小人”，没有出息。这样一来，孔子就把种庄稼看作只能是“小人”干的活儿，在“大人”和“小人”之间划出了一条鸿沟。后来孟子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并认为这是“天下之通义”，又说“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见《孟子·滕文公上》），就是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观点的。



道家的看法与儒家不同。《庄子·马蹄》曰：“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认为织布而后穿衣、耕种而后吃饭是老百姓固有的本能和天性，是人类共有的德行和本能。在《天地》篇中，又对本已被尧立为诸侯，结果自己“辞为诸侯而耕”的伯成子高作了赞扬。在《盗跖》篇中，又通过盗跖之口斥孔子为“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庄子的目的仍在强调要任其自然，对劳动的本质并没有真正意义的认识，但其思想却对后来的不少人特别是一些隐士产生了很大影响。应当说在庄子之前就已经有隐士参与躬

耕了。《论语·微子》载,孔子在周游列国时,就曾碰到两个隐士长沮、桀溺在“耦而耕”(两人并耕),孔子让子路去问路,两个隐士爱理不理的,认为天下这样纷乱,谁能改变得了呢,不赞成孔子这样到处去推销自己的政治主张,建议孔子还不如跟着他们这些人避世隐居。孔子得知他们的建议后,回答说:“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 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意思是,人隐居山林,就得与鸟兽同群,我们既然无法与鸟兽同群,不跟天下人打交道,又跟谁去打交道呢? 如果天下太平,我就不会来从事改革的工作了。又一次,子路掉了队,找不到孔子了,刚好碰到一个隐士,就向他询问:“子见夫子乎?”谁知隐士回答:“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与盗跖骂孔子的话几乎如出一辙,后者接受了前者的影响也未可知。

陶渊明是主张世道混浊就归隐田园的,而且还主张归隐田园后亲自参加劳作。他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认为人生总会归向于道,但不管归向什么道,首先要吃饭穿衣,没有谁连衣食都不经营而能求得自身的安乐的。又说:“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宴安自适,岁暮奚冀? 担石不储,饥寒交至。”(《劝农》)认为人生就应该勤快,勤快了就不会贫乏,如果贪图安逸,不愿劳动,到年终就没有什么指望了,一点存粮都没有,就得饱受饥寒的折磨了。他对孔子的主张不以为然,“孔耽道德,樊须是鄙”,对孔子沉缅于自己的道德观、鄙视樊迟的行为婉转地提出了批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更表示孔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虽然让他景仰之至,但可望而不可及,他自己是下定了长期耕种的决心,以解决“贫”的问题,认为“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移居》其二),衣食问题只能

靠自己解决，只要自己努力耕种了，老天就不会欺骗自己，一定会有所收获。可见，陶渊明提倡躬耕、参与躬耕是有蔑弃儒家名教的意义的，他是要“蔑彼结驷，甘此灌园”(《扇上画赞》)，即蔑视荣华富贵，甘愿过浇水种菜的农耕生活。《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云：“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陶渊明虽然在他自己所崇奉的“道”在与“贫”发生矛盾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安于贫困，而不放弃自己所崇奉的“道”，实际上遵守了孔子“忧道不忧贫”的遗训，但他显然对孔子认为“耕”不能解决“馁”的问题、只有“学”与“禄”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看法不表苟同。在陶渊明的作品中，还多次对长沮、桀溺、荷篠丈人、陈仲子等人表示了敬仰之情，说明他的立场是在这批自食其力的隐士一边的，他是认同庄子的主张的。不过，我们也不难看出，陶渊明对于劳动的价值与意义的认识虽然同庄子一样朴素，但却是要深刻得多的，庄子对于农耕的意义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而陶渊明却提出了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很了不起的。



陶渊明言行一致，确实在归隐之后长期坚持了劳动，这在他的作品中有明确的反映。

《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一写道：“在昔闻南亩，当年竟未践。屡空既有人，春兴岂自免。夙晨装吾驾，启涂情已缅。鸟弄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是以植杖翁，悠然不复返。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其二写道：“秉耒欢时务，解颜劝农人。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日入相与归，壶浆劳近邻。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癸卯岁”即晋安帝元兴二年(403)，诗人这年39岁，在出任彭泽令之前，闲居在家，第一次参加了生产劳动。诗人老老实实地承认，过去只是听人谈起过农事，但自己从来没

有亲自实践过。由于家中经常缺粮,现在春耕开始了,难道自己可以避开不管。于是清早起来就套好了车,刚一上路,他的心就飞到远处的田间去了。第一次参加劳动心情是兴奋的,只觉得初春的鸟叫显得特别的欢快,初春的和风也使人感到特别的惬意。"平畴"四句,不仅写出了秧苗欣欣向荣的生意,也写出了诗人在看到自己劳动的初步成果时的喜悦心情。诗人不仅自己拿着农具欢欢喜喜地从事劳作,还笑着勉励农民。太阳落山后,大家一起收工回家,他拿出酒与近邻共饮,表示慰劳。真切地写出了诗人第一次参加劳动的体验,其兴奋、喜悦的情绪连读者也不由得要受到感染。

《归园田居》其一写道:"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其三写道:"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这里的"南野际"与"南山下"当指一地。大概由于种植经验不足,当然也可能因功夫下得不够,种的地"草盛豆苗稀",让人不免要哑然失笑。但诗人赶快采取了措施。清早起床下地,头顶明月回家,山路狭窄,夕露沾衣,何其辛苦,但诗人都不以为忧,只要其愿不违就行,可见其节其志。



《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写道:"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遥遥沮溺心,千载乃相关。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庚戌岁"即晋安帝义熙六年(410),离诗人第一次参与躬耕已经7年,诗人46岁了。此前二年,诗人家中遭遇火灾,家庭生活日趋困难,为解决生计问题,诗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披星戴月,沐霜栉露,饱尝"田家"劳作之"苦",实已与普通农民没有多少差异

了。不过经过辛勤劳作，一年的收成也还可观，而且劳动回来洗过手脚后，坐在檐下休息，喝上几杯酒散散心，也感到颇惬意。更重要的是，参加劳动身体虽然疲劳，但或许可以逃避意外的灾祸。因此，诗人表示希望能够长期如此，再次表达了坚持躬耕不动摇的决心。

《丙辰岁八月中于下噀田舍获》写道："贫居依稼穑，戮力东林隈。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司田眷有秋，寄声与我谐。饥者欢初饱，束带候鸡鸣。扬楫越平湖，汎随清壑回。郁郁荒山里，猿声闲且哀。悲风爱静夜，林鸟喜晨开。曰余作此来，三四星火颓。姿年逝已老，其事未云乖。遥谢荷蓧翁，聊得从君栖。""丙辰岁"即晋安帝义熙十二年(416)，诗人这年已经52岁了。开头两句即表明，在贫困中生活就依靠稼穑来解决问题，所以他要到东林隈努力劳作。管农业的官员关心秋天的收成，这与他的想法其实是一致的。他这个经常挨饿吃顿饱饭就会感到高兴的人，很早就起床束好衣带等着鸡叫下地秋收了。最后表示：自归田参与躬耕，到现在已经历了12个秋天。岁月流逝，人已衰老，但耕种这件事自己是不会放弃的。再表决心，自我激励，显示出坚定的意志。



陶渊明坚持长期参与农耕，使他的思想感情发生了很大变化。"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常恐霜霰至，零落成草莽。"(《归园田居》其二)同农民亲近了，大家常来常往，而聚在一起时谈论的话题都是庄稼的长势、收成的好坏这类问题。自己种的地越来越多，桑麻的长势也不错，这时就常常担心霜冻不期而至，那样损失就大了。与农民成了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休戚与共，利害相关，交往、交情就都是发自内心的了；庄稼收成的好坏关系自家的切身利益，对农事的关心自然也是发自内心的。这比起那些居上位者即使是

真诚地表现的对农民、农事的关心，也不可同日而语；比起那些不过是在口头上说说的关心，更不啻有天壤之别。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

陶渊明参加劳动，从中找到了快乐，从“秉耒欢时务”、“盥濯息檐下，斗酒散襟颜”等句不难看出这一点。他更真切、更深刻地认识了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不仅自己勉力坚持劳作，还“解颜劝农人”；不仅说了“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这样的既自勉又勉人的话，还专门写了《劝农》一诗，勉励人们从事农业劳动，这种热情、胸襟和眼光，不能不让人至为感佩。但劳动也是一件艰苦的事情，陶渊明也经历、忍受了许多辛苦，但他坚持下来了；劳动必有所收获，劳动对他的物质生活有所弥补和改善，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他的贫困问题，他也照样坚持下来了。从这里看出了陶渊明的守志不移，守节不苟。所谓“衣沾无足惜，但使愿无违”，所谓“不言春作苦，常恐负所怀”，其所“愿”、“所怀”，决不仅仅是对耕种有所获所抱有的希冀，更重要的

是指摆脱官场羁束、不与同流合污、回归自然淳朴生活、保持高洁品格的素志。“即理愧通识，所保讵乃浅”，其所要保的也是个人高远的人生追求和高洁的品格节操。通过隐居耕种来达到这一目的，在陶渊明看来是一件大事情，所以他说“讵乃浅”，意思是：“这意义难道还小吗？”陶渊明是达到了这一目的的，所以他赢得了无数后人的崇敬。

李白一生是曾隐居过的，但他隐居期间是否参加过劳动，尚难作出明确的判断，虽然他在描述隐居安陆白兆山桃花岩的生活时曾说过“入远构石室，选幽开山田”这样的话。

苏轼一生未曾真正隐居过，但他却是实实在在地参与过躬耕的。据他自己说，他曾“少年辛苦事犁锄”（《野人庐》），他出身于一个中小地主家庭，这种情形并非绝不可能出现。进入官场后，他也并不以当农民为耻。他曾写有一诗，标题是《庆源宣义王丈，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掾。遇吏民如家人，人安乐之。既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华》，是赞美好官王庆源的，中间有两句：



吏民莫作长官看，我是识字耕田夫。

意思是，王庆源待百姓如同家人，要求百姓不要把他当作长官看，他自己不过是一个识字的种田人。说的是王庆源的事，但实际上也是苏轼的夫子自道。苏轼对陶渊明能不避霜露、坚持躬耕的操守十分叹赏，曾谈到他与人一起读《归园田居》（种豆南山下）时的感受说：“览渊明此诗，相与太息。噫嘻，以夕露沾衣之故而犯所愧者多矣！”（《书渊明诗》）被贬黄州期间，苏轼真正过起了农耕生活。《东坡八首序》写道：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

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

又《与章子厚书》云：

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

次年，苏轼又在东坡盖房五间，由于竣工时正下大雪，于是题名曰“雪堂”。苏轼参与劳作，风吹日晒，脸色变得黑红，从外表上看，已和农民差不多了。《次韵孔毅夫久旱已而甚雨》其二云：

去年东坡拾瓦砾，自种黄桑三百尺。

今年刈草盖雪堂，日炙风吹面如墨。

到惠州和海南后，苏轼也参加了一些体力劳动，一方面出于解决生活实际困难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精神有所寄托。他对劳动的感觉也发生了变化，在海南所写的《籴米》诗云：“不缘耕樵得，饱食殊少味。”甚至因此提出：“再拜请邦君，愿受一廛地。”由于海南民间多以贸香为业，很多土地没人种，所产稻米不够吃，只好以杂粮熬粥充饥，因此苏轼仿效陶渊明，也作了《劝农》六首。



总的来看，苏轼与陶渊明相通之处颇多，他们对待农耕的态度，参与农耕的热情，通过参与农耕所表现出来的品格操守，在古代的士大夫中是很少有人能够与之相比的。

# 七、民胞物与　一派真情



《论语·颜渊》载孔子的学生子夏语云："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此话颇得后人认同。汉代无名氏《别诗》云："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陶渊明《杂诗》其一云："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王勃《杜少府之任蜀州》说："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都步趋其后，反复强调了同一道理。苏轼《杭州谢上表》写道："视天下如一家。"即把天下人当作自己一家人看待，意与之

略同。张载《西铭》说:"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后二句后来被浓缩为"民胞物与"一词,即民为同胞,物为同辈,犹言热爱一切人与物,意也与之近似。

古代不少仁人志士,古道热肠,是具有热爱、包容一切人与物的胸襟的。他们不仅在同僚、同行中颇多朋友,在其他行业中往往也有不少朋友,甚至能真诚地与劳动者交朋友;不仅在同道中颇多朋友,甚至还能与反对过、迫害过自己的人真诚交往;既能待朋友以真情,也能待家人以深情。在这方面,也是充分地展示了他们的坦城性格、博大胸襟和崇高品格的。

# 黎民百姓的朋友



与朋友的交往，是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交往之一。古人十分重视朋友之间的交往，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原则。《论语·季氏》载孔子语云："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认为有益的朋友有三种，有害的朋友也有三种。同正直的人交朋友，同诚实的人交朋友，同见闻广博的人交朋友，是有益处的。而同善于逢迎谄媚的人交朋友，同当面一

套背后一套的人交朋友，同惯于能说会道的人交朋友，就有害了。《论语·子路》载孔子语云:“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认为朋友之间应相互督促、勉励、批评，兄弟之间应和睦地相处。《论语·学而》又载孔子语云:“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认为远方来了朋友，是一件很让人快乐的事情。孔子的学生曾参在这方面也说过几句著名的话:“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论语·颜渊》)即君子用文章学问来聚会朋友，用朋友来帮助自己培养仁德。又云:“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把与朋友的交往是否诚实当作自己必须每天多次反省的事情之一。“信”后被列为儒家倡导的“五常”之一，得到高度重视，吴兢《贞观政要·诚信》载房玄龄语说:“仁义礼智信，谓之五常，废一不可。”而朋友之间的诚信，成为“信”的重要内容之一。




曾参像

在其他儒家典籍中，对交友的原则也多有阐述。如《周易·系辞下》云:“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认为与地位高的人结交不应谄媚讨好，与地位低的人结交不应轻视侮慢。《礼记·表记》云:“子曰:‘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坏。’”认为君子之间的交往如水一般淡薄，小人之间的交往则如甜酒般味浓，而君子之交淡如水却能成功，小人之交甘如醴却会心坏。庄子持有相同的看法，《庄子·山木》曰:“君子之交淡如

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其间的差别，就是欧阳修在《朋党论》中所说的：“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即君子是因志同道合而成为朋友，而小人是因为利益走到了一起，“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而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而“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可见，交友绝不是一件小事清，这不仅与个人的品德操守有关，还与国家的利益相关。

古人主张“民胞物与”，认为四海皆可为兄弟，皆可视为一家，一切人与物皆可相爱，实即只要遵循一定的原则，同任何人都可以交朋友。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不同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甚至不同性别、不同年龄的人们要交朋友却是存在一定困难的。在古代，居上位者要同老百姓特别是同农民交朋友尤其困难。儒家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尚书·五子之歌》），甚至主张“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提出要“爱民如身”（荀悦《申鉴·杂言上》），“善为国者，爱民如父母之爱子、兄之爱弟”（刘向《说苑·政理》），虽得到不少居上位者的认同，但其中的多数人，根本没有、甚至不愿与老百姓、特别是与农民作近距离的接触，更遑论心心相印交朋友。因此，能与老百姓、特别是与农民亲密接触，甚至交上朋友的人，显得特别可贵。“结交莫羞贫，羞贫交不成”（《古诗》），“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贫一富，乃知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史记·汲郑列传赞》），能放下身份、不计贫贱与老百姓、特别是与农民交朋友的人，是显示了胸襟的开阔与品格的崇高的。

陆游是一个能和农民交朋友的人。他在闲居山阴期间，“身

还民服，口诵农书”（《除宝谟阁待制谢丞相启》），“身杂老农间”（《晚秋农家》）并“扶衰业耕桑”（《幽居》），与农民有了十分密切的交往。且看下列描写：



陆游像

东邻稻上场，
劳之以一壶；
西邻女受聘，
贺之以一襦。

——《晚秋农家》

野人知我出门稀，
男辍锄耰女下机。
掘得茈菇炊正熟，
一杯苦劝护寒归。

又：

野人喜我偶闲游，取酒匆匆劝小留。
舍后携篮挑菜甲，门前唤担买梨头

——《东村》

邻家稻上场、女受聘，都送上些礼物表示慰劳、祝贺，礼虽轻而情义重。农民对诗人也非常亲热，看到诗人来了，都非常高兴，男的立即放下农具，农妇立即走下织机，取出酒，挖来慈菇放到锅里煮熟，买来果品，苦劝诗人喝一杯酒取暖，免得回去在路上受了寒。亲热之状，关切之情，如历如见。诗人常常到农家串门，《游山西村》写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农家热忱相邀、招待，诗人则表示今后要不时拄着拐杖，乘着月光，来到农家敲门做客。在与

农民聚会时,诗人同农民聊家常、话桑麻,还向他们倾吐自己报国不成的满腔悲愤,表示"吾侪虽益老,忠义传子孙"(《村饮示邻曲》),我们这些人虽然越来越老了,但要把忠义传给子孙,一旦朝廷下令北伐,大家就跟着我拿起武器去战斗。不难看出,诗人确实是把这些农民当成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看待的,不然肺腑之言,岂肯轻吐。

陶渊明也是一个能真心和农民交朋友的人。且看下列描写:

《归园田居》其二写道:"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诗人归隐后,断绝了和官场、上层社会的应酬,但却和农民们"披草共来往",而且和他们有了共同的话题、共同的语言。

《饮酒》其九写道:"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问子为谁欤,田父有好怀。"清晨听到有人敲门,急忙起身去开门,把衣裳都穿颠倒了。"问子为谁欤"是边开门边询问之辞,这时诗人还不知道大清早就前来敲门的人是谁。等到把门打开,才知道是农民朋友前来拜访。农民心地善良而淳朴,诗人赞之曰"有好怀",可见彼此的契合与认同。

《饮酒》其十四写道:"故人赏我趣,挈壶相与至。班荆坐松下,数斟已复醉。父老杂乱言,觞酌失行次。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称前来拜访的农民朋友为"故人",可见交往不是一年两年了。"相与至",可知来的不是一两个人。大家在地上铺上荆棘杂草,然后坐下来,你一言我一语地交谈,你一杯我一杯地痛饮,渐渐地乱了顺序,不难想见酣饮之畅快,交谈之惬意,气氛之热烈。"故人"是知我"趣"而"赏我趣"的人,又可见相知之深。在开怀痛饮中,达到了物我两忘的

境界，真正地体悟到了酒中的“深味”。如果不是关系亲密，气氛融洽，心无滞碍，是不可能达到这种境界的。

在《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其二中，诗人还写到他与农民一起下地，一起收工，他勉励农民农耕，对农民的辛苦表示慰劳。在《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中，又说：“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对农民劳动的艰辛、生活的贫困寄予了同情。由于诗人长期与农民往来并亲自参与了农耕，因此他对农民的情况和情绪能够感同身受，他对农民所倾注的感情也最为淳朴、最为真诚，这是没有相似经历的人所难以比拟的。

苏轼也是一个能和普通民众亲密往来，并同他们交朋友的人。在做地方官期间，苏轼就经常到农村，了解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状况。在遭贬谪期间，和民众特别是农民有了更多的接触。在黄州期间，苏轼常常“扁舟草屦，放浪山水间，与樵渔杂处”（《答李端叔书》）。他躬耕田亩，还得到了农民的关心和帮助：“农夫告我之，勿使苗叶昌。君欲富饼饵，要须纵牛羊。再拜谢苦言，得饱不敢忘。”（《东坡八首》其五）。在惠州期间，苏轼常与父老往还，“父老喜云集，箪壶无空携。三日饮不散，杀尽西村鸡”（《西新桥》）。为了减轻农民的劳动强度，提高劳动生产率，苏轼还曾大力推广一种新式农具——“秧马”。

特别是在儋州期间，苏轼与百姓有了更为密切的交往，与当地黎族百姓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刚到海南时，苏轼住在一个破败的官屋中：“如今破茅屋，一夕或三迁。风雨睡不知，黄叶满枕前。”（《和陶怨诗示庞邓》）就在这时他得到了当地贫寒士人黎子云兄弟的慷慨相助，他们帮苏轼盖起了五间茅屋，而且分文不取，这使苏轼非常感激。此后，苏轼在日常生活中缺少什么，黎族百姓常常主动提供帮助。

苏轼在黎族民众中找到了真正的朋友，从此开始了密切的交往。他常常串村走寨，“久安儋耳陋，日与雕题亲。”（《和陶与殷晋安别》）。他还脱下儒服，换上黎装，并学说黎语。苏轼几乎无一日不与黎民往来，只要一天不来往，他就感到不舒服。有时没菜吃了，他就直接到黎族农民的菜园子里去讨。他也努力帮助黎族人民，如传播知识文化、规劝改变杀牛祭鬼的风俗、改变不良卫生习惯、劝农民开垦荒地、介绍中原先进农耕方法等等。苏轼完全同黎族百姓打成了一片，泯灭了官民、汉黎之间的界限，产生了“咨尔汉黎，均是一民”（《和陶劝农》其一）这样一种在当时极为难能可贵的想法。苏轼完全把自己当作海南民众的一员了，宣称“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别海南黎民表》），并打算长期在海南住下去，宣称“余生欲老海南村”（《澄迈驿通潮阁》其二）。后来苏轼奉命北移，是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离开海南的。“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一个“冠”字，对自己的三年海南生活作了高度的概括和评价。苏轼的离开，也给海南百姓留下了无尽的思念。



陆游、陶渊明、苏轼能够成为黎民百姓的朋友，与他们特殊的经历有关，但更与他们的思想、品格和胸襟有关。与他们的经历相似的人大有人在，但不是都能像他们那样成为黎民百姓的朋友。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和实际表现，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爱民”的人，是在交友这件事情上真正表现出了“君子”之风的人。

# 同道知音



古代以道义相合、笃于友情的故事，数不胜数。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也有不少这样的故事。

陶渊明一生交往并不多，但他决非那种看破红尘、心如死灰的隐士，对志同道合的朋友，他是一往情深的，从《停云》、《答庞参军》、《和郭主簿》等诗不难看出这一点。如《答庞参军》写道：

相知何必旧，倾盖定前言。

有客赏我趣，每每顾林园。

谈谐无俗调，所说圣人篇。
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
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物新人惟旧，弱毫多所宣。
情通万里外，形迹滞江山。
君其爱体素，来会在何年？

庞参军曾为陶渊明邻居，两人志趣相投，时相过从，相得甚欢。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初春，庞奉江州刺史王弘之命使江陵，行前有诗赠渊明，渊明即以此诗作答。该诗话语平常，不事渲染，但所表达的是一派至性至情，远非常人所能及。

陶渊明同颜延之也有过一段亲密的交往。颜延之的思想与品格，与陶渊明颇有相似处，《宋书》本传说他“少孤贫，居负郭，室巷甚陋”，又说他“性既褊急，兼有酒过，肆意直言，曾无遏隐，故论者多不知云”。曾写《五君咏》，分咏”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向秀、阮咸、刘伶五人以寄其志。颜延之初为始安太守经过浔阳时，曾天天去找陶渊明喝酒，”每往必酣饮致醉”(萧统《陶渊明传》)，临别，还留下了2万钱给陶渊明作酒资。陶渊明死后，颜延之作《陶征士诔》，深沉地回顾了他们之间的友情。

陶渊明在隐居期间，除交了一批农民朋友外，也交了一些贫士朋友。《移居》其一云：”昔欲居南村，非为卜其宅。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怀此颇有年，今日从兹役。弊庐何必广，取足蔽床席。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其二云：“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辄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素心人”即心地真纯之人，与陶渊明情性正相投合。而能“奇文共欣赏”、“登高赋新诗”，则都有相当文化知识，陶渊明与他们的交往，具

有相当文化品味，在贫乏的文化生活中，增添了不少乐趣和慰藉。而从“过门”几句看，他们的关系又是非常热忱、朴实、真诚的，与同农民朋友的交往，并无实质上的差别。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李白性情豪爽，游踪四布，他的交游要比陶渊明广得多，而所交之友，也多为志趣相投、性格相类的人物。比如孟浩然既是一个隐士，又有热切的用世之心，又具有重义好施、蔑视权贵、不慕荣华的品格，因此李白对他十分仰慕，在其《赠孟浩然》诗中写道：“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频中圣，迷花不事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孟浩然比李白大12岁，但两人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李白为送别孟浩然，写下了《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这篇传诵千古的杰作：

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
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

首二句叙事，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水乳般交融进秾丽的画面中，同时婉蓄地表现出诗人对友人东去的留恋怅惘之情。后两句写景，通过对孤帆消失在水天相接之处、眼前只剩下一派浩莽长江水景象的描写，刻画出诗人久久地伫立江边、专注地凝望着孤帆远去的形象，进一步传达出一片依依惜别的深情。前人评

这首诗说:“目力已极,离思无涯,怅望之情,俱在意外。”[1] 说得一点不错。

天宝年间,王昌龄因“不护细行”(《新唐书·文艺传》),被贬龙标(在今湖南黔阳县)尉。李白当时与王昌龄并不在一起,但他得知消息,很为朋友担心,于是写了《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一诗: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前两句写景叙事,后两句抒情。诗人展开想像,将无情之月视为有情之知己,以愁心相寄,伴朋友远行,意象新奇,情意无限。《金陵酒肆留别》云:“风吹柳花满店香,吴姬压酒唤客尝。金陵子弟来相送,欲行不行各尽觞。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末二句将深厚绵长的别意与滔滔不尽的东流水相较,既使抽象无迹的别意有了具体可感的形象,又含蓄地表达出别意比长长的东流水还长的意蕴,读来有悠然无尽的余味。《金乡送韦八之西京》云:“客从长安来,还归长安去。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此情不可道,此别何时遇?望望不见君,连山起烟雾。”总体自然、平易、朴素、真切,好似信手拈来,毫不着力。但三、四句却如奇峰壁立,出人意表,形象地写出诗人心逐友人远去、依依不舍、念念不忘的情态。末二句则刻画出诗人伫立凝望的形象,连山迷茫的烟雾,寄寓着诗人惆怅迷惘的心情,与“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同一意趣。上述诗作,表现手法各不相同,但都表现了诗人对于友人的满腔深情。

在唐代,中日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十分活跃,当时有不少日



① 唐汝询:《唐诗解》。

本人来中国留学,学成后有的还在唐朝做了官。大概在长安期间,李白与一些日本人交了朋友,晁衡便是其中的一位。晁衡原名阿部仲麻吕,汉名朝衡或晁衡。唐玄宗开元间来中国,在唐朝做过左补阙、左散骑常侍、镇南都护等官。代宗大历五年(770)卒于长安。天宝十二年(753),晁衡以唐朝使者身份,随同日本第十一次遣唐使团返回日本,海上遇风,飘至安南(在今越南北部),不久仍折回长安。回长安前,误传已在海上遇难,李白闻讯非常悲痛,为作《哭晁卿衡》诗:

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
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

诗题冠以“哭”字,为全诗定下悲凄的感情基调。后二句,谓晁衡溺死,明月也为之悲伤,以致沉落碧海(“明月”又喻指晁衡,谓其品格高洁),东海苍梧山上的白云也满是忧愁之色,融情入景,借景抒情,格调幽婉,把悲剧气氛渲染得更加浓厚。这首诗成为中日人民友好交往的历史见证。



杜甫像

最具价值、最引人注目的友情,产生在李白和杜甫之间。闻一多曾在《唐诗杂论》中说:“青天里太阳和月亮碰了头,那么,尘世上不知要焚起多少香案,不知有多少人要望天遥拜,说是皇天的祥瑞。如今李白和杜甫——诗中的两曜,劈面走来了,

我们看去,不比那天空的异瑞一样的神奇,一样的有重大的意义吗?”李白和杜甫是天宝三年(744)四月在洛阳相遇的。李白其时已44岁,在当时的诗坛已经享有很高的声誉;而杜甫还只33岁,他的最重要的创作时期尚未开始。但两人在思想、性格、理想、报负等方面都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点,因此两人走到一起后很快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一起在洛阳逗留了一段时间,之后李白去了梁园(今河南开封),两人相约在梁、宋(今河南商丘)再见。当年秋天,杜甫如约来到梁、宋,同李白第二次见面。当时诗人高适也在这里,于是三人一起寻访古迹,慷慨怀古,纵谈时事,品评诗文,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日子。之后,他们再度分别。次年秋天,李白与杜甫在东鲁第三次会面,两人一起寻访幽人,登临山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杜甫《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友情上升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最后两人在东鲁石门山(在今山东曲阜)分手。临别,李白写了《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诗:“醉别复几日,登临遍池台。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秋波落泗水,海色明徂徕。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对即将来临的远别表达了无限惆怅之情,盼望着能够“金樽重开”,但遗憾的是,后来两人再也没有能够重逢。



李、杜分别后,常常彼此思念。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写道:

我来竟何事?高卧沙丘城。
城边有古树,日夕连秋声。
鲁酒不可醉,齐歌空复情。
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

离开杜甫后,李白来到沙丘(今山东临清),独自一人,倍感寂寞,无情无绪,饮酒不能沉醉,听歌不受感动,对友人的思念之

情油然而生。前六句为后二句蓄势，后二句直抒思念之情，而又以浩荡绵延的河水为喻，化抽象为具体，留下了不尽的余味。

杜甫也写了不少思念李白的诗作。《春日忆李白》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寄李十二白二十韵》云："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不见》云："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对李白敏捷的诗才、李白诗歌的艺术风格和艺术魅力表现出透彻的理解和深深的敬佩之情。李白被远流夜郎，杜甫得知消息后，异常挂念，积想成梦，因而作了《梦李白二首》，几乎一字一泪，生动深切地表现了两位诗坛巨子肝胆相照、生死不渝的伟大情谊。据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的统计，杜甫所作与李白相关的诗将近 20 首，其中专门寄赠或怀念李白的有 10 首。李白所写有关杜甫的诗有 4 首，都是漫游齐鲁时期所作，其前其后应该还有作品，可惜散佚了。单从现存作品，也足可看出两人友情的深厚。李杜交谊，确实是文学史上的一件盛事，一段佳话。

李白有不少崇拜者，李白同其中的一些人也结下了深厚的情谊，魏万是一个突出的代表。魏万是在广陵遇见李白的，而在这之前，他为了寻访李白，先到梁园，再到东鲁，再到吴越，循着李白的游踪，走了几千里路，直到广陵才与李白相遇。当时李白已经 54 岁，而魏万还很年轻，两人结成了忘年交，"一长复一少，相看如弟兄"（魏万《金陵酬翰林谪仙子》）。他们在一起很亲密地过了几个月，临别，李白把自己保存的诗文都交给了魏万，请他编集，并写了一首长诗送魏万，诗中说："黄河若不断，白首长相思"（《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魏万后来改名魏颢，编成了《李翰林集》，并写了一篇序。其时李白尚在世，这是他的第一部诗文集，可惜已经失传，只留下了魏颢的序文。

还有一个崇拜者叫汪伦，李白的《赠汪伦》是咏叹他们间的友情的：“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桃花潭在泾县(今属安徽)。关于李白与汪伦的交往，袁枚《随园诗话补遗》记载了一则传说：“唐时汪伦者，泾川豪士也，闻李白将至，修书迎之，诡云：‘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欣然至。乃告云：‘桃花’者，潭水名也，并无桃花。‘万家’者，店主人姓万也，并无万家酒店。’李大笑。款留数日，赠名马八匹、宫锦十端，而亲送之。李感其意，作《桃花潭》绝句一首。”诗前半叙事，“忽闻”为句中关键，写出意外之事、意外之喜。后半抒情，“不及”为句中关键，充分表达出汪伦的深情。沈德潜《唐诗别裁集》评云：“若说汪伦之情比于潭水千尺，便是凡语，妙境只在一转换间。”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苏轼的朋友之多、交友范围之广，不在李白之下。既有官场的朋友，文学艺术界的朋友，还有其他各行各业的朋友。既有他平辈的朋友，也有比他长一辈、低一辈的朋友。单在文学艺术圈内，他与欧阳修等相知甚深，还有秦观、黄庭坚、晁无咎、张耒这名噪一时的“苏门四学士”，还有陈师道、李廌、文与可、米芾，还有王诜、李公麟、王巩、王谠、廖明略、颜复、毕仲游等。苏轼对他的门生，一方面热情地指导和奖掖，一方面又像朋友一样和他们平等地交游唱和。《宋史》本传云：“一时文人如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陈师道，举世未之识，轼待之如朋俦，未尝以师资自予也。”苏轼对黄庭坚最为欣赏，平交如昆仲，敬重如畏友。黄庭坚后成为江西诗派的鼻祖，世以“苏黄”并称。苏轼对秦观亦颇为爱重，秦观被迫害致死，苏轼极为悲痛，两天不能下食。




黄庭坚像

苏轼在僧侣中也有不少朋友。他在《付僧惠诚游吴中代书十二》一文中说：“独念吴、越多名僧，与予善者常十九。”此文写于惠州，文中追叙与苏、杭等地诸僧人交往情谊，描述诸僧形象，个个形神兼备。与佛印、参寥等交谊尤深，佛印风流潇洒、机智敏捷，参寥则道德崇高，不慕虚名，苏轼在谈他与参寥的交往时说：“予友二十余年矣，世所知独其诗文，所不知者，盖过于诗文也。独好面折人过失，然人知其无心，如虚舟之触物，盖未尝有

怒者。”(同前)苏轼旷达的天性,使他与僧人之间的交往无拘无碍,极为坦诚。此外,苏轼还有一些道士朋友如乔仝、吴复古、陆惟谦等。

在苏轼所交的朋友中,颇多耿介坦诚之士。其中不少人在苏轼遭受贬谪后受到牵连,不少人在苏轼遭受贬谪后为他担忧,牵挂他,安慰他,甚至不远千里去看望他。在黄州时,参寥、同乡友人巢谷跋山涉水前来看望他,参寥还在苏家住了差不多一年光景;陈慥多次来看望他,还有一个马梦得长期伴随他,跟着他一起过苦日子。在惠州,参寥、钱世雄不断派人给苏轼带来礼品、药物和书信,同乡道士陆惟谦不辞数千里之遥特意来看他,另一个道士吴复古同他在一起住了几个月。在海南时,虽然一海相隔,路途更加遥远而艰险,但千里来访的事情仍不断出现,如吴复古、马梦得、僧人卓契顺等都曾先后来访。尤让人感动的是巢谷,当时已经73岁,在南赴途中,不幸病死于新州。

朋友的关心,给了苏轼莫大的安慰,给他平添了生活勇气和乐观精神。苏轼在惠州给参寥的一封回信就说:“专人远来,辱手书,并示近诗,如获一笑之乐,数日慰喜忘味也。”朋友关心,缘自苏轼对朋友的坦诚和关心,缘自苏轼的品格光辉和人格力量。苏轼在这方面的表现,也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光辉的模样。

# 伉俪、父子与兄弟



《论语·颜渊》载齐景公向孔子问政治，孔子的回答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意思是做君的要像个君，做臣的要像个臣，做父亲的要像个父亲，做儿子的要像个儿子。继之则有了"三纲五常"之说。《论语·为政》"周因于殷礼"何晏《集解》引马融："'所因'谓三纲五常。"所谓"三纲"，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指仁、义、礼、智、信。又有所谓"四德"、"五伦"之说，"四

德"指孝、弟、忠、信,"五伦"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间的五种关系。可以看出,儒家对于君臣、父子、夫妻、兄弟之间的关系是极为重视的。但所提出的主张,主要出于维护当权者统治秩序的目的,有其特定的内涵。不过,在夫妻、父子、兄弟之间建立和维持一种正常的关系,彼此真心关爱,和睦相处,却是一种传统的美德,是值得予以肯定的。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这方面的表现,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据《南史·隐逸传》载,陶渊明妻翟氏,与陶渊明"志趣亦同,能安苦节,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只是在陶渊明任彭泽令时,两人的意见产生过分歧。当时陶渊明让县吏将公田全种上秫,秫即粘高粱,适于酿酒,渊明说:"吾常得醉于酒,足矣。"翟氏却得考虑全家人的吃饭问题,一再坚持要种上粳稻。陶渊明于是搞了个折衷,用50亩种秫,50亩种粳稻。看来,陶渊明还是重视翟氏意见的。陶渊明能长期坚持躬耕,翟氏的理解和支持非常重要,两人堪称甘苦与共的贫贱夫妻的典范。



据魏颢《李翰林集序》载,李白始娶许氏,许氏死后,娶刘氏,刘氏死后,又在东鲁娶过妻,最后娶的是宗氏。李白对于家室的感情非常认真,与宗氏的感情尤深。李白在永王兵败后被囚系于浔阳狱中时,宗氏曾为他奔走营救。李白《在浔阳非所寄内》云:"闻难知恸哭,行啼入府中。多君同蔡琰,流泪请曹公。知登吴章岭,昔与死无分。崎岖行石道,外折入青云。相见若悲叹,哀声那可闻!"说宗氏翻山越岭,前来相救,就像当年为救犯法当死的丈夫,而去向曹操求情的蔡文姬一样。李白长流夜郎,宗氏又让其弟宗璟送了很长的一段路程。李白深深地感到对不起妻子,在《窜夜郎,与乌江留别宗十六璟》诗中自责说:"我非东床人,令姊忝齐眉。""东床"用东晋王羲之故事。《世说新语·雅量》

载，太傅郗鉴在京口时，派门生去找丞相王导，说要在王家挑一个女婿，王导即让他到东厢房去随意挑选。门生到东厢房看过后，回去向郗鉴报告说："王家的几位郎君都不错，但听说我去挑女婿，又都庄重得有些拘谨。只有一位袒露着肚皮躺在东床上，就跟没有听说这回事似的。" 郗鉴说："就是这个好！"再去打听，这人原来是王羲之，郗鉴就把女儿嫁给了他。后即以"东床"指女婿，这里为李白自称。"齐眉"用东汉梁鸿和孟光的故事，后即以"举案齐眉"比喻夫妻恩爱，相敬如宾。从这里可以看出，李白与宗氏平时的关系是极为融洽的。李白在赴夜郎途中，还写了《南流夜郎寄内》一诗：

夜郎天外怨离居，明月楼中音信疏。
北雁春归看欲尽，南来不得豫章书。

其时宗氏寓居豫章(今江西南昌)，而李白大概正行进在靠豫章西北的江夏一带，因此他说春时从南方北飞的大雁，都快飞尽了，也没有得到豫章宗氏的来信，语调颇为惆怅，不难看出李白内心对宗氏深切的怀念。



苏轼 19 岁那一年，与年方 16 岁的王弗结婚。王弗是眉州青神乡贡进士王方的女儿，温柔贤惠，知书达礼，务实际，明利害，对苏轼常有所提醒和匡正。苏轼《亡妻王氏墓志铭》云："见轼读书，则终日不去，亦不知其能通也。其后，轼有所忘，君(王弗)辄能记之。问其他书，则皆略知之，由是始知其敏而静也。" 苏轼任凤翔签判时，"轼与客言于外，君立屏间听之，退必反覆其言，曰：'某人也，言辄持两端，惟子意之所向，子何用与是人言。'有来求与轼亲厚甚者，君曰：'恐不能久。其与人锐，其去人必速。'已而果然"。认为模棱两可、只看着对方意思说话的人，不值得跟他多说什么；认为跟你好得过分的人，要抛弃你时也会

很快:这是何等敏锐的眼力。苏轼其人,常把人人当好人,王氏的提醒,实在是非常有必要。可惜,这样的一位贤内助,在27岁的这一年就殂谢了。这对苏轼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第二年,苏轼扶其父苏洵灵柩归葬原籍,王氏也一并归葬。苏轼常常思念他的亡妻。十年之后,他在梦中见到王氏,于是写下了《江城子》这首千古传诵的悼亡词: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上片写梦前,几经转折,将思念亡妻的复杂情感曲曲传出。下片写梦境,以昔日闺中温馨生活小景与久别乍逢的相顾无言映衬,透出无限凄凉。最后回到现实,悬写亡妻墓地凄清幽独情景,以景结情,感怆无尽。通篇真情郁勃,语语沉痛,强烈地表现了词人感人肺腑的伉俪深情。



王弗死后,苏轼续娶王闰之。王闰之是王弗的堂妹,23岁时嫁与苏轼。王闰之贤惠质朴,善于理家,体贴人。苏轼《小儿》诗云:“小儿不识愁,起坐牵我衣。我欲嗔小儿,老妻劝:‘儿痴。儿痴君更甚,不乐愁何为。’还坐愧此言,洗盏当我前。大胜刘伶妇,区区为酒钱。”苏轼正当烦躁之时,孩子来拉扯衣服,苏轼欲呵斥孩子,王闰之相劝,说孩子不懂事,你比孩子还不懂事,一天不高高兴兴的,发愁干什么,并端来酒放到苏轼面前,让他排遣愁闷。苏轼大为感激,觉得他的老妻比起力劝丈夫戒酒的刘伶妻来,实在不知要胜过多少。这个生活细节,颇能体现夫妻性情。王闰之陪伴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被贬黄州的惊涛骇浪,在艰难的岁月里是苏轼的忠实伴侣。苏轼与章子厚书:

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昨日一牛病几死,牛医不识其状,而老妻识之,曰:“此牛发豆斑疮也,法当以青蒿粥啖之。”用其言而效。勿谓仆谪居之后,一向便作村舍翁。老妻尤解接黑牡丹也。言此,发公千里一笑。

信写于黄州,从中能看出夫妻坦然面对艰苦生活的情状。“老妻”之称,不惟口吻亲热,还透出几分幽默与自得。可惜这样一位老妻,不幸在她47岁的这一年故去,苏轼再遭沉重打击,“泪尽目干”,万分悲痛。苏轼在祭文中表示将来“惟有同穴”,后来并履行了自己的诺言。

王闰之死后,苏轼将原为其侍妾的朝云扶为正室。朝云是钱塘(今杭州)人,苏轼39岁作倣州通判时收他为侍女,那时年方12岁。18岁时,苏轼收为侍妾。朝云为苏轼的患难知己,在黄州时,一次饭后苏轼扪腹散步,边走边问身边的侍女:“你们且说说看,这里面装着些什么东西?”侍女们争相回答,有的说肚子里装的全是文章,有的说装的都是巧妙机关,苏轼听后都不以为然。只有朝云最善解人意,说:“学士一肚皮不合时宜。”苏轼听后,捧腹大笑。朝云生有一子,名遁儿。苏轼在遁儿满月举行洗礼时写了一首著名的《洗儿戏作》:

人皆养子望聪明,我被聪明误一生。
惟愿孩儿愚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

结合自身遭际,自嘲中不无沉痛,而对朝中“愚且鲁”的公卿又不无嘲讽之意。不幸的是,在苏轼乘船至九江途中,遁儿夭折,仅活了十个月。朝云哭得死去活来,苏轼也万分悲伤,作了两首悼儿诗,其一说:“吾老常鲜欢,赖此一笑喜。”而今“归来怀抱空,老泪如泻水”。其二则主要写朝云的悲痛:“母哭不可闻,欲与汝俱

亡。故衣尚悬架，涨乳已流床。感此欲忘生，一卧终日僵。”丧子之痛，对朝云的疼爱之情，俱溢于言表。

苏轼被贬惠州，此时王闰之已故去，家有数妾皆相继辞去，独朝云不怕蛮烟瘴雨，陪苏轼远行。在惠州，朝云常为苏轼唱词，以慰苏轼愁肠。但不幸又降临到朝云和苏轼头上，到惠州未及两年，朝云感染瘟疫，竟尔身亡，仅34岁。苏轼在《墓志铭》中，说朝云“敏而好义，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敬若一”，这是对朝云最透彻的理解，也是最崇高的评价。苏轼还写了好几首诗词悼念和怀念朝云，其《西江月》词云：

> 玉骨那愁瘴雾？冰姿自有仙风。海仙时遣探芳丛，倒挂绿毛幺凤。　素面常嫌粉涴，洗妆不褪唇红。高情已逐晓云空，不与梨花同梦。

“海仙时遣探芳丛”，这个“探芳丛”的使者，就是“倒挂绿毛幺凤”。苏轼有诗云：“蓬莱宫中花鸟使，绿衣倒挂扶桑暾。”自注云：“岭南珍禽，有倒挂子，绿毛红喙，如鹦鹉而小，自东海来，非尘埃中物也。”以“海仙”、“幺凤”衬托梅，又以梅喻朝云，赞美了朝云高洁的品格和脱俗的格调，表现了对于朝云深刻的认知和绵长的思念。此后，苏轼未再婚娶。



绵邈深情，在父子关系中也有体现。在陶渊明集中，屡见“弱子戏我侧，学语未成音”（《和郭主簿》）、“好味止园葵，大欢止稚子”（《止酒》）之类的语句，可见儿女绕膝之乐，是他精神的一大慰藉，其爱子之情也溢于言表。陶渊明还写有《命子》、《责子》、《与子俨等疏》等与子女有关的诗文。《命子》诗是为长子俨命名而作，共十章，前六章叙陶氏光荣历史，有夸耀祖先功德以予继承之意，后四章写得子心情及对儿子的希望与告诫。《责子》写得颇为风趣：

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
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
阿舒已二八，懒惰固无匹。
阿宣行志学，而不爱文术。
雍端年十三，不识六与七。
通子垂九龄，但觅梨与栗。
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

从诗中可以看出，陶渊明对家族的荣誉和门第还是重视的，也希望孩子们在“纸笔”上多下些功夫，结合陶渊明本有用世之志的情况，有此想法并不难理解。而诗又以谐谑出之，且对孩子们的不学也未严苛厉责，抱着“天运苟如此，且尽杯中物”的态度，亦可看到其委运自然、旷达乐观的个性。换句话说，陶渊明并未要求孩子们一定要去做什么，一定不能做什么，而是在相当程度上认同、尊重孩子们的个性，让他们自然地去发展，这也是对孩子们的一种爱法。《与子俨等疏》为晚年所作，有遗书性质。陶渊明向孩子们回顾、说明了自己的个性、志趣和爱好，挂念孩子们“柴水之劳，何时可免”，因子俨非翟氏所生，又叮嘱“汝等虽不同生，当思四海皆兄弟之义”，还要他们向古人鲍叔、管仲学习，“分财无猜”，向汉末名士韩元长学习，“兄弟同居，至于没齿”，向晋人氾稚春学习，“七世同财，家人无怨色”。殷殷嘱托，爱子之情，溢于言表。

李白对于儿女也有很深的感情。李白被召入京，特地赶回与儿女相别，《南陵别儿童入京》云：“呼童烹鸡酌白酒，儿女嬉笑牵人衣。”与孩子们在一起时的情景是非常欢快的。李白南北漫游，登山临水，饮酒赋诗，仿佛可以忘掉身外的一切，而对其儿女却是非常惦念的。《送杨燕之东鲁》云：“二子鲁门东，别来已经

年。因君此中去，不觉泪如泉。”有朋友到鲁中去，李白嘱托他去看看稚子伯禽，说：“我家寄在沙丘旁，三年不归空断肠。君行既识伯禽子，应驾小车骑白羊。”（《送萧三十一之鲁中兼问稚子伯禽》）。《寄东鲁二稚子》则想念儿女在东鲁的情景：

吴地桑叶绿，吴蚕已三眠。
我家寄东鲁，谁种龟阴田？
春事已不及，江行复茫然。
南风吹归心，飞坠酒楼前。
楼东一株桃，枝叶拂青烟。
此树我所种，别来向三年。
桃今与楼齐，我行尚未旋。
娇女字平阳，折花倚桃边。
折花不见我，泪下如流泉。
小儿名伯禽，与姊亦齐肩。
双行桃树下，抚背复谁怜？
念此失次第，肝肠日忧煎。
裂素写远意，因之汶阳川。



诗人想像他亲手栽的一棵桃树已长得“与楼齐”，想像小儿女折花倚桃因不见父亲而“泪下如流泉”，想像小儿女“双行桃树下”没有人抚背怜爱，无不充满依依深情，读之不禁令人要为之酸鼻，诗人伟大的父爱在此表露无遗。诗篇想像细密，摹写真切，特别是一对小儿女的情态活现毫端，十分凄楚动人。在浔阳狱中，李白又写有《上崔相百忧章》一诗：“星离一门，草掷二孩。万愤结缉，忧从中催。”读来也颇觉惨切，使人感到诗人的舐犊之情是何等得强烈！

除朝云所生遁儿外，苏轼尚有三个儿子：苏迈、苏迨和苏过。

据《宋史》载,三子“俱善为文”。“乌台诗案”期间,苏轼身陷大狱,全得长子苏迈在身边照应。远流海南期间,则又全得幼子苏过在身边照应。凡生活中所需一切,苏过都锐身打理,一身百为,从不叫苦叫累。到海南不久,苏过写了一篇文章《志隐》,苏轼看过之后,说:“吾可以安于岛夷矣。”苏过后来成为一位诗人兼画家,其志趣才艺,确乎得到了苏轼的真传。

兄弟情深,则陶渊明与苏轼均可称楷模。陶集中有《悲从弟仲德》诗和《祭从弟敬远文》,所咏均为堂弟,所抒皆为至情。陶渊明自己对死非常旷达,但他对于仲德的死却怀着持久而深沉的悲哀。“衔哀过旧宅,悲泪应心零。”“迟迟将回步,恻恻悲襟盈。”何等一往情深!他与敬远志趣相投,曾在一起躬耕,在贫困饥寒的生活中彼此常在一起谈心互勉,感情很深,因此对于敬远之死,也是悲情不能自抑,“感平生之游处,悲一往之不返。情恻恻以摧心,泪愍愍而盈眼”,令人不忍卒读。此外,陶渊明尚有《祭程氏妹文》,说:“谁无兄弟,人亦同生,嗟我与尔,特百常情。”所谓“特百常情”,即百倍于常情,这种既深挚又强烈的感情,也是感人至深的。



苏轼比他的弟弟苏辙大四岁,兄弟二人,自小生活在一起,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苏轼曾有诗说:“我年二十无朋俦,当时四海一子由。”两人性格并不相同,苏轼豪放洒脱,常玩笑戏谑,直言无隐,而苏辙沉稳实际,性情恬静,拘谨寡言。但两人却有相同的政治见解和志趣抱负,既有手足之情,又有同志之爱,一生休戚相关,患难与共。“乌台诗案”发生后,苏辙立即上书神宗,自述得知兄长下狱的消息后,“举家惊号、忧在不测”,“臣早失怙恃,唯兄轼一人,相须为命”,愿“乞纳在身官以赎兄轼,得免下狱死为幸”。后来苏轼结案,苏辙果真被从应天府判官谪往筠州任

酒监。而苏轼被逮入狱后，首先想到的也是他的弟弟。此后宦海浮沉，南北流徙，两人总是相互慰藉扶助，并常相会于梦寐之间。两人书信往还，寄赠诗词，彼此唱和，数十年间从无间断。诗词颇多佳作，仅录诗词各一首如下：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
老僧已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
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和子由渑池怀旧》



水调歌头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水调歌头》



诗作于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苏轼出任凤翔府签判时，是对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一诗的和作。开头四句，形象生动，寄意深沉，富有哲理，耐人寻味，当时就传扬开来，“雪泥鸿爪”更成为后来惯用的成语。词作于神宗熙宁九年(1076)，当时苏轼任密州太守，与苏辙已有七年没有见面，因此“作此篇，兼怀子由”(词前小序)。作者对月抒

怀，含蓄隐约地抒发了谪官居外的凄凉寂寞之情和人生离别的思念之苦，而最后表达对亲人的祝愿，以旷达乐观的情怀作结。前人认为这是中秋词中最好的作品，而这应与抒写了诚挚的兄弟之情不无关系。苏轼临终前，将后事托与苏辙，说："即死，葬我嵩山下，子为我铭。"苏辙执书，哭曰："小子忍铭吾兄！"（见《东坡先生墓志铭》）苏辙在墓志铭中，怀着无比的哀痛，回顾了兄长的一生，对兄长一生的品德功业作了高度评价，最后说："我初从公，赖以有知。抚我则兄，诲我则师。皆迁于南，而不同归。天实为之，莫知我哀。"兄弟深情，可以说是老而弥笃，至死不衰。

# “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



战国时，秦王为了统一中国，从各国广揽人才，六国有不少人到秦国后得到重用。韩国借此机会，派水利专家郑国入秦，帮助秦国兴修水利，企图通过实施开渠灌田的巨大工程以削弱秦国的军事实力，后计谋败露。因客卿入秦而使自己的权势受到影响的秦国宗室贵族，乘机利用这一事件大做文章，大造客卿不可信的舆论，向秦王提出“请一切逐客”的建议。秦王采纳了这一建

议，下令逐客。原为楚人的李斯认为客卿为秦国的不断发展和强盛作出了巨大贡献，不能不分青红皂白地“一切逐客”，于是上书劝谏，写了著名的《谏逐客书》，力陈利害，最后说服秦王撤消了逐客令。李斯在他的上书中，说了两句著名的话，即：“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成其深。”言外之意是，只有像泰山那样不拒绝微小的泥土，像河海那样不排斥细小的水流，才能成就大事业。类似的话，在他书也能见到。如《管子·形势解》说：“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石，故能成其高。”《庄子·则阳》说：“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大。”王充《论衡·别通》篇说：“海不通于百川，安得巨大之名。”曹操《短歌行》说：“山不厌高，海不厌深。”这些话，上可以成为一个国家的大政方针和政策，下可以成为一个人的品德修养。一个人只有肚量大，才能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广泛地采纳别人的意见，才能宽恕别人的错误，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为政者应如此，为学者也应如此，推而广之，凡做人都应如此。

古代有不少人不同程度地做到了这一点。比如曹操，历来被人认为是一个忌刻残忍的人，其实他也有宽容大度的一面，不然他怎能罗致大批人才，扫平众多敌手，统一北部中国。曹操所罗致的人才，不仅济济可观，而且源源不断，不仅袁绍、袁术、刘表等人不能望其项背，即使比之孙权、刘备，他也占有明显优势。曹操能够罗致大量人才，首先在于他有一个积极、真诚的态度。对于一些闻名已久的人才，曹操总是真诚地渴慕，希望有朝一日能罗致到手。人才一旦来奔，曹操总是真诚地欢迎，常有相见恨晚之感。官渡之战中许攸弃袁绍来奔，曹操来不及穿鞋，光着脚匆忙出迎，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重要的人才来奔，曹操都要尽快地亲自接见，询问方略，听取建议，表达对对方的礼敬之意。

尤为值得称道的是，对于那些反对过自己的人，只要转变态度，曹操也能宽大为怀，不念旧恶，并委以一官半职。比如陈琳，在官渡之战前夕为袁绍起草过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历数曹操的种种“罪恶”，其中有的说的是事实，有的说的则不一定是事实。有的说的虽是事实，但不一定就是“罪恶”。比如说曹操的祖父曹腾是宦官，父亲曹嵩是领养的，而曹操则是“赘阉遗丑”，揭曹操的老底，现在看来就有人身攻击之嫌。但在当时，这却是极能伤害曹操的手段。汉代宦官由于数度操纵朝政，残害士人，名声很坏；汉代又看重名第，如此攻击可以说明曹操出身微贱；汉代以孝治天下，骂到父祖，比骂本人在感情上还难以接受。因此，仅凭陈琳这篇称得上是“恶毒攻击”的檄文，曹操就足可以把他杀掉。但是，曹操打败袁绍俘获陈琳后，只责备陈琳说：“卿昔为本初移书，但可罪状孤而已，恶恶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意思是，你在檄文中骂我也就行了，怎么连我的父祖都骂上了呢？陈琳赶紧谢罪，曹操赏识他的才学，就原谅了他，并任命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留在身边使用。曹操这样不念旧恶的例子，还可以举出一些。



北宋·苏轼·江上帖

苏轼《文与可字说》写道：“君子不恶人，也不恶于人。”意思是，君子不讨厌别人，也不被别人讨厌。可以说，苏轼将这当作他的人生信条。苏轼心地善良，坦荡赤诚，胸无城府，不会因个人好恶或恩怨而特别地去亲近谁、特别地去疏远谁或怨恨谁。

苏轼还曾自称“眼前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这虽是极而言之，但苏轼一生不避与任何人交往，能放开双臂接受任何人，能包容任何人，不对任何人怀有仇恨，不对别人加给自己的灾祸耿耿于怀，却用实际行动说明了这一点。苏轼能做到这一点，与曹操还有不同。曹操所做到的主要是宽容，他能做到宽容，既有秉性、品格方面的原因，还有出于政治、政策和策略方面的考虑，而且他不仅有宽容的一面，还有忌刻残忍、小肚鸡肠的一面。而苏轼所做到的主要是宽厚，而且纯由其秉性和品格所决定，是毫无功利方面的考虑的。

苏轼不计前嫌，与王安石等人友善交往，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在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由于政见不合，苏轼屡遭迫害，先蹲大狱，继被远放，甚至曾面临性命之虞。但苏轼对他的对手，却能公平、冷静地对待。苏轼对王安石利用宰相权力，废除以诗赋取士，改为以经义取士，作文过分强调有补于世，偏重政治教化，忽视艺术形式，强迫人们在学术和写作上“同己”的做法是十分不满和厌恶的，曾在《答张文潜书》中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对王安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但另一方面，苏轼又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对王氏之文作了客观评价。苏轼显然认为，王氏之文“未必不善”，只是为文必须多样化，即使是好文章，也不能让大家都来照着写，千篇一律，那样就僵化了。苏轼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有是此非彼，不因反对王安石“同己”而把他的文章也给全盘否定了。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这一点。王安石写过一首吊古抒怀之作《桂枝香》(金陵怀古)，气象苍茫，写景如画，用典无痕，寓慨深沉，既怀古，又警时，

当时被推为“绝唱”。而苏轼也突出地站在了这赞美者的行列之中，他笑称：“此老乃野狐精也。”以嘲谑的口吻，赞美王安石的绝顶聪明竟至到了“精怪”的地步，从而对其作品作出了高度肯定的评价。

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之后，退居金陵钟山之麓，所居房屋仅能遮风避雨，平时或静坐家中读书，或骑一驴游诸山寺，境况颇为落寞。神宗元丰七年(1084)七月，苏轼由黄州贬所转汝州团练副使，舟经金陵，特地去拜访了王安石，王安石恰患病初愈，热情地接待了苏轼。两人在一起留连一月有余，或谈诗论文，或谈佛论禅，或相与唱和，相处得十分融洽。苏轼作有《次荆公韵四绝》，其四云：

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从诗看，苏轼还意欲买田金陵、致仕归隐。王安石看到此诗后，针对“从公已觉十年迟”句说：“十年前后我便不厮争。”意思是，不用谈迟还是不迟的问题。离开金陵渡江至仪真，苏轼还给王安石去了一封信，情辞恳款，很难想像两人曾是政坛上刀来剑往的对手。苏轼确曾打算在仪真买田归隐，而买田归隐的目的之一，是“扁舟往来，见公不难也”，可想见其赤诚。而着重介绍秦观的才德，希望王安石能加以揄扬，则表现了苏轼对后进的爱护，同时也表现了对王安石的信任。

哲宗元祐元年(1086)四月，王安石病逝，这时苏轼正身居中书舍人的高位，奉命草拟了《王安石赠太傅敕》，对王安石一生的学术成就和在政事方面所作出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对其病逝表示了深切的哀悼，虽为代拟公文，实亦反映了苏轼个人的思想和感情。又曾写《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韵二首》，中有句

云："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对王安石人亡势去、门庭冷落的情景表示了叹惋之情。

王安石对苏轼也颇有君子之风。据周紫芝《诗谳跋》载，"乌台诗案"苏轼陷狱时，处境相当危险，王安石没有落井下石，反而明确表态："岂有圣世而杀才士者乎？"从而为保护苏轼出了一臂之力，使之免被戕害。对苏轼的才能王安石也极为佩服，据《苏轼诗集》王文诰注引施注，苏轼在金陵时，王安石多次与他一同出游，曾"叹息谓人曰'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苏轼当时写了《同王胜之游蒋山》诗，王安石赶紧取读，读到其中"峰多巧障日，江远欲浮天"二句时，"乃抚几曰：'老夫平生作诗，无此二句。'"倾心推挹，引为知己。可见，苏、王之交，确为君子之交，之所以成为文学史上众口传颂的一段佳话，绝非偶然。

王安石变法失败后，司马光执政，在为相的八个月期间，苏轼因对尽废新法不满，曾与司马光激烈争论，弄得很不愉快。但司马光死后，苏轼在《司马温公神道碑》中，仍对司马光的才德作了热情的赞颂，认为司马光的可贵之处在于"诚"和"一"，也是能持平守正的一个例子。

最能显示苏轼的坦诚大度的，是他对章惇的态度。章惇原为苏轼的好友，交情甚厚。原曾参与变法，在司马光执政时遭贬。哲宗亲政，意图恢复新法，起用他为相。章惇上台后，虽以恢复新法相号召，但实际上专务派性报复，大量黜逐元祐时期的政治人物，苏轼也被划入旧党一派，以"讥斥先朝"的罪名远贬惠州，连苏轼的好友黄庭坚、秦观、张耒、晁无咎、王巩等也受到牵连。之后，又被贬到更远的儋州。据《舆地广记》载，苏轼在惠州时，作了一首《纵笔》诗："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五更钟。"此诗"传至京师，章惇笑曰：

‘苏子尚尔快活邪?’复贬昌化”。可见,章惇就是要苏轼难受,所以才将他一贬再贬。又陆游《老学庵笔记》载:“绍圣中贬元祐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其字之偏旁也。”竟以其人姓名之偏旁为据确定贬所,尤属荒唐。事实表明,章惇专以报复泄愤为快,品质极为恶劣。

但对这样一个必欲将自己置之死地而后快的人,苏轼竟也抱了宽容的态度。徽宗即位后,章惇自食派争恶果,被贬到与海南岛隔海相望的雷州海康。而苏轼这时却获赦自海南北归。得知章惇遭贬雷州的消息,苏轼没有幸灾乐祸,而是深为关切,好言劝慰。他给章惇的女婿黄师是写信说:

> 子厚得雷,闻之惊叹弥日。海康地虽远,无瘴疠,舍弟(苏辙)居之一年,甚安稳。望以此开譬太夫人也。

他又给章惇的儿子章致平写信。后面苏轼又说到自己的病,说“自半月来,日食米不半合,见食却饱”,说“书至此,困惫放笔,太息而已”。信写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十四日,离七月二十八日病逝只相隔了不到一个半月,重病缠身,却仍勉力写了这一长信,多方对章惇表示关心和慰藉,将自己所遭受的残酷迫害却轻描淡写地说成“出处稍异”,并说“交情固无所增损”,如此胸怀,何等博大!如此品格,何等崇高!苏轼真正将其“不恶人”的人生信条坚守到了生命的最后关头,没有炉火纯青的涵养,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



诚然,苏轼是为自己的坦诚和宽厚付出了代价的。世事险恶,人心难料,就算你“不恶人”,而且自身并没有做错什么,也难保证“不恶于人”,就不遭人迫害,苏轼的遭遇雄辩地说明了这一点。赵翼《瓯北诗话》在赞美苏轼的“襟怀浩荡,中无他肠”之后说他“故邪正不分,而其后往往反为所累”,“其后背而陷之者甚

多”,是符合事实的。苏轼自己对此也并非没有觉察。这除了天性使然外,长期坚守的品格和精神也起了很大作用,不然是不可能始终如一地做到这一点的。

# 八、驰骋文苑　异峰突起



中华民族拥有灿烂而悠久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对于我们的民族素质、民族性格、民族心理、民族精神乃至独特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价值观念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增进我们对祖国悠久历史的了解、增进对中华民族的了解、增强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增强我们民族的凝聚力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对于促进理想的民族品格和个人品格的形成也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每一个龙的传人，

都是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都不可能脱离这个传统而存在，因此，都必须坦然地去面对这个传统，正确地去对待这个传统。对于优秀的传统文化，理所当然地应当加以珍惜，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学习、传承、革新和发扬光大的重任。古代不少仁人志士，在这方面表现得极为出色。他们对祖国的传统文化有着极为深厚的感情，有着极为广博深厚的修养，有杰出的创造才能，有非凡的建树，从而不仅很好地继承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且很好地光大了祖国优秀的文化遗产，显示出了常异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

# 学兼百家，才该众艺



古人历来重视对传统文化的学习。《论语·雍也》载孔子语云："君子博学于文。"意思是，君子要广泛地学习文献。我国有文、史、哲不"分家"的传统，先秦时期尤其如此。一部著作，虽然其主体面目是清楚的，或为历史著作，或为哲学著作，或为政治学著作，或为军事学著作，但往往融史学、哲学、天文学、地理学、农学、医学于一炉。即使是一篇文章，也往往是多种学科内容纷然并陈。后来

学科之间的分野虽然日渐清晰，但文、史、哲不“分家”的情形还是比较突出的，因此孔子提出“博学于文”的主张，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孔子也是这么教他的学生的，《论语·子罕》载颜渊语云：“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意思是说，孔子善于有步骤地诱导我们，用各种文献来丰富我们的知识。对“博学于文”后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如清初学者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解释“博学于文”时说：“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认为从自身修养到国家大事，都是应当关心学习的，可见他所理解的“文”，包括了社会历史和现状，这种认识无疑是对孔子思想的一个发展。

在学习态度、学习精神和学习方法等方面，古人也提出了很多主张，总结了很多经验。如孔子自己的学习态度是“发愤忘食”，对自己的要求是“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主张“学而时习之”，认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要求“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均见《论语》），等等，都对后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其人，所学是极为广泛的。朱光潜《诗论》在论到陶渊明时说：“他摩挲最熟的是《诗经》、《楚辞》、《庄子》、《列子》、《史记》、《汉书》六部分；从偶尔谈到隐逸神仙的话看，他读到皇甫谧的《高士传》和刘向的《列仙传》那一类书。他爱读传记，特别流连于他所景仰的人物，如伯夷、叔齐、荆轲、四皓、二疏、杨伦、邵平、袁安、荣启期、张仲蔚等。所谓‘历览千载书，时时见遗烈’者指此。”说得一点不错。陶渊明自己说：“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则除《诗经》外，他还下功夫学过《论语》、《尚书》、《礼记》、《春秋》、《周易》、《乐记》等儒家典籍，《老子》、《淮南子》等均有所涉足，《穆天子传》、《山海经》、《列女传》

等也时常翻阅。他“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五柳先生传》)，就是追求内心有所感悟，以己意去会通书中的意旨，不在繁琐的章句训诂上下功夫，则是其性情所致，是魏晋玄学家“得意忘言”思想方法的一种体现，是学习方法灵活的一种体现。陶渊明广泛地学习，使他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使他能够博采众家之长融合成自己的心灵，铸成自己的理想品格和诗文创作。

李白很小就在他父亲的督责下开始接受文化教育，而且学习的范围相当广泛，他自己说：“余小时，大人令诵《子虚赋》，私心慕之。”(《秋于敬亭送从侄耑游庐山序》)又说：“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上安州裴长史书》)所谓“六甲”，指用以计算年、月、日的六十甲子，也为神仙方术之一；所谓“百家”，指先秦以来的各类子书，内容涵盖了儒、道、史、法、兵、纵横等各个方面。李白还说他“十五观奇书”(《赠张相镐》)、“十五好剑术”(《与韩荆州书》)、“十五游神仙”(《感兴》其五)，真有广摄博取、来者不拒的味道。李白学习十分刻苦，他自己说：“常横经籍书，制作不倦。”(《上安州裴长史书》)有一个“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的故事，是跟李白有关的。故事说李白少年时在眉州象耳山读书，有次逃学下山，经过一条小溪，看见一个老妇在溪边磨铁杵(舂米的铁棒)，说是要将这铁杵磨成针，李白听后，大受感动，于是立即回到山中用功读书去了。这则故事最早见于南宋人祝穆所著《方舆胜览》，很可能是出自后人的附会，但与李白的好学有关，不是毫无根据的。



李白勤奋、广泛地学习，使他成为一个有着广博学识和多方面才能的人。李白是一个大诗人，而且诗才敏捷，“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是一个书法家，

黄庭坚说他草书的风格"大类其诗"(《题李白诗草后》),前人评其为"字法超放,若游龙翔凤,目所罕见","草法之神,迅如奔雷,疾如掣电,出规入矩,飞舞自得,即使(张)旭、(怀)素见之,亦当掣肘逊避"(《孔尚任诗文集》卷八)。李白善击剑,剑术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李白爱音乐,能鼓琴,能歌舞,其诗常有提及,如《春日独酌》其二云:"横琴倚高松,把酒望远山。"《独酌》云:"手舞石上月,膝横花间琴。"《月下独酌》云:"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杜甫在《赠李白》诗中也说他"痛饮狂歌空度日"。李白还有很好的口才,《开元天宝遗事》记载说:"李白有天才俊逸之誉。每与人谈论,皆成句读,如春葩丽藻,粲于齿牙之下,时人号曰李白粲花之论。"李白出身于中亚碎叶(今巴尔喀什湖南面的楚河流域,唐时属安西都护府管辖),五岁才到四川,又生活在国力强盛、南北文化与中外文化交流极为活跃的盛唐时期,因此他对西域文化和外族文化也都有所吸纳。有人根据范传正《李公新墓碑》中"草答蕃书"一语,认为李白还认识外文,证据虽然不足,但不是完全没有这种可能。



苏轼对传统文化的学习,也涉及到经、史、子、集、儒、道、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他学习非常刻苦,同时讲究方法,他曾说:"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讲求"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还主张亲手抄书,以增强记忆和理解。长期的刻苦学习和多方积累,使苏轼成为一个古今少有的大学问家和通才。王十朋《苏轼诗集序》说苏轼"英才绝识,卓冠一世,平生斟酌经传,贯穿子史,下至小说、杂记、佛经、道书、古诗、方言,莫不毕究,故虽天地之造化,古今之兴替,风俗之消长,与夫山川、草木、禽兽、鳞片、昆虫之属,亦皆洞其机而贯其妙,积而为胸中之文,不啻如长江大河,汪洋闳肆,

变化万状”，所说大率不离事实。

苏轼是一个大文学家，其诗、词、文、赋的创作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北宋·苏轼·南轩梦语帖

苏轼是一个大学者，他对文艺学、美学、哲学、宗教（道教、佛教）、历史学、伦理学、道德学、教育学、民俗学、养生学、医学等都有相当甚至是很深的研究，在许多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苏轼是一个大书法家，从小就勤于练字，后来独辟蹊径，自成轨范。在书法史上，历来以“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苏（轼）”并称，他占有一席；在宋则以“苏、黄（庭坚）、米（芾）、蔡（蔡襄或蔡京）”并称，他居首席。苏轼在世时，随时随地有人恳求墨宝，苏轼的朋友中也有不少人是热心搜集、收藏苏字的。其真墨遗迹，现已成为世界级的艺术瑰宝。在书法理论方面，苏轼也发表了许多独到精辟的见解。



苏轼是一个大画家，善画古木、顽石、丛竹，属文人写意画一派，风格独特。米芾《画史》曾说：“子瞻作枯木，枝干虬曲无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无端，如其脑中盘郁也。”苏轼的绘画理论，在绘画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

苏轼是一个养生学家，写有不少有关养生的文字。他认为长寿的良方是：一、无事以当贵；二、早寝以当富；三、安步以当

车;四、晚食以当肉。主张节制饮食,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认为饮食的要领是:食不可急、每食八分饱、食不求精。这些看法,都有一定道理,至今仍有不少人奉为信条。



北宋·苏轼·墨竹

苏轼在医药方面也颇有修养,有丰富的知识,能自己采药处方。还涉猎炼丹术,对气功也有相当研究。更是一个烹饪学家,很会做菜,“东坡肉”、“东坡鱼”、“东坡鸡”等名菜至今风行海内外。其《煮鱼法》云:“子瞻在黄州,好自煮鱼。其法,以鲜鲫鱼或鲤治斫冷水下,入盐如常法,以菘菜心芼之,仍入浑葱白数茎,不得搅。半熟,入生姜、萝卜汁及酒各少许,三物相等,调匀乃下。临熟,入橘皮线,乃食之。其珍食者自知,不尽谈也。”由此可窥一斑。

此外,苏轼对开凿湖泊河道、治水筑堤、盖房修屋、制墨造酒也颇有心得。又善谈吐,善交际。总之,苏轼是一个全才,要全面地了解苏轼,并非易事,因此曾有人提出“苏学”的建议,即将苏轼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来研究,得到不少人响应。

像陶渊明、李白、苏轼这样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具有多方建树的人,在古代还有不少。比如东汉时的张衡,他“通五经,贯六艺”,对儒家思想颇有研究,对道家、墨家思想也有所涉猎。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写有著名的大赋《二京赋》(即《西京赋》、《东京

赋》)、小赋《归田赋》和诗作《同声歌》、《四愁诗》等。他是著名的科学家,写有著名的天文学著作《灵宪》,创制了候风仪和地动仪,还创制了能自动转向的三轮指南车,仪器的设计和制作都非常精细,在当时居世界领先水平。他还有很高的史学修养,曾要求到东观去修史书《汉记》,可惜未获批准。他还很有政治才干,任河间相时,“治威严,整法度,阴知奸党名姓,一时收禽”(《后汉书》本传),其政绩颇得时人肯定。郭沫若在《张衡碑记》一文中,曾给予张衡很高的评价,说:“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上亦所罕见。”

又如王安石,不仅是一位政治家、文学家,而且是一位经学家、文字学家。他著有《书经新义》、《诗经新义》、《周官新义》,时称“三经新义”。还著有《字说》22卷,其解字方法与现代研究文字学的方法已经颇为近似。有的女性也有超群之才,如比苏轼稍晚的李清照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词人,在金石学、文字学、文物鉴定、书画鉴赏等方面也有很深的功底和造诣,李调元说她“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



学兼百家,才该众艺,没有对祖国传统文化的深厚感情,没有传承祖国传统文化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没有刻苦学习、认真钻研和大胆创新的精神,是绝对做不到的。这本身就是品格、意志和精神的一种体现,而传统文化的精髓,反过来又进一步培育了这种品格、意志和精神。正是靠一代又一代人们的努力,特别是其中优秀人物的努力,祖国的传统文化才得以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并不断有所扬弃、有所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培育了一代又一代的炎黄子孙,铸就了我们特有的民族性格和民族精神。

# 戛戛独造，自成大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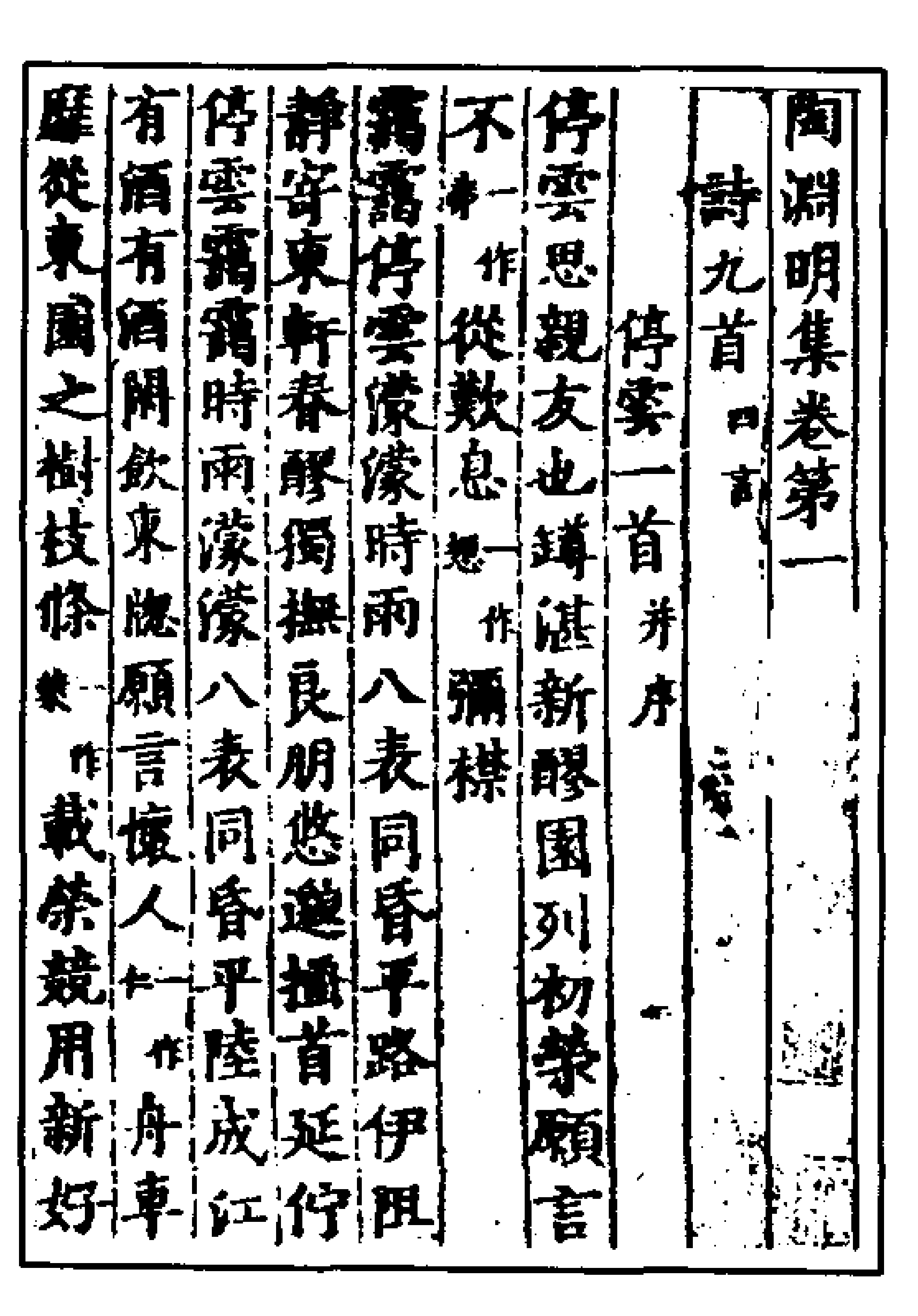
古代诗文是古代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受众之广、影响之大，无与伦比。古代诗文中蕴藏着许多美好的、健康的或有益而无害的东西。诗文中所表现的爱国主义的思想情怀，为真理、为美好理想和信念而不懈追求的精神，对邪恶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忧国忧民的思想感情，热爱祖国河山的思想感情，高尚的道德情操，美好的人格修养，对社会人生的关注，对人生哲理的探求，对亲

情、友情的珍视，对高风亮节、风骨神韵的标举，都有利于净化人们心灵，有利于培育人们健康的情感和健全的人格，有利于推动和帮助人们实现思想的升华、品格的升华，从而使人的生命变得更为充实，使人生变得更有意义和价值。诗文中有不少具有很高美学价值的作品，不仅其思想蕴涵、情感蕴涵是美的，其意象、意境、语言、音韵、结构、风格也是美的，表现技巧、表现手法是精湛的，不少作品具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读之能令人回味无穷。阅读这些作品，不仅能使人们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和快乐，还能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丰富，生活情趣更多样，实现人生的艺术化；还可以陶冶性情，美化心灵，升腾精神，完善品格，加强修养，提高品位。因此，古代诗文对一个人品格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对民族精神、民族性格的形成和发展所起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代诗文作者人才辈出，古代诗文作品浩如烟海。仅以唐宋诗文为例。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收录有姓名可考的诗人2200多家，诗48900多首，经后人辑佚，现存唐诗已超过50000首。其中，李白900多首，杜甫1400多首，白居易3000多首。据清人所编《宋诗纪事》，宋代诗人有3800多人，《宋诗纪事补遗》又增补了3000多人。由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纂的《全宋诗》，共收诗人9079人，诗247183首，残诗5983句(联)，存目323首(句)，所收诗人是《全唐诗》的4倍，诗作是《全唐诗》的5倍。其中，苏轼、杨万里诗各有4000多首，陆游约9300首。今人唐圭璋编纂、王仲闻参订、孔凡礼补辑的《全宋词》，共汇辑两宋词人约1000多家，词约20000多首，其中辛弃疾629首，苏轼362首，刘辰翁354首，吴文英341首。清人编纂的《全唐文》共1000卷，共汇辑唐、五代文章18488篇，作者3042人。之后，又有《唐

文拾遗》72 卷。由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纂的《全宋文》，收录作者达 1 万人以上，收文约 10 万篇，字数达 5000 万字，为《全唐文》的 5 倍。应当说明的是，以上著作虽多号称“全”，有的还经过了大规模的增补，但可以肯定的是，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他们不可能完全收“全”。但同样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从已知的作者和作品的数量看，已经宛若广袤夜空满布的繁星，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不可能与之比拟的。其中，自有许多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自有许多卓有建树的大诗人、大词人、大散文家。他们卓越的成就都值得大书特书，但限于篇幅，这里仅将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这方面的卓异建树和巨大贡献略作介绍。

陶渊明是革新玄言诗风的大功臣。古代诗歌从西晋末、东晋初进入玄言诗的发展阶段。所谓玄言诗，即以体悟玄理为宗旨的诗，而所谓玄言，是指一些关于道家思想的深奥神妙的谈论。玄言诗用抽象的语言来谈论哲理，使诗歌变成了一种枯燥乏味的东西。也有一些从一定的感性形象入手来说理的作品，但往往也带有一些直陈其理的成分。这种玄言


陶淵明集卷第一
詩九首　四言
停雲一首　并序
停雲思親友也罇湛新醪園列初榮願言
不（獲一作）從歎息（想一作）彌襟
靄靄停雲濛濛時雨八表同昏平路伊阻
靜寄東軒春醪獨撫良朋悠邈搔首延佇
停雲靄靄時雨濛濛八表同昏平陸成江
有酒有酒閒飲東牕願言懷人（仁一作）舟車
靡從東園之樹枝條（㯃一作）載榮競用新好

宋刻本《陶渊明集》书影

诗风一直绵延了将近百年，到东晋末刘宋初才开始收敛。开始改变玄言诗风的人物，六朝时一般认为是谢混、殷仲文，但由于他们自己创作的成就有限，因此所起的作用并不突出。真正给

玄言诗风来了个大转变的人是陶渊明。陶渊明生当玄言诗流行的时代，显然是接受了玄言诗的影响的，但从根本上说来，他又是一个具有自己思想和个性的人物，他同当时一般玄学名士的思想和行为模式并不相同，他对玄虚的思辨并不感兴趣，而是将精神上的追求转化成了一种切实的人生态度，与其说他是站在哲理的高度来观察人生，不如说他将对人生的丰富体验上升到了哲理的高度。因此，他在诗中即使是要说理，也多能将哲理化入日常景物，化入日常的生活体验，通过艺术的形象和意境来加以表现，从而彻底改变了玄言诗"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面目，将诗歌推入了一种新的境界、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其贡献是不可小觑的。

陶渊明是田园诗派的开创者，他第一次有意识地将农村生活、田园风光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看待，从而在读者面前展示了一个新的审美领域和新的艺术境界。陶渊明把农村、田园与官场、世俗对立起来，认为朴素恬静的农村、田园是当时世界上惟一的净土，以置身农村和田园为乐，因此在他笔下，几间茅屋，几棵榆柳，一排桃李，几缕炊烟，鸡鸣狗吠，酌酒读书，采菊看山，无不充满了诗情画意，具有了巨大的审美价值。更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在其笔下表现了农耕的主题。作为一个士大夫亲身参加农耕，并用自己的笔写出参与农耕的真切的情景、体验和感受，歌咏劳动给人生带来的愉悦，歌咏劳动的价值，反映劳动的艰苦，陶渊明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人。陶渊明着力发掘并表现了劳动中所包含的美的意趣，劳动生活被当作重要的审美对象进入诗人视野，进入诗歌领域，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第一次。农耕生活自然也有其艰苦的一面，陶渊明自己也实实在在地经历过困厄，甚至到了"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怨诗楚调

示庞主簿邓治中》)和外出乞食的地步,但他能够"贞志不休,安道苦节,不以躬耕为耻,不以无财为病"(萧统《陶渊明集序》),甘处贫困而不丧失操守和气节,并以坚守"固穷"而在精神上得到极大的满足,"被褐欣自得,屡空常晏如"(《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从而实现了人生的完美和崇高。把"固穷"和"安贫"当作一个主题集中加以表现,着力发掘其内涵(包括思想蕴涵和美的蕴涵),表现其对于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这在中国文学史上,也是史无前例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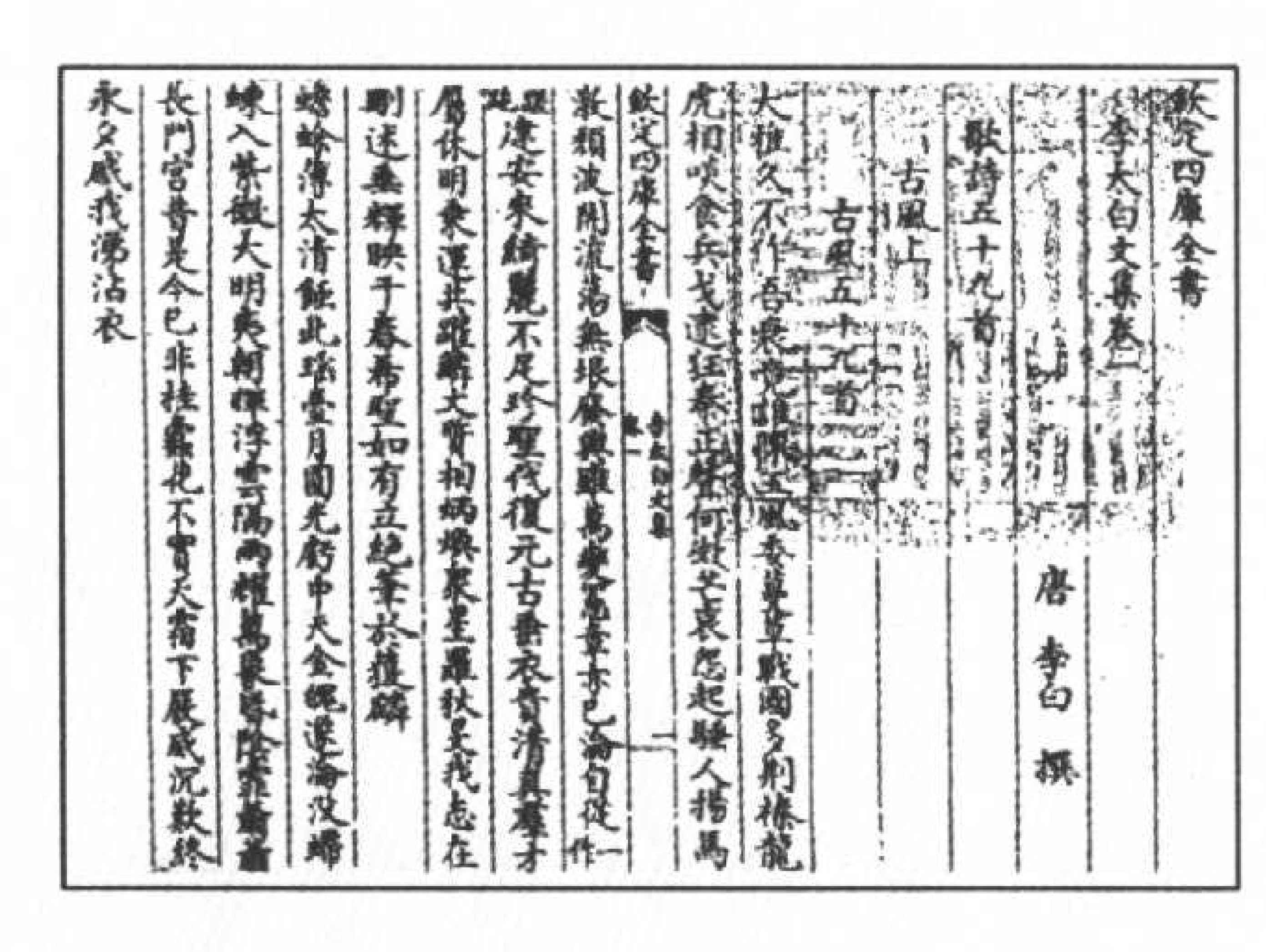
陶渊明创建了一种朴素、自然、淳厚相结合的文学风格。陶诗的风格是朴素自然的,这在诗歌界早有共识。而其风格的淳厚则在苏轼的反复强调之后才引起了人们的充分重视。苏轼《与苏辙书》说:"渊明作诗不多,然其诗质而实绮 ,癯而实腴。"《东坡题跋·评韩柳诗》说:"所贵乎枯淡者,谓其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渊明子厚之流是也。"又惠洪《冷斋夜话》引苏轼语:"渊明诗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皆为超见卓识,不是对陶诗深有会心的人,是绝对说不出来的。陶诗的淳厚,主要表现在诗中充满了情趣和理趣,能于平淡中见深厚、见警策;语言仿佛顺手拈来,略不经意,其实经过了艺术的加工和锤炼,能于平淡中见至味,朴素中见绮丽。能将朴素、自然与淳厚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也是陶渊明的一个独特建树。



陶渊明的辞赋和散文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归去来兮辞》被欧阳修推为晋代文章中最好的作品。《闲情赋》多被认为是一篇写爱情的作品,赋中写"愿在衣而为领,承华首之余芳"、"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等"十愿",从一个重要方面表现了陶渊明思想的大胆、观念的开放和艺术上的创新,曾得到苏轼的热情肯定。《五柳先生传》、《桃花源记》等文平淡深至,耐人寻味,

也具有独特的风格。

陶渊明的诗文，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其诗文所表现的精神、境界、品格和风格，成为许多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厌倦官场之后所回归的领地、所向往的乐土、所陶醉的家园。不少人认为陶渊明的名字足可与屈原、李白、杜甫并称而无愧色，甚至有“古来称诗圣者，惟陶、杜二公而已”（黄子云《野鸿诗的》）这样的说法。宋元以后，陶渊明诗集的版本之多，注释、评论之多确也差不多可与注杜、评杜相埒，不难看出陶渊明的巨大影响。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文集卷二
唐 李白 撰
歌詩五十九首
古風上
古風五十九首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荊榛龍
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正聲何微茫哀怨起騷人揚馬
激頹波開流蕩無垠廢興雖萬變憲章亦已淪自從一作
欽定四庫全書　李太白文集
建安來綺麗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
屬休明乘運共躍鱗文質相炳煥衆星羅秋旻我志在
删述垂輝映千春希聖如有立絶筆於獲麟
蟾蜍薄太清蝕此瑤臺月圓光虧中天金魄遂淪沒螮
蝀入紫微大明夷朝暉浮雲隔兩曜萬象昏陰霏蕭蕭
長門宮昔是今已非桂蠹花不實天霜下嚴威沉歎終
永夕感我涕沾衣

李太白文集

唐诗在中国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是一个最为辉煌的阶段，代表了我国古典诗歌的最高成就，而李白又站在唐诗的最高峰，是唐代少数几位创作个性突出、最具代表性的诗人之一。李白的创作个性，最突出地体现在他的诗歌具有强烈的主观色彩，侧重表现其特立不群的个性、豪迈奔放的气概和高亢激越的情怀。如《行路难》其一：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值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表现诗人政治理想得不到实现的苦闷、抑郁、迷茫、悲愤和

痛苦，同时也表现了诗人的倔强、自信和决不轻言放弃的对于理想的执著追求，展示了诗人力图从人生低谷和苦闷痛苦中挣扎出来的强大精神力量。诗人没有去描写具体的生活历程，没有对具体的事实、事件和客观物象作精细的刻绘，而是抓住自己最为突出、强烈的主观感受，以感情的起伏跌宕为脉络、为节奏，以纵横奔放的气势表现出来。读李白诗，能强烈地感受到他非凡的自负和自信、不肯屈己傲世独立的人格、豪放洒脱的气度、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酷爱自由的情怀。鲜明地表现了这种个性风格的作品，多为诗人最具魅力、最激动人心的代表作。

出于表现内心高亢激越的情怀的需要，李白诗歌常有出人意料的想像和夸张。“黄河之水天上来”，“黄河如丝天际来”，“黄河落天走东海”，“黄河捧土尚可塞”，“白发三千丈”，“飞流直下三千尺”，“燕山雪花大如席”，“连峰去天不盈尺”，“狂风吹我心，西挂咸阳树”等诗句，无不想落天外，奇之又奇，突出地表现了诗人豪迈不羁的个性和超凡脱俗的气概，也极具特色。

与非凡的想像力相关联，李白诗中颇多雄奇壮丽的意象。“抟摇直上九万里”的大鹏，“独宿天霜寒”的凤凰，“连峰去天不盈尺”的险峰，“涛似连山喷雪来”的巨浪，“黄河如丝天际来”的大河，“飞流直下三千尺”的瀑布，以及大漠、沧海、雪山、宝剑等等，无一不是诗人飘逸不群的个性和热爱自由、追求自由的精神的体现。此外，李白诗中也不乏清新明丽的优美意象，其中明月的意象使用得尤为频繁。“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关山月》)“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渌水净素月，月明白露飞。”(《秋浦歌》其十三)“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这些明月意象，使人感受到了李白对光明和纯洁的热爱、追求与向

往，感受到了李白性格和心境中清纯澄净的另一面。

李白独特的艺术个性，在其乐府歌行中表现最为突出。赵翼《瓯北诗话》说："(李白)才气豪迈，全以神运，自不屑束缚于格律对偶，与雕绘者争长。"事实确实如此。由于篇幅可以长短不限，结构可以跳跃多变，句式可以长短不拘，最适合表现跌宕多变的感情，因此李白特别喜欢采用乐府歌行体写作。李白所写的七言歌行，空无依傍，纵横恣肆，变幻莫测，不仅将豪迈不羁的个性和健旺的生命激情淋漓酣畅地表现了出来，也将七言歌行这种诗体推向完美的极致。此外，李白的绝句也写得极为出色，被后人奉为唐人绝句的典范。

李白的文与赋，如《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大鹏赋》等，也颇有纵横之气、狂放之度，能见个性、气度和精神，与其诗一脉相通。

東坡集卷第三十九
神道碑一首
司馬溫公神道碑一首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
風俗一變異時薄夫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為忠
厚人人自重恥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
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懷毒自疑數入為寇
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
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
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

宋刊大字本《东坡集》书影之一(集甲)

李白诗歌所具有的个性魅力、凛然风骨与潇洒风神，在当时就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此后又倾倒了无数的后来人。李白历来与杜甫并称，被推为古典诗歌的最高典范。李白诗歌的艺术个性在中国诗史上是独一无二的，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的诗歌史上，他都享有不可替代的尊崇地位。

苏轼才高学富，多才多艺，在文学上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其诗题材广泛，内容丰富，笔

力雄健，想像丰富，比喻奇妙，风格多样，自成一家，特被称为"苏诗"。严羽《沧浪诗话》认为宋诗的特点是"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学问为诗"，而其始作俑者即苏轼、黄庭坚二人。苏轼注意以景言理、融理入情，并运以丰富多彩的表现手法，因此多数诗作能形象生动，意趣盎然。其写景咏物之作灵动新警，尤具丰采。如《百步洪》其一写水波冲泻的一段：

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
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
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
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
四山眩转风掠耳，但见流沫生千涡。


念奴娇·赤壁怀古

"有如"四句，连用七个比喻来描状徐州百步洪水流的湍急陡险，穷态极妍，淋漓恣肆，蔚为壮观。钱钟书在《宋诗选注》中评论说："他（苏轼）在风格上的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而且在他的诗里还看得到宋代讲究散文的人所谓'博喻'或者西洋人所称道的莎士比亚式的比喻，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的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必现，降伏在诗人笔下。"《百步洪》所用的正是这种典型的写法。鲁迅曾在给杨霁云的信中说："我以

为一切好诗，到唐已经做完，以后倘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事实表明，苏轼是翻出了“如来掌心”的，他创制出了别具一格的宋诗体制，与黄庭坚一起成为宋诗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作者。

苏轼对词体的发展更发挥了关键的推动作用。苏轼之前，诗词分疆而治，所谓“诗庄词媚”，体格各不相同。此前词作，大都遵依“花间”，字句必合音律，多写闺房绣帷之事，呈现绮罗香泽之态，题材狭窄单调，风格柔媚婉约，境界狭深纤美。苏轼却以写诗的精神来填词，“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刘熙载《艺概·词曲概》），举凡怀古、感旧、记游、抒怀、说理皆可入词，并运以雄健清刚之气，还部分地打破了音律的束缚，从而大大地扩展了词境，提高了词品，使词的风格趋于多样化。《江城子·密州出猎》上片写出猎，下片写请战，场面热烈，情豪志壮；《念奴娇·赤壁怀古》上片写壮阔之景，下片通过对雄姿英发的周瑜形象的描绘，抒发渴望建功立业而壮志难酬的感慨，皆有“横槊赋诗”气概，成为豪放词的代表作。苏轼敢于“以诗为词”，从而开创出一种新体“东坡体”，打破了艳科文人词一统天下的局面，促成了词坛多元格局的形成，并直接成为南宋豪放爱国词派的滥觞，影响极为深远。



苏轼的散文和词赋，成就也非常高，在唐宋八大家中，历来以韩、柳、欧、苏并称。其政论文紧密结合实际，颇多切中时弊之论，写法则深受《孟子》、《战国策》和贾谊、陆贽的影响，博采史实，议论纵横，辞锋锐利，析理透辟。其史论文能利用古代史料，翻新出奇，立意超卓，见识独到，古为今用。其杂记类散文题材众多，内容丰富，面目各具，异彩纷呈。其中为楼台亭榭所作的题记数量较多，往往能在记述的同时，寄寓至理、深情和卓识，给

人以艺术的享受和思想的启迪。游记文既不同于柳宗元的侧重描写，也有别于欧阳修的富于情致，而是取二家之长，融事、景、情、理于一炉，《石钟山记》、前后《赤壁赋》皆为脍炙人口的名作。其余小品序跋、传记碑志、书札随笔等，皆能随意挥洒，各臻其妙，体现出作者的胸襟与性情。前人有“韩潮苏海”之誉，苏轼散文题材如此广博，内容如此宏富，形式和风格如此多样，确如大海般一望无际、深不可测。“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苏轼的这番夫子自道，或可视为苏文的总体风格，舒卷自如，曲折尽意，确实是我们读过苏文后的总体感觉。

苏轼的文学创作，代表了北宋文学的最高成就，他理所当然地继欧阳修之后，成为北宋文坛众望所归的盟主。苏轼的诗、词、文、赋无一不对后世产生了深广影响，因此，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少数几位知名度最高的作家之一，成为少数几位在海外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

以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为代表的古代大作家在文学领域的卓异建树，不仅为古代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扬光大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优秀作品也为后人提供了丰厚的精神食粮，在培育一代又一代人们美好的思想情操、高尚的品格气节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可以肯定，古代诗文中的优秀作品，将会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历久弥新，永葆其灿烂的光彩和健旺的生命活力。

# 从平淡自然到自然天成



古代文学风格多样，气象万千，异彩纷呈。明人胡应麟在谈到“唐诗之盛”时说：“其格则高卑、远近、浓淡、浅深、巨细、精粗、巧拙、强弱，靡弗具矣；其调则飘逸、浑雄、沉深、博大、绮丽、幽闲、新奇、猥琐，靡弗诣矣。”(《诗薮》外编卷三)其实，这远远不能概括唐诗多姿多彩的艺术风貌。司空图《诗品》将诗歌风格分成雄浑、冲淡、纤秾、沉着、高古、典雅、洗炼、劲健、绮丽、自然、含蓄、豪放、精

神、缜密、疏野、清奇、委曲、实境、悲慨、形容、超诣、飘逸、旷达、流动二十四类，即使以此来说明唐诗风格，也只能是大致涵盖，仍未能包罗穷尽。唐代有成就的诗人无不具有自己独特的风貌，王勃之婉丽宏放，陈子昂之高峻激昂，岑参之雄劲奇丽，王昌龄之雄浑自然，孟浩然之清新高远，王维之明丽淡逸，李白之雄奇奔放，杜甫之沉郁顿挫，孟郊之凄寒苦僻，韩愈之峻伟奇崛，柳宗元之幽峭明净，刘禹锡之稳练爽朗，白居易之通俗流畅，贾岛之清奇瘦峭，李贺之诙奇诡谲，杜牧之俊爽豪健，李商隐之瑰丽深微，皆独树旗帜，独标其格，决不与他人雷同。加之每一位诗人又都往往具有好几副笔墨，虽以一种风格为主，但又决不仅仅株守一格，这就形成了千汇万状、争奇斗艳、令人目不暇接的局面。诗歌如此，散文、辞赋又何尝不是如此。唐代如此，其他历朝历代又何尝不是如此。

古代文学风格的多样化，是古代文学创作繁荣的一个标志，它满足了人们多样化的审美需要。任何一种成熟的、独特的文学风格，都有其独特的审美价值，都有必要予以重视，加以研究。由于平易自然的风格与平易自然的心灵、性情和品格有关，加之这种风格一以贯之，在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作品中都有突出体现，因此特将这种风格从众多风格中抽出，结合作品作一些剖析。



朱熹云："渊明诗平淡，出于自然。"① 平淡自然是陶渊明诗歌的主体风格，对这一点古今人的认识几乎是完全一致的。其平淡自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内容上看。陶诗所写的都是诗人的亲身经历、真情

① 《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

实感，既不矫情，也不矫饰。陶诗所写的主要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如村舍、鸡犬、豆苗、桑麻等；平淡的农村日常生活，如农耕、读书、饮酒等。田园风光本来就是自然的，农村日常生活本来就是朴素的，诗人的感受本来就是真实、平和的，诗人照实写来，笔下自然会呈露出天然、本色、素朴的气象，形成一种平淡自然的风格。

二是从表现手法看。陶诗多用白描手法，写景如“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记事如“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同前其二），抒情如“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同前其一），议论如“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皆不事渲染烘托，笔法简净而单纯，从而形成了平淡自然的风格。

三是从语言上看。陶诗所使用的语言，多为“田家语”，亦即朴素自然的农村日常语言。如“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归园田居》其一），如“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同前其二），如“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同前其三），如“白发被两鬓，肌肤不复实。虽有五男儿，总不好纸笔”（《责子》），诸如此类，都浅近通俗，明白如话，似不经意，沛然从胸中自然流出。陶诗的语言不是没有锤炼，但其原材料多为寻常话语，不采奇字奥义。虽也有设色，但极为清淡，多为“青松”、“白云”、“玄鬓”、“白发”之类。因此，总体呈现的还是平淡自然的风格，而且在不少情况下，其诗平淡自然的风格还主要是通过语言表现出来的。



四是从意境构造看。由于陶诗抒的是真情，写的是真景，而情与景又都是平淡自然的，因此在陶诗中很难找到奇特的意象和意境，多是平和的、恬澹的、自然的、朴素的。苏轼《东坡题跋》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句说：“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

此句最有妙处。”实际上，陶诗中的不少作品，都是在极自然的状态下“境与意会”的产物。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将“采菊”二句举为“无我之境”的一例，认为“无我之境”是“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既然“我”与“物”都淡到了差不多分辨不清的地步，二者相融所构成的意境，也就只能是“无我之境”，具有平淡自然的特色。

李白诗歌的风格，以雄奇、奔放、飘逸为主，与陶渊明有很大不同。但一些诗又具有真率自然、清丽自然的特点，这与陶诗风格又是相通的。具体表现是：李白诗歌，直抒胸臆，感情真实，不无病呻吟，不吞吞吐吐，不虚伪矫饰。皇帝征召，心里高兴，他就说：“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南陵别儿童入京》）仕途受阻，他就直呼：“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行路难》）对权贵不满，他就公开宣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内心忧愁难以排遣，他就说：“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坚信理想终会实现，他就宣称：“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行路难》）总之，口如其心，毫无遮拦，从而形成了真率自然的特色。



李白诗歌的语言，不少也是朴素平易、明白如话的。如：“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古朗月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非人推。”（《襄阳歌》）“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静夜思》）“两人对酌山花开，一杯一杯复一杯。”（《山中与幽人对酌》）“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把酒问月》）“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早发白帝城》）均不加雕饰，似脱口而出的口语，从而形成了真率自然的特色。

李白诗歌，也常采用白描手法，境界往往自然天成，这都促成了真率自然风格的形成。

李白诗歌具有真率自然的风格，在很大程度上缘自他有意识的美学追求。《古风》其一云："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其三十五云："丑女来效颦，还家惊四邻。寿陵失本步，笑杀邯郸人。一曲斐然子，雕虫丧天真。"在这里，李白对建安以来专务雕琢绮丽的文风提出了批评，对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的做法进行了嘲讽，而提出了"清真"、"天真"的美学标准。李白以此标准衡文、评文，符合此标准的就是好的，反之就是不好的。《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云："览君荆山作，江、鲍堪动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即从"天然去雕饰"的角度，对韦良宰的诗表示了特别欣赏，作出了高度评价。"清水出芙蓉"的境界，清新自然，令人神往。对具清新、清丽风格之美的南朝谢朓，李白尤为钦重。在《李白集》中，对谢朓表示倾慕、赞美、怀念的诗作竟有十余首之多。"解道澄江静如练，令人长忆谢玄晖。"（《金陵城西楼月下吟》）"三山怀谢朓，水澹望长安。"（《酬殷明佐见赠五云裘歌》）皆直言不讳地倾诉了对于谢朓的无尽怀念。谢朓居住过或到过的地方都常引起李白的缅怀，安徽当涂县青山有谢朓宅，李白因仰慕谢朓，悦谢家青山，甚至有终焉之志。李白如此表现，引起了后人的感慨。王士禛《论诗绝句》说："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李白一生傲岸，对六朝诗也不无嗤评，而能对谢朓如此"低首"，原因就在谢朓诗具有"清"的风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送储邕之武昌》云："诸谓楚人重，诗传谢朓清。"一个"清"字，点出了关键所在。可见，李

白是将谢朓引为异代同调的,他的一些作品,特别是一些山水之作,也是有意向谢朓学习,并深得其精髓的。其诗所表现出来的清新自然、真率自然的风格,正是他实践自己美学追求的结果。

自然天成也是苏轼在创作中一以贯之的美学追求。苏轼有不少诗作,特别是其中的山水记游之作,描绘田园风光、农耕生活的诗作,抒发闲适放旷情怀的诗作,具有平淡自然的风貌,而且越到晚期越是这样。苏轼的大量和陶之作,不少能得陶诗神髓。如《和陶拟古九首》其一:“有客扣我门,系马门前柳。庭空鸟雀散,门闭客立久。主人枕书卧,梦我平生友。忽闻剥啄声,惊散一杯酒。倒裳起谢客,梦觉两愧负。坐谈杂今古,不答颜逾厚。问我何处来,我来无何有。”情景真切,感情纯朴,语言朴素,明白如话,具有明显的真率自然的特色。从中不难看出陶诗的一些影子,如“有客扣我门”、“倒裳起谢客”即从陶诗“清晨闻叩门,倒裳往自开”(《饮酒》其九)二句化出。但从根本上来说,苏轼又是在写自己亲历之事,如王文诰所评:“公在海南,真有此种情状,随手拈来,皆古人所不道。”[①] 写亲历之事,抒亲身所感,直接说来,不事雕琢,焉得不真率自然。

苏轼的词,有一部分侧重表现日常生活和朴素感情,也具有平易、纯朴、自然的特色,几首描写农村景象的词尤其如此。如《浣溪沙·徐门石潭谢雨,道上作五首》,其中写到“黄童白叟”、“采桑姑”、“络丝娘”,写到“麻叶”、“苘叶”、“豆叶”、“枣花”,写到“三三五五棘篱门”、“老幼扶携收麦社”、“谁家煮茧一村香”、“村南村北响缫车,牛衣古柳卖黄瓜”,纯为农村人、农村景、农村事,

① 《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案语。

用近乎“田家语”的语言写来，不惟逼真生动，也觉纯朴亲切。像这样的作品，与陶渊明诗的平淡自然实在是可以比肩并美的。

苏轼的一些散文，写得自由随便，也颇具平易自然的特色。如《记承天寺夜游》写道：

> 元丰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作于黄州贬所，写作年、月、日、时皆具，颇似一则日记。颇有意境，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清旷自适心情，但顺次写来，纯任自然，记真事，绘真景，抒真情，确如一则日记的写法。其他散文，特别是杂文、书信类散文，写法大都类此。

苏轼为文，也是强调自然天成的。《答谢民师书》说：“所示书教及诗赋杂文，观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书黄子思诗集后》说：“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虽是评论别人，但实为苏轼的“夫子自道”，从他在《自评文》中说自己是“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即可知。自己主张“自然”、“天成”、“自得”，则其文能具有这种特色，也就不足为奇了。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为文能够平淡自然、真率自然、自然天成，原因可能并不单一，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却是不可忽视的，即他们都具有任真自然的性情和品格。陶渊明作文是任何功利目的都没有的，其《饮酒》诗序云：“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五柳先生传》也说：“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写作既是为了自娱而非娱人，不是为了讨好别人，有求于人，自

然也就不必患得患失、畏首畏尾,不必有所避讳,也不必有所伪饰,是什么样就写成什么样,想怎么写就怎么写,惟以真实恳切、自然天成为上。陶渊明就仿佛一个纯真的孩童,把自己的一片赤子之心捧献给了读者。陶渊明所说的"自娱",主要含义为抒发自我性情,以获得心理上精神上的放松、愉悦。这一点是得到了李白、苏轼的认同的。李白说:"清风北窗下,自谓羲皇人。何时到栗里,一见平生亲。"(《戏赠郑溧阳》)苏轼说:"我即渊明,渊明即我"(《书陶渊明〈东方有一士〉诗后》),"只渊明,是前生"(《江城子》),既包含了对其人的认同,又包含了对其文的认同。而能如此认同,在于他们都有一颗天真纯朴的童心,因此能引为同调,相互景仰、推重。因此,从平淡自然到自然天成,能够一脉贯通的关键就在这里。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将"自然"这一文学风格推向了极致,同时也使"任真"的品格得到了很好的展示和弘扬,这对纠正矫饰文风、抵制虚伪世情是不无好处的。

# 九、哲人风采　魅力永存



古代的仁人志士，在面对着人生和社会时，也在不断地思考着人生和社会，在不断地加深着对人生和社会的认识，并得出了许多深刻的富有启示意义的结论。为了更好地认识自己所生活着的这个世界，更好地适应和改造这个世界，他们也很注意对于物性事理的探求。在探求人生哲理和物性事理时，他们又常用形象的手法来加以表现，常带情韵而行，常与切实的人

生体验、生活体验融汇为一。

对于文学艺术，他们更是发表了许多深刻的具有个人风采和民族特色的见解。他们往往感受敏锐，见解新颖，思想透彻，显示出很好的哲人的眼光和修养，显示出一种既深邃又灵动的哲人之美，具有了启迪智慧、引发思考的永久魅力。

# 对人生哲理的体悟与探求



古代仁人志士，有的自己就是哲学家，或虽还称不上哲学家，但也写过一定数量的哲学论文；或虽没有写过专门的哲学论文，但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对人生和社会作过这样那样的哲学思考。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人在诗、词、赋等文学作品中，也进行积极的哲学思考，许多作品甚至可以看作是一位哲人以诗、词或赋的形式写成的哲学著作。陶渊明、李白和苏轼都写过不少这样的作品。

陶渊明不仅是一位诗人,也是一位哲人,这在学界有相当的共识。1945年陈寅恪在其《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就明确地说陶渊明"实为吾国中古时代之大思想家,岂仅文学品节居古今之第一流,为世所共知者而已哉"。陶渊明对人应该如何保持自然本性的问题,对生死问题、安贫乐道的问题、如何看待农耕劳动等问题都进行过独特的思考,其诗具有浓郁的哲理色彩,将诗人的情趣与哲人的智慧有机地结合在了一起。仅举数首略作分析。

《归园田居》其一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诗人在这里描述了两种境界:一种是非自然的世俗世界,一种是自然的世界。非自然的世界充满了虚伪、污浊、束缚、险恶,是"尘网",是"樊笼";而自然的世界完全没有束缚,一切都呈现出朴素、自然的状态。诗人说自己"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又曾在《归去来兮辞序》中说自己"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因此步入官场后就感觉受到了严重的束缚,就觉得违背了自己的本性,而非脱离官场、回到自然状态中去不可。"复得返自然",摆脱羁束、如释重负的欣喜之情,溢于言表。这里的"自然",与老庄哲学中"自然"的概念是一致的,均指天然、非人为的。王安石《老子》说:"本者,出之自然,故不假乎人之力而万物以生也。"世界上的一切,原本都是自然的。陶渊明本是"自然"之人,有"自然"之性,田园、农村中的景物是"自然"的,又"多素心人"即心地淳朴之人,因此,诗人回到田园、农村,主观情性及其所处客观环境就又都

回到了“自然”的状态,所以他感到特别的高兴。陶渊明在这里所提出的“自然”命题,成为他人生、思想的归依,也成为了他审美的对象,成为了他诗文所表现的主题。

《饮酒》其五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为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县)人,浔阳当水路交通要冲,为浔阳郡、江州治所,相当繁华,陶渊明就隐居在这座城市的郊区,心能静得下来吗?陶渊明在这首诗中对这作了很好的回答:只要心“远”离城市和官场,“地”自然就偏远了。所谓“心远”,就是心不滞于名利,也不与权贵们来往,这样名利即使就在身边,唾手可得,也会觉得离自己很遥远,而不与权贵们来往,门前自然也就不会有车马的喧闹。在“心”与“地”也即主观精神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中,诗人特别强调了主观精神的决定性作用。陶渊明能身处世俗繁杂的包围而不为所动,他的善于坚守的品格起了很大的作用,从这里能特别清楚地看出陶渊明品格的高洁、精神力量的巨大。“心远地自偏”,最能代表陶渊明的人生哲学。“采菊”以下数句,描绘了一幅境与意会、悠然深远的境界。陶渊明说“此中有真意”,这“真意”是什么呢?陶渊明没有具体说明。其实,答案还得从“真”中去找。《老子》第二十一章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庄子·秋水》云:“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真”就是本原、本性也即“自然”。飞鸟晨出而夕还,这乃出之“自然”。人与“南山”也即自然“悠然”冥合,这也合于“自然”。也就是说,这都是“真意”的表现。陶渊明悟出了眼前景象中的“真意”,他想把这一“真意”说出来,但由于人与自然已经冥合一体,主观的意识已不复存在,因此想要说而无可说,也就“欲辨已忘言”了。这是一首具有高

度思辨意味的诗，其理趣的浓郁、超逸和悠远，达到了中国古典诗歌的极致。

《杂诗》其一写道："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分散逐风转，此已非常身。落地为兄弟，何必骨肉亲。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陶渊明认为人和草木不同，没有根蒂，必然会像路上的尘埃一样，随风四处飘转分散。当飘转分散之身如尘埃"落地"时，此身已非旧时之身，凡见面相处在一起的人，就当如兄弟般亲近了。大家相处在一起是快乐的，有快乐就应及时享受，因此要"斗酒聚比邻"。最后归结到岁月易逝，应及时努力，有所作为。诗篇如行云流水，层层递进，转接无痕。而句句包含哲理，句句耐人咀味，深刻地表现了诗人对人生和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理解。

《饮酒》其十七写道："幽兰生前庭，含薰待清风。清风脱然至，见别萧艾中。行行失故路，任道或能通。觉悟当念还，鸟尽废良弓。"兰草的芳香有待清风发扬，清风一来，芳香四溢，与萧艾的区别就一目了然。诗人以幽兰自比，当身处官场时，与小人同列，就如幽兰之与萧艾杂陈。而之所以与小人同列，乃因在人生旅途一时迷失了旧路。但如能"任道"及随自然之道而动，就还能回到"故路"上去。觉悟了就应当赶快回头，否则当权者在除尽异己后，也会倒过来除掉为他们出过力的人。诗篇形象鲜明，寓意深刻。

类似诗作和诗句尚多，如："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中于西田获早稻》）"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余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等等，皆语浅而意深，足可发人深思。

李白《把酒问月》写道：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
人攀明月不可得，月行却与人相随。
皎如飞镜临丹阙，绿烟灭尽清辉发。
但见宵从海上来，宁知晓向云间没。
白兔捣药秋复春，嫦娥孤栖与谁邻。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惟愿当歌对酒时，月光常照金樽里。

康熙帝书
《早发白帝城》

把酒问月，极富浪漫情调，是诗人不羁个性、探索精神的自我写照。诗从月与人之关系、时间与空间的交织中，将对明月的疑问一一写出，塑造出一个美好而又神秘的明月形象，抒发了诗人既旷达豪放而又略显孤独消沉的情怀。“今人”以下四句回环往复，把明月长在而人生短暂之意渲染得淋漓尽致，极富理趣，能启人遐思。像这样包蕴哲理的作品，在李白集中也不少见。如《越中览古》云：“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在今昔盛衰的感慨中，就深寓着荣乐无常的警诫。即如人人稔熟的《早发白帝城》，我们也是能从中感受到世间事物都在发展变化、在一定条件下还会迅速发展变化的道理。

苏轼由于好以议论为诗，因此集中富有理趣的作品尤多。略举数例如下：

《和子由渑池怀旧》写道：“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苏辙《怀渑池寄子瞻兄》中原有句云：“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苏轼和诗，即承“雪泥”引发，变实写为虚拟，以“雪泥鸿爪”喻人生旅程。人的一生，东漂西走，在一个地方停留一下，不就像南飞或北转

的鸿雁偶然从天空落下，在雪泥上留下几处指爪痕迹一样吗？既抒发了诗人对人生飘忽无定的感慨，也表现了诗人对人生无常性的认识。从“哪复计东西”五字，我们还可以体会到诗人坦然跨越过去、敢于奔向未来的热忱，反映了刚跨入仕途的诗人对于人生的清醒认识和积极态度。

《於潜僧绿筠轩》写道：“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俗士不可医。旁人笑此言：‘似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世间哪有扬州鹤？”诗通过物质与精神、美德与美食的比较，说明人生最重要的是精神世界和品格风节。末句“扬州鹤”语出《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赀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欲兼三者”，即欲升官、发财、成仙兼而得之。诗人在这里诘问“旁人”也即俗士：你又想种竹（“此君”）以获清高之名，又想面竹而大嚼美味，想要两者兼得，这就像“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一样，怎么可能！诗人一面赞美了高士，一面诘责了俗士，一褒一贬，态度分明。而理与情偕，议论精警，发人深省。



《慈湖峡阻风》其五写道：“卧看落月横千丈，起唤清风得半帆。且并水村欹侧过，人间何处不巉岩。”以自然界山岩的高险，喻人生道路的高险；又由越过山间巉岩，表达出克服人生道路上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的决心和信心。不仅写出了诗人个人的经历和感受，也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普遍的启示意义。

《病中游祖塔院》写道：“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道人不惜阶前水，借与匏樽自在尝。”“因病”二句，阐明对病的辩证认识及“安心”对于养病的重要性，既表现了诗人的乐观精神，也为天下患病人开出了一剂良方。钱钟书在《论快

乐》一文中，将此二句举为“偏有人能苦中作乐，从病痛里滤出快活来；使健康的消失有种赔偿”之一例，并说：“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最大胜利。”说得一点不错，这正是这两句诗给予人的教益和启示。

除诗中常常包蕴哲理外，苏轼的词也常包蕴哲理。《浣溪沙》云：“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门前的流水尚能向西倒流，人为什么就不能再年轻一回呢？这是不服衰老的宣言，是对青春活力的召唤，表达的是奋发向上的精神，揭示的是只要乐观自信，就能永葆青春活力的人生哲理。《定风波》云：“万里归来年愈少，微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乌台诗案”发生后，王定国受到牵连，被贬宾州（今广西宾阳县南），带歌女柔奴同行。三年后北归，聚会时让柔奴劝苏轼饮酒。词赞美柔奴能对岭南艰苦生活甘之如饴的精神和品格。“此心安处是吾乡”，语出白居易《初出城留别》：“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又《种桃杏》云：“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这里实借柔奴之口，表现了苏轼个人的胸襟抱负，警策隽永，耐人寻味。《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渊源于李白《把酒问月》，藉与明月的对话，探讨人生的意义，既有情趣，又有理趣，更为读者所熟知。



苏轼的赋抒写人生感慨和表现哲理的地方也不少。著名的前《赤壁赋》在消除“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的人生困惑时，就说了一段颇富启示意义的话。作者先以水和月为例，说明“变”中有“不变”的道理。然后从变与不变两个方面，阐述了所谓短暂的人生与永恒的宇宙的辩证关系，即从变的方面看，天地都不能存在一瞬；如果从不变的方面看，万物与我都是无穷尽的，又何必“羡长江之无穷”呢？最后亮出求得人生自满自足的“法宝”：与大自然同在，随遇而安，知足常乐。作者是凭仗着哲

学的“武器”，来摆脱忧患情绪的羁束的，“文学”与“哲学”在这里实现了完美的结合。

从根本上说来，诗、词是用来抒情的，赋主要也是一种写景、咏物、抒情的文体，都不是用来说理的。理与文学，特别是与文学所特有的形象和情趣，就如油之与水，是融合不到一起的。古代有许多说理的诗，或如儒家伦理道德的教科书，或如老子《道德经》的翻版，缺少生机与灵性，读之令人生厌，因此受到不少诗人和诗论家的批评，如钟嵘《诗品》就批评东晋时表现道家思想的玄言诗是“理过其辞，淡乎寡味”，是“平典似《道德论》”，宋人则将枯燥说理的诗称为“理障”。不过，也不能否认，也有不少说理的诗是具有“理趣”的，所谓“理趣”，就是说理而有趣，即作者在说理的同时也兼顾到了诗歌的特点，读者读这样的诗，在领略到哲理的同时也欣赏到了诗歌的艺术美，前面所例引的作品均有这样的特点。陶渊明对人生的哲学思考虽也吸收了先哲的思想资料，但主要是其生活体验的升华，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作抽象的哲理思辨，而是带情韵而行，有生活气息，有真情实感，是情趣与理趣的结合体。苏轼对陶渊明这类作品颇为欣赏，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三曾载有苏轼的一则有关的言论：“东坡拈出陶渊明说理之诗，前后有三。一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曰：‘笑傲东轩下，聊复得此生。’三曰：‘客养千金躯，临化消其宝。’皆以为知道之言。”所谓“知道”，“道”也可以理解为人生的真谛。虽然各家、各人对人生真谛的理解并不一定相同，但很显然，陶渊明对“道”的理解，苏轼是认同的。苏轼在其作品中所表现的理趣，不少也与陶诗相类。当然，苏轼也有自己的特点，从其“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东坡题跋·书吴道子画后》）的主张，就不难看出这一点。

# 对物性事理的求索



物有物性,事有事理。古代仁人志士对于物性事理的探求,不少人很用心,很刻苦。苏轼《净因院画记》云:“山石竹木水波烟云,虽无常形,而有常理。”《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云:“独专山水乐,付与宁非天。三百六十寺,幽寻遂穷年。所至得其妙,心知口难传。”这种对物有性、事有理的明确认识和穷幽极胜、不“得其妙”决不罢休的精神,是颇有代表性的。于是,不少看似平易,实则寓有

深意的笔墨，就频频地出现在他们的毫端，如："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谁挥鞭策驱四运，万物兴歇皆自然。"（李白《日出入行》）"流而不返者，水也；不以时迁者，松柏也。言水而及松柏，于其动者，欲其难进也。万事不移者，山也；时飞时止者，鸿雁也。言山而及鸿雁，于其静者，欲其及时也。"（苏轼《送杭州进士诗序》）"公亦何为，视民所宜。有莠则除，有疾则医。"（苏轼《祭司马君实文》）这些笔墨，不断地深化着人类对于物性事理的认识，同时也给人们提供了众多的耐人咀味的精神食粮。

松柏傲霜斗雪，经冬不凋，最易引起人们的注意。陶渊明也喜欢用松柏自比，如《饮酒》其八："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严霜殄异类，卓然见高姿。连林人不觉，独树众乃奇。提壶挂寒柯，远望时复为。吾生梦幻间，何事绁尘羁。"前四句是对孔子"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的诗化，"连林"二句，进一步突出古松的高拔不群。"提壶"二句，诗人与孤松同现，互为映衬。最后二句，抒发感慨，写出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写出在道德沦丧的社会中坚守品节的不易。前面明写孤松，暗写自己，后面变暗为明，人松互映，高节毕现。陶渊明作品中写到松柏的地方还有不少。《归去来兮辞》云："三径就荒，松菊犹存。""景翳翳以将入，抚孤松而盘桓。"《和郭主簿》其二云："芳菊开林曜，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其四云："栖栖失群鸟，日暮犹独飞。徘徊无定止，夜夜声转悲。厉响思清远，来去何依依。因值孤生松，敛翮遥来归。劲风无荣木，此荫独不衰。托身已得所，千载不相违。"这里不仅写到孤松，还写到了菊，松与菊，都是诗人情志品节的写照。还写到孤鸟，孤鸟也是诗人自我形象的化身，而孤鸟栖息孤松，托身得所，千载不相违，则表现了诗人与高尚品格彼此契合、坚守终身的信念。

苏轼《题西林壁》写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远近高低各不同”,即从远处看、近处看、高处看、低处看所看到的庐山各不相同。为什么会这样呢?“只缘身在此山中”。读后自可从中获得启示:对同一事物,站在不同的角度、立场看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对任何事物,如果看不到全局,不明真相,就可能把局部当作全局。而作为当事人,如果你不能总揽全局,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你就可能误把局部当作全局,所谓“当局者迷”,就是这个意思。因此,对事物必须全面观察,总体把握,力戒片面性。诗人在这里实际是以具体的、特定的、有限的庐山,表现了抽象的、一般的、无限的哲理。

苏轼《惠崇春江晓景》写道:“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这是一首题画诗,惠崇是一位能诗善画的僧人。诗既点明了画面,又跳出了画面,使人能于画外见意,受到启迪。单是“春江水暖鸭先知”一句,就能让我们想到“实践出真知”这一道理。早春时节,江水开始由凉变暖,但开始的变化是非常细微的,一般人根本感觉不到。对这一细微的变化拥有发言权的,自然莫过于鸭子。鸭子常游水中,它对水温的感觉最为直接,最为敏锐,它能在第一时间感觉到水温的变化,它能通过对比感觉出水温的变化。因此,“鸭先知”虽为推测之辞,却有着实实在在的依据。春江及江面上浮游的鸭子虽为画面本有之物,但“水暖”、“鸭先知”却是诗人独特的发现和创造,为画面增添了更多的内涵、更独特的机趣。

苏轼此类作品尚多。如《次韵子由岐下诗·鱼》云:“湖上移鱼子,初生不畏人。自从识钩饵,欲见更无因。”《雍秀才画草虫八物·蜗牛》云:“腥涎不满壳,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回,竟作粘

壁枯。”初生的小鱼心地单纯，不知道怕人。一朝忽被钩饵所欺，便长了见识，躲得远远的，再也见不到它的踪影了。蜗牛“腥涎不满壳”，仅够湿润自己的身躯，可它却要拼命地往上爬，最后枯死在墙壁上。两诗均能让我们联想到某些社会现象，寓有深意。

对物性事理的求索，成为许多诗人的癖好，或有意为之，或不经意为之，往往能臻于妙境，达于至味。仅举数例如下：

王之涣《登鹳雀楼》写道：“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即景生意，运用朴实而形象的语言深刻地说明了两点哲理：一是要站得高才能看得远，二是要达到更高的目标，就必须不怕困难，勇于攀登。情、景、理、事妙合无垠，语浅而意不浅，耐人寻味。

白居易《大林寺桃花》写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转入此山来。”大林寺在今江西庐山牯岭附近，为佛教胜地之一。本诗采用拟人化写法，把“春”既写得十分形象美丽，又十分顽皮可爱，表达出诗人的一片爱春、惜春之情。同时，又寓哲理于平易之中，形象地说明事物的发展是有不平衡性和差异性的，我们要正确地认识事物，就必须要有辩证的观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以偏概全，搞一刀切。这是一篇立意新颖、富有幽默感和涵蕴的作品。

杨万里《过松源晨炊漆公店》其五写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错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出一山拦。”诗写山行中的体验和感受，而这种体验和感受又具有某种典型性，容易让人联想到生活中的类似现象：人们在完成某项比较艰巨或艰难的工作后，往往以为后面的工作就不再艰巨或艰难了，因而放松警惕，盲目乐观，殊不知后面还有新的困难在等着我们。诗人提醒我们：人生的道路是不平坦的，越过了一座高峰，前面还会

有另一座高峰横亘在前进的道路上,需要我们去攀登;人生的历程就是一个不断攀登跨越、不断克服困难的历程。以质朴通俗、幽默风趣的语言,讲出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颇耐玩味。

陆游《游山西村》写道:“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诗篇描绘、渲染出丰收之年农村一片安宁、欢悦的气象,表达了对于淳朴民风的赞赏之情。三、四句写信步走在山间水畔所看到的景色和所产生的感受,读后能给人以深深的启迪,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我们在学习和工作中,在研究问题和钻研学问时,有时也会产生前路迷茫、甚至再也无法进行下去的感觉。但是,如果坚持不懈,往往也会终于找到解决问题的关键,顿时豁然开朗,让人兴奋不已。因此,当我们在学习、工作中碰到困难时,千万不要轻言放弃,而要发扬锲而不舍的精神,促使情况发生转机,迎来前所未有的新天地。两句诗包蕴了世间事物消长变化的哲理,其意义远远超出了自然景物描写的范围。



朱熹《观书有感》其一写道:“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不看诗题,一定以为这是一首写景诗。但从诗题看,却是要说感想、讲道理、发议论的。实际上,这就是一篇形象的读后感,全诗的内容都是跟“书”有关的:半亩方塘就像一面打开的明镜,这是形容书的,一本打开的书,内容新鲜、生动,因此给了作者这样的感觉。书中的内容丰富多彩,就像“天光云影”在方塘中徘徊一样。书中的内容为什么能这样清新、这样给人以全新的感觉呢?因为它反映的是新鲜的知识,谈的是新鲜的见解,不是老生常谈,就像

方塘有“源头”源源不断地为它输送“活水”一样。单从景物描写的角度说，这也是一首好诗，而它在景物描写中还蕴涵着耐人寻味的理性的东西，让人读后懂得了不断总结新经验、了解新情况、吸收新信息的重要性，因而更是一首好诗了。

探求物性事理的诗，一般都有这样一个特点：诗人能将所说之理包蕴在具体的生动的形象之中，用形象来加以表现。读者阅读这样的诗，首先感知的是形象，进而体味到的是包蕴在形象中的哲理，因而不仅不觉得枯燥乏味，相反觉得意味深长。很多情况下，作者也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在诗中说理，而是因眼前情景触发，悟到了某些哲理，才“顺便”在诗中加以表现的。像王之涣写《登鹳雀楼》，可能在主观上就自始至终都没有想到要说理，而是不期然地在其描写中包蕴了哲理。以上例举的作品，可能只有朱熹的《观书有感》一开始就明确是要发议论、讲道理的，但这首诗也颇具形象性，可见朱熹深知在诗中说理必须具有理趣的重要性。因此，诗人们一般都善于从日常生活人们习见的景象和现象中，敏锐地去发现和感悟，然后将这种发现和感悟表现出来，可以说是妙手偶得，并非刻意搜求。当然，这要求诗人要有高度的品格修养、深刻的思想和敏锐的观察力，否则，所发现和感悟到的东西可能就会是没有价值、没有新意的，甚至根本就不可能有所触动、有所发现，就跟一般人一样，见多不怪，无所收获。袁枚《遣兴》云：“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没有“解用”的功夫，这“绝妙词”是绝对写不出来的。

# 对艺术辩证法的思考与阐释



我国的文学艺术,历史悠久,门类众多,内容丰富,艺术形式和风格多样,因此文艺理论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其基本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是内容丰富。有文论、画论、书论、乐论、舞论、戏剧理论等种种门类,各门类还可以再分,如文论中,又可以分为文(散文、骈文)论、诗论、词论、曲论、赋论、小说理论等。所论内容,涉及作家、作品、思想、艺术、渊源、影响、创作规律等众多

方面。

二是形式多样。既有专著、专论，也有序跋、评点，还有散见于诗、文、小说、笔记及其他应用文（章表、书信、碑刻等）中的见解。既用散文（含骈文）体写作，也用其他形式特别是诗（甚至是抒情诗）的形式写作。诗话、词话、曲话等作为宋元以来我国文艺批评的主要形式，则是介于诗论、词论、曲论和笔记之间的一种漫谈式的随笔，数量甚多，影响也颇大。

三是我国古代文论中的许多命题、概念、范畴如"气"、"神"、"韵"、"味"、"风"、"骨"、"体"、"势"、"格"等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显示出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追求。许多对应的概念充满了艺术的辩证法，如奇与正、幻与真、文与质、自然与雕琢、雅与俗、虚与实、形与神、静与动、文与道、心与物、情与景、通与变等。

四是文艺理论家往往与作家、诗人、画家、书法家、音乐家、戏剧家的身份集于一身，因此他们往往喜欢用具体可感的形象、生动的语言来评论作家作品，揭示创作规律，说明艺术风格，与单纯抽象的说理迥异其趣。如钟嵘《诗品》评范云、丘迟诗曰："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似落花依草。"张怀瓘《书断》评王献之行草书云："兴合，如孤峰四绝，迥出天外，其峭峻不可量。"即为其例。因此，偏重于鉴赏的理论在中国古代文论中显得颇为发达。



从上述情况不难看出，古人对于文学艺术的探讨是何等的热情，所取得的成就是何等的巨大，所形成的特色又是何等的鲜明。详细情况难于尽述，下面仅将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这方面的贡献略作介绍。

陶渊明没有专门论及文艺的诗文，但这不等于他就没有文

艺思想。从他"性本爱丘山"、"质性自然"的自我宣示,从他在诗中一再提到"真想"、"真意"、"真风"、"含真"、"任真"、"养真"等概念,不难看出他具有摒弃浮华、崇尚自然的美学思想。陶渊明的作品,全为"真在内"而"神动于外"之作,朴实自然,充分地体现了他崇尚自然的文艺思想。

李白《古风》其一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又孟棨《本事诗》载李白语:"梁、陈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欤?"可见,李白对建安之后、梁陈时期绮艳浮薄的文风是非常不满的,他要恢复梁陈以前淳朴、清新、自然的文风,担当起改革诗风的重任。他所崇尚的,是建安诗歌的风骨,是南朝齐谢朓诗清新秀美的风格(《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中间小谢又清发。"),是谢灵运所写出的"池塘生春草"这样的特别清新自然的诗句(《送舍弟》:"他日池塘一梦君,应得池塘生春草。"),是他的朋友韦良宰所写出的如"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诗作(《经乱离后,天恩流夜郎,忆旧游书怀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此外,李白对屈原的作品也给予了崇高的评价。《江上吟》说:"屈平辞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在《泽畔吟序》中,李白又指出时人崔某,由于遭际与屈原相似,因而所作"逸气顿挫,英风激扬,横波遗流,腾薄万古",间接地赞美了屈原诗风。可见,李白诗歌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和清新自然的风格,实在是其来有自。李白的文艺思想,不仅直接指导了他的诗歌创作,还对当时的诗歌革新运动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李白刚离世不久,李阳冰就在其《草堂集序》中说:"卢黄门(卢藏用)云:陈拾遗(陈子昂)横制颓波,天下质文,翕然一变。至今朝诗体,尚有梁、陈宫掖之风。至公(李白)大变,扫地以尽。"李白对诗歌革新作出了巨大的贡

献，他圆满地完成了自许的“将复古道，非我而谁”的重任。

苏轼的文艺思想，内容丰富多彩，以下几点最为引人注目。

关于文与道的关系问题。苏轼推崇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潮州韩文公庙碑》），主张文艺要有充实的内容，要切合现实，针砭时弊，对社会有用。在《题柳子厚诗》中，就直接强调“诗须要有为而作”。苏轼自己的文字，特别是那些政论文和反映现实的诗篇，很好地做到了“有为”，如苏辙在《东坡先生墓志铭》中所说，是“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的。不过，苏轼对“道”的理解并不偏狭，他并未将“道”仅仅理解为儒家思想，仅仅理解为政治，他实际把“道”的内涵扩展到了社会生活、自然和文艺的各个方面。此外，他对“文”也非常重视，在《答谢民师书》中引欧阳修的话说：“文章如精金美玉，市有定价，非人所能以口舌定贵贱也。”又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则疑若不文，是大不然。”在《与王庠书》中说：“‘辞达而已矣’，辞至于达，止矣，不可以有加矣。”表示赞同孔子“言之不文，行而不远”的主张，并对“辞达而已矣”提出了自己的理解，认为“辞达”并非只求通达，不要文采，认为真正的“辞达”，是达到了语言艺术的最高境界的。苏轼强调了“文”与“道”的有机结合，他自己在创作实践中颇为注意这两者的结合。



关于自然与雕琢的问题。苏轼崇尚自然，反对雕琢。他在《谢欧阳内翰书》中，赞成朝廷“罢去浮巧轻媚丛错采绣之文，将以追两汉之余，而渐复三代之故”的举措；在自评其文时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在《答谢民师书》中，赞扬“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之文，都是这种文

艺思想的体现。这种文艺思想,是与陶渊明、李白一脉相承的。

关于形与神的问题。在古代文论中,有所谓形似、神似的概念。苏轼论画论诗,都是贵神似而对只具形似不以为然的。《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其一说:“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意思是,论画如果只以形似为标准,那见识就跟儿童差不多;写诗如果只知道对对象作具象的描摹,那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诗人。要怎样才能做到神似呢?苏轼认为应首先抓住特点,抓住最能显示对象精神、神韵的地方予以重点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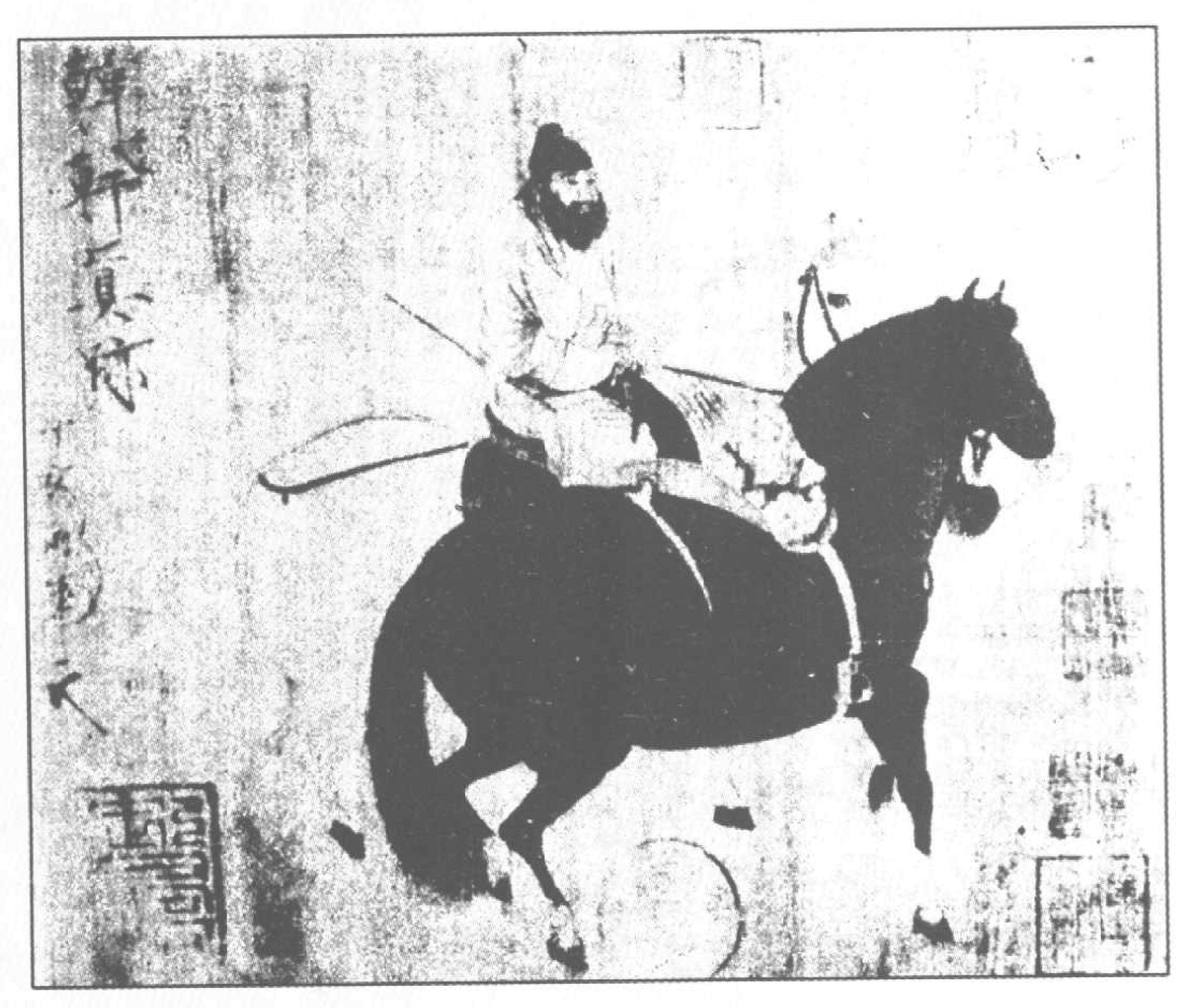
东晋画家顾恺之,字长康。《世说新语·巧艺》载:“顾长康画人,或数年不点目睛。人问其故,顾曰:‘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阿堵”,犹言这个、那个。苏轼对顾恺之的做法颇为首肯,认为画人物必须抓住“传神”的关键,画好眼睛、颧骨、面颊即“意思所在”。所谓“意思所在”,即能体现出人物情态神韵的特征所在。除此之外,苏轼还主张总体把握对象,在创作前成竹在胸,创作时一气呵成,这样方可把对象的神韵表现出来。其《文与可画篔簹谷偃竹记》认为,竹子刚出土时,只有一寸的嫩芽,但竹节和竹叶已经具备了。从节痕如蝉腹、蛇鳞般的新笋,长到挺拔数丈,都是生来就具备的。也就是说,竹生来就是一个整体,因此在画竹时,也不能在画幅上一枝一叶地去拼凑,而应当整体地去感知和表现。

由于强调神似,苏轼对晚唐司空图在《与李生论诗书》中所提出的“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在《与极浦书》中所提出的“象外之象,景外之景”及其《二十四诗品》就有了较多的认同。其《书黄子思诗集后》云:“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

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所谓“三复其言”，就是再三体会他的见解。所引司空图语，皆出自《与李生论诗书》，主旨在说明诗要有弦外之音，要言有尽而意无穷。此外，苏轼在《送参寥诗》中说：“咸酸杂众好，中有至味永。”在《评韩柳诗》中对“外枯而中膏，似淡而实美”表示肯定，表达的都是同一意思。

当然，苏轼贵神似，不等于完全排斥形似。苏轼评自己的文字是“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在《子由新修汝州龙兴寺吴画壁》诗中，更对“细观手面分转侧，妙算毫厘得天契”这种细节的真实表示赞赏，都说明苏轼对形似是并不忽视的。他所追求的，从根本上说来，还是形与神的统一，具象与抽象的统一。





唐·韩干·双马图

关于诗与画的关系问题。苏轼是诗人，又是画家，他对诗画的共同性有着深刻的理解，对此也有深入的阐释。《韩干马》云："少陵翰墨无形画，韩干丹青不语诗。"《书摩诘蓝田烟雨图》云："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云："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欧阳少师令赋所蓄石屏》云："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确实，诗与画虽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两者确有不少相通的地方。一些诗画兼擅者，更是有意将两者沟通起来，彼此借鉴，各臻胜境，王维、苏轼就是这样的人。苏轼评王维"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就高度概括了王维诗画互补的特色，实际上也概括了一切优秀的诗画作品所共有的特色。所谓"诗中有画"，就是诗中具有绘画般的意境；所谓"画中有诗"，就是绘画中具有诗的情趣。要达到这种胜境，诗人就必须尽力吸取画家绘画创作的艺术经验，把在绘画中必须掌握的线条、色彩、层次、动静、光感、角度乃至透视原理等创作经验、表现手法和表现技巧运用到诗歌创作中，从而使诗歌也具有线条美、色彩美、构图美、空间立体感和画面的冷暖明暗感，总之一句话，具有绘画的美感。画家也必须尽量从诗人那里吸取诗歌创作的艺术经验，使绘画尽量摆脱受有限的时间和空间束缚的缺陷，吸取诗歌情融于景、情景交融、驰骋想像、富有余味的长处，使绘画在有限的画幅中具有更多的包蕴。苏轼关于诗画关系的论述，总结了前辈诗人画家的创作经验，总结了个人赋诗作画的心得，对后来的诗画创作和诗画理论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关于风格问题。苏轼《答张文潜书》说："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于好使人同己。"《答王庠书》云："今程式文字，千人一律，

考官益厌之。"《书黄子思诗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不难看出,苏轼是主张风格的多样化的,任何一种成熟的风格,都具有美的价值,苏轼都是肯定的、欣赏的,苏、李、曹、刘、陶、谢、李、杜正因为有了各自独特的风格,才得以自立于诗人之林,才得以被视为大家。也因为有了这么多独具风格的诗人,诗坛才形成了创作繁荣、绚丽多彩的局面,才得以满足历朝历代人们多种多样的审美需要。苏轼是反对风格单一的,更反对强人就我的做法。而苏轼自己,其风格也是多样的,清旷放逸、平淡自然、豪放纵恣皆有之,而"高风绝尘"则是其最高的审美追求,这种追求,也是反映了苏轼的人生态度和人生理想的。

总的来看,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文艺思想丰富了我国古代文艺思想的宝库,其中的不少思想闪耀着辩证法的光彩。天下一切事物都充满了辩证法,艺术当然也不例外。辩证法属于哲学的范畴,对于艺术辩证法的思考、探求和阐释,也时时闪耀着哲理的光彩。还值得注意的事,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文艺思想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所使用的"真"、"淳"、"清"、"枯"、"膏"、"淡"、"味"等概念,都凝聚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情趣,体现了中华民族独特的审美追求,对创造性地推动具有民族特色的文艺理论的发展,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 十、儒道玄佛　博采兼收



特有的文化传统和思想传统，对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中尤以儒、道、释诸家的影响最为突出。由于儒、道、释诸家相互间是有矛盾、有斗争的，而另一方面彼此间又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因此它们对古代文人所产生的影响极为错综复杂。其中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影响，是对文人总体人生态度、人生道路和人生哲学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

可以用《孟子·尽心上》中的两句话“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来概括。

古代文人又往往能从现实的需要出发,对各家思想有所取舍,有所改造,有所发展,因此虽出入于各家思想,却能主儒术而不迂,杂佛老而不溺,融汇众长,推陈出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方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精神世界、深厚的品格修养和高远的人生追求,从而达到了崇高的思想境界和精神境界。

# “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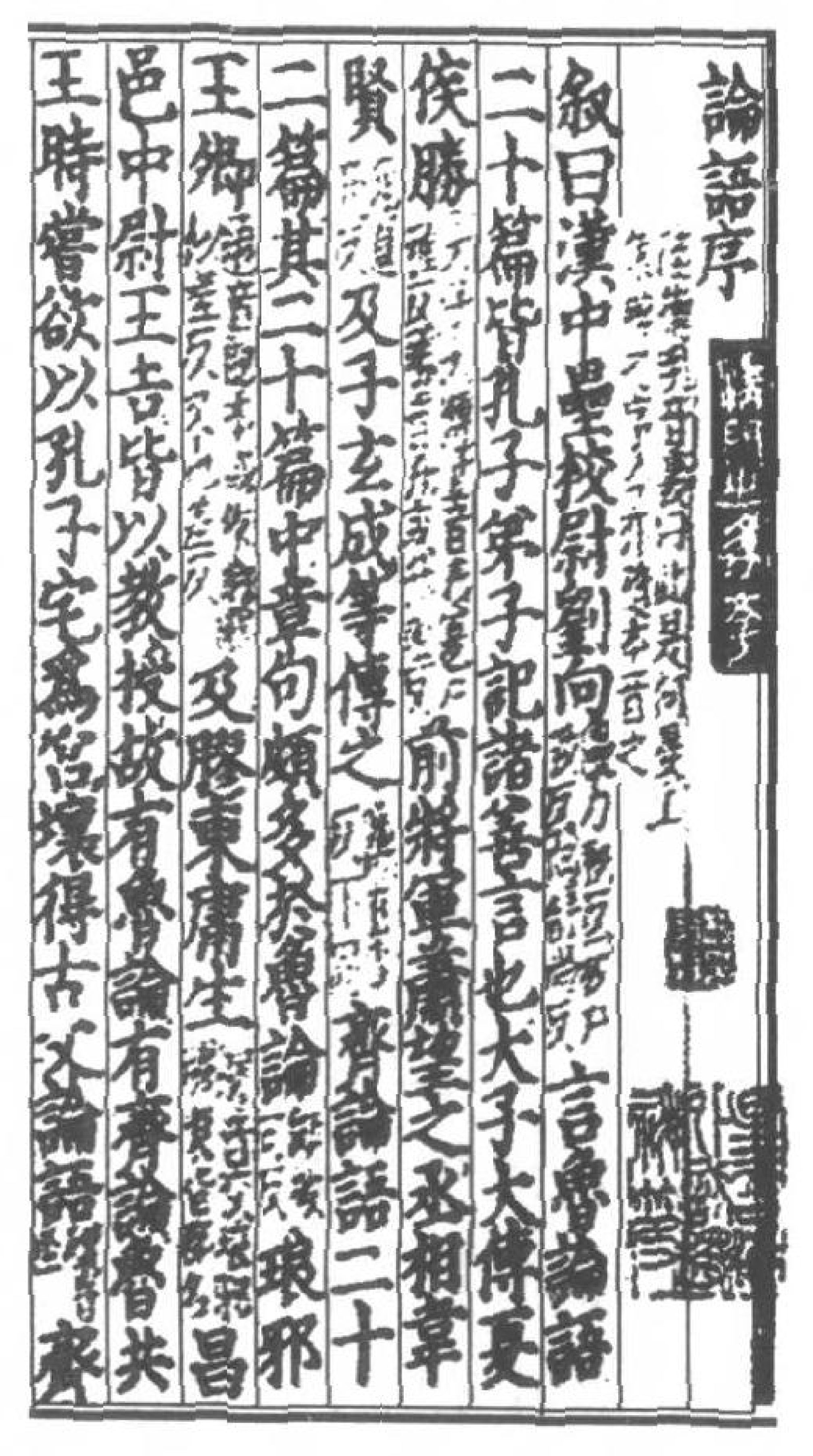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早在先秦时，就已被称为“显学”，在诸子百家中地位最高，影响最大。西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此儒家思想更成为整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东汉末年，由于经学思想日趋僵化，由于统一的中央政权的解体，由于道家玄学思想的冲击，儒学曾一度趋向衰微，但仍保持着强大的生命力。最高统治者从维护皇权的需要出发，大都仍以儒

学为正统思想，一般的大臣文士也都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就连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统治者，为了在中原地区站稳脚跟，也都认定儒学是最为有效的思想武器，因而无一例外地注意提倡和保护儒学。因此，历来儒家思想对文人的影响最大，对文人思想性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对生命的意义和价值总会有自己的看法。《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到晋国去，范宣子向他请教古语"死而不朽"的含义。叔孙豹未即作答，范宣子就谈了自己的看法，认为从前匄的祖先，从虞舜以上是陶唐氏，在夏朝是御龙氏，在商朝是豕韦氏，在周朝是唐杜氏，在晋朝主持中原的盟会时是范氏，世代相传，"死而不朽"说的恐怕就是这个意思。叔孙豹不同意他的看法，认为这只能叫"世禄"。那么真正的含义是什么呢？叔孙豹说："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认为"不朽"有三方面的表现：最高的是树立德行，其次是树立功业，再其次是树立言论。这就是著名的"三不朽"说，代表儒家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看法，代表了儒家最高的人生理想，也代表了古代士人最高的人生理想。



人活一世，儒家认为最应追求的是品德。品德当然有特定的阶级和时代的内容，孔子和孟子强调得最多的，有仁、义、礼、智、信、道等等。据杨伯峻《论语译注》和《孟子译注》的统计，在《论语》中，"仁"一共出现了 105 次，"义"出现 24 次，"礼"出现 74 次，"知"出现 116 次(其中同"智"25 次)，"信"出现 38 次，"道"出现 60 次；在《孟子》中，"仁"一共出现了 157 次，"义"出现 108 次，"礼"出现 64 次，"智"出现 31 次，"知"出现 112次(其中同"智"3 次)，"信"出现 30 次，"道"出现 140 次。在实词中，出现的频率要算是最高的一部分，且所使用的词义，绝大多数都与品德有


論語序
叙曰漢中壘校尉劉向言魯論語
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記諸善言也大子大傅夏
侯勝前將軍蕭望之丞相韋
賢及子玄成等傳之齊論語二十
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頗多於魯論琅邪
王卿及膠東庸生昌
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魯論有齊論魯共
王時嘗欲以孔子宅為宮壞得古文論語

宋代刻本《论语》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梁惠王章句上　凡有七章
趙氏註　孫奭疏

宋代刻本《孟子注疏解经》



关。与品德修养有关的“君子”一词，出现的频率也相当高，在《论语》中出现了 107 次，在《孟子》中出现了 82 次。毫无疑问，品德是《论语》、《孟子》所要阐发的一个核心内容和重要主题。《论语·述而》载孔子语云：“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又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意思是，品德不修养，学问没有讲习，听到义了不能加以实行，有了缺点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感到忧虑的事情；要立志于道，要坚守着德，要不违背仁，要在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之中游憩。孔子实际把品德的修养放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又《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云：“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孟子·告子上》载孟子语云：“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则更明确地阐明了“仁”、“义”高于生命的价值，当

苟生有害于“仁”、“义”时，应当毅然选择“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以实现生命的最高价值。类似的话，在儒家典籍中随处可见，如在《礼记·儒行》中，就说到“劫之以众，沮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可杀而不可辱”，“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等等。可见，儒家认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完全体现在能否“立德”上。能“立德”，人的一生就活得有价值，死后还能以道德影响、沾溉后人，名垂后世，达于不朽。

品德之外，儒家认为最值得追求的是功业。所谓“立功”，就是为统治阶级、为国家建功立业。振翮于治世，搏击于乱世，拯国于危难，救民于水火，一展鸿图，出将入相，封万户侯，入麒麟阁，几乎是古代每一个士人的理想或梦想。当然，在“立功”的同时也必须“立德”，孔子曾明确地提出要求：“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拱)之。”(《论语·为政》)孔子的学生子路也曾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论语·微子》)能“立功”的人，生前能使国家人民受益，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死后其功业还能使后人受惠，垂名后世，达于不朽。



司马迁像

品德、功业之外，儒家认为最值得追求的是“立言”，即著书立说，在思想和学术方面有所建树。司马迁在遭受宫刑奇耻大辱、生不如死的情况下，坚持写完《史记》，“亦欲以究天人之际，

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就是这种思想的突出表现。无数古人追求“立言”，从而形成了古代学术文化繁荣昌盛的局面。著书立说不但可以教育今人，还可启悟后人，成为思想或学术的薪传者，也足可垂名后世，达于不朽。

“三不朽”铸就了儒家“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载孔子语）的功名观，铸就了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铸就了广大士人强烈的入仕思想和参与意识，也为文人理想品格的形成和发展规定了方向、奠定了基础。从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身上，也可以看出这一点。

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很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其诗文对儒家经典颇多引用，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①]一文统计，仅对《论语》的引用就达 37 次，说明陶渊明对儒家经典颇为熟谙，他在这方面的学习确实下过很大的功夫。有的诗几乎专咏孔子，如《饮酒》其二十对孔子汲汲奔走，对败坏的社会风气进行弥补，想使之重新变得淳朴，使礼乐得以暂时复兴的努力表示了赞赏，对孔子死后洙、泗之间再也听不到精微要妙的言论表示了惋惜，对秦始皇焚毁《诗》、《书》等儒家典籍表示了愤怒，对汉初伏生等“老翁”从隐居之所出来勤勉地讲授六经表示肯定，而对汉代灭亡以后再没有人去亲近六经的情形表示了困惑和不满。最后，对眼下只见士人整天驾着车到处忙碌奔走，却不见有人探求治世之道表达了深深的失望，表示自己只能痛痛快快地饮酒了。从全诗看，陶渊明是非常服膺孔子和儒学的。梁启超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说陶渊明是“儒家出身”，“一生得力处用力处都在儒学”。



① 参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568 页

陶渊明有儒家的入世精神，曾有强烈的功业之心和政治抱负：“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而其“猛志”的具体内容就是要“大济苍生”（《感士不遇赋》）。他对祖上的功业颇为自负，而对“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杂诗》其二）则表示非常无奈和痛苦。他没有忘掉名，在《咏荆轲》中说：“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在《拟古》其二中说：“生有高世名，既没传无穷。”他甚至没有忘怀富贵，在《咏贫士》其三中说“岂忘袭轻裘”，在其七中说“贫富常交战”。他对政治始终未能彻底忘怀，对社会的黑暗、世风的污浊常怀愤愤之心，都是他具有用世之心的表现。

陶渊明也像儒家那样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读史述九章》说：“进德修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所谓“进德修业”，也就是要立德立功，“德”是放在“业”的前面的。稷、契都是帮助舜治国的大臣，稷任农官，教民稼穑，契任司徒，教民以人伦道德。陶渊明说，谁不愿像穑、契那样呢？流露出无限神往之情。在《感士不遇赋》中，陶渊明也提到“庶进德以及时”，还提到“发忠孝于君亲，生信义于乡闾”。陶渊明还多次提到要坚守“道”，要坚守“固穷”。提到“立善有遗爱，胡为不自竭”（《形影神·影答形》），“朝与仁义生，夕死复何求”（《咏贫士》其四）。这与孔子所说的“朝闻道，夕死可矣”（《论语·里仁》），完全是一脉相承的。此外，孔子曾赞赏“隐居以求其志”（《论语·季氏》）；对不肯做孤竹国的国君而双双逃到国外的伯夷、叔齐兄弟，孔子认为他们是“古之贤人”，是“求仁而得仁”（《论语·述而》）。因此，甚至连陶渊明的归隐，从根本上说来也并没有与孔子所倡导的原则相悖。

李白的思想颇为复杂，但儒家思想在其头脑中也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他关心国家命运，是一个功名事业心很强的人，有

着强烈的“济苍生”、“安社稷”的儒家用世思想。他认为“苟无济代心，独善亦何益”(《赠韦秘书子春》)，要“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他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也完全与儒家相通。在《任城县厅壁记》中，李白赞扬任城县令贺公的政绩是：“一之岁肃而教之，二之岁惠而安之，三之岁富而乐之。然后青衿向训，黄发履礼。耒耜就役，农无游手之夫；杼轴和鸣，机罕颦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自春。权豪锄纵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让于道路，任者并于轻重。扶老携幼，尊尊亲亲。千载百年，再复鲁道。”所描绘的完全是一派儒家理想社会的图景。由于李白对自己人生道路和人生目标的设计过于理想化，他在现实人生中不断遭到挫折，但他始终不肯放弃自己的追求，可见其信仰的执著。李白一生功业无成，但他在著述方面却获得了很高的成就。《古风》其一说：“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所谓“希圣”，就是要追踪孔子，说明李白“志在删述”、“垂辉千春”，也是遵循了儒家“立言”以求“不朽”的原则的。



比起陶渊明、李白来，应当说儒家思想在苏轼头脑中更突出地居于主导的地位。他从小熟读儒家典籍，仁、义、礼等儒家观念深植其脑。他走的是正统的“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仁宗嘉祐二年(1057)应进士试，试题即为“刑赏忠厚论”，其文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代帝王实行赏罚的范例，论述刑赏必须以忠厚为本，对儒家的仁政思想作了深入阐述。苏轼上皇帝的许多策论，多是主张德治、仁政，而反对功利、刑法的。其《上神宗皇帝书》云：“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贵。道德诚深，风俗诚厚，

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所论完全本于儒家思想。其《辩试馆职策问札子》自谓“及事神宗，蒙诏对访问，退而上书数万言，大抵皆劝神宗忠恕仁厚”，其言不虚。在《六一居士集叙》中，苏轼论述儒家思想的演变及其与杨、墨、佛、老诸家学说的斗争，主张以儒学救天下，明显地表现了儒家正统思想。苏轼以儒家思想规范自己的德行，其爱民、亲民的举措，都与儒家思想的影响有关。他在贬谪黄州期间，“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并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目的也在说明自己“穷不忘道，老而能学”，以希“复入于道德之场”（《上文潞公书》）。评介别人，也常以儒家思想为标准，如赞美范仲淹“其于仁义礼乐，忠信孝悌，盖如饥渴之于饮食，欲须臾忘而不可得”（《范文正公文集叙》），在向朝廷推荐黄庭坚的表章中称赞黄“孝友之行，追配古人”，皆属此类。可见，儒家思想确为苏试言行之准绳、品格之轨仪。苏轼利用接近皇帝的机会力劝施行仁政；利用手中权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行仁政；用自己的笔大力阐发、宣传仁政。儒家所说的“立德”、“立功”、“立言”，在苏轼这里可以说得到了高度的统一。

# “今见《庄子》,得吾心矣”



所谓儒、道、释三家中的“道”,完整地说,应当包含“道家”和“道教”两个部分。道家是一个学派,道教是一种宗教,二者是有区别的,但产生较晚的道教继承了老庄道家的基本思路,二者后来在各自的发展历程中又时分时合,结下了不解之缘。古代的文士,不少人同时受到道家和道教的影响。

西汉初,统治者为了休养生息以恢复国家元

气，曾一度崇尚黄老思想，但在武帝独尊儒术后受到排斥。不过，在儒家名教的严重桎梏下，一些精神上感到痛苦、具有独立精神的人仍自觉不自觉地把眼光投向老庄，从中寻求心理的平衡和精神的寄托。到了汉末，儒家经学走向衰微，老庄思想便大张旗鼓地走上了历史舞台。到了一方面大倡名教，另一方面又充满了阴谋与篡夺的曹魏正始时期，以《周易》、《庄子》和《老子》（即所谓“三玄”）为基础核心的玄学应运而生，并很快形成一种汹涌的思潮，波及到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整个西晋、东晋时期，玄风都极为畅行。直到刘宋，玄学还得与儒、文、史并列为四科。刘宋以后，玄风才逐渐减弱，但老庄思想始终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仍在思想文化领域产生着时大时小的影响。在唐代，《老子》、《庄子》还曾被奉为经典，同儒家的经典一样被列为士子的必读之书，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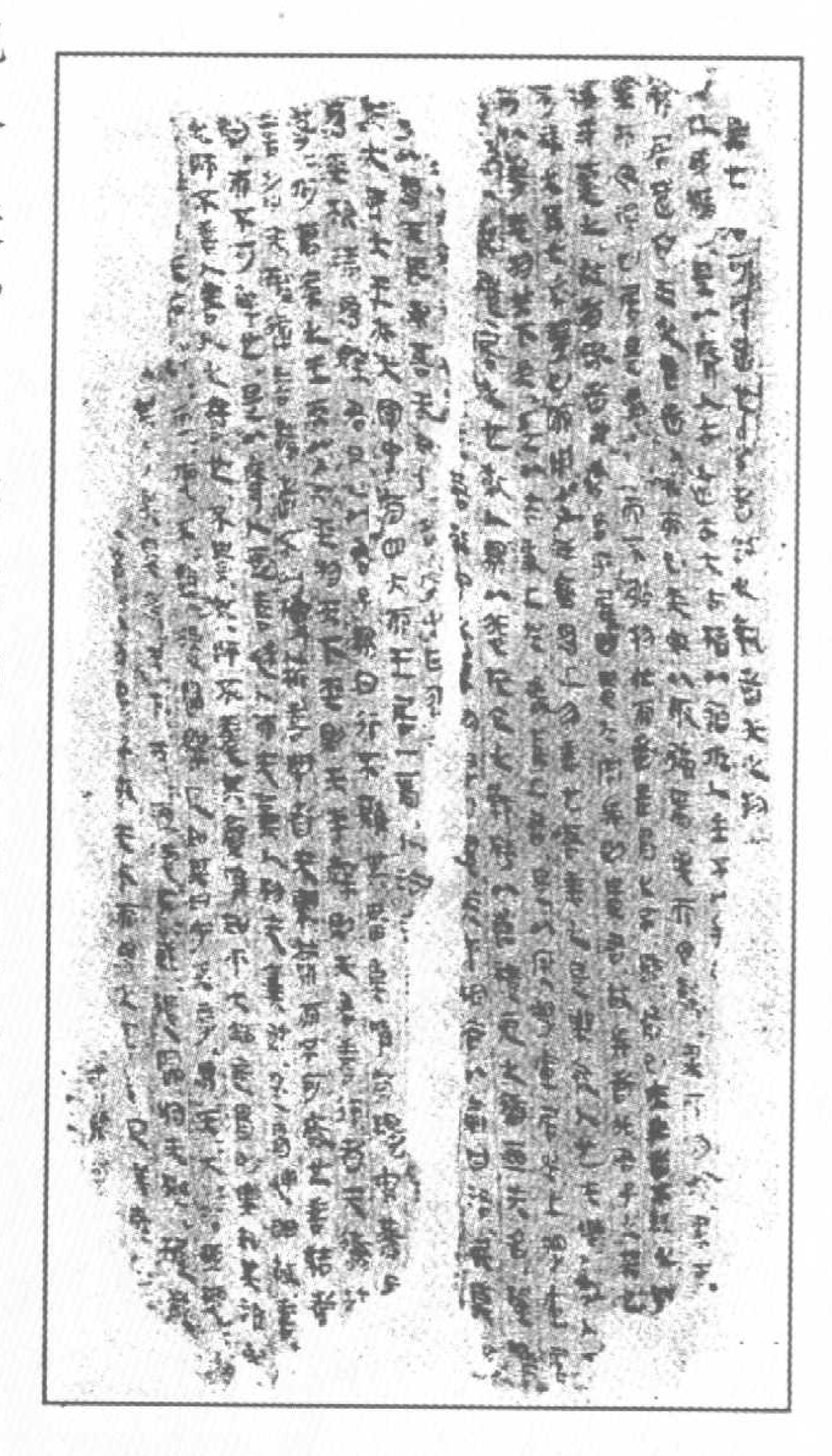
陶渊明、李白与苏轼都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他们对道家的典籍都颇为熟谙，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陶诗用事，《庄子》最多，共四十九次”。另据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统计，陶渊明“在诗文中有 70 篇用了《老》、《庄》的典故，共 77 处之多”。苏轼很早就接触《庄子》。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说：“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喟然叹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苏辙这段话，主要是从作文的角度谈的，苏轼的文风，确实深受《庄子》的影响，如罗大经《鹤林玉露》所说：“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辨痛快，无复滞碍。”但苏轼所欣赏的绝不仅仅是《庄子》的文风，他在思想上也与《庄子》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所谓“得吾心矣”，应作是解。



老子像

道家思想对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影响，主要是崇尚自然的思想对其人生态度、人生哲学的影响。老、庄都是以自然为最高的境界的。《老子》第二十五章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据任继愈《老子新译》，译成白话就是：“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它自己的样子为法则。”“自然”二字还见于《老子》第五十一章：“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第六十四章云：“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所谓“自然”，与我们今天所说的与人类社会相对而言的“自然界”、“大自然”中“自然”不是一个概念，它指未经人力加工、改动、改造过的万物原本的状态。老子认为，世间万物皆按其本来的面貌而存在，其发展、变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人只能去顺应它，而不必企图去做点什么，也就是要“无为”，只要真正做到了“无为”，也就是有为了。所以老子说：“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焉而不为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据《老子新译》，其意思是：“圣人用‘无为’去处事，用‘不言’去教导。任凭万物生长变化，而不替它开始。生养了万物，而不据为己有。推动了万物，而不自以为尽了力，功成而不自居。正由于不居功，所以他的功绩不会失去。”庄子也说：“汝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庄子·应帝王》）意思是，只要你听任自然、顺应自然而没有半

点儿个人的偏私,天下也就得到治理了。对这个意思,《庄子·齐物论》"夫吹万不同而使其自己也"郭象注讲得更为透彻:"然则生生者谁哉?块然而自生耳。自生耳,非我生也。我既不能生物,物亦不能生我,则我自然矣。自己而然,则谓之天然。天然耳,非为也。"认为万物生生不已,都是"块然"自生的结果,不是"我"作用的结果。万物是自生的,"我"也是万物的组成部分,所以"我"也是自生的。这就是"天然",所谓"天然",就是非人力所为的。



马王堆汉墓帛书《老子》甲本片段



东汉以来,由于名教礼法变得越来越虚伪,面对世风的浇薄和政治的黑暗越来越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常常"助纣为虐",而对士人独立人格、个性情感的束缚却越来越厉害,于是魏晋以后,名教礼法逐渐成为人们批判的靶子,而批判的武器就是老庄崇尚自然的思想。嵇康、阮籍在这方面的态度最为激烈。嵇康在《难自然好学论》中说:"六经以抑引为主,人性以从欲为欢;抑引则违其愿,从欲则得其自然。然则自然之得,不由抑引之六经;

全性之本,不须犯情之礼律。”为此,嵇康甚至发出了“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呼喊。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态度不像嵇康、阮籍那么激烈,但不满虚伪礼法、崇尚自然精神,却是并无二致的。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都热衷保持和维护自己自然的本性或天性,不愿让自己的本性或天性受到压抑、扭曲或束缚。他们往往是怎么想就怎么说,想怎么做就怎么做,不会矫饰自己的言行,即使得不到别人的理解、为社会所不容、甚至给自己招来灾祸也在所不惜。陶渊明还提出了“抱朴含真”的概念,“朴”和“真”均指未经礼法和智巧沾染的淳朴人性,两个概念均出自《老子》和《庄子》。《老子》第十九章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第二十八章云:“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第三十二章云:“朴虽小,天下莫能臣也。”第二十一章云:“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第五十四章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庄子·渔父》云:“礼者,世俗之所为也。真者,所以受于天也,自然不可易也。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庄子·秋水》云:“无以人灭天,无以故灭命,无以得殉名,谨守而勿失,是谓反其真。”可见,“朴”与“真”都是与世俗礼法相对立的。陶渊明认为,上古时代的先民,是最淳朴、真纯的:“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劝农》)而名教兴起之后,风气就变了:“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饮酒》其二十)“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感士不遇赋》)因此,他对社会、官场的虚伪、黑暗和腐败感到十分厌恶、不满,“乃逃禄而归耕”,以“养真衡门下”,任真自得,按自己固有的本性去生活。李白放荡不羁,不愿“摧眉折腰事权贵”,苏轼总是拥有一颗童心,一点也没有学会弥漫于官场的圆滑和世故,都是“抱朴含真”性情的自然表现。

陶渊明、李白所憧憬的社会，也是具有"抱朴含真"的特点的。陶渊明《桃花源记》所描绘的桃花源，人人自耕自食，真诚相处，无君无臣，无赋无税，无论老少，并怡然自乐，就是一个理想的"自然"的社会。李白在《大猎赋》中，主张"饱人以淡泊之味，醉时以淳和之觞。……六宫斥其珠玉，百姓乐于耕织。寝郑卫之声，却靡曼之色"，也颇有"抱朴含真"理想社会的影子。而这来源于老、庄对"小国寡民"和上古"至德之世"情景的描写，是对老庄社会理想的形象化。

《庄子·养生主》云："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又《大宗师》云："古之真人，不知说(悦)生，不知恶死。"也就是说，人生应当顺从自然，委运任化，顺逆、穷达、毁誉、贫富乃至生死存亡都不应当放在心上，否则，便将陷入无穷的烦恼，便将达不到《庄子·天道》所说的"夫虚静恬淡寂漠无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的境界。这种思想对陶渊明影响很大，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化"字跟"真"字一样，出现的频率很高，如"聊且凭化迁，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作》)"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形影神·神释》)"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侍》)"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归去来兮辞》)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句子。陶渊明不是说说而已，而是将这转化成了他的一种切实的人生态度和处世态度。苏轼屡被贬谪，能处变不惊，随遇而安，也表现出了这种处世态度。

按照老庄思想，山水田园处于一种最自然的状态。魏晋时期，还有由山水以体悟老庄自然之道的概念。阮籍《老庄论》说："夫山静而谷深者，自然之道也。"认为自然万物是作为精神本体的"道"的外在显现，主张"与造化为友，朝餐阳谷，夕饮西海，将

变化迁易，与道周始”（阮籍《大人先生传》），与天地自然合为一体，从中获得悟道、畅神、怡情的美感。陶渊明、李白和苏轼都特别喜欢山水田园，陶渊明还归隐于田园，李白曾隐居山林，并一再表示“功成”之后要终隐江湖，苏轼也曾多次打算归隐田园，这些想法和做法，都与道家思想有着必然的联系。《老子》第九章云：“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成遂身退，天之道。”李白的“功成身退”思想，也是直接源自《老子》的。对于生产劳动，老庄是表示肯定的。《庄子·马蹄》说：“彼民有常性，织而衣，耕而食，是谓同德。”认为“织而衣，耕而食”是人类固有的本能和天性，是不会改变的。陶渊明在归隐期间参加过劳动，苏轼在贬谪期间曾亲事农耕，应当说都是对庄子思想的实践。

此外，老庄都对现实不满，都对现实采取批判态度。《老子》第七十五章云：“民之饥，以其上食税之多，是以饥。”“民之轻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轻死。”《庄子·胠箧》说：“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都对现实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这种批判精神，也为陶渊明、李白和苏轼所继承。他们的诗文所呈现出来的平淡自然、真率自然的风格，也是老庄崇尚自然思想的一种反映。



道教是中国土生土长的传统宗教，产生于东汉中叶，是继承黄老思想并掺和古代民间巫术及神仙方术思想而成的，老子被宗奉为教主。道教以修真悟道、羽化登仙为最终目的，在魏晋以后企望长生的人们心中有很大影响。唐朝时，由于皇帝姓李，老子（李耳）也姓李，统治者出于借宗教以培植李姓帝室统治威严的目的，尊崇老子为祖宗，大力提倡道教，道教几乎成为唐朝的国教。当时全国道观林立，求仙学道成为一种时尚。唐玄宗本人也迷信道教，并在宫中设坛炼丹，追求长生不死。他的两个妹

妹西宁公主和玉真公主还以贵族身份出家做了道士。李白的家乡蜀中，也是道教气氛十分浓厚的地方，李白家附近的紫云山是道教胜地，青城山是道教十大洞天之一。环境的影响，使李白也有了相当浓厚的神仙道教思想，他自己说："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感兴》其五)几乎一生与神仙道教思想为伴。李白还成了一名真正的道士，并参与炼丹服食的活动。他"一生好入名山游"，其中也怀有求仙访道、采药炼丹的目的。葛立方《韵语阳秋》说："李太白古风两卷近七十篇(现存59篇)，身欲为神仙者殆十三四。"在总数近千首诗中，则约有100多首与神仙道教有关。

神仙道教在宋代也颇有市场，北宋真宗和徽宗还是两个著名的崇奉道教的皇帝。因此，苏轼也颇受神仙道教思想的影响。他不仅热衷于学习道教教义，常与道士交往，而且亲自参与修炼。在黄州时，他曾"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日夜为之，寝食之外，不治他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答秦太虚书》)。他对炼丹服食之事也颇感兴趣，常与朋友进行探讨。在其作品中，也常有对神仙世界的描绘，流露对神仙世界的向往。

其实，李白也好，苏轼也好，对"羽化登仙"之事都是不可能真信的。李白《古风》其三说："尚采不死药，茫然使心哀。""徐市载秦女，楼船几时回？但见三泉下，金棺葬寒灰。"一面赞扬了秦始皇的雄才大略和统一中国的业绩，一面又讽刺了秦始皇追求神仙长生不死的荒诞行径，能清楚地看出李白的态度。李白尚且如此，苏轼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热衷于神仙道教，有时是为了利用道教的修炼方式或方药强身健体治病，苏轼在《答秦太虚书》中就说："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

言，厚自养炼。”在更多的情况下，是为了以此求得心灵的宁静超脱，是为了通过对神仙境界的追求，发泄对现实世界的不满，表现自己对不受羁束的逍遥人生境界的向往。李白《暮春江夏送张祖监丞之东都序》云：“仆书室坐愁，亦已久矣。每思欲遐登蓬莱，极目四海，手弄白日，顶摩青穹，挥斥幽愤，不可得也。”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他们往往欲自我解脱、“挥斥幽愤”而“不可得”，因此神仙道教思想往往挥之而不能去，也是可以理解的。

总的看来，道家、道教思想对古代士人的影响是复杂的，其中会有一些消极、迷信的东西，但从其正面意义而言，它对士人精神的解放、个性的独立、人格的自由和品格的迥出产生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为有正义感的知识分子冷眼看世界、批判现实黑暗提供了一种便捷的精神武器，为他们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保持自己品格的“天真”和“自然”提供了支持，为他们在面临打击时提供了一种平衡心理的机制。就文学创作而言，则对作家丰富想像力的形成和作品淳朴古淡、真率自然风格的形成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从陶渊明、李白和苏轼的情况，不难看出这一点。

# "归诚佛僧,求一洗之"



佛教出于印度,创始人为释迦牟尼,约在西汉末、东汉初传入中国。东汉时,已有了我国现存佛经中最早的译本《四十二章经》,译者为天竺(今印度)人摄摩腾和竺法兰。汉末以后,由于社会处于不断的动乱中,人们的生命时常受到威胁,很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佛教因而有了较快发展。东晋南朝时期,佛教的传播迅速形成了建康、庐山两大佛教中心,涌现出道安、慧远、僧肇

等在中国佛教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佛学家。历代有不少帝王怀着种种目的，热心提倡和支持佛教，使佛教如虎添翼，更加势不可挡。东晋诸帝均颇信佛，尤以明帝、简文帝、孝武帝为最。南朝宋文帝也重佛教，常与慧严、慧观等僧人交往，甚至允许个别名僧参与朝政。梁武帝更是历史上著名的佛教皇帝，他不仅下令以佛教为国教，自己还曾先后多次舍身寺院，由朝廷和群臣以巨额金钱赎回。他还亲自登台讲经，并长期斋戒，俨然一个虔诚的佛徒。由于梁武帝的狂热倡导，当时江南佛寺多达500余所，造佛像成风，讲经说法成风，佛教信仰弥漫江南。



释迦牟尼像

当时少数民族贵族统治的北部中国，虽曾发生过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发动的两次灭佛事件，但佛教总的说来也得到了有力的扶植。十六国统治者大都崇信佛教，后赵石勒、石虎尤为突出。北魏曾将佛教奉为国教，统治者大张旗鼓地在大同云岗和洛阳龙门开凿佛教石窟，雕刻佛像，并资助译经事业。这一时期，洛阳城内及四郊佛寺多达1367所，占到民居总数的1/3。整个江北地区佛寺多达3万余所，僧尼多达200万人。官私所立塔像多得不可计数，其中不少规模巨大，如北魏献文帝天安元年(466)在天宫寺所造释迦牟尼立像，就“高四十三尺，用赤金十万斤，黄金六百斤”(《魏书·释老志》)。这一方面造成了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另一方面也使佛教在中原地区广为流布，扎下深根。

唐朝实行儒、道、释三教调和的思想统治政策，这也为佛教的广为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唐朝的不少皇帝都"事佛而佞"，如唐肃宗曾下敕"僧尼朝会，不必称臣"，唐宪宗自称"听政之暇""澡心"于佛，并曾下诏奉迎佛骨。由于皇帝大力扶植推行，佞佛也成为一时风气，僧尼成为一种特殊的势力。此后，佛教势力代代相传，并日益与儒、道相融合。直到进入近代，才逐渐走向衰落。

佛教长期广为传播，必然要使广大士人深受影响，不少士人还对佛教的传播起了重要的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少士人对佛教研究有浓厚兴趣，与僧人交往也往往成为风气。如南朝谢灵运，据不完全统计，他就与慧远、法显、慧睿、慧严、慧观、法勖、僧维、慧驎、僧镜、昙隆、法流、慧琳、法纲、道生、道秉等僧人有过来往。谢灵运与慧远的关系尤为密切，建立了很深的感情。慧远去世后，谢灵运还特地写了《庐山慧远法师诔》、《庐山法师碑》以致悼念之情。隐居会稽期间，谢灵运为了接待来访的高僧，还特地在自己的庄园内建造了僧房。谢灵运"笃好佛理"，而且有相当深入的研究，著有《与诸道人辩宗论》，申述竺道生"顿悟"之义，引起僧俗的广泛注意。又曾注释佛教重要典籍《金刚般若》，与慧严、慧观等一起修改《大般涅盘经》，将原经品数由13品变为25品，卷数则由40卷减为36卷。谢灵运在给友人的书信中，也颇多谈论佛理的文字。与谢灵运同时的颜延之，也精通佛理，写有《通佛影迹》等多种佛学论著。此后历代都有不少文士热衷于佛教，如南朝梁的昭明太子萧统、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萧子显、王规、刘遵等，南朝陈的江总等，唐朝的王维、刘禹锡、白居易等。甚至像杜甫这样出身于"奉儒守官"家庭、有着浓厚儒家思想的人，也多多少少接受了佛教思想的影响。



慧远像

陶渊明一生，主要接受了儒家和道家的影响。但他生当佛教盛行的时代，与佛教界并非全无来往。陶渊明住在庐山脚下，距离当时佛教领袖慧远所在的东林寺很近。慧远在庐山前后30余年，联系南北名僧，周旋于名士权贵间，进行了大量宗教活动，一时影响很大。据传陶渊明与他是有过交往的。慧远笃信佛教的因果报应说，认为生死祸福、富贵贫贱都是报应，陶渊明却不认同这一点，在《饮酒》其二中说："积善云有报，夷叔在西山；善恶苟不应，何事立空言？"认为伯夷、叔齐是做了善事的，做了善事说是会有善报，但他们却在西山饿死了。善恶如果没有报应，为什么要讲空话呢？陶渊明所写的《形影神》三首，可能就是针对慧远的《形尽神不灭论》表达不同看法的。不过，认为人总是要死的，不赞成道教的神仙长生之说，这点陶渊明与佛教是一致的。此外，陶渊明对佛教应当也有所研究。《归园田居》其四云："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空无"一词，即为佛家用语，支遁《咏怀》有句云："廓矣千载事，消液归空无。"陶渊明对佛理即使并无太深的研究，但由于佛教与老庄义理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因此陶渊明与佛教在对人生进行关照和参悟时，也是完全有可能产生暗合共鸣的情形的。陶渊明对功名荣利抱淡泊态度，这也可能接受了佛家随缘任运思想的影响。

李白一生，主要接受儒家、道家和道教的影响，但对佛教也有相当的濡染。李白喜欢与僧人来往，僧人见于《李白集》者，有

僧伽、僧晏、莹禅师、昌禅师、通禅师、叶和尚等。诗篇涉及佛典者也不少。如《与元丹丘方城寺谈玄作》云:"茫茫大梦中,惟我独先觉。腾转风火来,假合作容貌。灭除昏疑尽,领略入精要。澄虑观此身,因得通寂照。朗悟前后际,始知金仙妙。"元丹丘是道士,但诗中所谈,却颇多佛理。佛教认为世界万物和人之身体皆由地、水、火、风这"四大"构成,其作用分别为持(保持)、摄(摄集)、熟(成熟)、长(成长),其属性分别为坚、湿、暖、动。《圆觉经》云:"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此为诗中"腾转"二句所本。《楞严经》云:"净极光通达,寂照含虚空。"此为"因得"句所本。"寂照",谓心境安静清明,与前句"澄虑"同义。《维摩诘所说经》云:"法无有人,前后际断故。"《华严经》云:"虽知诸法无有前际,而广说过去;虽知诸法无有后际,而广说未来;虽知诸法无有中际,而广说现在。"此为"前后际"所本。"金仙"指佛,并非一般所谓神仙。《般若灯论》云:"声闻菩萨等亦名仙。佛于中最尊上,故名大仙。"化用佛教经典,不仅随手拈来,而且诗意妥帖,音韵和谐,能看出李白对佛理的谙熟和造诣,可见李白对佛理是下了一番钻研功夫的。



比起陶渊明和李白来,苏轼对于佛教的契合是最为深入的。他很早就与佛僧和佛教有了接触。苏轼开始喜欢佛典,是在做凤翔府签判时,其时苏轼 28 岁,刚步入官场不久。苏轼真正倾力于佛教,是在被贬黄州后。从《黄州安国寺记》可知,苏轼佛教思想的滋长,实因政治上不得意所致。他希望能够通过"归诚佛僧",达到"物我相忘,身心皆空"的目的,达到了这个目的,无欲无求,想要犯罪也将无从犯起。他赞赏寺僧继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即知道满足就不会受辱,知道适可而止就不会有危险,也是希望自己能达到这样的境界。为了达到这样的境界,苏轼

真正做到了一个“诚”字，每隔一二日就到安国寺去练习打坐，清早去，天黑回，整整坚持了5年。在家的日子，肯定还要花不少时间钻研佛经。从此，读经参禅就成了苏轼的日常功课，所交的僧人朋友也越来越多，有时甚至达到“神交”的地步。

受苏轼影响，朝云对佛教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苏轼《答李端叔书》说朝云“亦学佛，临去，诵《六如偈》以绝”。死后，墓前即建六如亭，所谓“六如”，即佛经中所说的“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苏轼《悼朝云》云：“苗而不秀岂其天，不使童乌与我玄。驻景恨无千岁药，赠行惟有小乘禅。伤心一念尝前债，弹指三生断后缘。归卧竹根无远近，夜灯勤礼塔中仙。”满纸佛家语，大概在苏轼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切合朝云身份，才能表达出自己的哀痛心情。

苏轼《答毕仲举书》云：“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也就是说，苏轼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求得心灵的宁静和处世的旷达，克服烦恼、恐惧、忧愁、恼怒等情绪的侵扰。《答毕仲举书》说：“黄州滨江带山，既适耳目之好，而生事百须，亦不难致；早寝晚起，又不知所谓祸福果安在哉?”到海南岛后，苏轼常觉“此中枯寂，殆非人世，然居之甚安。”(《与郑靖老书》)又常“与过(苏过)子相对，如两苦行僧耳。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侄孙元老书》)即使“葺茅竹而居之，日啖薯芋，而华屋玉食之念，不存于胸中。”(苏辙《追和陶渊明诗引》)可见苏轼“本期于静而达”的目的，应当说是达到了。

学佛之后，苏轼常对人生、社会作佛理禅观式的思辨，佛家用语因此也常见于其诗文字里行间。据宋人张端义《贵耳集》载，南宋时李壁出使金国，陪伴李壁的金人对李壁说：“东坡作文，爱用佛家语。”李壁的回答是：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灰

飞烟灭”四字,即出自《圆觉经》:“火出木尽,灰飞烟灭。”苏轼还常以禅参诗,即以参禅的态度和方法读诗,搜寻、品味诗中的理趣。《夜直玉堂,携李之仪端叔诗百余首,读至夜半,书其后》云:“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其诗词也颇多寂静空寒的禅家意境,如《雨夜宿净行院》云:“芒鞋不踏利名场,一叶轻舟寄渺茫。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念奴娇》云:“人间如梦,一樽还酹江月。”又钱谦益《读苏长公文》说:“吾读子瞻《司马温公行状》、《富郑公神道碑》之类,平铺直叙,如万斛水银随地涌出,以为古今未有此体,茫然莫得其涯涘也。晚读《华严经》,称性而谈,浩如烟海,无所不有,无所不尽。乃喟然而叹曰:‘子瞻之文,其有得于此乎!’”苏轼广摄博取,转益多师,其文风受到佛经文风影响,也完全是有可能的。

#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儒、道、释三家由于理论体系、思想观念不同,相互间是有矛盾、有斗争的。但另一方面,各家又并非没有相通之处,因此各家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又是一个相互包容、吸收和融合的过程,从而给社会思潮、文化学术带来了错综复杂的影响。

儒、道都是产生于中国本土的哲学,儒学积极入世,道家则出世无为,儒家乐观进取,道家则消

极退避。表面看来，二者是尖锐对立、不可调和的，但实际上，它们常协调互补地统一在历代文士身上。其相互融合的过程，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开始，《吕氏春秋》杂取儒、道就是一个例子。到了西汉，刘安《淮南子》以道为主兼融儒术，董仲舒《春秋繁露》融合儒、道，扬雄融合儒、道以入玄，更加快了二者融合的过程。从对人的影响看，历代文士大抵都以儒学为立身之本，而处世态度又多受道家影响。儒、道满足了社会和人们的不同需要，因此都大有市场，得以长盛不衰。

儒学与道教也有较深的渊源。西汉时，董仲舒以阴阳五行学说杂入儒家思想，使得当时的儒生出现方士化倾向，这为道教的产生造就了适宜的土壤。道教从一开始就大量吸取了汉代的经学思想，如《太平经》在讲阴阳灾异的同时也讲君、臣、民协调。后来的神仙家有不少人是出身于儒家的，皈依神仙道教后往往还不能忘怀儒学。如东晋葛洪在从道后就念念不忘“忠孝”的信条，甚至将其纳入教义，其《抱朴子·内篇·对俗》就说：“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在这里，将封建伦理道德当成了长生的必要条件，将神仙道教与儒家名教思想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

儒学与佛学也有一个交融的过程。佛教传入中国后，首先代表中国文化去接纳的便是儒家思想。佛教为了能在中国立足并扎下根来，力图使佛教中国化，因此竭力调和佛与儒之间的矛盾，努力寻求两者的共同点。一些佛僧认真钻研儒家经典，并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据《高僧传》载，六朝时不少僧人都“博览六经”、“通六经”。一些人还有研究儒学的著述，据《隋书·经籍志》载，慧始、慧琳就著有《孝经注》，僧智著有《论语解》。另一方面，热衷佛学的文士又多为儒学出身。在这个互动的过程中，儒、佛

相互吸纳和影响在所难免。

比起儒与道、佛来，佛与道、玄的关系似乎更密切一些，因为两者之间相通的地方似乎更多。着重于心的“本来清净，元无烦恼”的禅道，相通于老子的自然无为之道。禅学屡屡提到无言、无心、无事、无往、无相，与老子主张的无名、无知、无为、无事相通。庄子哲学在空物我、齐生死、重解悟、亲自然等方面，与佛教禅宗也有不少认同。玄学出现后，在修心、养性、生活行为等方面与佛学有相通或相似之处，而其关键在于玄学的有无之旨与佛教的空有之辨是相通的。因此，佛学义理常被用来阐发玄学，而玄学思想也常被用来比附、解说佛经。在这种情况下，僧人与玄学家常彼此引为同道，佛与道、玄也获得了互相渗透共同发展的契机。

佛学与道教的关系，比与玄学的关系要早。佛教刚传入中国时，是附庸于鬼神方术的，其内容不过是斋戒祭祀，来华的译经名僧多被视为方士。佛教为了自身的存在和发展，在当时汲取了神仙道教的理论方术。魏晋以后，佛教转而依附玄学，在依附的同时得到了很大发展。南北朝时期，由于佛教的影响超过了道教，二教之间的关系一度变得十分紧张，但在斗争中仍有包容和交流。



梁武帝像

总之，儒、道、玄、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是在逐渐走向融合的，这种融合的倾向到南朝刘宋

以后变得越来越明显。南朝梁奉佛教为国教,但在治理国家时仍注意发挥儒学的作用,对道教也并未采取打击的政策,实际上是三教兼容的。梁武帝本人就兼综三教,并多有著述。三教并重,自此开端。梁武帝还提出了三教同源说,并从理论上进行了论证。

唐朝崇奉道教,但儒、佛在社会上也很盛行,实际上是三教鼎立,三教各自突出自己、发展自己。唐玄宗本人信奉道教,但他同时注了《孝经》、《道德经》(即《老子》)和《金刚经》,实际上在他看来,儒、释、道三家是三位一体的。进入宋代以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更加强固,以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家学说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指导思想,于是以儒为主,儒、道、佛在新的环境中走向新的融合。

在儒、道、玄、佛兼容并重的情况下,士人多兼综数家之学,并常以此为荣。南朝宋谢灵运,其思想就是集儒、道、释为一炉的,黄节在《谢康乐诗注序》中说:"康乐之诗,合《诗》、《易》、聃、周、《骚》、辩、仙、释以成之。"一些佛道人士也复如此,如一代名僧慧远就"博综六经,尤善《庄》、《老》"(《高僧传》卷六)。这在后来几乎成为一个传统,以致鲁迅在《准风月谈·吃教》中说:"中国自南北朝以来,凡有文人学士,道士和尚,大抵以'无特操'为特色的。晋以来的名流,每一个人总有三种小玩意,一是《论语》和《孝经》,二是《老子》,三是《维摩诘经》,不但采做谈资,并且常常做一点注解。"可见,能三教兼通,历来是被视作时髦的。当然,从根本上说来,兼通三教不是为了赶时髦,而是三教确实各有各的用处。唐宋时期,有"以佛修心,以道养身,以儒治世"的说法,而"修心"、"养身"、"治世"往往是一个人同时都需要的,因此,人们必然地也会将眼光同时投向三教,从三教中"各取所需"。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自然也不例外，他们虽对儒、道、佛各有其重点所爱，但又都能兼容并包。他们所爱虽有重点，但并不僵化地固守，而是有所扬弃，有所改造，对他说有所吸取。如陶渊明尊崇孔子，但他颇有将孔子道家化的倾向，如《饮酒》其二十说："羲农去我久，举世少复真。汲汲鲁中叟，弥缝使其淳。""真"和"淳"这两个概念并不见于《论语》，而在《老子》、《庄子》中却屡见，纯为道家的观念，陶渊明在这里是将儒、道合一了。陶渊明尊奉道家，但又不信道家的神仙长生之说，认为"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挽歌诗》其一），这同时也是对佛教"神不灭论"的否定。又《归园田居》其四说："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空无"为佛家语，但与道家也有渊源，实为佛家"性空"之论与道家"本无"之说的融而合一，同时表现了陶渊明同佛教和道家的因缘。

李白和苏轼的情形也是如此。李白深受儒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影响，向往拯物济世，但他又蔑视功名富贵，不肯"摧眉折腰事权贵"。醉心于求仙访道，但他又认为求仙不如饮酒："贤圣既已饮，何必求神仙。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其二）



苏轼对佛道二教均濡染颇深，但他却在《和陶神释》诗中说："莫从老君言，亦莫用佛语。仙山与佛国，终恐无是处。"他热衷于寻求长生不老的灵丹妙药，但对方士之言并不尽信。《记服绢》云：

> 医官张君传服绢方，真神仙上药也。然绢本以御寒，今乃以充服食，至寒时当盖稻草席耳。世言著衣吃饭，今乃吃衣著饭耶？

绢为"神仙上药"，确实闻所未闻。苏轼毫不含糊地给予了否定：绢是用来做衣被御寒的，如果可以用来服食，到冬天不就只能盖

稻草席了吗？常言"穿衣吃饭"，现在难道要倒过来成"吃衣穿饭"了吗？以常识常性常理加以批驳，顿使其荒谬无所遁形。又《诵经帖》载：苏轼诵读佛经，但照常吃肉，有人跟他说这样不可以，于是苏轼舀了一碗水漱了漱口。这人还是说："用一碗水哪能漱得干净！"苏轼的回答是：这样做高僧是能领会的。一问一答之中，既暗藏禅机，也能看出苏轼的"自行其是"和幽默。再看《养生说》：

> 已饥方食，未饱先止。散步逍遥，务令腹空。当腹空时，即便入室，不拘昼夜，坐卧自便，惟在摄身，使如木偶。常自念言："今我此身，若少动摇，如毛发许，便堕地狱！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事在必行，有犯无恕！"又用佛语及老聃语，视鼻端白，数出入息，绵绵若存，用之不勤。

养生学说应当是离道家学说最近，但苏轼在这里却将法家的律令、兵家的军令、佛语和老庄语全都调动起来了，可见其不拘一格。苏轼日常行事、思想作风，大都类此。

兼综众学，广摄博取，对古代文士的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审美观、文化心理结构、人格修养、仪态风度等都带来了复杂而深刻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最为突出的影响，是对文人整个人生态度、人生道路和人生哲学所产生的影响。这种影响可以用《孟子·尽心上》中的几句话来概括：

> 尊德乐义，则可以嚣嚣矣。故士穷不失义，达不离道。穷不失义，故士得己焉；达不离道，故民不失望焉。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

这段话据杨伯峻《孟子译注》，译成白话就是："崇道德，喜爱义，就可以自得其乐了。所以，士人穷困时，不失掉义；得意时，不离

开道。穷困时不失掉义,所以自得其乐;得意时不离开道,所以百姓不致失望。古代的人,得意,惠泽普施于百姓;不得意,修养个人品德,以此表现于世人。穷困时便独善其身,得意便兼善天下。”这段话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三点:

一、这段话具有很强的概括性和包容性。所谓“穷”、“达”,几乎可以概括所有人一生的生存状态。“穷”是在政治上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一般指不居官时或归隐时;“达”指仕途顺利、能一展抱负之时。“穷”往往避世隐居,“达”则处于一种用世的状态。积极用世是儒家的主张,避世归隐则是道家的主张,但也是儒家对人生道路的一种选择。孔子早就说过:“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还说过:“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人的一生无非处于“仕”与“不仕”两种状态,如果将“不仕”也看作“隐”,则人的一生无非处于“隐”与“仕”两种状态。两种状态之间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由“隐”而“仕”,由“仕”而“隐”,可以很方便地过渡。两者还可以互有交叉,有的人在“仕”着,却有归隐之心,所谓“朝隐”指的就是这种情况;而有的人“隐”着,却照样关心国家大事,甚至为之呼号奔走。因此,这段话是对人生状态的总概括,对任何人都是有针对性的。



二、这段话对人的品格修养规定了大方向,提出了总要求。“穷”时要“不失义”,“达”时要“不离道”。“得志”时要利用有利的条件即利用手中的权力多做好事,不是为个人、家庭和小团体多做好事,而是要为广大老百姓多做好事;“不得志”时要注意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以品德崇高显名于世。实际上是要求无论“穷”、“达”,无论“得志”、“不得志”,无论是在位时还是不在位时,都要追求理想品格,不过其具体作为和表现有所不同而已。

三、孟子是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所提为儒家学派的主张。但是,由于这段话概括了人一生的生存状态,其中也包括了道家、佛家所追求的生存状态,因此具有很强的包容性。所谓"德"、"道",所谓"修身",所谓"善",所谓"泽加于民",各家也都有所追求,尽管对其内涵的理解或有不同。因此可以说,"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大体浓缩、涵盖了各家对理想品格的追求和对历代文士所产生的影响,或者说各家都能在这两句话中找到自己的立场、理念和追求的支撑点、共鸣点。各家思想的交融和互补,在这里也得到了较为集中、较为充分的体现。为了实现"独善"、"兼善"的目标,各家也都可以在这里找到自己的作用点,都可以在其中发挥这样那样、或大或小的作用。

由于其有巨大的包容性,因此"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不仅成为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共同遵奉的信条,也成为历代众多文士在处理出处进退的矛盾时所共同遵奉的信条。屈原《离骚》说:"进不入以罹尤兮,退将复修吾初服。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积极进取的路走不通了,隐退下来,也要继续保持、培育和完善自己的美德。无论进退,都要努力实现自己的生命价值,培育自己的理想品格。这样的人生,无论处于哪一种生存状态,庶几都可算作完美的人生了。



当然,理想品格的培育,不仅有赖于各家思想的影响,还跟当代社会思潮、文人个人所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生活环境、个人所受教育、个人的社会经济地位、个人的社会经历和现实需要都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对前代的思想资料,人们不是简单地继承或"拿来",不是对前代各家思想作简单的综合,而是从现实的需要出发,有所取舍,有所改造,加以融会贯通,使之成为自己思想观念、品格修养和生命意识的有机组成部分。这实际上是

一个精神创造的大工程。在这个创造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性格和行为方式,形成了带有个人色彩和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新观念、新品格,甚至形成了自己既融汇众长、又别具一格的思想体系。文人的理想品格,也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结 语



古代文人的品格,无论就一个时代还是就一个人来说,其情形都是极为复杂的。其品格构成既有闪光的、理想的部分,也有暗淡的、并不理想的部分。即使是闪光的、理想的部分,也只能是相对而言,必须将它们放到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去加以观照、理解和评价。所谓理想品格,不同时代可能会有不同的标准,同一时代中不同的人们可能也会有不同的标准。理想品格需要随着时代的

发展而不断地更新、充实和完善自己。

现在，我们进入了一个与古代社会完全不同的新时代，我们对理想品格的理解有了合于我们时代的新标准。但是，我们对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仍须给予必要的重视，理由是：

一、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从一个重要方面体现了古代精神文明建设所达到的高水平，对推动古代社会的发展、造就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起了积极作用。对此必须给予充分肯定，不能采取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

二、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不是突然产生的，而是代代传承、不断发展的结果。每一个时代的理想品格，在理想品格发展的历史长河中，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它既有时代性、开创性，又有其历史的继承性。我们所要构建的新时代的理想品格，不可能突然从天上掉下来，也必须是古代理想品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因此，我们必须坦然地面对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从中吸取有益的营养。



三、在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中确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继承和弘扬的东西。比如孔子所倡导的“仁者爱人”，就是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很好的规范和标准，它与欧洲后来提倡的人道主义是并无二致的。孔子所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是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一条很好的原则，在西方被视为“黄金法则”，或被视为“人类行为的伟大法则”。古人“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林则徐《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的精神品质，也是值得令人好好学习的。就连儒家积极入世、道家虚静恬澹的人生哲学，我们也不妨兼收互补，使之成为心理平衡的调节机制。诸如此类，难于尽举。

四、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

品格规范，这种规范为万众倾仰，对凝聚人心，对维系社会的稳定、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发挥了积极的作用。直到今天，它还是凝聚海内外中华民族子孙向心力的一个要素。对这一历史作用，我们不仅必须予以正视、肯定，还必须努力加以维护和弘扬。

五、任何一个民族的品格，都既有其民族性，又有其世界性，是个性与共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一个民族的品格，如果没有了自己的个性，它就失去了自身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因此，对于我们民族品格的基本精神，必须代代相传，不断发扬光大。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并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和进步更好地作出我们的贡献。

当然，我们在继承和发扬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同时，必须注意扬弃那些已与现代社会不和谐甚至相抵触的东西，对其中可取的部分也应给予重新审视，加以改造、更新和发展。在此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吸取外来文化中的有益养分。我们应当充满自信，高瞻远瞩，熔铸古今，兼摄中外，创造性地构建我们时代的理想品格，使之既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又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成为光芒万丈的灯塔，照耀我们更好地前行，去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 主要参考书目



1.《十三经注疏》（清）阮元编　中华书局 1980 年影印本

2.《四书集注》（宋）朱熹集注　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3.《论语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4.《孟子译注》　杨伯峻译注　中华书局 1960 年版

5.《老子新译》 任继愈译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 年版
6.《老子译注及评介》 陈鼓应著 中华书局 1984 年版
7.《庄子集释》 (清)郭庆藩撰 王孝鱼点校 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8.《庄子浅注》 曹础基著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9.《晋书》 (唐)房玄龄等撰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10.《宋书》 (南朝梁)沈约撰 中华书局 1974 年版
11.《南史》 (唐)李延寿撰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12.《旧唐书》 (五代)刘昫等撰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13.《新唐书》 (宋)欧阳修、宋祁撰 中华书局 1975 年版
14.《宋史》 (元)脱脱等撰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15.《资治通鉴》 (宋)司马光撰 中华书局 1956 年版
16.《陶渊明集》 逯钦立校注 中华书局 1979 年版
17.《陶渊明集》 王瑶编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版
18.《陶渊明集校笺》 龚斌校笺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
19.《李太白全集》 (清)王琦注 中华书局 1977 年版
20.《李太白全集》 中国书店 1996 年版
21.《苏轼文集》 孔凡礼点校 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22.《苏轼诗集》 (清)王文诰辑注 孔凡礼点校 中华书局 1982 年版
23.《东坡乐府》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24.《东坡志林》 乔丽华点评 青岛出版社 2002 年版
25.《高僧传》 (南朝梁)释慧皎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1 年影印本

26.《法书要录》 (唐)张彦远辑录 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4 年版
27.《中国文化典籍要义全书》 乔力主编 光明日报出版社 1996 年版
28.《中国古代文化史》(二) 阴法鲁、许树安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29.《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李泽厚著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版
30.《道教与传统文化》 文史知识编辑部编 中华书局 1992 年版
31.《禅宗与中国文化》 葛兆光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 年版
32.《中国哲学史》 冯友兰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33.《中国思想史》 葛兆光著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34.《中国教育思想史》 孙培青、李国钧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
35.《中国文学史》 袁行霈主编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9 年版
36.《中国美学史》 李泽厚、刘纲纪主编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 年版
37.《崇文盛世》 刘扬忠著 中华书局 1997 年版
38.《诗与酒》 刘扬忠著 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4 年版
39.《汉魏六朝诗:走向顶峰之路》 张亚新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
40.《曹操大传》 张亚新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1994 年版
41.《陶渊明研究》 袁行霈撰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7 年版
42.《李白》 王运熙、李宝均著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
43.《李白》 王瑶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44.《苏轼新论》 朱靖华著 齐鲁书社 1983 年版

45.《苏东坡传》 林语堂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年版

# 后 记



让我来谈古代文人的理想品格这样一个大题目,确实绝非易事。一方面,古代历史上下数千年,文人何只千万,情况纷纭复杂,把握起来,谈何容易;另一方面,品格问题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涉及到社会思潮、社会环境及文人生活的众多方面,把握起来,自也极为困难。但考虑到文人的理想品格显示了古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水平,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遗产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对

我们构建当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选题本身很有价值,因此也就不避举鼎绝膑的危险,勉力地承担了这一任务。

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许多方面历来被视作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代表,因此本书重点对三人的品格表现作介绍和评析,同时兼顾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总体表现,力图将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如前所说,由于选题本身地负海涵,包容巨大,因此本书总体说来只能算是粗陈梗概、浅尝辄止。如果读者读过本书后,能对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构成、表现、成因、影响等获得一个大致的印象,并能引发一些思考,就算是达到了目的。

本书为"文化中国:永恒的话题"丛书中的一种。丛书主编之一乔力先生是我的老朋友,自1987年在四川成都召开的中国古代文学学术研讨会上认识以来,我们已经数度合作,这次能够再度携手,实属荣幸。孔子说:"朋友切切偲偲。"曾参说:"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这在我们身上都有体现。济南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丁少伦先生,责任编辑王菁女士、赵志坚先生为出版本书劳心费神,多所匡正,谨此致谢! 在写作过程中,王笏、刘昕、刘云青、张川为我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也特予胪列,以志不忘。



本书完成之日,正值春光复来之时。一天上午,正坐在电脑前校对书稿,忽有久违了的熟悉而稚嫩的鸟叫声在耳畔响起,原来是一只燕子就站在我身边的窗台上,顿时感到莫名的新鲜和惊喜。正是:

新莺隐叶啭,新燕向窗飞。

——(南朝梁)萧绎《春日》

而当时的感觉,则如唐人令狐楚《游春词》所写:

高楼晓见一花开，便觉春光四面来。

在春光来到之时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自会给人带来春风拂面、春风得意的感觉。但愿这种感觉能常伴人生。但愿绚烂春光能永驻人间。

张亚新

2004年3月初于北京黄寺寓所